



小鳥

以文学之名

卷十八 2022.06

驯服与被驯服的：在拉萨繁育藏獒

周雨霏

科尔姆·托宾 《〈尤利西斯〉问世百年：现代主义文学的发端》 | 作家之爱

周恺 《何郎殉情》 | 小说家

姜紫 《隧道》 | 24小时文学聚会





小说

小说家 | P5 何郎殉情 周恺
24 小时文学聚会 | P11 绿洲青年旅馆 徐大龙
第二回 | P19 隧道 姜紫
P31 巨人的公园 水陆两栖
故事群岛 | P37 梦成真 胡安·卡洛斯·奥内蒂
P43 毒药 露西·考德威尔
P51 昏暗的餐厅 费利斯贝托·埃尔南德斯
P57 坠落的眩晕 玛丽·科斯特洛

非虚构

长乐路百业指南 | P61 蒲园记事之道 听途说伊险峰
田野中国 | P67 驯服与被驯服的：在拉萨繁育藏獒 周雨霏
吉井忍的二次会 | P79 潜入！小学语文课本编辑部 吉井忍
生活亲历者 | P85 工厂 | 定海桥往事⑤ 路明
小鸟文摘 | P91 言者何罪 熊景明
P93 乌克兰：超越“后苏联” 伊莱亚娜·纳凯斯库

档案

小鸟访谈 | P97 转型中国何以稳定？ | 陈映芳访谈 曾梦龙
Newsletter | P105 如果承诺管用，还要法律做什么？ 张依依
P111 尤瓦尔迪枪击案能否推进美国枪支管制？ Snufkin
P115 美国未来会爆发内战吗？ 曾梦龙
发现经典 | P121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汉娜·阿伦特
P129 阴晴不定的日子 葛兆光
P133 阅读、图书馆和纸，那些关于书的书 刘苏里
P137 米沃什的另一个欧洲 西川

专栏

作家之爱 | P143 《尤利西斯》问世百年：现代主义文学的发端 科尔姆·托宾
王伯伯脑保健操 | P147 这届人民审美疲劳了 /
P151 当珍宝海鲜舫沉入海底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 王永智
在汉堡 | P155 今天我们开车去卡辰 王竞



图片来自 [Joseph Pearson](#) on Unsplash

小鸟问答 Vol.18

小鸟 | 小鸟问答

不要忘记。不要习惯。不要忘记。不要习惯。

6月1日起，上海声称复工复产，但依然有太多无法走出家门的人。

聂鲁达说，智利人难为情地面对面相觑，无法确切弄明白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现在，我们在上海，我们有点难为情。

我们先看一段马尔克斯与他的朋友门多萨的对话。

门多萨（Plinio Apuleyo Mendoza）：你非常惊讶，发现拉丁美洲的独裁者都十分昏愦谵妄。每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你总给我讲一个从书里看来的这类故事。下令把黑狗斩尽杀绝的是哪个独裁者？

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arquez）：杜瓦利埃，海地的杜瓦利埃博士，人称“杜克老爹”。他曾下令把全国的黑狗斩尽杀绝，因为据说他的一个敌人为了逃避逮捕和暗杀，竟变成了一条狗，一条黑狗。

门多萨：巴拉圭的弗朗西亚博士曾经下令全国21岁以上的男青年都得结婚，是不是？马尔克斯：是的。他居然还把他的国家当成一幢房子关闭起来，只许打开一扇窗户递送邮件。弗朗西亚博士这个人怪极了，他居然还是一个颇有声望的哲学家，甚至能对托马斯·卡莱尔进行专题研究。

门多萨：他笃信鬼神吗？

马尔克斯：不，笃信鬼神的是萨尔瓦多的马克西米利安诺·埃尔南德斯·马丁尼斯，他让人把全国的路灯统统用红纸包起来，说是可以防止麻疹流行。马丁尼斯还发明一种钟摆，据说进餐前先在食物上摆动两下，便知食物是否下过毒药。委内瑞拉的胡安·维森特·戈梅斯有一种非常奇特的观念，似乎他具有一种预测未来的能力。

门多萨：他让人宣布他的死讯，后来又突然复活，这跟你这部小说里描绘的家长的情况一模一样。

引用马尔克斯，是因为看到聂鲁达一段话引起我们“共情”的一段话。他说：“在我们美洲动物志里，那些不可一世的独裁者都不过是巨蜥自动物，是史前陆地上庞大封建主义的幸存者。那个智利的犹大只不过是暴君的学徒，而且在蜥蜴目的等级上恐怕至多只能是一只毒蜥蜴。但是，他做足了损害智利的事，至少使这个国家出现了历史大倒退。智利人难为情地面对面相觑，无法确切弄明白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是啊，我们在上海，我们有点难为情。尤其是当我们面对死去的人，离开的人，死去的动物，一切因为愚蠢和暴力蒙受羞辱的人。总的来说，面对过去2个月发生的所有的事。

i

“不要忘记。不要遗忘。不要遗忘。”

我们做了一期《小鸟大声》特刊。事实上我们同时做了两期，《SAVE AS“另存为”·上海市民艺术展》和《小鸟大声》。对于后者，我们是发出了征集：在上海的你，经历了过去几十天之后，你最想跟所有人或者很多人大声说出来的话。好几位应征者

遵循“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原则，说出了我们自己最想说的，也是做这两份特刊时最想表达的话：不要遗忘。不要遗忘。不要遗忘。

ii

“不想再看了”。

一个月前，当“小鸟四月特刊”出来的时候，有一位读者与我们表示了厌倦：刚过去的一个月，太多负面情绪和信息了，不想再看了。她的话让我想起钱理群自己讲过的一段故事：老师在课堂上讲了许多痛苦。但我想，一个人可以阳光地活着，这不更好吗？

钱理群老师回答说：

我所说的是“丰富的痛苦”。我当年在上大学时读过一本俄国的剧作，题目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智慧的痛苦》，意思是说，真正的思考和智慧，一定是和精神的痛苦相伴而生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是代价，也是价值；思考与智慧的痛苦，是丰富的，它给你的生命是充实感。因此，我常说，我因思考而痛苦，但我从未感到空虚，我每天都为新的探索，新的发现而兴奋不已。这也是一种快乐，一种为思考，智慧的阳光所照耀的生活。当然，这是我这样知识分子的选择。人们完全可以选择另外一种不那么沉重的、更为轻松的、更偏重于物质享受与精神的愉悦的生活。那也很好。但要有一个前提：你的快乐是通过自己的诚实的劳动得来的，不能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不能靠掠夺别人伤害别人来换取你的快乐。

我们想说的是，思考，哪怕是沉重的思考并不是痛苦的缘由，痛苦是其它外力造成的。阳光是自己争取的（想到网上传的视频中“武康庭哈姆雷特”完美声线对太阳、自由的赞美），而苟且地以为自己拥有阳光，作埋头起的鸵鸟状，认为不看就不存在，是愚蠢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因为与此同时，他也一定会拒绝思考。

iii

更不要放弃思考。

重新去思考一些我们平常挂在嘴边上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新认识。这来自于我们以及与朋友读者聊天时的发现：很多话都会有新的解读。

比如：“生活还要继续。”以往我们在用这句话安慰他人或自我安慰的时候，虽然有一点无奈和逆来顺受的感觉，但实际上无非是亲人生病、飞来横祸，需要面对，时间终于会消弭掉震惊、苦痛或者悲伤。而现在，如果有人跟你说同样的话，你可能会疑惑：继续下去的是什么呢？生活继续下去是其他的、更大的苦难时，这句话的意义在哪里？

再比如我们经常告诫自己尼采的那段话，“凡是与怪兽搏斗的人，务必小心自己别在过程中也变成怪兽。对着深渊凝视太久，深渊也同样回望着你”。它容易被理解成是一句鸡汤——不要被恶龙吞噬，你要看到光明。但是，我们在最严酷的“十字花转运”、“强制入室消杀”那几天里，第一次意识到，当你身临深渊，你会不得不看着深渊，而且你还充满恐惧。

甚至，“确定性”比“不确定性”更让人担忧。因为当确定性意味着坏消息总会到来，意味着他们一定又想出了新的禁足词语，意味着他们一定想出了新的花招来控制我们……那可能还是不确定性中还藏着一点向好的可能性。

不要放弃思考，这可能是少数值得做的事之一。因为当你走出这段困境，你不应该再是昏昏噩噩的人了。

iv

不要绝望。

谁敢保证自己在长达两个月的监禁时间里，不会有须臾的绝望呢？我们都是凡夫俗子，我们生命本能中本来也不应该预置面对这样境况的机制，我们只是不断调动我们的应激反应罢了。如果把时间浪费在绝望之中，你就中了他们的诡计。他们不怕你绝望和恐惧。让你绝望和恐惧，甚至就是他们的目的。

v

我们应该更相信文明。

我们应该更相信文明，除了寄希望于文明的力量，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抓在手中捍卫自己权利的武器？

vi

是文明，而不是国家才在道德上有权要求人民的忠诚。

我们还借助约瑟夫·列文森，重新认识了顾炎武的那句著名的话。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辩？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列文森评价说：

文化与道德，亦即整个价值都属于“天下”，如果人们只知保“国”，那仅是一种政治上的利害关系。“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但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知道保“天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是文明，而不是国家才在道德上有权要求人民的忠诚。

vii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重新审视“生命至上”这句话了。

一种声音来自于我们的“小鸟大声特刊”：别逗了，去你妈的。你那叫好死不如赖活着。

另一种声音就是重拾顾炎武的话：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我们是在保护我们的文明。

viii

我们所做一切，所说的话，所希望的，都是文明延续。文明让人自由呼吸，让人识善恶，辨真伪，知美丑，文明让人成为人。当文明遭受挫折，我们当然要做一点事。这是为自己为未来必须要做的事。

ix

手动介绍这一期的内容。

特别推荐的是“田野中国”。作者周雨霏把田野和文学融为一体，无论从深入藏区观察藏獒养殖者的世界的水准，还是从讲述故事、把自我和他者有机统一在思考之中的能力，周雨霏都是佼佼者。

这一卷有一篇“24 小时文学聚会”，作者之前写过《四海饭店》。和上一篇一样，这一次的作品《隧道》有着精致的处理故事层次的能力。作者对把控叙述层次的耐心一如既往，层次带来情感的释放和信息的展露，故事的张力也随之展现。

6月16日是布鲁姆日——《尤利西斯》的主人公利奥波德·布鲁姆在爱尔兰街头游荡的日子。小鸟文学会刊发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纪念詹姆斯·乔伊斯的文章，也是这篇文章首次有简体中文版。

这一卷的小说家是周恺。除此之外，还会有一份特别的清单，是万圣书园的主理人刘苏里对“关于书的书”这一主题的大整理，犀利且赤诚。

“定海桥”系列的作者路明又有新作。固定专栏都会继续更新。

x

封面的鸟……

White-tailed Grouse，白尾雷鸟，松鸡家族中最小的鸟，永远生活在树木线以上的高海拔地区，其羽毛颜色随着季节的不同会发生变化，在夏天通常有灰色、褐色或白色斑点，冬季则完全变成白色。封面为作品局部，来自画家奥杜邦。

xi

最后，我们用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塔·米勒的一段话，结束我们的自说自话。我们不想离开这个国家。不想下多瑙河，不想飞到空中，不想爬货车。我们走进乱蓬蓬的公园。埃德加说：假如该完的完蛋了，那么别人就都可以留下来。他自己都不信他说的话。没人相信该完的一准完蛋。每天都听到有关独裁者患旧疾新病的谣传。这也没人信。可大家还是交头接耳，一个传给另一个。我们也传递谣言，谣言里仿佛潜伏着致命的病毒，最终还是会抵达独裁者本人：肺癌、咽癌，我们悄声说：肠癌、大脑萎缩、瘫痪，血癌。

他又要出去啦，大家交头接耳：去法国或中国，比利时，英国或韩国，利比亚或叙利亚，德国或古巴。耳语的时候，自己逃亡的心愿跟他的出行结合在一块了。

每一次逃亡都是给死亡提供一次机会。所以耳语才具有这样的吸力。两次有一次败给卫兵的警犬和子弹。

流淌的水，行驶的货车，静止的田野都是死亡地带。农民收割玉米时，发现风干或胀裂、被乌鸦啄空的尸首。农民收走玉米，让尸首留在原地，因为眼不见最好。到了晚秋，会有拖拉机来耕地。

对逃亡的恐惧使独裁者的每一次出行演变为就医急诊：远东的空气治疗肺癌，野生植物的根治疗咽癌，电池热枕头治疗肠癌，针灸治疗大脑萎缩，温泉浴治疗瘫痪。据说，只有一种病他不用出国就诊：治疗血癌用的童血他在国内就能获得。在妇产科医院用日本吸针从新生儿脑袋中抽取。

独裁者患病的谣言与埃德加、库尔特、格奥尔格和我母亲的来信相似。耳语是在提醒预备逃亡的人先等一等再说。人人因幸灾乐祸而热血沸腾，虽然灾祸从未降临。

独裁者的尸体如同人们自身腐朽的生命，悄悄潜入每个人的脑中。大家都想比他活得更长久。

xii

春天已经过去了。我们保持警觉，迎接六月。

留言给微博 @ 小鸟文学，或邮件至 info@aves.art。



小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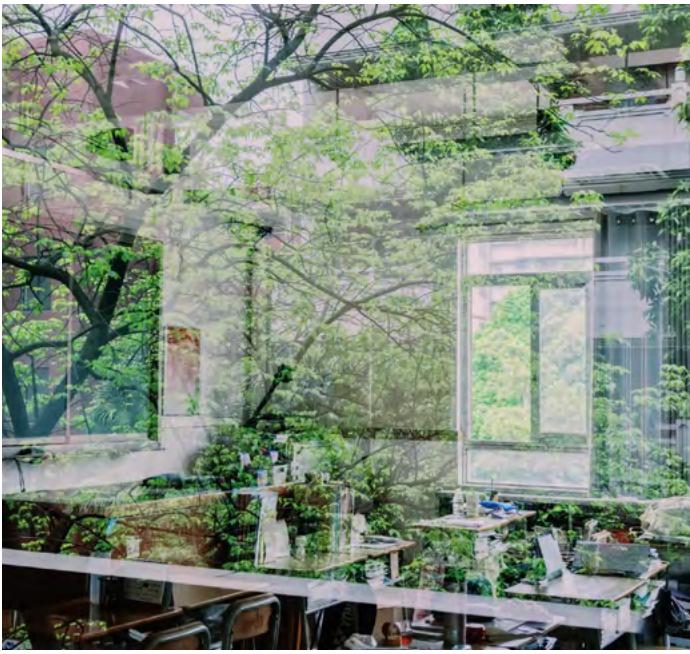
一份新文学杂志。注意，不是文艺杂志。

我们最大的愿望是找到最好的文学作品和作者，并呈现出来。

小鸟问答

这个栏目每月一次，回答来自读者的各种问题。

它放在每月的第一篇，兼有告知功能。



来自 [TopoloGiraffe](#) on Unsplash

小说

何郎殉情

周恺 | 小说家

他心想，她说我看不懂，
那她又看懂了啥子？

最后一节课结束后，班主任走了进来，把全班男生都留了下来。她给每个男生发了一张纸，叫他们在上头写四个字：我喜欢你。她说这个话时，别的班放学的学生正从门口过，他们笑了起来，有几个男生也跟到笑，被她呵止住了，然后，所有的男生就都拿出笔，工整地在纸上写下了那四个字，并署上名字，交了上去。班主任一张张认真比对，最后，只留下了六个男生。“跟我料想的一样，只可能是你们几个干的。”她从讲台上拿起了一张纸条，在半空中挥了挥，“哪个写的？”

那纸条是龚新海写的，是龚新海写给袁远的。

这学期开学第一天，袁远带了十多本小人书来炫耀，书的封面上全盖得有五丝厂图书室的章，应该是袁远的妈妈拿回来的，她妈妈原来在五丝厂上班，这年热天才下的岗。当然，袁远没讲这些，她只说：“书是我的，有武侠，有逮特务的，有打小日本的，你们哪个想看，可以来我这里借。”话音刚落，人些就围了上去，她从凳子上跳了下来，紧紧按住那些小人书，“不准抢，不准抢。”龚新海也凑了过去，但轮到他时，袁远桌上的书已经被拿光了。他问：“还有没的？”她耸了耸肩。他刚转身，她又说：“有倒是有。”她打开了书包，从里头又掏出一本，打量着他，“但你看得懂么？”他问：“讲啥子的？”她抬了抬嘴角，眯起眼睛说：“讲爱情的。”

龚新海借的这本最破旧，封面使桑皮纸包过，书名是手写上去的，叫《何郎殉情》，讲的是一个古代的故事，讲一个富家少爷喜欢上一个丫鬟，屋头长辈发现后，把那丫鬟打发了回去，并给富家少爷安排了一桩门当户对的婚事，可那少爷说啥子都不肯跟新婚妻子圆房，仍旧跑去找丫鬟，终于有一天，丫鬟的爹妈告诉少爷，丫鬟上吊了，并带他去看丫鬟的坟，那坟当然是假坟，可少爷偏偏信了，一头撞死在了坟前。当天晚上，龚新海窝在被窝头，打着手电筒看完了，那时，四周已是一片寂静，他浑身都泡透了，他关掉手电筒，把书放到枕头底下，晾着身子，侧躺在床上，后来，外头下起了雨，他听了许久的雨声，仍睡不着，重又打开手电筒，又翻开书，翻到少爷跟丫鬟偷欢的那一页，那页一个字都没有，只有一间柴房，柴垛上挂了两件衣裳，一件是男人衣裳，另一件是女人衣裳，那页还夹了枚树叶，那树叶是翠绿的。

第二天上课，龚新海困得眼皮都睁不开。第二节课下课后是课间操，但这天操场是湿的，课间操取消了，这样就有二十分钟的休息时间，他趴在桌上眯了一会儿，迷迷糊糊中听到有笑声，猛一下睁开眼，就看到数学老师那张臭脸。数学老师扶了扶眼镜，“睡安逸没有？”他摇头，点头，又摇头。数学老师拿书拍了下他的脑壳，“滚到后头去。”他走到了教室后头，先开始是站在第二排的后头，然后又挪到了第三排的后头，站在那里，恰巧能看到袁远的背影。数学老师背过身，在黑板上写着一道题。袁远把马尾拨到了肩膀上，手伸进了抽屉。数学老师指着黑板，“典型题。”袁远赶忙又抽出手，直起了身子。“龚新海，等于好多？”数学老师忽然问。全班的目

光都齐刷刷看向了他。袁远也转过身来，然后比了个一，又比了个二。他说：“十二。”数学老师将手头的粉笔朝他丢了过来，“睡嘛，刚刚才讲了。”全班又笑起来。袁远用肩膀遮着嘴，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袁远这学期变化很大，方方面面变化都很大。过去，她总是小心翼翼地不引人注意，作业按时完成，早上从不迟到，上课也从不接话，跟一堆女生在一起时，她会悄悄挪到边上去。像在以往，这天这种情况，她顶多跟到别人笑笑而已。

这天放学后，龚新海因为上课打瞌睡，被留下来帮到打扫卫生，正好当天负责卫生的小组就是袁远他们那组。他们负责拖地和扫地，龚新海只用负责抹前后黑板。或许是粉笔灰的缘故，抹黑板槽的时候，龚新海一连打了好几个喷嚏，然后，他就听到笑声，是袁远，只她一个人笑，其他人都没笑。他把剩下的半截黑板草草抹完，就喊小组长验收，这时，袁远也放了扫把，也喊小组长验收。他俩就这样一前一后地出了教室，龚新海能听到袁远黏哒哒的脚步。走出校门，她突然喊：“龚新海，等到我。”他住了步，但没回头。她跟了上来，“我跟你一路，我今天也走老街。”他说：“哦。”学校出去是顺江路，顺江路有半边还在翻修。她盯着脚下，“今天上数学课，你是看到我说十二，你就说十二么？”他说：“不是。”她说：“我以为是，我看到你在看我。”他说：“没有，我站后头看不清黑板。”不晓得是没有走稳，还是刻意的，她撞了他一下，“应该是二十，要先算除法。”他把手抄到了屁股兜头，“我站后头看不清黑板，我晓得是二十，我晓得要先算除法。”一部拉河沙的狗儿车从他们侧边驶过，袁远捂着鼻子，车开了脑壳，拢老街街口，才松开手，答应了声“哦”。龚新海回头瞄了眼那部已经驶远的狗儿车，问到：“你是要去供销社买东西么？”她说：“不是。”又问：“你借去的书看完完了么？”他说：“还没有。”她说：“你要是不是看，你就还给我，我都还没有看完。”他感觉心窝子被刺了一下，“你没看完？”她说：“看到一半。”他说：“我下个星期还你。”她住了步，嘀咕了句，“我就晓得你看不懂。”然后，便快步甩开了他，再又跑了起来。这时，龚新海才反应过来，袁远是来找她妈妈的，她妈妈正抱着手，站在供销社的裁缝铺门口，等到她。他琢磨着她刚才的话，觉得脸上有些烧。

接下来的两天是周末，龚新海把那本《何郎殉情》从头到尾地又翻了几遍，夹在书中的树叶变干了，他越来越肯定，这枚树叶就是袁远夹进去的，他心想，她说我看不懂，那她又看懂了啥子？星期天，龚新海他妈出门买菜时，龚新海让她带了本字帖回来，那天下午，龚新海就躲房间里，把字帖上的纸撕下来，蒙在柴房那页上头，太阳光从桌子上退到了地板上，又从地板上退到了窗外。龚新海的手越抖越凶，越摹越糟，他靠到椅背上，歇了一会儿，然后把临到一半的画折了起来，从字帖上又撕了一张纸下来，使直尺比到，一笔一划地写：袁远，我喜欢你。正要写“龚”字时，外头喊：“吃饭咯，听到没有？”他答应：“听到了。”握着笔犹豫了一下，又答应：“马上。”然后便放了笔，小心地把那页纸裁成细长的条条。

星期一早上，龚新海比往天早起了半个小时，头一个赶到了学校，坐到位子上，把小人书拿出来，把那张纸条抽出来，看看纸条，又看看袁远的方位，像被一股潮润的水气笼罩着，坐了一会儿，听到楼下车铃铛响，又垂头丧气地把书收回了书包。第二个进教室的是住在庙子沱的苏磊，虽然庙子沱离太平场很远，但以往，苏磊都是第一个到教室。“我还说哪个那么早。”他一手提着米，一手拿着刚掐的一把马鞭子，米是拿来抵学费的，马鞭子是拿给几位老师当教鞭的。龚新海没理他。他放了手头的东西，走了过来，似乎是想跟龚新海扯几句白，“你来补作业么？”龚新海头也不抬地说：“关你锤子事，狗腿子。”苏磊愣了片晌，识趣地回了位子。

后来，别的同学也陆陆续续来了，袁远是跟两个女生说笑着进来的，龚新海以为她会车过来看他，她没有，她刚坐定，班长就走到了讲台上，领着大家读古诗。龚新海也翻开了语文书，也跟到张嘴巴，可心头想的却是，到底该不该把那张纸条夹到书里？早读课结束，坐龚新海后头的彭宇拿着书去还袁远，袁远接过书，翻也没翻，就塞到了抽屉头。就趁到这时机，龚新海把手伸进书包，摸出小人书，放到桌子上，使手掌压了压，然后迅速起身走过去。“给。”他把书递给了袁远。袁远正扎头发，嘴皮咬着橡筋，问：“看完了？”他说：“嗯。”又说：“没看。看我不懂。”他把书丢到了她桌子上，然后返身回了自己的位子。他紧张得快晕过去了，他把手叠放在课桌上，下巴搁在手背上，盯着袁远，她一只手抓着头发，另一只手将橡筋套到马尾上，一圈，两圈，三圈，然后将橡筋往上勒，然后晃了晃脑壳，然后将桌子上的小人书塞到了抽屉里。“袁远。”他们那组的小组长在叫她。她转过头来。龚新海忙看向窗外。“你作业还没交。”小组长说。“哦。”袁远说，“哦，我马上交。”

接下来的一节课，龚新海的目光几乎没有离开过袁远，他用右手撑着额头，手掌遮着眼睛，时不时咬咬笔头，这样，老师就以为他是在思考问题。龚新海注视着袁远，注视着她的每一个动作，她摸摸耳垂或者揉揉太阳穴或者在文具盒里翻找铅笔或者跟同桌借橡皮或者侧着身子望到回答问题的同学，都会让他揪心一下。第一节课下课，又有两个女生去还书，其中一个女生跟她多说了两句，似乎是想再借一本，然后，龚新海就看到她从抽屉里拿出了《单刀会》和《何郎殉情》，当那女生指着《何郎殉情》时，他差点站了起来，好在袁远笑了一下，递了《单刀会》给她。最难熬的是第二节，那节是数学课，不晓得啥子原因，数学老师没有来，班长坐到了讲台上，喊大家自习。班上有一大半同学，要么睡觉，要么摆龙门阵，坐讲台两侧的两个男生像是为啥子事争执了起来，袁远托着下巴听了几分钟，兴许是觉得无聊，她把一张纸折成了豆腐块，放到桌子边沿，然后埋下身子，额头靠在上头，刚开始，龚新海以为她在睡觉，可没过一会儿，他就发现她的肩膀在动，她可能正把书摊在腿上，她可能正在翻书，当他意识到这点时，耳朵头嗡地一响，四周的声音像是瞬息被压缩了一样，他把脑壳埋到了手臂上，直到下课铃打响，才慢慢抬起头。“你额头上杠杠的。”袁远的同桌对她说。“是么？”袁远搓了搓额头，两人一同走出了教室。她看到那张纸条了么？她若是看到了，咋个一点反应都没有？教室逐渐空了，然后，整栋教学楼都空了，操场上响起了广播体操的音乐。龚新海坐在那儿，想，兴许她翻的不是那本书呢？他轻声站起来，走到教室门口，探出头睃了眼，然后，快步走到袁远的方位，从她抽屉头抽出《何郎殉情》，抓着书脊，抖动手腕，那张纸条落了出来，那枚树叶也落了出来，并轻飘飘地滑到了地上。他把纸条揉成一团，然后弯腰捡起树叶，夹回

书里，将书放回原位。不管她有没有看到这张纸条，就当啥子都没有发生过。他在心头对自己说。这时，零散的脚步朝教学楼涌来。就当啥子都没有发生过。可他仍不自觉地回过头，盯着袁远的抽屉。就当啥子都没有发生过。他捏紧了拳头，然后忽一下就泄了气。

“你没有下去做操？”苏磊头一个跑回教室，喘着气问龚新海。龚新海看也不看他，“我下去了啊。”苏磊叉着腰说：“不可能，你飞上来的？”龚新海说：“你管老子咋个上来的，你要敢到班主任那儿乱讲，老子打死你。”然后从班长的桌子上拿了本别的作业，老师要中午才有时间批改，班长一般是第三节课下课才抱过去，他还有一节课的时间可以拿来补周末的作业。龚新海一边抄，一边瞄到袁远，她并没有啥子异样。第三节课下课，龚新海勉强抄完，追到走廊上，把作业给了班长，然后顺带下楼尿了泡尿，他刻意走得很慢，再回到教室时，已经上课了，音乐老师正演示竖笛，他没有停下来，只是甩了甩头，示意他进教室。音乐老师演示了一下指法，然后就开始完整地吹一支曲子，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笛声中，甚至闭上了眼睛，班上的同学也沉浸在他的笛声中，大家都默默地看着他，结束时，大家都鼓起了掌，除了袁远，她的手放在抽屉里，身子紧紧地贴着课桌，东张西望。

吃饭时，袁远跟前排的几个女生把课桌拼到一起，围着坐，往天她们也这样，往天，袁远是向到讲台坐，这天，她换了个位子，她坐到了过道上，侧对着龚新海。她们一边吃饭，一边小声聊着天，小声得像在说悄悄话，每当有人从她们那儿经过，她们就闭上嘴，互相看着。她们似乎聊到某个讨厌的老师或者同学，有个女生过于激动，叹了口气，“那个瓜婆娘。”她立马意识到自己失了口，一双手捂住了嘴，其他几个女生愣了一下，然后，少有地放声笑了出来。就是这一刻，袁远看向了龚新海，她伸着颈项，目光越过那个捂着嘴巴的女生的肩膀看向了龚新海，她嘴角带着迟疑的笑，龚新海也扬了扬嘴角，随即，她的脸红得跟猴屁股一样。她已经发现纸条了，她一定想到了我头上，她一定会来问我，龚新海想。

“让一下。”龚新海端着饭盒，侧身从袁远背后走了过去。她没有抬头，也没有起身，只是往前稍微倾了倾。这时候，洗碗的人还不是很多，龚新海走到了水槽最边上，刚站上台阶，就看到袁远也过来了，只她一个人，她盯着饭盒，步态很别扭。起先，她站在水槽的中间，他们之间还隔了两个人，没一会儿，走了一个，她挪了一步。龚新海把饭盒从里到外，洗了又洗。她似乎也是这样。又过了一会儿，另一个人也走了，她又挪了一步，但并没说话。自来水哗啦啦地流。龚新海使饭盒接了碗水，漱口的时候，她关掉了水龙头。“你塞了张纸条在我抽屉头。”她说。这并不是一个问句，龚新海听得很清楚，他吐掉嘴里的水，偏过头去看她。她没有看龚新海，她若是看着龚新海，龚新海肯定会心虚，她看着她饭盒盖子上的商标，想把它撕掉。龚新海问：“你说啥子？”她抬起头，迟疑了一下，“你塞了张纸条在我抽屉头？”龚新海车小了水龙头，“啥子纸条？”她皱着眉头，“没的啥子。”然后拍了下饭盒盖子，又说了一遍，“没的啥子。”她走了，仍是那样，步态别扭。龚新海把饭盒放到一边，然后把手臂伸到了水龙头底下，让水顺到肩膀流去，直到整个身子都凉爽下去。

龚新海以为他的反应和回答是聪明的，他既没有承认纸条是他写的，也没让她打消怀疑。他设想了许多可能，单单没有想到她会告诉班主任。

“那我就坐这儿跟你们耗到起。”班主任虽这么说，但她没这个耐性，只几分钟，她又说，“不承认么？那我喊派出所的人来查笔迹咯。”没有人开腔。“好嘛。”她拿起了马鞭子，轻轻地敲着讲桌，嗒嗒嗒。那声音听得龚新海头皮发麻。“好嘛。”她逐个打量底下的人，就好像那张纸条是他们六个人联手写的，“好嘛，乳臭未干，就搞这些名堂。”她的口水淌了出来，坐第一排的男生躲闪了一下。她的话以及那个男生的动作逗得龚新海想笑。“龚新海。”她说，“这像是你的字哦。”龚新海连忙摆脑壳，“不是我。”她说：“不是你？我看就是你，这就是你的字。”龚新海做了个赌咒的手势，“不是我，我发誓。”她喊：“站起来。”龚新海站了起来。她问：“今天课间操你在哪儿？”龚新海说：“在操场上啊。”她问：“在操场上么？”龚新海说：“在啊。”她说：“我咋个没有看到你喃？”龚新海慌了，他不晓得她是不是在诈他。“再问你一遍。”她使马鞭子指到龚新海，“课间操你在哪儿？”看到那根马鞭子，龚新海忽一下就想到了苏磊，准是他告了他的状，他慌了，“不在，我在……我在教室头。”她露出了狡黠的笑，“你在教室头搞啥子？”龚新海说：“我肚皮痛。”他赶紧抠着课桌，“那纸条……那纸条真不是我写的……我发誓。”他话音未落，一阵凳子响，是彭宇站了起来。班主任瞪着眼问：“你又咋子？”

彭宇梗着颈项说：“本人写的。”

彭宇替龚新海挨了五鞭子，重重的五鞭子。心狠手辣的班主任拿马鞭子沾了水，在彭宇的手板心上打了两下，又在他大腿上打了两下，最后一下，班主任叫彭宇投降似地举起两只手，然后，马鞭子唰的一声横起抽了过去，抽到他手臂内侧，听起来都痛，彭宇硬是没吭一声，他退了一步，仍高举双手，像个受刑的英雄。

龚新海跟彭宇一点也不熟，准确说，彭宇跟哪个都不熟，他总是独来独往，他们都怕他。三年级有一阵，他们班好些男生女生迷上打乒乓球，每天中午，他们都会端着饭盒去乒乓球台那儿轮流打几把，打不了太久，高年级的下来后，他们就得让位。那天，彭宇也端着饭盒下来了，起先他只是在旁边看着，不晓得啥子时候，他默默地排了过去，轮到他，他把饭盒放到了地上，拿过球拍，不巧，刚站过去，高年级的就来了。往天这时候，他们总是自动就散了场，这天没有，因为彭宇站在那里不动，并招呼对面已经让开的同学，“别走，发球啊。”高年级的挤他，“发你妈屁。”彭宇一只手仍握着球拍，另一只手抓着球台一角，不肯让步。僵持了一会儿，高年级的退了一步，架起手拐子，猛地撞向他，然后又退一步，又撞上去。彭宇的双腿压成了弓步，每挨一下，他就发出一声“唏——”，那声音是从他的齿缝间挤出来的。旁边几张台子的人都停了下来，盯到他们这头。顶了有六七下，高年级的才停下来。“小杂种。”站在彭宇对面的那个人问：“小杂种，你打得很好么？”彭宇几乎快趴到台子上了，他瞪到对面的人。“小杂种。”对面的人用球拍剁着台面，“小杂种，这样子，我们来打一把，哪个输了哪个滚。”彭宇环视了下周围，渐渐松了手，揉着肩膀，羞涩地笑了，迅速又把那笑容憋了回去。只看彭宇拿球拍的姿势，就晓得他不会打球，他横握着球拍，五根手指都握在拍柄上。对方掂了掂球，然后将球高高抛了起来，

显然，对方在嘲笑彭宇，平时，没有人这样发球。彭宇望着球，身体紧张得像只乌龟，肩膀抬着，脑壳缩着，两腿微微下蹲。球发得不好，软绵绵的，弹得很高，喂到了彭宇眼前。彭宇一手撑着球台，像打羽毛球一样，把球盖了过去。阴差阳错地，他竟然打出了一记好球，球落到了对方的反手角，对方跨步过去，慌乱地接住了球。球再次高高地跳到了彭宇的眼前，他用同样的方式，又盖了一下。这次，球落到了对方的正手，对方切了一记下旋。球恰恰越过中界，刚一落到台面，迅速改变方向，回了过去。彭宇傻站着，高年级的大笑着，挥着球拍叫他让位时，他仍没反应过来发生了啥子。“你输了。”高年级的推了他一下。他站了回去，“没有，是你们输了。”高年级的码起了脸，拿球拍指着，“滚不滚？”彭宇再次抓住了球台边沿，“是你们输了。”“日你妈。”高年级的一脚踏到了彭宇身上。彭宇死死地抓着球台“有种你打死老子，有种你打死老子。”他重复着这句话，然后，对面的球拍就飞了过去，正正打中了他的鼻梁。所有人瞬间安静下来，血顺到他的鼻梁和鼻孔往下流。高年级的走了，彭宇嘀咕着去捡起球，转过身对众人说：“来啊，继续。”

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他们怕彭宇，倒不是因为彭宇打架多么生猛，而是因为他有一种被打断了牙齿会悄悄吞下去的狠劲。

龚新海想不通，彭宇这样脾气又倔又古怪的人，咋个会主动替他背黑锅。龚新海更想不通的是，第二天早上，前几排的女生拿这事跟袁远开玩笑，而彭宇竟然刻意地昂着头挺着胸，从她们中间经过。害羞的反倒是袁远，她捂着脸，背过身去，过了会儿，抽泣起来。那天上午，龚新海的目光始终在彭宇和袁远之间徘徊，就连他自己都快以为那纸条是彭宇写的，是彭宇塞到袁远抽屉里的了。

中午吃过饭，天气闷热，太阳正当晒，多数同学都呆在教室里，或趴在桌上午休，或小声摆着龙门阵，只有几个男生在阳台上弹蚌壳。龚新海也趴在桌上眯了一小会儿，没睡着，他耳朵里老是听到彭宇和袁远的名字，他抬起头，彭宇正拿着小刀在桌上刻着啥子，而袁远则托着下巴，像是在睡觉，也像是盯着黑板发神。那纸条是我写的，彭宇不过是替我背了黑锅。龚新海在心头说着，他希望袁远能听到。龚新海忽然想到，他为啥子不再写一张，对，他应该再明明白白地写一张。犹豫片刻，他从作业本上撕下了一张纸，教室里很安静，有几个同学回过头来看他，他又撕了一张，撕得更整齐些，然后，他把笔夹到耳朵上，把纸拿在手上，学着彭宇昂首挺胸的模样，沿着第一排和第二排的过道，从教室前门走了出去。

三楼是五年级的地盘，满是鸭公嗓挤出的肆意的笑，再往上就是天台，天台门总是锁着，那条楼道既不通风，也没日照，越往上，越是黑黢黢，粘乎乎，梯步上有些零食袋，有些碎玻璃，还有些烟头。龚新海一直上到最顶一级，然后将那张废纸垫在梯步上，背抵着天台门坐下，再把另一张纸铺在腿上。这次他打算写长一点，写满整张纸。

袁远：你好，猜猜我是谁？猜不到么？看完这封信，你就知道了。

写完第一行，纸张已经戳破了好几个洞，龚新海牵起来看了看，又继续往下写。

我是躲在三楼的角落给你写的这封信，这里光线不好，我的字很丑，希望你不要生气。好像是从上学期期末开始，也好像是从这学期才开始，我喜欢上你了，我喜欢你，所以我每天上学都很高兴，我老是偷偷看你，看你的时候，我希望你也看我，但我又害怕你看到我在看你，这样，我就老是听不进课。

作文纸已经写到一半了，接下来的字龚新海写得更小了些。

现在，我感觉好多了，你马上就知道我是谁了。上个星期，你借了本书给我，那本书是讲爱情的，你以为我读不懂，其实，我读得懂。我读懂了，然后，我就在书里头夹了张纸条。你猜到我是谁了么？其实，你早就猜到了。你还问我，那纸条是不是我写的？如果，当时我答应是呢？你就不会把纸条交给老师？你是不是也喜欢我呢？我觉得是。

他停住了笔，天台上飘过来的那股沥青味，熏得他眼淋子流，他把脸伏在腿上，过了会儿，又添上了最后一句。

现在，我感觉好多了，你已经知道我是谁了。

一张纸正好写满，他只能在右下角的空白处，歪扭地写上自己的名字：喜欢你的龚新海。如果时间充裕，他还想再读一遍，但来不及了，他站起来，抖掉纸背面的灰尘，将纸叠成豆腐干，揣到了裤兜里，转过楼角，他差点滑了一跤。狗腿子苏磊正半边身子靠在栏杆上，指到他笑。

“笑你妈屁。”龚新海镇定下来，在梯步上刮了刮鞋底。

“我就晓得。”苏磊仍指到他。

“晓得你妈屁。”龚新海快步往楼下走。

苏磊跟着他，压低声音说：“哼，我就晓得那纸条是你娃写的。”

“别跟到老子。”他甩了他一拐子。

“你娃那天课间操时候写的。”苏磊突然放开嗓子说。

龚新海在二楼和三楼的转角那儿停住了，“你说是老子写的，老子还想说是你写的嘞。”

苏磊也停住了，“你放屁。”

“老子看到你提前跑回教室，塞了一坨啥子东西到袁远抽屉头，老子马上就去跟彭宇说，说该吃鞭子的是你。”龚新海继续下到二楼。

苏磊追了上去，“你放屁，明明是你。”

龚新海冷笑着说：“是你，老子亲眼看到的。”

快走到教室门口时，苏磊竟然想把手伸进龚新海裤兜，“那你兜儿头的是啥子？”

“是你妈屁。”龚新海甩开他的手。

苏磊又伸了过去，“有本事拿出来看下。”

龚新海抓住他的手，使劲一拽，他踉跄扑到了地上，龚新海三步跨上去，趁他起身前，又捎了他一把，然后坐到他身上，“老子不打死你个贼娃子。”龚新海一连往他脸上擂了好几拳，直打到他告饶，才停下来，但手仍按住他的脑壳，嘴上仍说着：“你个贼娃子，你个贼娃子。”

“让我。”是彭宇在说。

这时，龚新海才发觉，一帮子人正堵在教室门口看热闹，龚新海站了起来，甩了甩手腕。

彭宇抄着手，昂着脑壳，吹着口哨，从他旁边走了过去。

龚新海兜里的那封信自然不敢再递给袁远。在学校头，他尽量绕开她的方位走，不可避免地，在走廊上或者楼梯上迎面而过，他也会略惊慌地偏开脑壳或者低下脑壳。不单在学校头绕开她走，上学放学，他也不再走老街，袁远的妈妈现在在帮供销社的裁缝铺，他怕走老街碰到袁远。但上课的时候，当她背对着他时，他仍旧会偷偷注视着她。后来，他找到了一个排解的方法——把她画下来，就像他摹着小人书，画那间湿漉漉的柴房一样，那些被深埋的、模糊的情感，在纸上，透出了一丝光亮。学校头发的美术本被他画完了，他就在算术本上画，在作文本上画，在所有空白的纸面上画。

袁远只是短暂地低落了几天，几天后，袁远变得更开朗了。她学会了在课堂上接话，有时是抢着回答老师的问题，抢在老师抽问前，就把答案说出来，有时是迎合老师的话，譬如，老师说：“中国人最擅长打乒乓球。”她就会补充一句，“国球。”有的时候，只是灵机一动的俏皮话，譬如，老师说：“这世上没的绝对的事。”她立马就问：“绝对没的么？”每每受到老师夸奖或者逗得众人发笑，她总会摸一摸后脑勺，作出一副无意的样子。课后也是这样，当她们一群女生伙在一起时，她不再站在边上，而是站在中间，她成了话最多的一个。当然，在某些时候，袁远仍会露出害羞且紧张的神色，比方有人提到彭宇的名字时，比方彭宇从她的坐位经过时。那时候，已经没人会拿那件事洗涮袁远了，但她听到他的名字，或者看到他，仍是别扭的。令龚新海最伤心的一次，是十月底的一节体育课，他们十几个男生轮替着在打半场篮球赛，而袁远和另一些女生在篮球场旁边跳高，袁远跳完，排到队伍的末端，一颗篮球弹了过去，打到了她的腿上，她反过身来，朝他们吼：“哪个甩的？”然后，她就发现，篮球是从另一个半场弹过去的，彭宇独自一人在那边投篮，她瞟了他一眼，迅速用脚尖拨开了篮球。

天气转冷后，袁远多了好几套新衣裳，袄子、套头衫，甚至还有羽绒坎肩。另外，她又带了一些课外书到学校头来，不再是小人书，而是一套崭新的阿童木的漫画。就跟上次一样，班上的同学争相到她那儿借书，看完一本，得先把书还给她，才能借到另一本，没有人能依顺序看，只能在聊天中，相互拼凑起情节。大家都在聊阿童木，龚新海也听得心痒痒，好几次，看到有人拿书还她，龚新海都想走过去管她借，但一想到上次的经历，又打消了念头。

袁远再次跟龚新海说话，已是十二月初了。每年这时候，龚新海的手都要生冻疮，左手尤其厉害，肿得跟熊掌一样。中午稍暖和的时候，正是最难受的时候，太阳光一照，那些关节就像有蚂蚁咬。袁远走过来时，龚新海正用衣裳上拆下来的一根线，勒紧指头。“龚新海。”她敲了敲他的课桌，她刚睡醒，脸是红通通的，声音是嘶哑的，“今天我要去供销社。”他望起脑壳。她说：“放了学，你等到我嘛。”没等他回答，她就走开了。那根线被龚新海越勒越紧，指头由红变青，由青变紫，就快麻木了，线头一松，那根指头像要炸开一样。

放学铃打响，龚新海已经收拾好了书包，袁远磨磨蹭蹭的，待教室头只剩下打扫卫生的人，她才背起书包，龚新海也跟到起身。跟上次一样，他们一前一后地走，只不过，这次，龚新海走后头，袁远走前头。顺江路已经修好了，柏油路面，平平整整的，几个男生女生拼起骑自行车，踩得飞快，笑声和车铃铛声渐远。拢老街街口，袁远终于住了步，取下书包，使一只脚背垫着，从里头找了本书出来，是漫画书。龚新海也住了步，裤兜里的手紧紧捏着。“给。”她重新背上书包，侧过身来说。他走上前去。她问：“你喜欢看漫画么？”他点头。她把书递了过去，“你拿去看。”他接过书。她掐着衣扣说：“你看完，再帮我拿给彭宇，连同书里头的信一起。”然后，她就走了，就跟先前一样，快步甩开了他，再又跑了起来，留下的雪花膏的香气许久才散。

袁远的信写了整整两页，是用信笺纸写的，是那种大人才用的信笺纸，如果换成作业本的纸，至少有四五页。她称呼彭宇为“彭宇同学”，她从那张纸条开始说起，她说她展开纸条，一看到那几个字，就很害怕，也很生气，她就把纸条交给了老师，可是，她渐渐就后悔了，尤其是第二天，当她听说他为这事挨了鞭子时，她觉得她不该那么做，她应该像眼下这样，跟他谈谈。她谈到了对未来的畅想，她说，现在她妈妈对她管教很严，她也逐渐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她会努力把成绩提上去，她希望将来能考进县高，然后再考上师范校，她的理想就是当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然后，她又问彭宇有没有理想，她希望他也能找到一个理想，并为之奋斗。这些用了一页半的篇幅，这一页半，她是用钢笔写的，字迹工工整整，一个黑疤都没打。最后半页，她换成了圆珠笔，字迹稍潦草了些，她延续前头的话说，他们还不到谈情说爱的年纪，但她认为他是诚实的，善良的，她愿意和他做朋友，她有好多开心与不开心的事，想和他分享，如果他也愿意跟她做朋友，就在还她书的时候，也写上一封信。结尾署名的地方，有枚浅浅的手掌印，准是她检查时，不小心拂到的。

龚新海盯着那枚手掌印出神，就像是听到了她的声音，听到她在念这些句子，可翻回到开头，看到“彭宇”两个字，他又回过神，他把信折起来，塞到衣柜里，塞到那堆画的中间。他打开漫画书看了会儿，眼睛渐渐糊了，于是他又站了起来，从衣柜头取出这封信以及那堆画，冻疮里的脓水像是渗到了骨头里，渗进骨头缝地痒，接着，它们一张张地撕成粉碎，他不明白，事情咋个会变成这样，他呜咽着低语道：“我永辈子都不再理你了，永辈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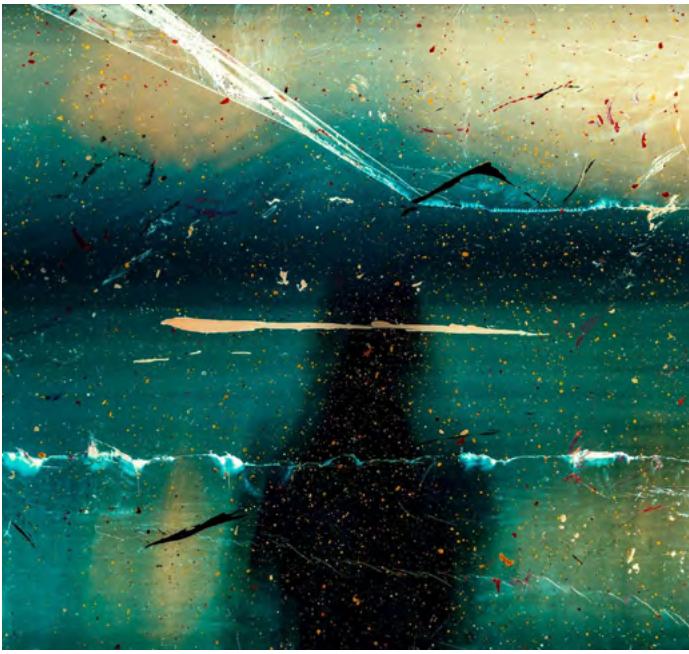


周恺

1990 年生，四川乐山人，写小说，出版有长篇小说《苔》，短篇小说集《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

小说家

这里是华语作家的首发原创小说。我们尽力挑选出最好的作者，也等待最好的读者。



图片来自 [Jr Korpa on Unsplash](#)

小说

绿洲青年旅馆

徐大龙 | 24 小时文学聚会

他们都靠在座位上，满脸的疲惫，我混在他们中间，一下子就被淹没了。

献给心心美

(一)

喀什地区距离乌鲁木齐一千六百公里，坐火车需要二十五个小时。我礼拜一上车，礼拜二下午到。火车上很拥挤，座位上坐满了人，其中一些是学生：大学生或者是高中生，一些人我能看出是来旅行的，剩下的大部分还是新疆人。我心里想着一千六百公里，或许对于他们来说，那也是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车窗外一直是沙漠，连绵不断，我之前没怎么见过，就一直朝窗外望，可久了就觉得无聊。本地人隔一段时间就在地上铺起毯子做礼拜，一天五次，我又盯着人家看。但看多了也腻。

到了喀什，下了火车，我背着包又走进购票厅，打算把回程车票先买了。火车站挺破，人挺多，排成了两个队伍，我在右侧队伍里面排着队。这时候快下午六点了，天看起来还像下午两点似的。天气炎热又干燥，我热得冒汗。左侧队伍有一个老外扎着辫子，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T恤，正举着钱和售票员说着什么，他说了一会儿就一脸无奈地走了，回到队伍最后继续排队。几个军人走了过来，他们背着大大的包裹，被人领着插到了我们队伍的前面，大家一边嘟囔囔地说着什么一边往后挪。等了一会儿，又排到那外国哥们儿了，我听了听，他在说汉语，但是只会说一句，是个地名（大概是克拉玛依吧）。他不停地说话拉玛依，售票员不停地朝他要护照。老外又要走了，我想他他妈又要回去重新排队了。这时候我前面一个小姑娘冲他喊了一句“your passport!”。老外把护照递了进去，然后回头朝她笑了笑，露出一嘴黄牙，售票员接过护照翻了翻就把车票和找零给了他。他看起来挺开心的，就好像这是他这辈子做的第一件事，离开的时候特意过来和她打了个招呼。

我是坐公交车到的绿洲青年旅店，在门口我看到了YHA的标志。进了门，我看到了如青，她是一个南方姑娘，个子不高，小鼻子小眼儿的，皮肤挺白。

如青给我登记了入住，然后她说：“之前咱们沟通过，你会开车。你先稍微休息一会儿，然后你就开车去火车站接个客儿吧。”如青说话声音不好听，牙尖嘴利的，带着点挖苦人的劲儿。

我问她是不是外国人，她说不是。她递给我一大块西瓜，“你会说英语，真好。但是这次不用。”她又从柜台里面拿出来一个盘子，然后问我不要吃块馕。

是一辆老尼桑，看起来挺破。我看到的第一眼就心想这不会是他妈手动挡的车吧。还好，是自动挡，而且开起来也还行。其实开起来怎么样我无所谓，能开就行。从旅店出来右转到喀什噶尔大道，然后一直往北开个十公里，再往左一转就到了火车站了。出站口在马路对面。我调了头，把车停在路边，然后下来抽烟。

将近八点钟了，天还通亮，远处黄沙漫漫的，我的脸被晒得生疼。我拿出来一瓶水喝了几口，然后学着出租车司机的样子把剩下的水浇在挡风玻璃上。这时候安玲走了过来。

她身材非常矮小，背着个看起来比她还大的登山包，风尘仆仆的样子。

“请问是绿洲青年旅店的车吗？”她问。

我这时认出来她就是车站里的那个女孩，就是给老外当翻译的那个。我说是，然后问她是不是安玲。

她礼貌地说：“我是安玲。”

我把烟扔地上，说：“我是王奥，包放后备箱，然后咱们走。”

回程的路上，我对她说她看起来像是日本人或者是韩国人。她笑了笑，没说什么。

我们回到旅店，我把车停在了门口，然后帮安玲把她的背包拎进店里。如青在前台，她让我把车开进后院，这时我才发现这里还有一个后院。真不错。

店里没什么人，只有一个中年谢顶的胖子挨着书架坐着看书。如青朝安玲要证件，安玲把护照递给了她。我看了一眼：香港人。接下来如青教我怎么办理入住。其实也简单，有身份证件的，刷身份证件，我是这么想的，没身份证件的老外或者是假老外，总之拿护照的，就把护照拍个照片上传系统，然后录入护照号，就完了。入住和离开日期随便填，房钱自己计算好就行。

“这玩意还挺先进的。”我对如青说。

“什么？”如青问我。

“这个软件系统，办理入住的这个。”我说。

“哦，确实。前一阵子才装上的。要求的，不装不行。”如青说，“有时候也坏。”

“坏了怎么办？”我问。

“过会儿再试。”她说。

我算是员工，住三楼员工房间。上楼时，我看到楼梯处有大扇大扇的绿色窗户，我站在那里向外望了望，整个城市都是绿色的了，我联想到了沙漠里的啤酒瓶。员工房间不过是一间普通的客房，里面有六张床铺，但只住我一个人。

晚饭时候，我第一次见到周生。他瘦高高的，带着金属框眼镜，脸长得像个高中生，看起来挺痛苦的样儿。晚饭是如青做的，有牛肉和羊肉，不得不说做得挺像样。本来晚饭就我们三个人，但如青把安玲也叫过来一起吃。收费的，午餐或者晚餐三十块，早餐十块。

安玲说餐费不贵。如青赞同她，她说这里提供餐饮不是为了盈利。她们俩不停地聊着天，安玲汉语说得不好，我们一半能听懂，一半听不懂，她有时急了就说英语，这时候我就简单翻译一下给他们。安玲是环球旅行的，在路上一年多了，她从香港出发，先是去了德国待了几个月，在那度过了冬天，然后去了比利时，接着又跑去了摩洛哥，从那去了尼泊尔，然后中亚。现在她来了喀什。如青问她来喀什打算做什么，安玲想了一会儿。

“来看看。”她说。

如青又问了我的行程，我大致和她说了一下。如青听完点点头，我怀疑她根本没听我讲的话。然后如青问我能在这里待多久，我告诉她我买了一个月后的车票，有变动再改签，如青又点点头。我们聊天的时候，周生一句话也没说，他低头吃饭，有时候陷入沉思，他先吃完了就放下碗，对如青说：“一会儿我来收拾。”又冲我们笑了一下就走了。我能感觉出来他们俩是情侣，那种在一起生活了很久的情侣。周生走了，如青放松了一些。她和我大概说了一下这里的情况，老板常年不出现，旅店靠他们两个维持着。店里常年招收义工，也就是我，而我要做的工作，主要是开车去接客人回来，然后再干一些杂活儿。

“总之就是店里的活儿咱们都要干。这些活儿不固定，就咱们仨，咱们相互帮衬着干。”如青说。

吃完晚饭，安玲坚持把她用的碗筷洗了，然后就出去了。如青让我去休息，或者出去转转，总之放松一下，明天再开始工作。然后她凑近我，告诉我前台的柜子里有个黑色的钱包，里面有现金，店里的支出直接从里面拿，之后告诉她一声就行。

“听起来好像活儿挺多，但白天大部分时间都没客人，空闲时间想干啥都行。”她说，“你别被我之前说的吓着了。”

我出了旅店，走去了大清真寺。不算好找，但是跟着地图走还行。快要到清真寺门口时，我发现自己被集市中巨大的人群包围着。大家走路撞来撞去的，声音嘈杂，街边卖什么的都有，烤包子、骆驼肉，竟是些我没见过的古怪东西。我吃了一碗酸奶（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酸奶），就是费了好大劲才问清楚价钱。羊肉串看起来不错，标准的三瘦一肥，扇风的扇子也是地道的破纸壳子，烧烤炉子旁边就捆着两只库尔勒黑脸羊跪在那，一声不吭。人们都围着炉子，一把肉串烤好了他们上前就抢，我看了一会儿没弄明白怎么买。一些摊位专门卖乐器，还有的摊位卖一百多种馕。

天终于黑下来了，我一边吸着香烟一边往回走。按照地图，我抄了一条小道，走到一半没路灯了。我摸着黑又继续走了几分钟，路灯来了，在那个路灯下，我看到安玲举着个巴掌大的无花果站在那。我走过去问她在这里做什么。

安玲吓了一跳，她用迷惑的眼神看着我，然后终于认出了我。我感觉她快哭了。

“我迷路了。”她说。

我们回到旅店的时候，已经夜里十一点了。一楼大厅里聚满了人，我看到周生和如青在陪着大家聊天，桌子上摆着切好的西瓜，哈密瓜，香烟。其他的桌子上也聚着几小帮人，他们大多戴着帽子，脖子上围着围巾，一看就是旅客。

如青把我叫过去介绍给大家，一个戴着绿色小帽的维族中年人就是这家旅店的房东，他叫艾尼瓦尔·萨迪克，旁边是两个年轻人，长得挺英俊的，一个叫阿布都克里木·艾孜麦提，另外一个是维族人一样，叫达谷。我和大家打了招呼，艾尼瓦尔招呼我坐在他旁边，告诉我地上跑来跑去的三个小孩是他的儿子。

“我的，两个巴郎子，一个丫头。”艾尼瓦尔说着变了调的汉语，然后让三个孩子过来依次和我握手。阿布是艾尼瓦尔的邻居，他是当地的歌手，达谷有一个汽车修理店，平时也搞摄影，同时还是个兼职吉他手，他们两个人经常一起演出。西瓜和哈密瓜甜得齁嗓子，大家的沟通真他妈费劲。我们的交谈夹杂着汉语，维语，还有一丁点儿英语，气氛很热烈，聊了半天也没说清楚什么。

隔壁桌的客人们相互交谈着，分享着各自的旅途经历。其中一个小伙子声调很高，他

说他骑着摩托车从拉萨一路开到这里，一共花了三天时间。我心里清楚这不可能，我觉得大家也都能明白，但他旁边的姑娘却入了迷，夸张地叫着回应他。她脸上扑着厚厚的粉，身子前仰后合的，胸都蹭上他的胳膊了。我想今天晚上这个不要脸的小娘子就会在他的身子底下哇哇叫了。

凌晨了，艾尼瓦尔带着孩子们走了，走之前又依次和我们握了手。阿布和达谷待了一会儿也走了，大家说好下次把乐队都带过来。客人们陆续回房。一楼大厅里留了一桌的果皮和烟头，如青快速地收拾了一下，然后去公共浴室洗澡。周生和我留在大厅看着电视里的格斗比赛。

“咱们俩留到凌晨两点，然后锁门。”周生对我说，“两点是关店的点儿。”

“国际青旅还关店？”我问。

“在这儿得关，这儿不太一样。”周生说。

(二)

我慢慢习惯了店里的规矩，白天睡到自然醒，等到客人们都出去了就简单清理一下客房，重点是打扫厕所和浴室，倒倒垃圾。换洗床单被罩是个大活儿，周生干，但是他经常消失，如青替他干。下午有大片的时间，我会去老城区里转转，那里有满地的鸽子屎，还有许多放风筝的小兔崽子。不出门的时候我就在一楼大厅里一边抽烟一边看书，同时构思一下我要写的小说。如青常在那做点小手工艺品，串个珠子或者做个耳钉什么的。周生大部分时间闷在他的房间里面剪辑视频，我看了他拍的那些玩意，是一部推广当地民俗的影片，拍得还行，但可能是达不到自己理想中的效果，周生后来越来越痛苦，不怎么想见人。如青很担心他，但是完全帮不上忙，时间久了也就不管了。晚上客人都回到旅店了，大家都会聚在大厅里聊天，有时打打牌。艾尼瓦尔几乎每晚都过来坐一会儿，阿布和达谷也来过几次，他们俩一过来我们就看格斗比赛。有一次他们把乐器带来了，我们在小院中举行了一个小规模的演出。阿布的嗓子没得说，达谷的吉他弹得也好，我告诉达谷我也会弹吉他，但是手很臭，达谷鼓励我试试，他递给我一把吉他让我跟着扫弦。我照他说得做了，效果还不错。一些客人们围着我们跳起舞来，如青也跳了起来。我觉得她扭动身体的样子很吸引人。

一天下午，我正在一楼看书，安玲在旁边画画。如青刚淋浴完，头发湿漉漉地走下楼，问我喝不喝酒。我已经有一阵子没碰过酒了，被她这么一说来了欲望。

“好啊。”我说。

安玲在旁边停下来，问什么酒。

“白酒。”如青说。

“我也可以来一点儿。”安玲说。

我想打电话叫阿布或者达谷来，但如青说这个时候他们不能喝酒。于是我们三个人喝了起来，安玲很快就有些醉了，她开始大声地说着什么，一边说一边挥着拳头，大概就是她在路上遇到过的形形色色的傻瓜。如青笑着听她讲话，偶尔回应她几句。如青的嘴唇又小又厚，笑起来眉毛还一挑一挑的，我盯着她看了一会儿。她的耳朵小小的，脖子那里有一颗痣，锁骨很漂亮。如青看着安玲，然后她转过头来看看我。安玲说完一大通话，然后突然说她喝醉了，接着就倒在了旁边睡着了。我坐到了如青身边开始吻她，我们吻了一会儿，她站起来示意我去厨房。我想起了周生，我觉得他可能在他的屋子里，也可能他一早就出去了，我不确定。我们走过小院，来到厨房，厨房的侧面有个小门，里面是个没有窗的书房。我们走进去，开了灯，锁好门，然后在书房的桌子上做了。

接下来的几天，如青表现得好像那事儿根本没发生似的，既不冷落我，也不回应我，哪怕只有我们俩的时候也是这样。于是我告诉自己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斋月前那几天，为了对抗老板欠薪，周生和如青开始罢工。我没有理由罢工，我本来就没有薪水。我只干自己的那份活儿，顺带着也给客人办理入住。如青这点还是好的，她虽然罢工，但她还做饭。偶尔我们也喝点。安玲这些日子通常是上午出去逛逛，晚上出去参加活动，有时候是别人的婚礼，有时候是舞会之类的，下午的时间她都在一楼大厅里画画。我当时觉得她不是来旅行的，因为很多时候她哪也不去，就是坐在相同的位子上不停地画。我问过她，她说反正不管在哪里待着，消费都一定比香港要小，她的工作就是画画而已，哪都能画。由于罢工，店里开始变得乱糟糟的，到处都是垃圾。有些常住的客人实在看不过眼就帮着做一做清洁，安玲做得最多。于是，如青对安玲说不如她就做店里的义工，安玲同意了，有了她的帮忙，店里总算是像个人住的地方。那时候，上午我们两个人做各种杂活儿，晚上就在前台推销手磨咖啡来增加收入，我靠着这些钱买烟。下午可以得一阵子闲，安玲还是画画，我经常去睡觉。偶尔我们 also 做爱。

进了斋月，游客明显少了。我开始写我的小说，安玲继续画那些没完没了的画。有时候她也会和我讲讲她在画的东西，她会讲她用了什么样的线条，什么样的人物形象来表达什么什么玩意。我以前就在旁边看过她画，有点像儿童漫画，但她似乎总想弄出点什么深刻的含义。我觉得她的画没有任何价值。后来她看我没兴趣慢慢也就不再说了。有几次她也问我写的是什么，我就敷衍她一下，除了办那事以外我并不想和她讲话。斋月的第一个周末，当时我正在看书，有人推开门走了进来，他按了按前台的铃。我走过去看到邹叶背着包站在那。邹叶是我在旅途开始时遇到的人，我们一度混得很熟。我在绿洲安定好后曾经给他发过消息，当时他正在北疆的喀纳斯宿营。

“你看起来像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对我说。

“我猜我们可能在哪见过。”我回复道。

晚上我带着邹叶去外面吃，我们开车到了汉人区，在那好好吃了顿猪肉，喝了一些酒。我们聊了聊旅途中的见闻，又聊了聊格斗比赛。之后我带着他去了温泉中心。

“温泉中心？”邹叶问，“在这沙漠城市里面有温泉？”

“就是个休闲的地方。”我对他说。

在那，我们彻彻底底清洗了一遍身体，之后我们就在躺椅上聊天。休息了一会儿我给他叫了一个按摩小姐，他们进了房间。我继续躺在那抽烟，心里琢磨着我的小说。

有些时候我的人物会在他的世界里面丧失兴趣，他好像什么也不想干，本来我已经给

他安排好了一切，他或许清楚，或许不清楚，但是时机到了，他就有事情要做，有时候是去烹饪一个面包，有时候是去送个包裹，或者是陪一个人聊一晚上。一件做完了，就有下一件，虽然不能说是安排地妥妥当当，但他并不用为了明天而发愁。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什么也不想干。

三刻钟后，邹叶回来了，他躺在椅子上，看起来并不兴奋。

“怎么样？”我问。

“不行。”他摇着头说。

我们要了一些啤酒喝，然后又聊起了格斗比赛。我们聊了聊哈比布和托尼·弗格森，邹叶觉得哈比布不算个真正的斗士，因为他只能用摔跤和柔道手段来结束战斗。我不赞同他的观点，但这也无所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托尼·弗格森就不同了，他很勇敢。”邹叶说。“他玩了命地击打对手，他也允许对手打他。他是个爷们。”在这一点上我赞同他的看法。我们又要了烤羊排，然后就着羊肉喝光了所有的啤酒。

十一点钟，我们回到旅店，如青和安玲正在一楼大厅里做瑜伽。如青一边拉伸身体一边叫我们吃西瓜。我们在凳子上坐下，我抓起冬不拉摆弄几下，我弹不好，声音很难听。我把它递给邹叶，他弹得比我强点儿，但也不好听。我们坐在那，一言不发地看着两位女士做着各种动作。如青的动作很优美，有一种内在的力量，她高高抬起下巴，我看到她的汗水顺着脸颊和脖子流淌下去。她们的身体变换成各式各样的曲线，我看得很入神。

临睡前，我们来到了三楼楼顶，那里视野开阔，能够看得很远。两个破了的帐篷还钉在那里，是从前某个客人留在这儿的，还没来得及处理。我们把两把椅子搬到楼顶，然后在那坐下。

“这儿可以？”邹叶问。

我告诉他没问题。我掏出来一支香烟，用手指揉一揉，把烟叶倒出来一些，然后我拿出大麻，那是橡皮泥一样的大麻膏，我揪下来一小块然后搓成一条细线，插进香烟里。我点燃抽了一口，然后递给邹叶，他接过去抽了一口。我们靠在椅背上仰头看着满天的星光。

“后来狗肉跑丢了。”我说。

“听说了。它跟着哪家客人跑了，鞑子说它跳上人家的车赖着不下去。”邹叶说。

“不是那么回事。鞑子不给它饭吃，让它自己出去抓老鼠。”我接过烟又抽了一口，“哪他妈有老鼠。狗肉都快把我的鞋给吃了，下一步就想着吃我了。”

我们都沒说话。起风了，帐篷被吹得哗啦哗啦地响，老城里面最后一盏灯也灭了下去，很远的地方响起来警车的声音。

“你老婆还挺好的？”我问。

“好。整天在家里待着，现在木耳卖不出去。”

“在家里待着干什么？”我又问。

“不知道，可能和男网友聊天吧。”他说。

“昆明的事儿你听说了吗？”他问。

“听说了，大家都说可能要戒严了，最好在那之前去塔什库尔干。”我感到一阵头晕，身子靠在了椅背上。

“嗯，后天就去吧，然后我从那去和田。你再来一口不？”他说。

我摆了摆手。邹叶抽了一口，然后他说：“楼下那女孩怎么样？”

“都不错。”我说。

(三)

我们整理了行装，又打听了如何坐车。安玲也要跟我们一起去，待上几天再和我一道回来。邹叶挺开心，我也就明白了怎么回事。晚上我们举行了聚会，我叫来了阿布，达谷这时不在城里。“他没有福气！”阿布说。这一阵子我们关系很好，总是混在一起，但如青一直觉得和他们喝酒不方便。“那就闭店吧”，如青最后做了决定。

气氛很快热烈了起来，不一会儿周生也出现了，他始终没喝酒，但看起来也十分开心。我们不停地交谈，周生难得地谈了一些他的拍摄理念。

“越客观越好，叙事的距离感越远越好。”他说。

周生和如青挨着坐，看起来十分般配，我竟从没发现他们是如此完美的一对。安玲赞同周生的话，然后说她的绘画也试图使用同样的手法。邹叶对安玲的画很感兴趣，他问了很多。总之，我觉得他们能聊到一块去。阿布酒喝得凶，接着他唱了起来，唱到高潮又开始跳舞，舞跳完，他从后腰掏出一把刀来。“英吉沙刀，我的宝贝。”他说。邹叶十分喜欢那把刀，几乎到了爱不释手的程度。

“哪能买到这么好的刀？巴扎上有？”邹叶问他。

“和田。”阿布回答。

聚会结束后，邹叶跟着安玲去了她的房间。在我快要睡着时，邹叶敲我的门叫我出来抽烟，我问他怎么样。

“她给我看了她的画，那么多，一幅一幅拿给我看，还和我讲一些线条之类的东西。”

“然后呢？”我问。

“她不错。”邹叶说。

第二天一早我们去赶车。前一晚我喝了太多酒，晚上又听着外面的鸽子叫了一夜，几乎没睡，我感觉很糟，一直在车里半睡半醒，邹叶和安玲一开始聊着天后来也各自睡着了。黄昏时候，我们到达了喀拉库勒湖边。我产生了高原反应，头疼得要命，躺在帐篷里起不来。邹叶和安玲在旁边陪着我，夜里我觉得好了一些，但是始终睡不着觉，第二天早上，我又开始头疼，心跳也很剧烈，于是我决定自己坐车回喀什。

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安玲执意要和我一起回喀什。邹叶听了耸耸肩，我知道他有些遗憾。我也觉得遗憾。“保重。”我们拥抱了一下，就此告别。回去的路上，随着海拔降低，我的身体逐渐恢复。我不明白安玲为什么要回来，这么想着不禁有些心烦，我猜想邹叶可能会觉得我小气，“操，”我骂了一句。安玲在旁边看着我，咧着嘴笑了笑。

回到旅店，我睡了一晚上，第二天身体完全恢复了。上午我躺在床上看书，午饭时候，只有如青和我。

“安玲病倒啦。”如青说。

现在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了，我盯着她看了看，想知道她对我有没有那个意思。没有。白天我开车去了牛羊巴扎，那是在郊区，我问了如青要不要一起去，她还是一如既往地语气，“我也去了，那谁看店呢？安玲病倒了。”我心想这可不是我的错啊，我撇了撇嘴就走了。

牛羊巴扎很热闹，除了一些大牲口外还有几十群小羊在那里，每群小羊被拴在单独的桩上。它们都是头朝着里面，尾巴朝着外，屁股蛋上耷拉着两个大球。那是塔吉克的羊，是绵羊。也有山羊，山羊就完全是另外一副模样了，他们大多有着瘦长的黑脸，长着巨大的羊角，瞳孔是个矩形，他们转过头看着我，露出麻木的神情，看起来像魔鬼。牛都被绑得结结实实，格外健壮的公牛还被黑布蒙着眼睛，他们鼻子里喷着热气，强壮的大腿肌肉在抖动，好像随时准备一跃而起。男人们围绕着牲口们，不停地讨价还价，我看中了一只小山羊，身体雪白，看起来很可爱。卖羊的对我说：“三个月大，回去养一养就可以吃了，嫩得很！”

回去的车程需要四十分钟，开车途中我心里一直想着给小山羊喂草的事情。老城前面那一片荒草地或许是个好地方，我之前在夜里倒垃圾的时候看到一些穆斯林，其实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穆斯林，总之是穿着黑袍的人，那副模样会让你感到不知所措。既然我们是在喀什，我想，那么他们应该就是穆斯林了吧，我看到他们把几只小羊赶过去吃草，然后他们就在旁边沉默地看着，仿佛要自己藏进黑夜里。回到旅店，我像往常一样把车停进小院，这时我看到一个小伙子正蹲在地上修理一台摩托车。他穿着粗布工装裤和麂皮靴子，上身是一件沾着油污的牛仔外套，头上戴着帽子，嘴里叼着香烟，脸上光溜溜的一根毛也没有，手里拿着个扳手正在拧紧变速箱上的螺丝。我下了车，从他身边经过，他头也没抬一下，好像我并不存在。我走进大厅，那里空荡荡地一个人也没有。

晚上我们吃饭的时候，如青告诉我安玲今天身体好了一些，但她不想出房间，要是我想的话可以把晚饭给她拿进屋子里。我想了想好像没有什么理由拒绝，所以我就答应了。我托着餐盘去了二楼，餐盘上是一碗米饭，一份洋葱和牛肉，还有一小碟咸菜。我走进了安玲的房间，看到安玲正躺在床上，上半身倚在床头。和我想的一样，她正在画画。她看了看我，对我说好久不见。我感觉有点纳闷，心想我们只有一天没见，这并不久。我开口回复她一句好久不见。这时，我看到安玲的脸上突然流露出一种奇怪的表情，我吓了一跳，以为她要打我。结果她一张嘴，嘴唇抖了几下，哭了。她哭得那么伤心，眼泪和鼻涕一起往下流，我心里有了一种莫名的恐惧。她哭了一会儿，然后停了下来，叫我把纸递给她。她擦干了眼泪，看起来心情平静了一些，然后她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问我今天做了什么。

“没什么特别的。”我说，然后我看了看她的胸部，问她想不想做爱。

坦白讲，我感觉不好，我们做得并不痛快。完事后，我把饭留下给安玲吃，就转身离开了。夜里，我站在楼顶抽烟。天上有许多云，月光被遮盖着。我吸着烟，烟头的光点一亮一亮的。这时有另外一个人来到了楼顶，开始我还以为是警察，但我看了看，发现那人是穿着裙子的。

她一边朝我走过来一边好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果然有人在这抽烟，我猜这就当是在和我打招呼了吧。我伸手把梯子旁边的射灯开关拉开，灯光把我们周围照亮了一些。她头发不长，眼睛又圆又大，穿着一件米色睡裙，露出了脖子和小腿，看起来刚淋浴完。她问我看完了没，要是看完了就把灯关上。我把灯关上了，她问我还有没有烟，我递给她一支，然后帮她点上火。我们就这么站着抽了一会儿，然后她问我从哪弄回来的小羊。这个时候，我又看了看她，我对她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我告诉她是在牛羊巴扎买回来的，她听了点点头说那是个好地方。我问她是哪天来的，她说今天来的，骑摩托车从广州一路骑到这。这个时候我想起来那个修摩托车的小伙子了，有那么一个瞬间我差点以为他们是兄妹，后来我明白了，她就是那个小伙子。她低头抽烟，说自己穿着裙子还挺像那么回事的吧。我告诉她还行。

“你抽的那玩意，”她说，“给我抽一口。”

我递给她，她接过来抽了一口，然后又把烟递给我。过了一会儿，她开始笑，我知道她兴奋起来了。我又给她抽了一口，然后她唱起歌儿来，她唱了几句，开始在原地转圈。楼顶光线昏暗，她的身影像个木偶，当她转到面朝路边的一侧时，远处的路灯略微照亮了她的脸。之后，我开始感到一阵胃酸。晚上我躺在床上，胃酸还没有消退，但可以忍耐。一会儿我睡着了，我梦到了王贞。

第二天早上，我在清理浴室的时候发现了一副眼镜。我把眼镜放在前台，然后查了一下入住信息，昨天来的人只有一个。我知道了她叫康彩。钱包里面只有二十块钱现金了，我出门买了包香烟，回来后就一直在大厅里看书。如青出现时，我发现她戴着一串佛珠，“戴着养一养，都快长毛了。”她说。周生从外面走进来，带回了西瓜。这个月我切了许多西瓜，弯刀也用得越来越顺手，没人的时候我看到就会拿起刀来挥一挥。周生把瓜交给我，我把西瓜切成二十四块。我们坐下吃瓜，这时候小羊凑了过来。周生把西瓜皮喂给它，然后告诉我它昨晚上尿在了大厅的炕上。大厅的角落里是有一个炕，七月以来周生觉得房间里太热，就一直睡在那。他告诉我那味道很骚，我想了想告诉他撒点孜然。

阿彩从院子里走进了大厅，现在她又是一副男人的打扮了。她的摩托车有点毛病，问题不大，但最好还是修一修，她问我附近有没有熟悉的修理厂。我告诉了她达谷的店。“靠谱。但是修得很慢。”我说。

阿彩说不急，本来她也要留几天，活儿干得漂亮就行。然后她问我哪里有陶艺品作坊。之后我出门了一趟，帮周生把他的影片宣传册带去东巴扎，那里有老板想要。回来的时候，我把车窗都落下，让干燥的热风吹着我。我不明白周生为什么不喜欢开车，如青是不会开车我知道，可是周生的驾照比我拿得还久，他出去买点什么东西可骑着自行车也不开车。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开车，哪怕漫无目的地闲逛也很舒服，当然我说这话是因为汽油钱也算店里支出。或许周生在这里开车出过什么事故吧，我猜，应该不是撞死人那种事故，可能是撞死了人家的牛那种事故吧，我不知道，总之这和我没什么关系。我就在路上逛着，心里好像期待着什么。我从古丽街转到了可达街，然

后往前行驶，路过了那个陶艺作坊。我看到阿彩蹲在店门口正朝里面望着，我停好车走过去问她在看什么。她朝里面抬抬下巴，我看过去，三个手艺人店后面的院子里做陶。他们安稳又沉默，底座平稳地旋转着，那些烂泥巴也就开始有了生命，逐渐变换出各种曲线。他们用指甲触碰几下，陶的表面就出现了各种奇妙的花纹。我们看了一会儿，阿彩掏钱买下了一个碗。

回去的路上，阿彩说以后她就用这个碗吃饭了，我们笑了笑。她又说：“你的烟劲儿挺大。”我问她接下来打算做什么，她说休整几天，然后要去塔县。

回到店里已经快中午了，我把水管接到后院的水龙头上，然后在旅店门前的土路上洒水。如青看来已经开工了，她坐回到了前台里面，安玲把门窗全部打开通风。这时，一个小女孩哭着往胡同里面跑，我认出来她是艾尼瓦尔的小女儿古丽莎。我问她怎么了，她停下来对我敬了个礼，然后哭着说被许记餐馆的老板欺负了。那家餐馆我知道，在汉人区，老板是个高个子的软蛋，头发还烫成小卷。我问她去汉人区做什么，她没有回答我。如青让她回家找她爸爸。古丽莎走后没多久，我们看到阿布骑着一台摩托车冲了出去，然后艾尼瓦尔载着古丽莎骑着另一台摩托车也出去了。

“或许你也该跟过去看看，他们可能说不明白。”如青对我说。说实话我并不想管闲事，但是去看看就去看看吧。

外面阳光很刺眼，路旁建筑上的玻璃反着光，一切都是亮晃晃的，我有点后悔没戴墨镜。我到了那家餐馆的时候，有两个路人在门口围观，屋里有人正在喊着什么。我来到门口，看到古丽莎在大声地哭着，艾尼瓦尔大声喊着，一个餐桌被掀翻了，碗筷散落一地。老板手指上夹着香烟，脸涨红地在讲着话，他说他没碰古丽莎，只是让她赶紧离开。说着他激动地用掐着烟头的手指指了指古丽莎。这时古丽莎大声尖叫了一下，那声音令我头疼欲裂，天晕地旋。阿布跳过去从侧面把老板扑倒，老板脸朝下趴在地上，阿布骑在了他的背上，并从腰里拔出刀抵在老板的后颈。后厨发出了女人们的叫声，艾尼瓦尔在大声喊着一句维语，古丽莎也在喊着相同的话。他们不停地喊着这句话，语气中透露出气愤和坚定。这时我看到外面的光射进了店里，柜台上的玻璃反射着刺眼的光斑，刀尖在发亮，我又开始后悔没戴墨镜了。阿布抬起右腿，用膝盖顶住他的后背，在大声咒骂着什么，我看到口水从阿布的嘴里喷出来。老板趴在那里没有挣扎，嘴上说着他没做任何对不起良心的事儿，他没有惩罚古丽莎，甚至还想把汽水送给她喝。阿布骂了一会儿，然后他的声音开始变小了一些，可能他也有点累了。我看到刀从老板的后颈处拿开了，阿布把刀拿到了一边。

沒事儿了，我在心里想，这只是一场小冲突，不会惊动警察的那种。艾尼瓦尔不再大声嚷了，他嘟嘟囔囔的，像是在发牢骚，古丽莎也就跟着平静了起来。我知道他们都是和善的人，我认识他们将近一个月了，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口角。艾尼瓦尔赔一点钱，老板向他们道个歉，这事情就过去了。我这么想着，老板在阿布身下翻了一下身，手伸向了刀。阿布差点被他甩掉，但他快速地调整了重心并开始用肘部击打老板的头。他打了很多下，老板不动了，然后阿布重新发力，这次他把全身的力量都用上按住了老板，我觉得他不用使这么大劲，老板已经不动了，接着阿布挥刀把老板的右耳朵割了下来。

地上溅了一些血，老板趴在那没反应。阿布捡起那个耳朵，拿过去给艾尼瓦尔看，艾尼瓦尔看了看，两个人在说着什么。我看到他们在笑。警车开来了，两名警察走了进来，举着枪。他们把艾尼瓦尔和阿布带走了，也带走了古丽莎。我看到阿布偷偷把耳朵揣进了口袋里。

警察路过时，把我往边上推了推，这个时候他们才发现我。艾尼瓦尔冲我笑了笑，阿布对我说：“没事，兄弟。”古丽莎想对我敬个礼，但是没来得及动作就被警察推进了车里。

(四)

我们计划乘坐上午九点的长途公共汽车，这样我们下午四点钟可以到达塔县。但阿彩想要在喀拉库勒湖边上住一晚，她听说那里很好看，我告诉她那里只有光秃秃的石头，还有车一经过就扬起尘沙的土路。阿彩不相信我的话，但她同意早上一同乘坐九点的汽车，这样中午我们到达湖边，她可以留在那，我可以继续乘车去塔县。我心想只要她一到那里，看到漫天的尘土还有满地的羊粪蛋就会立刻改变主意。车行驶之后阿彩把帽子拉低开始睡觉，我拿出书来看，太颠簸了，我看了几眼就放弃了。外面天气晴朗，阳光很足，沿途都是秃山，有一些看起来像动物，有一些造型很诡异但是什么也不像。阿彩在我旁边安静地睡着，我向窗外看了一会儿也睡着了。

我是被司机的喊声吵醒的，当时我和阿彩正靠在一起，司机大喊着湖边到了，停车五分钟。窗外的景色大变样，天空瓦蓝，远处是雪山，近处是湖水，挨着湖水有一片草地，几只羊在那吃草，旁边是几个白色的毡房。阿彩看起来挺开心，她叫我一起下车。我们下了车，阿彩问我不要和她一起留一晚，我觉得这也是个好主意就同意了。我们找到毡房的主人，那是个吉尔吉斯族的女人，她正带着一个婴孩在那晒太阳。她裹着个暗红色的头巾，长着一张极其粗糙的脸。我们问了价钱，不贵，如果在她这里吃晚饭和早饭，那么住宿还可以免费。我们把背包放在毡房后就去湖边散步。

喀拉库勒湖正对着慕士塔格峰，山峰上积雪很厚，反射着强烈的太阳光，看起来很有压迫感。湖边上落着不知道什么鸟类，一直用嘴在水中啄着什么。

“这不挺好的嘛。”她说。

我们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安静的下午。晚饭是手抓饭配着奶茶，饭里混着羊肉丁和胡萝卜丁，我吃了很多，吃完就跑出去抽烟。我坐在岸边，本想安安静静地等日落。阿彩不知道从哪搞来一把笛子坐在离我不远处吹了起来，我得承认，还挺好听的。天色暗下来了，彩霞映着湖水和冰川，阿彩的身体反射着红色的光。我望着她渐渐出了神。我想起了一些神话传说。风渐渐变大了，我裹紧了衣服，阿彩依然敞着怀，面对着湖水演奏，表情很严肃。

晚上我们同住了一个毡房，毡房里面烧着炉子，上面开着一个很大的孔，我们在两个临近的床铺躺下，不平静地过了一夜。

我们在塔县过得十分愉快。开始的时候阿彩说要去一些地方看看，比如石头城，还有彩色岩绘，但后来我们哪都没去，就是在镇子上待着。她人很有趣，喜欢在早上醒来

后摸我的耳朵。我们不停地交谈，我觉得我一辈子都没说过这么多话。对于交谈这回事，阿彩不比我强，她说得快了就会冒蠢话，每当这时她就会咯咯地笑笑，然后挥一下手，说自己说得不对，我们就相互递烟，这个话题就算是终结了。然后我们会开启下一个话题。

我们在那里待了一周，之后我接到了父亲的电话，他说我奶奶住院了，叫我尽快赶回去。电话挂断后我开始思考这件事情，奶奶住院是常见的事情，她每年都要住院一次到两次，每一次都是一两个礼拜就出院了，那么我是否有必要赶回去。我思考再三觉得还是应该回去。

临走之前，我还想去看一下乔戈里峰，阿彩以为我不想走，因为我没和她提起过。或许有些地方还是适合一个人去吧，我说。但乔戈里峰路途遥远且艰难，可能需要额外一个礼拜的时间，我只得放弃。阿彩决定在塔县再待一阵，于是我独自回喀什。

“那就再见了。”我对她说。我走的时候是个早上，阿彩还没醒，我摸了摸她的头发，然后关上门离开了。

回到喀什，如青告诉我，新来了一个义工，叫黎争。他是个矮个子小伙子，长得敦实，人也活泼。晚些时候，如青说安玲已经离开了，她这么一说，我才想起安玲来。如青拿出来一个大牛皮纸袋，说是安玲留给我的。我打开袋子，里面是一本画册，我翻开看了看，画得还是很糟，就和原来一样。我不由得笑了起来。如青问我怎么了，我就把其中一副拿给她看，问她觉得怎么样。如青看了看说她觉得还不错，于是我问她这能卖点儿钱吗，如青想了想说很难讲。我说既然她觉得不错就留在店里吧，说完，我盯着如青的嘴唇看，然后又看看她的眼睛。她没有给我任何回应。

晚饭时候，我再一次接到了父亲的电话，他问了问我的行程，然后又问我有没有办法提前回去，我告诉他没有办法，我坐明天的火车到达乌鲁木齐，然后在那乘坐飞机，这就是最快的方法。

因为第二天要赶早班车，所以夜里我很早就上了床。我躺了一会儿，没睡着，于是我起身来到天台。我看到梯子立在那儿就知道有人在上面，周生坐在那里。他招呼我过去坐，我们坐在那两个破帐篷里面，屁股坐上去，帐篷也就不再飞了。我给了他一支香烟，他接了过去，我问他什么时候开始吸烟的，他说今天。我们相互闲聊了一会儿，周生说阿布可能出不来了。我点点头，没说什么。接着他告诉了我事情的起因：汉族餐厅老板说小姑娘溜进去偷他的钱，而古丽莎说她是想进去买汽水，这就有些可疑了，古丽莎为什么跑那么远去买汽水呢。总之老板当时以为她是去偷钱的，他抓着古丽莎的胳膊，小姑娘的胳膊被他手指上夹着的烟给烫坏了。

风变大了一些，我能感觉到一些沙土打在我的脸上。过了一会儿，周生问我来到这里还有什么心愿没有达成，我告诉他在这里我并没有什么心愿。这时，我看到一个脑袋从楼梯口那里探了出来，我看出来那是黎争。他说着这里果然有人，然后很兴奋地走过来挨着我坐下。于是，我问他来到这里有什么心愿要达成，他开始说了起来。把他想要去的地方，想要做的事情一件件地说出来，期间他还做过变化，他也提到了乔戈里峰，但他也认为太难去了，所以他就把它从心愿清单里去掉了。接着他琢磨着把乔戈里峰换成什么好，他说着，然后很激动地说那就换成神湖吧，他爱神湖。还有那个什么，红其拉甫，他还要买一件羊皮袄带回家送给妹妹，他说他答应她的。

他兴奋地说着，我和周生沉默着吸着烟。天上有许多星星，其中有一颗特别硕大，耀眼，好像一团火，它闪着红色的光芒，似乎正在靠近我。或许那是飞机吧，我想。

第二天早上，是黎争送我去的火车站，路上他还没睡醒，话很少。在车上，父亲一连给我打了三个电话，我没有接。我不想接。他还要我怎么做呢，我已经选了最快速的方法回去了。到了车站，黎争拍拍那辆车问我不要再开着它兜一圈。我告诉他不用了，我们握了握手，我转身进了车站。候车室里人不多，只有十几个旅客，我一眼就能够认出他们。他们都靠在座位上，满脸的疲惫，我混在他们中间，一下子就被淹没了。这时我看到了父亲给我发的消息，他说奶奶在今天早上走了。我心想自己是不是不用回去了，随后我不禁为自己的愚蠢而发笑。

列车准时开了。我看着窗外大片大片的沙漠，不知道下次再见是什么时候，可能再也见不到也是正常的。我就那么盯着窗外看着，不一会儿就累了，开始觉得无聊起来。



徐大龙

本名徐力佳，男，1987年出生，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人。现居辽宁大连。

24小时文学聚会

他们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写作，不管他们赖以谋生之道是什么，在写小说的时候，他们的职业都是小说家。欢迎来到24小时文学聚会。每周六见。



图片来自 [Meg Jerrard on Unsplash](#)

小说

隧道

姜紫 | 第二回

他是元初，而她是替代。

1

父亲老了。

在记不清是几年前的中秋家宴上，原本是很久才回来一次的二叔给奶奶敬酒，父亲却不知什么时候举着酒杯跟了上去。二叔敬完酒，父亲依旧举着杯子，有些僵硬地给奶奶鞠了个躬，说，妈妈，我也敬你，谢谢你把我养大。他的声音不大，但所有人都突然安静了片刻。父亲说完，仰头喝掉杯里的白酒，看了看大家，回到自己的座位去。周围像暗自松了一口气，悄悄又热闹起来。

沈黛就是在那个瞬间发现父亲老了。这并不是因为父亲已经很久没有再染头发，也不是因为父亲回座位时的脚步略显迟缓，而是因为父亲的眼睛。那天父亲一直垂着眼睛，那是一双象一样的眼睛，浑浊、干涸、发灰，像是沉积了很厚的尘土。

照片应该就是那段时间前后拍的，现在放大后洗成黑白，再装进黑色的相框里，即使隔着布包，沈黛也能清晰地感受到那双眼睛里透出来的灰扑扑的苍老和衰败。

父亲的旁边是沈元。相框里沈元的照片是彩色的，因为时间久了，母亲拿去重新上过色。现在还弄这个的相馆已经不多，沈黛在手机上查了很久，又带着母亲开着车找了好几天，终于找到一家。相馆调出来的颜色带着一种上世纪特有的陈旧感，婴儿肉嘟嘟的小嘴泛着点紫，配上像是擦了劣质胭脂的红脸蛋，再加上照片放大后变得更虚的眼睛，婴儿于是整个透出生硬和呆滞。呆坐的婴儿身旁还有一行花体字：周岁纪念，“念”字的尖顶上停着一只蝴蝶，沈黛记不清蝴蝶是什么颜色的，总不外染成玫红或者明黄之类。这是按出生时间算的周岁，但母亲的习惯是把怀胎的十个月也算上，所以过了年，沈元就该是四十岁，虚岁。

发动机持续的轰鸣里，母亲终于直起腰，推上后排车门，自己钻进副驾，直直望着前方说，好了，走吧。

沈黛指副驾的安全带，开门下车，把后排车座上的两个布包分别系上安全带，才坐回驾驶座。

母亲已经扣好了安全带，此时朝沈黛微微侧过身，锁着脖子，抬眼看她，小心翼翼说，又不是人，这么绑着，他们会不会，不舒服？

沈黛升起副驾的车窗。母亲的话前后矛盾，沈黛却还是对她解释说，一会儿上高速，相框摔了就是一车碎玻璃……

母亲扬手打断沈黛，她手上还有刚才绑相框时勒出来的绳子印。行了，除了小唐，人都齐了，走吧，母亲说。

沈黛放下手刹，松开刹车。母亲在座位上微闭着眼，嘴唇不时动几下，不知是在喃喃自语，还是某种习惯性的颤抖。

车子缓缓驶出小区大门，岗亭里的保安缩在军大衣里打盹，天气不好，春节假期也还没结束，没有人愿意多动弹一下。

车子上了高速，沈黛的耳膜有些不适，她咽了一下口水后，母亲喃喃重复的话源源不

绝地流进来：元元，爸爸，妈妈，小代，如果再加上小唐，人就算齐了。

前方一片苍茫，无边无际的铅灰色云团压得很低，云团中间裂开了几处，像是旧棉絮上的破洞，破洞里漏下来几束灰黄的光，她们正是朝着结在光里的那片浑浊又虚浮的天地驶去。光随着车子的行进朝着沈黛脸上直扑过来，甚至晃了几下眼睛。沈黛自言自语道，预报说会下冻雨，这么冷，大概不会有蝴蝶。

导航里温柔的女声尽责地提示前方有限速拍照，除此之外，车里没有其它声音。沈黛知道母亲不会回答她，正如她不会回答母亲。

沈黛的睡意还未完全消散。不论天多冷，家里都从不用任何方式取暖，因而睡意也总是又湿又凉。和此刻一样的无数个冷嗖嗖的清晨，她拖着冰凉的双脚离开被窝，随即昏沉着坠入一些自己并不真正懂得的事端里，就像被一块无边无际的湿抹布所包围。但此刻不行，因为方向盘握在她手里。她甩了甩头，像是要把那块不存在的抹布甩掉。不出意外，她们明天就可以赶到那里。地图上，进入那个山谷要穿过一条长长的隧道。三天三夜那么长的隧道，父亲曾告诉她。

她猜这是因为父亲在里面堵过车，那时候还没有这么多高速路，车子在坑洼不平的公路上颠簸得久了，难免出意外，在穿山的隧道里堵上个三天三夜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到了现在，她猜她们也许至多花上十多分钟就能穿过那条隧道，只是父亲已经不在，她只剩下了母亲，母亲也只剩下了她，再没有其他人。

2

三十四岁那年，沈黛嫁给了一个比自己大一岁的男人，他们是通过相亲认识的。男人叫小唐，沈黛似乎从未提起过他的全名，父亲和母亲好像也一次都没问过。

沈黛三十四岁生日那天，母亲给她打来电话，她很快又要来看她，甚至打算今后每年到她这里来住上两个月，那恰巧是家乡最冷的一段时间。

从沈黛毕业之后，这种事每年会有三四次，都在母亲和父亲大吵之后。她经常搬家，地址总是在变，但母亲总能成功找上门，闯进她租的房子，放下一堆灰扑扑的不知什么东西，呼呼哧哧地打扫一遍卫生，买菜，做饭，睡在她的床上打呼，翻一遍她的衣柜，用食指把里面带蕾丝的东西勾出来一遍，往她的卫生间喷刺鼻的清新剂，给她的邻居送腌好的藠头，最后再和她也翻天覆地吵一场，拂袖而去。

母亲打算把这种拜访常态化，是因为知道沈黛前不久升任了总监，并且正在看房，是要在那座城市安顿下来的意思。所以母亲今后不用再担心房东因为来了人而闹意见，她有充裕的时间把从前那一整套再完整地循环上许多遍。在那些事的间隙里，她会去轧马路、逛商场、游公园，熟悉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并随时随地掏出照片、问人们有没有见过上面那个刚满周岁的男孩。这是她含辛茹苦养大沈黛后应得的回报。

小唐就是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的。在母亲滔滔不绝地说着自己的规划时，他像是从一片死寂的泥潭深处缓缓翻上来的一个安静而浑浊的泡泡，轻轻在沈黛的脑海里裂开。沈黛打断母亲，告诉她自己已经不准备看房了，她一直在相亲，前几个星期认识了一个叫小唐的本地人，他家里已经准备好了婚房。

在那个城市，小唐是一个不太行的富二代。他家里有几间厂子，拉扯着几门亲戚在当地做些不大不小的生意。父母忙生意上的事，从小就很少管他，只是早早给置办好了房产和几间铺面。小唐从没愁过吃喝零花，也没什么远大的志向，嫌留学麻烦辛苦，混了个三本的文凭后就闲在家里，平常大多打打游戏，不时去厂里看一眼，他上面还有一个哥哥，没什么事需要他操心。

他们很快在小唐父母的催促下登记，之后不久，她发现小唐迷上了赌博，边境上的小赌场、南美洲的足球联赛、地下六合彩，还有盗版视频里画面上方飘过的那种“性感荷官在线发牌”，他通通来者不拒。

沈黛闹过几次，小唐也答应了要改。来来回回几年过去，因为生意难做，家里的厂子倒了几间，小唐很少再跑边境，线上下注的金额也有所减少，但事情不会有什么实质性转变。众所周知，赌博很难戒掉，因为病根在心里。

赌博，这是最重要的部分，小唐整个人都是围绕这个核心而存在的。至于自己为什么竟会惹上这桩麻烦，沈黛当然也想过各种可能性，比如小唐其实早就在赌了，家里也拿他没办法，结婚有点半欺半瞒，这能解释为什么对方肯接受沈黛一个年龄偏大、从外地来、工作又没有编制的“打工的”。现在沈黛知道了真相，小唐家里想方设法求着拦着不让离婚，算是吃定了她在那座城市没有根基和依靠。此外，归根结底，都怪母亲一直催得紧，而在沈黛当时可选择的对象里，比小唐强一些的其实不多。

这些理由在后来完全没有派上用场，所有人都毫无障碍地接受了这桩婚事。沈黛在离家三千公里外的城市结了婚，丈夫是个暂时还不会完蛋的赌鬼，看样子暂时也离不了婚。婚礼没办，两家父母从未见过面，小唐从来不看岳父母，连视频电话都不愿意打，房子是婚前财产，房本上写的是小唐的名字，沈黛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拿到钱，孩子当然更不用想，赌鬼也不可能关心什么元元扁扁失踪或拐卖的事，父母要想过去的话只会让她更加为难。没有人探问事情的细节，在这种事上推敲逻辑只会显得冷酷又残忍。他们害怕这桩看不到头的麻烦，并且其实也不那么在意她。

无论如何，这桩倒霉的婚事让沈黛得以成功地把自己打成了一个死结，没有人再试图靠近她的生活，就算是沈元也只能滚得远远的，在成为泥足深陷的倒霉蛋后，她终于如愿呼吸到自由轻盈的空气。这一切当然只是暂时的，等到合适的时机，即使倒霉如她，人生也该有些转机。可几年过去，沈黛还没有想出那个应该天衣无缝的转机，事情却猝不及防来到了最后。

3

午后，休息区早已停满了车。加满油后，沈黛慢慢绕了好几圈，终于等到一辆SUV离开，她赶紧跟过去，想先占住位置。倒车时，第一把似乎没有打好角度，踩住刹车后，她慌忙开始调后视镜，就这么一会儿功夫，后面已经堵了一长串车，其中好几辆不耐烦地直接喇叭。或许是声音太大，母亲终于结束她不知真假的睡眠，睁开眼睛，看了看车后，抱怨道，按什么按，越催越慢，女的本来就不会倒车。

沈黛不说话，左右看了一下后视镜，低头盯住倒车影像，调一下方向，一点点往后挪。

母亲看着她叹口气，说，你不是说这条路线不会有多少人吗？

我怎么知道，沈黛说着，回了一下方向。抬起头，一辆银灰色的小轿车正等在她车头前面让出来的地方，驾驶座上的男人戴着顶深灰色的毛线帽，此时已摇下车窗，冲她微微点头，一只手朝她的右后方挥了挥。

沈黛点点头，朝右边打了点方向，倒车影像里随即出现令人满意的间距，再直向后倒，后面的拥堵很快畅通。沈黛停好车，熄了火，长出一口气。母亲迫不及待摁下车窗透气，又侧过身子朝沈黛那边张望着什么。顺着母亲的目光，沈黛才发现，刚才指挥自己停车的那个男人，已经在她旁边停好了车。男人打开车门，伸出一条腿点在地上，他的个子出奇地高，脸看上去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身上的冲锋衣也是深灰色，嘴里叼了一根烟，没有点，车里似乎没有其他人。

男人像是感觉到了什么，朝这边看了一眼。沈黛扭过脸对母亲说，你在车上等一会儿，我去看有没有吃的。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母亲松开安全带，喃喃地说，像是完全没有听到她的话。

在春节假期，城市的马路上总是空空荡荡，似乎所有车都挤到了自驾游的路途上去。沈黛知道这个，但这是她第一次身在其中，她的一家人从来不曾一道出游，现在只是一次奇特的例外。

沈黛在便利店买了煮好的玉米和茶叶蛋，走回去时她看到车门开着，母亲站在风里，正起劲地和那个男人聊着什么。

沈黛走过去，听见母亲说，你知道蝴蝶谷的吧，去年有个舞蹈家在那里表演过。

男人的肤色有些深，下颌骨硬朗分明，嘴里的烟已经不见了，冲锋衣里是一件炭黑色的高领毛衣，高领下面的喉结硬硬地凸起。他对母亲微微点头，说，听说过的，那里每年都有蝴蝶大爆发，就是路好像不太好走。

母亲重重点头，接过沈黛递来的玉米，说，我们就是要去那里，我姑娘开车带我们去。沈黛急忙抬头冲男人笑笑，说，还没来得及谢谢你，刚才多亏你帮忙。

没事的，男人盯住她，以后你倒车的时候最好把窗玻璃降下来，这样视野要好一点，光靠倒车影像是不行的。他说着，有意无意朝沈黛身后看了看，又说，就你们两个人吗？沈黛轻轻推上身后的车门，说，我哥他们开得快，说是前面宾馆会合。

那你也得开快一点了，男人说，这条路我走过好几次，最近的那家宾馆快的话也得差不多天黑才能到，天黑了以后路就不好走了。

你是去哪里呢？母亲在沈黛身后伸着脖子问男人。

男人一愣，回家，他想了想，说，过年嘛。

就你一个人吗？母亲又问。

男人露出一瞬为难的神色，旋即说，嗯，就我一个人在外面，他们都在家里。

哦，母亲若有所思应了一声，又一扯沈黛的袖子，说，我姑娘也是在外面，女婿家里开厂子的，事儿忙，就她一个人回来，为了带我们出来玩儿。

关上车门后，沈黛先回头看了看后排座位上两个布包，即使包得很厚，还是能看到依稀的棱角。

不是说了，不要随便搭理陌生人，谁知道是些什么人，出来外面要小心，沈黛说。

母亲赌气一样把玉米往杯架里一竖，说，太硬了，我牙齿不好你又不是不知道。

谁叫你非要挑这个时候出来，沈黛把茶叶蛋递过去，说，我已经跟你说过了，过年过节的出来挤，有吃的就不错了。

母亲把剥好的鸡蛋掰开，取出蛋黄送到沈黛嘴边，说，这不是为了将就你的时间吗？平时总是忙忙忙，小唐又指望不上，母亲说着，忽然看了看外面，沈黛才发现男人的那辆车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开走了。

可能和小唐岁数差不多吧，母亲说，要是元元还在，差不多也是这个个子，他从小就能吃，长得快。

沈黛接过蛋黄送进嘴里，升起车窗。她无从捕捉照片里刚过周岁的婴儿身上有没有长高的迹象，母亲也并不在意这个，正如她并不在意沈黛从小就爱吃蛋黄一样。谁都可以是元元，因为永远没人能取代他，小代只是为了证明这一点才被生出来的。

4

很久以后沈黛还一直记得醒来前的那种感觉，就像一个坏掉的蛋黄，黏糊糊地晃悠着，散不开，有股凉嗖嗖的腥气。她想用力睁开眼，从蛋黄里钻出来，它却会在胸口砰砰地一直跳。运气不好的时候，她会发现那团蛋黄竟粘在两腿之间，即使立刻坐起来也已经来不及了，床单脏了，她一定会挨骂。她永远睡不醒，醒来的时候母亲永远在。母亲并不会直接来叫醒她，她有许多别的办法：瓷砖地拖过后经久不散的又潮又腥的气味，扫帚打在床脚的震动，放元元照片的相框突然倒下来，接着洗衣机的水龙头猝不及防脱落、喷了一地水，窗帘杆掉了，来通马桶的人敲门……记不清多少次，母亲在院子里朝四楼她的卧室窗户大喊，说忘了把晾被单用的竹夹子带下去。

她爬起来，顶着轻微的晕眩开始在母亲的怒气里周旋，按她的吩咐找一块干的抹布擦灰，倒垃圾，竹夹子送下去之后会发现刷子也忘了拿，于是她要再跑一趟，她还要记得给父亲打电话，为了马桶、洗衣机或窗帘。她不知道应该拨哪个号码，父亲的电话总是在变，或许他换了好几个工作，去了不同的地方，他的生可能因此分为几个不同的时期，但对于沈黛，那只是一段很长的时间，父亲总是不在，家里只剩下她和母亲。

天热的时候，母亲拖完地就坐在沙发上织毛衣。她用的是一种环形的棒针，两根尖的金属棒针，中间用一根塑料软管连起来，绕上毛线后，组成一个闭环。她天荒地老地戳着，永远不会结束。

到了天冷的时候，为了过年，母亲要进行无数次翻天覆地的打扫。她从衣柜子里翻出许多面目难辨的破烂东西，一一展开又叠好，再塞回柜子，又从鞋盒里倒出一大堆破烂肮脏的鞋子，清理配对后，再装回去。她把厨房里每一个陈旧发黄的塑料调料盒洗得闪闪发光，用铁丝球一遍遍刮下卫生间墙上的污渍，再翻出许多条破布，一一搓洗后贴在墙上晾干。最后，母亲总要把阳台上晾的一条咸鱼取下来擦干净，再原样挂回去。据说那是一条鲨鱼，沈黛还记得它硬梆梆咧着嘴，成为咸鱼后仍然保留了几颗尖利的三角形牙齿，牙齿黄得厉害，他们一直没有吃那条鱼。

沈黛从来没有穿过母亲织的毛衣，家里不管打扫了多少次，看上去也总是凌乱而肮脏的。父亲的电话永远没人接，无论什么单位，周末办公室总是没人，她从不知道父亲去了哪里。每个月她只能靠自己，一点点把很少的零花钱攒起来，买最便宜的那种卫生巾。沈黛因为这一切而憎恨沈元，她从未谋面的哥哥。

沈黛五岁那年，父亲单位的叔叔来串门，笑着对她说，你是个黑娃娃，没有户口，将来只能送去读技工学校的。沈黛问技工学校学什么，叔叔用手一指电视屏幕，郑重地说，就是学里面那个济公，摇扇子。沈黛吓了一跳，电视里的老头疯疯癫癫，从头到脚破破烂烂，腰上插一把行将散架的蒲扇，她决不要变成那个样子。她去问母亲什么是黑娃娃，母亲眉毛一竖，说，别听他瞎说，上不了户口的是他们家，想要男孩儿，去年躲着生了一个，还是个女儿，又交不上罚款，我们家有男孩儿，也不用交罚款，他眼红呢。

沈黛依稀觉得母亲在说一件令人骄傲的事，却不明白里头的原因。她一直知道自己有个哥哥，但她已经长到比照片上那个婴儿大得多，他却从未出现过。这样说似乎也并不确切，实际上，元元一直都在。

母亲每年反复整理的那些破烂大多是元元的东西，毛衣是按年岁揣测元元的身形织的，分了春秋和冬天不同的厚度、花色和款式，贴在墙上晾干的破布是元元用过的尿布和口水兜，每次清洗晾晒的床单里都有元元的，几十年来一直没扔，为的是元元有一天会回来，鲨鱼是生元元的那年奶奶拿过来的，风干的东西不会腐坏，就那么天长地久地挂在阳台上，像是某种永恒的希冀。

元元是天底下最可爱、最聪明的孩子，白白胖胖，两只眼睛圆鼓鼓闪亮闪亮，笑起来很好看，生得也乖巧，不哭不闹不挑食，就连每天拉屎的时间都很准，还不干不稀，一点不让人操心。不像小代，生下来就总哭，细喉咙，喝奶喝药都很慢，稀饭只能小小口小口喂，不吃青菜，头发稀稀拉拉，整个人又黄又瘦，还长雀斑，每年冬天闹三个咳嗽，不说话，从来没人知道她在想什么，除了孤僻的性子和父亲有几分相似，简直看不出和这个家有什么关系。作为妹妹，她同沈元没有一丝相像之处，甚至她的所有缺点都同沈元的所有优点一一对应。

后来，沈黛自己改了名字。她喜欢对人解释自己的新名字：沈黛，沈阳的沈，林黛玉的黛，对，代替的代下面加一个“黑”字，这很重要。

5

黄昏时，天上开始飘一些细小的冰粒子，天色却反常地明亮起来，像是终于释放了一场压抑。路上车很少，许久才有一辆“嗖”地掠过去，很快就消失无踪。这光景给人一种错觉，似乎还有很长的时间等在那里，一切都不用急，也不会有什么打扰，她们大可以这样一直不紧不慢地走下去。

但这错觉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天光几乎是在一瞬间就暗了下去。越来越密的冰粒在车灯的光里不停旋转飘荡，沈黛睁大眼睛目视前方，在它们中间搜寻重组那条几近淹没的道路。她没有在这种天气里开过车，事实上，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开过车。

导航似乎经过了深思熟虑，在长久的沉默后终于出声提醒，前方八百米靠右行驶下高速。很快，匝道口限速 40 的指示牌出现在车灯黯淡的光里，沈黛暗暗松了口气。

宾馆是一栋简陋的四层楼房，暮色里，几个方形的窗口亮着昏暗的灯光，招牌灯箱上一半的字已经坏了，剩下的“迎”和“宾”不时颤颤巍巍地一闪。楼房看上去像一头遍体鳞伤的怪兽，红着眼歪斜地蹲踞在荒野里。

停好车后，沈黛很快看见了那辆小轿车。光线已经很暗，它又隔着一段距离，但她能确定就是他的那辆车，车牌尾号是 X7，她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记住的。

他也在这里，这家不知道叫“迎”什么的宾馆，距离最近，只此一家。他说得没错，他熟悉这条路。

沈黛下车去后备箱拿了旅行包，回转来，母亲已经下了车，大衣紧紧裹在身上，手里拎着那两个绑好的黑色布包。沈黛走过去，挡住母亲身前，压低声音问，你要干嘛？

母亲的眼神有些茫然，也许对她来说，这根本不成为一个问题。

沈黛说，不好让人看到的，今天在休息区你就大敞着车门。

母亲垂下头默然而立，片刻后，好像酝酿完成，她抬头，一句一句坚定地说，你爸，还有元元，他们两个，晚上，留在车里，不放心，又那么冷。

沈黛扭头看着亮着灯的宾馆前厅，说，万一惹人起了疑心，人家不给我们开房间，到时候留在车里挨冻的就是你自己。

不会的，母亲说，我负责拿好，不会让人看见，我们是一家人，又是这么冷的天，应该待在一起的。

房间在四楼，空调固定在 25 度，找不到遥控器，电视柜上有一只开着盖的、歪倒的电水壶，母亲把它仔细地洗干净，插上电后却发现底座的灯不亮，她们坐下来，怀着期待等了一会儿，还是没有动静。

沈黛披上羽绒服，端起水壶，对母亲说，我去换一个。

打电话不行么，母亲说，这不是贴着，入住须知。

不等她说完，沈黛已经开门走出去。

宾馆的大门关着，前厅里却还是有不知什么地方钻进来的冷风，无声地打着小小的旋。

日光灯管泛着蓝，照出脏兮兮的玻璃门上两个模糊的影子，刚才给她们办入住手续的前台小妹，和弯着腰、手肘半撑着靠在柜台上的高个子男人，正是他。

沈黛走过去，把装满水的壶连同底座一道举到小妹眼前，说，坏的，麻烦换一个。

小妹正和男人谈笑风生，被打断后，不情愿地看了沈黛一眼，却并不伸手，只说了句，不会吧。

沈黛把壶顿在柜台上，说，找个插座，我试给你看。

小妹依旧不动，瞟一眼男人，说，凑合一晚不行么？都这个点儿了，晚上喝多了水不好的。我妈只能喝热水，沈黛说，半年前才做的肠息肉。

那你拿个杯子来这里接吧，小妹侧过身，亮出自己身后的饮水机，桶里还剩一点底。

沈黛指指插座，说，你现在就可以插上试一下，是真的坏了。

我房间里那个跟你换，我试过，是好的，男人的声音在沈黛身后响起，我不喝热水。

沈黛转过身，像是刚刚发现他的存在，又盯住他看了看，才点了下头，说，是你。他没戴帽子，头顶一圈稍长的头发扎成一个小揪儿，余下的地方则剃成平头，好像是近来年轻人流行的发式，现在看来，倒也挺适合中年人掩饰秃顶。他的冲锋衣换成了一件黑色的摇粒绒，里面还是那件把喉结勒得很突出的高领毛衣。

你哥他们呢？男人问。

他们开到前面去了，另找了家宾馆，没办法，我开得太慢了，沈黛脱口而出，似乎从她再次看见他的那辆车时，这番话就已经等在她嗓子眼里了。

哦，男人点点头，看了眼前台小妹，又对着门口抬了抬下巴，说，我上外面去抽根烟，一会儿回来把壶给你们送去，你们住哪间？

我也出去透口气，沈黛也看了看小妹，说，怪憋屈的这里。

6

冰粒子已经停了，黑夜里飘着暗蓝的雾，两个人走过稀稀落落停的车，在公路边站定。男人从牛仔裤兜里掏出烟，抽出来递给沈黛一根，又为她点上。他自然而然地做着这些，仿佛和她早已熟识。

你们怎么会想到要去蝴蝶谷？男人问。

我妈妈要的，沈黛吐了个烟圈，说，我爸从前外派到那里去工作过。

那你爸应该很熟悉那边的路，男人说。

沈黛摇了摇头，是好多年前的事了，现在哪里还能一样，只是听他说过，那一带山很多，要过一段很长的隧道。

男人点点头，又说，你爸肯定很想念那个地方。

也许吧，沈黛注视着不远处一盏路灯，说，他在那里待了一年，回来的时候带了好多蝴蝶标本，都是他自己捉的，好多种花纹，颜色也不可思议。有一只他单独夹在一个本子里，说是世界名蝶。我还记得，枯黄色的翅膀，两边各有一行白色的花纹，说是放大了看，像一群戴着头巾的修女在唱歌，里头有一个样子像梦露，所以又叫梦露蝶。谁？男子有些茫然。

玛丽莲·梦露，一个美国的电影明星，六几年前就去世了，但好多人说她没死，跑到了南美洲一个修道院。

我想起来了，男人说，好像穿件白裙子，脸上什么地方有颗痣，一笑嘴咧挺大。

我用放大镜看过那只蝴蝶，认不出来哪个是梦露，沈黛说。

那是，修道院里都披着头巾呢，男人说，何况还化成了蝴蝶。

他们一道笑起来。夜里车很少，远处的山脉投下几不可辨的暗影，微弱地罩在他们脸上。其实我不是回家，男人说。

沈黛不接话，只用力吸一口烟，看着烟头橘红的光猛地亮一下又暗下去，像是某种微妙的回应。

这次是真的，男人好像开了闸，忽然喋喋不休地说起来，我下定了决心，再也不要这样下去，挑这个时候走就是为了表明我的决心，这种日子我一天都捱不下去了，你不知道，男人平时总是不爱多说什么，但是……

我知道，沈黛打断他，有一次，我爸也想这么干来着。

男人愣了一下，呆呆地问，你怎么知道？

沈黛裹紧身上的羽绒服，蹲下去，看着眼前的柏油路基，缓缓说，有一段时间，我经常陪我爸去逛商场。

父亲主要看的是床上用品，床垫、被子、枕头、四件套什么的。父亲腰不好，睡不了席梦思，就专门找那种填充棉絮的床垫。沈黛记得父亲看中的一个棉絮的床垫外面包了很漂亮的印花布，看上去绝对不会有什么棉絮飞出来。商场里的枕头又大又柔软，被子看着很轻，但一定很暖和，床单和被套的花色淡雅，统一配套。沈黛跟着父亲穿梭在那些柔软、舒适又好看的床品里，她知道父亲和自己一样，那样一个家令他们感到羞愧。

家里所有的床单和被套都是乱七八糟的花色，枕头上垫着会掉毛的枕巾，床上永远盖着一块不知从哪里弄来的丑陋的花布充当床罩。母亲每年都会指挥父亲把所有的被子和床垫拿去重新掸一遍，这是雷打不动的大事。

但沈黛知道，父亲带着自己逛商场，并不是要把这些东西买回家去。那一次，他大概终于下定了决心，就和现在这个男人一样，他准备离开，去一片截然不同的天地。她不确定那片天地里是否还有另一个人，只知道他挑的床品尺寸都是双人的。

他们，你妈妈，还有哥哥，知道这事吗？男人问。

沈黛摇摇头。

你也没想过告诉他们？

我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我反正不会说的，沈黛说。

最后那天，父亲终于选定了要买的床品。付完款，他在商场门口买了两只最贵的雪糕，好像一共花了十八块。他们站着吃完雪糕后，拎着那些东西走在马路上，它们都用透明又厚实的塑料袋子压缩密封起来，干巴巴地皱缩着，拎在手里轻飘飘的，就像父亲即将去到的那片新天地一样，轻松，美妙，又不真实。

她后来再也没有见过那些东西。那天父亲掏空了包里所有的钞票，他们拎着大包小包轻松地走在马路上，她对这件事的印象就到此为止。后来发生的事像是被黑洞吸了个干干净净，她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父亲到底把那些东西拿去了哪里，最终他又是怎么若无其事回到家，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但他们将因此而变得更加亲近，不是作为父女，而是作为两个企图逃亡的同谋。即使父亲无声无息地一败涂地，他们依旧是铁一样坚硬的同谋，沈黛想，就连沈元都无法介入的同谋。

那个蝴蝶谷，一定是个很美的地方，男人忽然说。

你可以跑到那里去，沈黛起身，说，和梦露一样，躲在轻飘飘的蝴蝶翅膀上。

好主意，男人笑起来。也许是黑夜的缘故，他的牙看起来很白。只是这样的巧的话，看起来会像一场私奔，他说。

开玩笑的，沈黛说着，低头用力踩灭地上的烟头，又说，我待会儿拿那个壶接热水回去，就不麻烦你了。

男人离开后，沈黛掏出手机。调出最近的一条信息，只有四个字：还回来么？沈黛也回复了四个字：不回来了。发送的符号像一只小小的纸飞机，手机屏幕微白的光亮熄灭，简短的告别飞入无边的夜色。她盯着那黑暗，还需要一会儿，烟雾散尽她才能回去。

7

天亮得比预料得早，这证明春天确实已经到了。太阳升起来后，天空像刚洗过一样晴朗而明澈，看不到一丝云。昨天的一场冻雨似乎把这段时间以来的坏天气一并带走，不留一丝痕迹。

母亲让沈黛关掉车里的空调，早起她的脸色就不大好，反复嚷着鼻子干，肚子也不舒服。开着车窗就行了，母亲说，透透气。

沈黛不说话，只是把空调的暖风调大一档。早春晴朗的清晨弥漫着她最害怕的那种寒冷，那种把你因为春天的到来而燃起的朦胧希望冻得半死不活的寒冷，那种即使太阳已经升起来也无济于事的寒冷。母亲从不知道这个，她也不会对她说。

升起车窗时沈黛朝昨天的地方看了一眼，枯草里结着脏兮兮的霜，风在草丛间打着旋，不见那辆车，他也许一大早就走了。

导航沉默了很久才开口，它并没有指示从昨天的路口返回高速，她们从另一个方向，上了一条柏油路。十分钟后，狭窄的柏油路两旁出现了一些稀疏的房屋，它们看上去像是那栋宾馆的许多复制品，同样地生硬和灰败。房屋之间长满的枯黄杂草也像是从宾馆外面一直延伸过来的。有一座房子的墙刷得白一些，铁皮门板阖得严严实实，看上去像是一间废弃的商店，门头挂着像是上个世纪就在那里的广告，褪了色的代言人生硬地咧开嘴，露出一排晒得发黄的牙齿，朝着悬浮在身旁一桶开了盖的机油竖起大拇指。路旁没有人，路上也见不到其它的车。

在一片安静里，母亲忽然说，我要上厕所。

沈黛下意识点了一下刹车，太阳已经升高，清晨的雾气正在消散，但路还看不到尽头，导航也陷入长时间的沉默。能忍吗，她说。

出门前我就说要把那个保温壶带上，你就是不听，我们是开车，带个壶怕什么的，母亲像是终于找到了某个缺口，源源不绝抱怨起来，饮水机从来烧不到一百度的，我们中国人的体质就是要喝开水，我又有了结肠炎，喝那种水会闹肚子的你不知道啊……

你那么多毛病谁能记得，家里那个保温壶早坏了八百年了也没见你记得，沈黛冷冷说。

母亲收回后面的话，悻悻问道，还有多远？

什么？

厕所，母亲像是维持着最后的耐心，拉长语调重复了一遍，厕所还有多远？

不知道，沈黛说。

你开车不认路吗？母亲有些着急。

导航认路，沈黛说着，朝手机努了努嘴。

母亲拿过沈黛的手机看了一眼，又无奈地放回去，说，早说了让你带一张地图，手机又不是万能的，而且我买的那张是旅游地图，上面应该是标了那地方的。

我不会看地图，沈黛说，而且地图和导航一样，也不会把厕所标出来。

上北下南左西右东都不知道吗？母亲有些恼怒。

那你说说我们现在正朝哪个方向走？沈黛朝手机指了指。

母亲看看手机，又凑近挡风玻璃看看外面天上的太阳，嚅嗫了几声，转身看看后排，又瞥了一眼沈黛，终于不再说话。

放心好了，沈黛说，不管怎么样一定能到，就算慢一点也没关系，安全第一，合同签了很长时间，不着急。

什么合同？母亲警觉起来。

当然是租车，沈黛说，你不是要自驾游么？

租的？母亲有些惊讶。

沈黛点点头。

母亲的声音发紧，说，那，你们自己的车也输掉了？他爸妈那边怎么说？

不等沈黛回答，母亲已经开了闸：

你不是说结婚的时候他家就给买了一辆，他自己肯定以前还有，所以是都输光了吧？

人生地不熟的，什么底都摸不明白，你急什么呢？

家里有几个钱又怎么样，没个稳定工作不行的，别以为生意好做，谁不知道这几年。

那年你回来的时候我就说让你去见见你爸以前那个同事的儿子，都是本地的，知根知底。

当初就那么马马虎虎，连个酒席都不办，我就说你要后悔。

那孩子面相就不怎么样，看着虚得很。礼貌也不懂，你爸办事都不回来一下。

都是命不好，初一那天我说让你跟我去上香的……

那我不走了，怎么样，沈黛忽然说。

母亲猛然停住，问，你说什么？

我不走了，沈黛说，以后都在家，不回去了。

母亲有些慌乱起来，什么意思，车子总归要还的吧，租来的。

网上租的，全国都有点，我查过了，在这里也可以还，沈黛牢牢盯住前路。房子越来越少，连片的枯草却像是没有尽头，像要渐渐将道路也吞噬掉。

母亲沉默片刻，开口问道，昨晚那么冷，你在外面待那么长时间，是不是小唐出什么事了？

没有。

真没有？

真没有。

8

有一段时间父亲突然开始密集地给沈黛发信息，内容大多是一些以讹传讹的养生文章，还有家乡当地公众号发布的新闻、轶事之类，中间夹杂着一些父亲用手机翻拍的旧照片。有一张照片是在一片枯草地里照的，一个小女孩穿着厚厚的红色棉袄、灰色棉裤，侧坐在一块石头上，风把她的头发和周围的枯草一道吹起来，她皱缩着脸，似乎正冲着

面前蹲着的父亲哭闹或抱怨什么。父亲那时头发还是漆黑的，他向她递上一块不知道什么吃食，并用一只食指指向镜头，好像在哄她乖乖照完相。照片右下角用很细的钢笔写了字，但字迹已经完全模糊。父亲在信息里告诉沈黛，那张照片照于她三岁那年。沈黛记不清自己照过这样一张相，但里面的孩子瘦弱、羞涩、别扭，很难讨人喜欢，正是她自己。

所有的旧照片里都没有沈元的影子，不知道是父亲有意为之，还是他们除了那张周年纪念之外，的确不曾给沈元照过其它的相。父亲对沈黛说，家里的老照片许多都不见了，收收拣拣也只剩下一册。沈黛不知道父亲为什么忽然想起照片来，他也许有话要对她说，但她和他都知道，他们不可能再真正说点什么。小唐的出现让她得以顺理成章把自己关起来，同时也是把他们关起来。他们在，又好像不在。她习惯用一个动画表情回复父亲的信息，让手机如愿安静下来，偶尔的电话，她只有例行的问候，他们似乎也没什么要说。那以后不久，父亲离开了。

父亲最后选了一个安静而偏僻的地方，那是一栋七层的荒废的宿舍楼，孤零零立在荒草丛生的野地里，工厂已经拆了许多年，不知道为什么单单留下了那栋楼。沈黛在那座城市生活了十八年，从不知道那片野地，她也不记得父亲待过任何一座工厂。那栋楼的窗口有一些还留着灰蒙蒙的玻璃，玻璃上映出远处的天空，残破又肮脏。有一间房的窗子整个脱落了，露出里面墙上掀起一角的海报，在风里呼拉拉地响着，就是不掉下来。楼顶有一圈歪歪扭扭的铁丝网，泛着灰白的光，还来不及生锈，是不久前新加上去的。它们就这样居高临下俯瞰着她站在荒草间，仿佛在说，没办法，我们也没办法。

她在草地里站了许久，确认这并不是那张童年照片里的地方。草里流过小股清澈的细流，不知道源头在哪里。她没有找到那个白色的轮廓，也许是被水冲走的，也许是被风吹散的，也许他们压根就没有画，那些草很硬，说不定一开始就没办法在上面画出什么轮廓。她也拒绝掀开那块白布。她记得父亲曾经有一双鹿一样的眼睛，瞳仁黑而大，上面总像蒙着一层潮湿的雾气，这让他的神色看上去时常带着些羞涩和惶恐，特别是在他下意识地垂下眼睛、想要躲开什么时候。早在他离开之前，那双眼睛就已经变了模样，她并不害怕什么面目全非，只是父亲既然选择躲开所有人，她理应完成他的心愿。

骨灰安葬那天是母亲问好的日子，母亲坚持办了酒席。那天沈黛穿一条全黑的连衣裙和一双黑色的漆皮鞋，戴了条很细的银链子，还涂了黑色的甲油，母亲不会满意这样的装扮，但她不会说，因为父亲留下的账还等着沈黛来了结。父亲单位的人发言时，母亲的一只手一直放在她大腿上。手有些凉，并且一直微微颤抖，沈黛没有握住那只手，却也没有躲开，她也没有流眼泪。开席后她坚持只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独自吃着那些不知道什么味道的饭菜。不断有人过来说些节哀顺变之类的话，她开始感到不耐烦，如果父亲在这里，大概也会和她一样。大多数时候他们只是单纯地失去耐心，但已经冒犯了别人。

散场时小姑特意走在后面，语重心长对母亲和沈黛说，从前妈走了以后，大哥和我们就渐渐散了，现在大哥走了，你们可不能再散了。小姑说的“你们”显然不包括沈元，他们已经很久不提起他，仿佛从来不曾有过这个人。但也许正因为这句话，母亲才决定要全家去一趟蝴蝶谷。

蝴蝶谷是近几年为了旅游开发打出的名号，那里的自然条件号称最适合蝴蝶的生长繁育，因而拥有的蝴蝶种类也居全球之最。每年，山谷里会有一次蝴蝶的集中破蛹爆发，景象很是震撼。沈黛看过那段著名的三分钟长的视频，画面里，身姿柔软的舞蹈家穿一条五彩斑斓的刺绣长裙，在大丛密集飞舞的蝴蝶中缓缓旋转。沈黛的印象里，视频的画面似乎出了点问题，舞蹈家的样子始终看不清，并且不知是不是因为数量过多，蝴蝶并不如想象中轻灵，它们飞舞的样子，像是某种剧烈的撞击之下迸散的碎片。至于周遭更广阔的景象，更是一团模糊。

在父亲被外派的那个年代，那里只是一个偏远村落边上的无名山谷，得由当地人带着，翻过一座大的山头，再攀过一段悬崖后，才能发现穿过森林的小路。山谷在森林的环抱中，父亲只进去过一次，那些绚丽多彩的蝴蝶大多是父亲在山谷外的村庄和田野捕到的。

那个小小的山谷非常安静，这并不是说那里没有鸟鸣、虫子，或者风吹过树叶什么的，而是在父亲唯一一次提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就只说了这个：安静。也许安静到连蝴蝶翅膀上排成行的白衣修女唱歌的声音都无从想象。父亲不确定那只梦露蝶是不是进到山谷里那次捉的，他后来忘记了许多事，并且在他从七层高的楼顶一跃而下之前，他就已经打定主意，背转过身子，只偶尔对自己说一些零碎的只言片语。即使是自诩为同谋的沈黛，也无法从其中拼凑出一段完整的时光。

这些空白也无法由母亲来填补，她所拥有的全部时间几乎都充斥着愤怒、失望和痛苦，那些时间因此变得高度同质化，死死板结为一块，再也不能成为任何具有意义的标记，她自己也因此变得一团模糊、语焉不详。

父亲留下的那份合同显示，半年多的时间里，他一共从那家公司借出五十万元合同条款里，借款利率是一个手填上去的数字，大约随借款的金额及期限各有不同，那个百分比上摁了一个已经发黑的指印，猛一看有些骇人。那些钱投进了同一家公司推出的一款互联网理财产品，已经亏得一点不剩。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加上利息，他需要偿还的金额不到八十万。在此之前，他已经悄无声息亏光了家里原本不多的存款。

那几本存折上各自剩下几十块的余额，没有遗书，没有不同寻常的言行，甚至那天他出门前也同平时一样没有跟母亲打一声招呼。这次他不再需要一个同盟者，他对于一切早已不耐烦，也不会再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回到家里去。

9

零星的房屋也消失之后，车子才停了下来，明亮的阳光下，只剩下望不到边的枯草，像是准备一直席卷到天尽头去。

沈黛拉起手刹，熄了火，下车打开后备箱，拿出一把黑色的雨伞，和一只折叠的坐便椅。母亲弓着身子下车来，手捂着肚子，有些为难地看着沈黛。

将就一下吧，沈黛瞄了一眼手机，说，伞撑开挡住，坐着，周围没人，我会帮你看着的。母亲朝四周望了望，又看看沈黛，终于朝漫天的枯草丛里走去。选定离路边较远一点的地点后，又迟疑片刻，才撑开伞和折叠的坐便椅，她的身影随即消失在阔大的黑色雨伞后。

沈黛坐回驾驶座，让车门敞着，风里传来似有若无的粪的气味，她心里有一丝奇特的欣慰。

手机信号依旧只有一格，收件箱里未回复的信息还剩一条：甘载磨砾，理想不死，戴熊教育感谢所有员工一直以来的奉献与付出，相关补偿会在资产清算结束后尽快发放，请保持通讯畅通，并确保预留卡号的银行卡状态正常，最后祝大家前程似锦，一路生花。沈黛逐字再读一遍，点了“删除”。

她打开手提箱，在里面胡乱翻了几下，当她意识到自己是想找到一包烟的时候，就停住了，母亲也许就快出来了。几乎与此同时，她看到一个又细又高的黑色身影朝她走过来。

男人收回了冲锋衣，毛线帽攥在手里，头顶的小揪儿有些凌乱，脸上泛着红，气喘吁吁，脚上的登山鞋边缘糊了厚厚的泥。他看见她，脸上的表情似乎有些难以置信，却又像是松了一口气。

你怎么在这里？沈黛从车里出来，关上车门，用身体挡住车窗口。

前面是山路，男人的车抛了锚，那里应该离一条隧道不远，他看见路标了。救援电话接不通，他等了很长时间都没有一辆车路过。他不知道隧道有多长、以及那头是什么情况，他不敢冒险，所以决定往回走，现在看来，他运气似乎还不坏。

隧道，沈黛想，他真要跑到蝴蝶谷去？

你不是说你走过这条路吗，沈黛说。

男人看着她摇摇头，说，逃跑的时候得走密道，最好是连自己都不认识的那种，这样才不会被发现。

逃跑的时候还应该像你一样，开辆越野，那样就管它什么走没走过的路通通不在话下，男人又说。他刚才似乎有些慌张，见到她后似乎渐渐平复下来。

那倒也不一定，沈黛说着，转头看了一下伞的方向，母亲还没有出来。再厉害的车开不好也容易出问题，她笑一下，说，我的技术就很烂，你见过的。

你哥为什么不拉上你们，男人盯住沈黛，缓缓说，他们就这么放心……

开快了我妈会晕车，沈黛几乎不假思索说。她并没有想到会再次遇见他，这是为了别的情况准备的答案。况且我哥那边还有媳妇儿和孩子，一车人刚好，她补充说。

那你呢，男人接上话，昨天好像听你妈说……

孩子丢了，沈黛忽然打断男人。男人还来不及掩饰住脸上的惊诧，她下定决心继续说下去。周岁生日的时候，孩子的奶奶非要领着去菜市场，其实是想把菜篮子挂在婴儿推车上，好省点力气。孩子睡在推车里，顶篷拉起来，老年人眼神不好，反应也迟钝，忙着掏老花镜凑近了看秤，发现的时候推车已经空了。那天孩子他爸加班没在家，联系上的时候已经过了好长时间，家里乱作一团，孩子是没指望找到了，家也因为这事散了。

怎么会这样，报案了没有，有没有叫菜市场调监控来看看？男人似乎想尽力表现出同情，又觉得不太合适，于是试图将表情转为痛苦。

沈黛摇摇头，这是她迄今为止根据所有的碎片所能拼凑出关于那件事的全部，四十年前的菜市场大概不会有什监控。

没再想想办法吗？男人口里继续问着，但看样子似乎想尽快结束这个话题。

没办法，沈黛打断他，再说我又恰巧和那孩子一天的生日，所以我也必须消失，否则伤口血淋淋的永远长不上，这样不行，日子总得过下去。

男人的脸色变得十分黯淡，沈黛乘势又说，我妈也因为这事一直精神状态不太好。她说到这里，抬起手在自己脑袋旁边胡乱地划了个圈，像是要把什么归零。所以，我们恐怕不方便……

她话没说完，男人的目光忽然朝她身后看去。她转过身，母亲拎着伞和坐便椅，慢慢走过来，她的面孔泛着黄，看上去比方才虚弱了一些。

男人抢上前弯腰扶了母亲一把，说，阿姨，还记得我吧，我们昨天见过，加油站那儿，停车休息的时候，你们要去蝴蝶谷，是不是？

母亲打量男人片刻，脸上绽出不自然的笑，像是不由自主般点点头，说，你帮我们小代倒车来着，男的开车技术都好，谢谢你。

我车坏在前面路上了，想求你们搭我一截，到有信号的地方我才能打电话叫人来拖车，男人说。

母亲像是什么都没听到，只是直勾勾盯着男人，忽然问，你今年多大了，有四十吗？

男人一愣，瞟了沈黛一眼，关切地对母亲说，我看您脸色不太好，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我车上带了药，还有开水，你们把我带过去，我拿药给您吃。

母亲看了沈黛一眼，眼神却像是什么都没有看见。她伸手拉开后排车门，两个长方形的布包扣着安全带，黑压压地并排而坐，留出一方明显的空位。

只有委屈你挤一下了，母亲说。

真是太感谢了，男人点了点头，弯腰钻进车里。像是要同那两只布包保持队形整齐，他第一时间拉过安全带扣上。

母亲看着他，像是很满意地呼出一口气。一个极细微的声音钻进沈黛的耳朵里，像是错觉，但她说的的确是那两个字：快了。

10

他们很快进入了山路，也仿佛陷入了没有尽头的循环。路两旁依旧是那些永远不会结束的枯草，一模一样的弯道一个接着一个，源源不断地奔上前来，隧道却一直没有出现。过弯的时候有一辆摩托车超了上来，一个姑娘侧坐在后座上，皮肤黝黑，高颧骨上泛着红，穿一条火红的裙子，长发结成粗粗一根辫子，里头编进去五颜六色的丝线，脖子、耳朵和手腕上都带了层叠的银饰，大概是过年期间的打扮。沈黛点了一下刹车，刚动了问路的念头，姑娘前面驾驶摩托的小伙子已经手上加劲换了挡，摩托呼啸着一路飙走。

姑娘回头冲她们笑了一下，她的眼睛出奇地明亮，牙齿白得耀眼，身上的银饰沙沙响着，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芒，一路飘洒，消失在下一个弯道处。但空气里似乎还飘着姑娘留下的什么，就连母亲也好像禁不住快活起来。她转过身，问后面的男人，你家是哪里的，父母都还健在吗？沈黛看不见男人的表情，只有硬邦邦的声音在身后说，就是本地的，我父母身体都还好。母亲毫无意义地“哦”了一声，又问，你知道自己是什么星座吗？沈黛咳了一声，母亲停住话，示威一样瞥了她一眼。阿姨还研究这个？男人似乎有些尴尬。母亲含含糊糊笑了一下，说，咳，算不上研究，玩儿呢。那你知道元元是什么星座？沈黛忽然问。母亲和男人都愣住，半晌，母亲才说，我当然知道。

十七岁，她在家过了唯一一次生日。生日在十月份，次年七月的高考，她会报一个离家很远的学校，不知为什么，她觉得父亲和母亲似乎同她一样，都十分确定这一点。大概是因为这个缘故，父亲那天破天荒为她买了一个生日蛋糕。她还记得装蛋糕的纸盒是白色的，盖子上粘着一个粉色丝带打的蝴蝶结。她有些受宠若惊。那天母亲一直没有回来，他们只好先坐下来，父亲让沈黛自己把蛋糕拿出来插上蜡烛，他在一旁准备好了火柴和相机。那是一个方形的蛋糕，厚厚的白色奶油把蛋糕包裹得严严实实，四周一圈玫瑰形状的裱花，中间是一只白色奶油做成的小熊，它面前斜插着一片棕色的巧克力，上面四个白色的花体小字：生日快乐，它看上去简直像是从某个台湾偶像剧里端出来的。她的愿望是父母身体健康，自己考上大学，第三个愿望还没许，她听到了开门声。在母亲进来前，她慌慌张张吹熄蜡烛，好像晚了就会来不及。她睁开眼，彩色的蜡液滴在纯白的奶油上，已经凝固起来，漂亮，又一塌糊涂。母亲买了卤鸡腿，她把它们倒在一只盘子里，说，生日快乐。她没有看沈黛，也没有看父亲。沈黛特意把有小熊的那块蛋糕端到母亲面前。母亲看了一眼，站起身，去厨房拿来一柄不锈钢的餐刀，用它在那块蛋糕上轻轻一抿，小熊和玫瑰花瞬间被摧毁，淹没在厚厚的白色奶油里。母亲分几次把那些奶油抹在父亲和沈黛的蛋糕上，那里有小熊和玫瑰花，但现在看上去只是一滩烂泥。我不吃奶油，母亲说，咽不下去。沈黛一直不能确定在母亲花样繁多的禁忌中是否真有奶油这一项，那天她拼命吞咽那些被抿成烂泥的奶油，直到因为发腻而干呕。好吃，我最喜欢这个，她对父亲说。虽然是生日，但收拾洗碗的照例是沈黛，从她六岁开始，这是从来没变过的规矩。在沈黛试图用一张餐巾纸去擦掉粘在桌上的一小团奶油的时候，母亲说，浪费，用抹布不行吗？沾了奶油不好洗的，沈黛说。

那买这东西干嘛呢，母亲说，她也许早就在等着这一刻。花这个钱，你以为演电视呢。元元过周岁的时候，还是我去买的蒸米糕，你那个妈，管过什么，哦，去买个菜非得带上孩子。这一天，过不去的！电视声音突然大起来，片刻之后又消失，最后是门关上的声音。又只剩下她。母亲又说回她。上个星期，不是给你缝了垫子么，多少次了，血染在上面洗不掉的知道吗，小姑娘家不讲卫生将来会得病的，以后还有的是麻烦，要是元元还在，哪至于惹这么些事……沈黛打开水龙头，挨个往每个碗里滴上洗洁精，这是母亲禁止的做法，她咬着牙，看着水流在一个个碗里冲出高高的泡沫。她明白了自己的名字意味着什么：他是元初，而她是替代。因为一个纯粹的巧合，她背负某种希望和隐秘的使命而来，但最终，热望熄灭，她同阳台上那条鲨鱼没有区别，死去的希望，风干的标本，可笑又伤感，她无法替代任何人。她去改名字的时候曾想要把出生日期也改掉，但那需要提供出生证明。她就此放弃，比起名字，没人会在意这个。

阿姨当然知道，男人说，随即似乎意识到这是一句无谓而荒唐的话，他自己不明所以地笑了一下。我女儿，大学毕业以后就留在外地了，母亲掉转话题，重又滔滔不绝起来，在一家大公司当总监，离家远呢，房子是女婿家买的，没贷款，说起来我那个女婿……女婿工作忙，您之前说过的，厂子里的事儿，男人小心翼翼接上话。母亲径自说，天天忙工作有什么用？我总说叫他们早点要上个孩子，慢慢就会好，可就不听我……孩子，是挺重要，男人说。她才不管，母亲说，男人的话似乎给她撑了腰，从小到大什么时候听过话，永远绷着个脸，像谁欠她的一样，母亲说。其实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他说，人要往前看，日子总要过下去的。说得对，沈黛抢在母亲开口前说，要往前看，有的人就当他不存在好了。我就知道你们吵架了，母亲像是猜中谜底一样笃定地说，你就是这样，什么都不说，只知道躲出去，跟你爸一个样。

11

像每次话到尽头后那样，母亲陷入不知真假的瞌睡里，阳光透过车窗照在她干瘦发皱的脸上，许多年过去，她的头发几乎没有变白，像是憋着一口气不肯认输。怎么还没到，你不是说不远么？沈黛问。这句话无济于事，可她必须说点儿什么。像是要回答她的话，一个温柔的女声忽然说，前方五十米请调头，是导航。沈黛愣了一下，却照旧朝前开着。为什么不调头？男人问。

导航有时候也会出错，沈黛说，何况这种路根本没法调头，过了隧道再看吧。男人凑上前来，几乎就在沈黛耳边说，我以前去过蝴蝶谷，是五月份，那会儿会有蝴蝶爆发，至于现在这个季节，那儿应该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你爸没跟你说过这个？蝴蝶什么的有什么关系，沈黛尽量让自己镇静下来，我们不是去看蝴蝶的，只是为了我爸……的一个心愿。可这不是去蝴蝶谷的路，男人说，前面也没有什么哥哥和爸爸等着，我猜是这样，对吗？男人靠回椅背，似乎并不需要回答。不对，我们一家人出来旅游，要到蝴蝶谷去，穿过隧道就到了，我们出发前看过了地图的，哥哥在，爸爸也在，你不要乱说，母亲的声音有些发懵，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醒来的。男人有些意外，随即像是想起了什么，肯定地说，你们走错路了，大概你们昨天从休息区出来以后下错了一个口，我昨晚就想告诉你来着。沈黛再次笨拙地转过一个弯，山路忽然变得平坦笔直。导航再次提醒，前方五十米请调头。沈黛依然没有减速。母亲扭脸飞快瞥了后座的男人一眼，转回来压低声音对沈黛说，你别任性了，从小就這樣，怎么说不听呢？就这么一直拗着不是个办法啊，日子总要过下去的嘛。日子当然要过下去，沈黛说。她听到自己的声音大了起来，干涩而空洞，就像从某个荒废的洞口传出来的回音。所以我得回来，爸爸不在，你也需要人照顾，她说。我不需要你照顾，母亲说，你爸虽然不说，但是他一把年纪了要那些钱干什么，还不是为了你，但他躲了一辈子，怎么会知道，事情哪能靠躲的。沈黛长长呼出一口气，似乎很平静地说，爸爸的事，全都怪我。母亲一愣，迟疑着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怪我，沈黛打断母亲的话，如果不是小唐，爸爸就会开口跟我借钱，七十多万，我能拿得出来。可是根本就没有小唐这个人，所有的事都是我编的，是我害了爸爸。你别这样，母亲说，她的语气似乎有些害怕，有了孩子，男人就懂事了，说不定赌也能戒了，他家里总不至于完全不管你们，慢慢会好起来的，可别意气用事，知道吗？那时候元元丢了，你以为我不恨吗，你以为我不想一走了之吗？可是我能上哪儿去呢？孩子不是还能生吗，生了也是我的孩子。会好的，都会好的，最重要的就是家，一家人，不能散了，母亲滔滔不绝说着，越来越激动。前方五十米调头，导航打断母亲，温柔的女声里似乎也带上了一丝急躁。沈黛又加了一点油门。男人深吸了一口气，说，调头，好吗？到了前面信号稳定的地方，你就能打通救援电话了，沈黛说。前面什么都没有，男人突然大声喊道，他的声音有些颤抖，我要回去，其实我们只是吵了一架，算不了什么的，何况还有孩子。几乎与此同时，母亲高声嚷道，我要上厕所。这句话似乎激怒了男人，他恶狠狠说，发什么神经，这两包鬼东西又是什么？沈黛猛踩刹车，一声尖利的声响中，三个人一道朝前方撞去，随后被安全带拽着摔倒座椅靠背。与此同时，一个布包飞出去，撞在椅背上之后落到了座位下，或许就在她踩下刹车的瞬间，男人摁下了系在那布包上的安全带扣。男人拎起布包，没有费什么力就扯开了绑在外面的绳子。母亲绑了很长时间，还打了好几个结，可是她力气不够，方法也不对，所以很容易就被拆开了。男人扒下层叠的黑布，几团发黄的棉花滚了出来，然后里面的东西终于露了出来。那是两只交叠在一起的黑色木框，没有照片，没有挡板，也没有玻璃，只是两个空荡荡一样大小的长方形，比父亲的遗像和元元的周岁照都更长，也更窄。

12

她们重新上路。后视镜里，男人侧着身子站在路边，脑袋低垂着，头顶的小揪儿在风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跳几下。他在后视镜里不断倒退，缩成一片黑色的薄影，令沈黛怀疑他那出奇的高个子只是自己的错觉。什么时候换掉的？男人的身影完全消失后，沈黛问。母亲似乎并不准备回答，她不知什么时候解开了安全带，靠在座椅上的姿态甚至有点不管不顾的松弛。你不是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么，母亲说，面面俱到，所有人都得听你安排，否则一定会出事，是不是？爸爸和沈元放在一起？沈黛说着，侧开脸去看另外那只布包，像是要避开母亲的目光，其实她并不能确定母亲是否在盯着她看，那种俯视、审查、打量的目光。你以为我忘了，可我记得清楚着呢，母亲说。起初，父亲找了两块海绵，用黑色的绒布包住，再用大头针把那些蝴蝶钉在海绵上，他又亲手钉起两只木框，漆成黑色，把海绵框在里面。黑色的绒布衬着蝴蝶们斑斓的色彩和花纹，木框斜靠在墙角，美艳又诡异。后来母亲说那些花纹、斑点什么的总在旋转，搅得她睡不好觉，父亲就把海绵换成了硬纸板，钉在纸板上的蝴蝶看上去似乎旧了一些，但也有一些颜色更显出奇妙的层次和变化来。无论如何，在那个灰败黯淡的家里，那些无法再飞舞的蝴蝶宛如一桩神迹。父亲有一次似乎说到自己还想再外派一年，他喜欢那个地方，空气很好。或许是在那之后不久，母亲在打扫卫生时，嫌两只木框碍事，就把它们摞起来，放到柜子顶上去了。沈黛就没有再见过那些蝴蝶。有一次过年扫除，父亲把木框拿下来，里面的纸板已经受潮发霉，大头针都还在，上面钉的却只剩下些碎裂的残片，再分辨不出颜色和花纹，再后来，连残片也消失了。那时沈黛已经不在家里，父亲对她说起这事，也只是淡淡说了两个字，坏了。许多年后，她看到那段舞蹈家在蝴蝶谷拍的视频，想起父亲的那些蝴蝶连灰飞烟灭的姿态都不曾有过，就无声地坏掉了，她觉得那是父亲老去的真正开始。那东西，我当初用布裹了一遍才放上去的。那些蝴蝶，漂亮着呢，也娇贵着呢，将来有机会摆出来，应该弄个玻璃封上，那样就不会坏了。可是你爸不让裹布，说是难看，像什么，木乃伊。其实包了布也是一样的，只要有空气进去，那些蝴蝶就会坏掉。你

爸没说过什么，你知道他那人就那样，什么都不说，到头来把门一关，什么动静都没了。就连元元丢了那次，他也没说过什么，怕你奶奶呗，孩子被弄丢了都不敢说个什么。你奶奶说他以前也这样，那时候一家子没饭吃，他饿得慌，也不说，就把饭留给弟弟妹妹，自己回学校操场上去跑圈，你说这是怎么办到的。临了倒好，你奶奶死了不久，你小姑她们把他叫去，说是单位发的抚恤金得她们三兄妹分，因为这些年她们紧着照顾了，你爸没出上什么力。你说这是人办的事儿吗？那时候他不想出力吗？人家什么条件，咱们什么条件……

母亲滔滔不绝地絮叨着沈黛知道或者不知道的事，那些她曾以为无关的事。

网络似乎在不知什么时候恢复了稳定，导航开始持续地重复提醒，前方五十米调头，前方四十米调头，前方三十米调头，前方调头，您已偏航，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这时，沈黛看到了那辆银灰色的轿车，它陷在路集外侧的泥地里，尾灯持续打着双闪，车牌尾号正是X7。男人没忘了在车后放上红色的三角架，他也没有骗她。

与此同时，仪表盘上加油的提醒标记不停闪烁起来，它也许已经闪了很长时间。而她们正在驶向一个硕大的半圆形洞口，洞里紧密而深邃的黑让洞口周围显出刺眼的明亮。沈黛知道，进入隧道的时候，空气会突然安静下来，路中央的白线会像一条蛇一样在前轮之间扭动，她的视网膜上会闪过一些颜色形状不一的光斑，这是外面的光消失前努力残留下来的印记。那些光斑在黑暗里闪动的样子，就像飞舞的蝴蝶，如果看得再仔细一些，蝴蝶其实已经因为撞击而迸裂，变成了飞溅的碎片。

快了，她对母亲说。

在一片漆黑里，母亲沉默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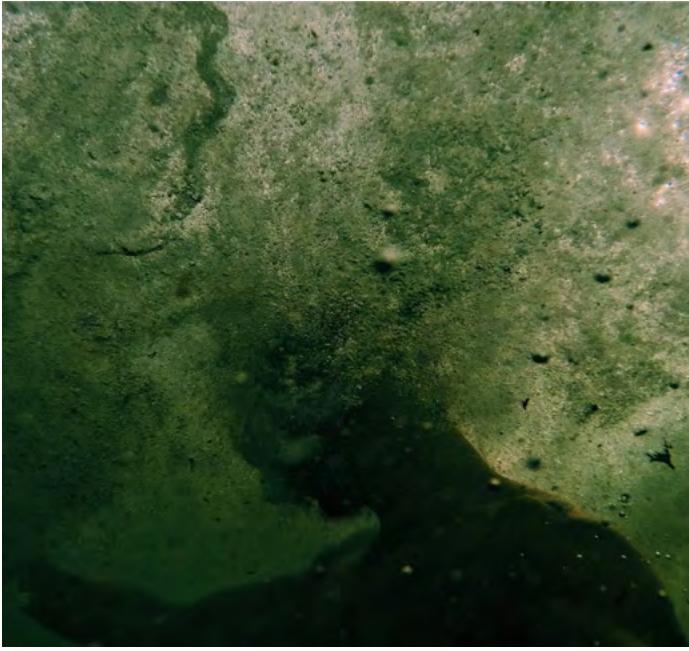


姜紫

女，现居昆明，教书为生，业余编点故事，作品散见于文学期刊和网站。

第二回

这是“24小时文学聚会”作者的第二篇章。祝他们欣欣向荣。



图片来自 Bash Fish on Unsplash

小说

巨人的公园

水陆两栖 | 第二回

人们虚无的梦和欲望像泡沫，
或者遍地开花的蘑菇孢子。

(一)

斯图尔格坐过来的时候，我正在和小莱吵架。争吵已经持续了三天，而我们必须在这周之内把该说的说完，否则我就要腐烂，并且在此之前进行有性繁殖，很多其他的幼年期的我已经飘到五米开外，这样的地理距离吵起架来有点儿麻烦。也有可能就在下一周，小莱会因为更高的食用价值被和斯图尔格一样的疯子挪走养殖，或者被刺刀般的鸟嘴撮起来吞掉。为了寂寞而无意义的往后，我们必须抓紧时间争吵。

一块沾着凯撒酱、洋葱和面包沫的赛百味包装纸落到我头顶，我无声尖叫。他妈的，别叫了，刚吵到哪儿了——我接收到小莱瓮声瓮气的频率。我说我们吵到生命的意义了！我刚刚哀怨地说，当我体会到人生的意义时，已经成为了一株蘑菇。就只有人生有意义吗？你怎么就认为我们蘑菇的生命没有意义？小莱作为一株蘑菇正值壮年，态度经常不太平和。我怀疑他做人的时候很刻薄，热衷于抬杠。七宗罪里应该再加一个刻薄，这就很能解释小莱为什么会下地狱。

小莱反驳，人实在不是更好的东西——法国人曾经说过，人是会思考的菌类植物！这就是说人生和蘑菇没有太大区别。我就是一刻不停地思考啊思考，最后才来到这鬼地方。我说，可是法国人没说过这句话。法国人对你说，变成非裂褶菌还是无毒的也就他妈的算了。可是你怎么变成了猴头菇啊！

还非裂褶菌——我他妈给你讲这个词纯属多余。看到那棵槲树了吗，最矮、最稀疏的那一棵，你快滚去那儿吧。小莱说，我知道自己是他妈的一棵猴头菇了——你不用每天提醒我一遍！

斯图尔格打了个喷嚏，一阵恶心的降雨淋漓扑面而来。小莱在旁边以远超其他猴头菇的丰富词汇破口大骂。我当时担心方圆一米内保持沉默的蘑菇们听到了会自卑。孢子在风和口水的照拂下逃命一样离我而去，想到许许多多新的我会在五米之外的槲树下出现，实在是有一种新生般的快乐，但想到这些孢子没有一个是现在的我了，就像忒修斯的船边漂流边破碎，破碎的地方都被未知填补，我又感到难过。想到费这么大力气却只能移动五米，一股腐物般的酸楚涌上我的茎秆，慢慢积累成毒蕈碱——这就是我成为毒蘑菇的过程。

偷偷跑进自然保护区的斯图尔格看上去也在为自己难过。他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男性疯子，穿一身荧光绿的连体登山服。有一次他半夜翻铁丝网闯进来，触电摔倒在草地上，像把地狱加上坟墓里的鬼都招呼出来一起点燃——那么大一片绿色鬼火。再后来他的翻跃就变得很熟练。他身材偏瘦，却有一张圆脸，脸孔和眼睛都不太干净，如同结实圆润的粉面刚刚滚过炉灰。这时候一阵风卷走了赛百味包装纸。我能看清楚张脸，是因为他此刻正坐在石头上俯瞰我和小莱，我们眼前的世界被这张巨脸完全挡住了。斯图尔格以一种树懒的姿势蜷曲着，一言不发地垂下头和手臂凑近看我们，手里攥着纸

巾擦拭嘴上的酱汁。

我喜欢那种餐巾纸，上面有芳香剂的味道，我对小莱说。可惜现在我没鼻子了。小莱回应，我现在唯一庆幸的事情就他妈是没鼻子！

“我还是饿。我好饿。”巨大的嘴一张一合。巨人斯图尔格突然向我们伸出手。再你妈的见！小莱看热闹一样冷笑着说，这疯子今天要把我生吃了。我希望我的孢子飞得够远，飞过那条绿油油的河，至少到对岸——我要看看河对岸有没有狮子。他说这话的时候巨人毛绒绒的五指突然在我头顶定住，灰眼睛变成阴天的水井。不是吧斯图尔格！你这个怪物！我朝小莱尖叫，同时脚下一空，过往的一切像洗衣机滚筒甩出的水珠，又像加工厂里排队等待被盖章的肉类，一滴一滴一块一块向前滚动。我看到太阳和牙齿，可是太阳太小了，我看到被菌丝裹住的一颗脏器，像蚕茧。我听到蚕蛹在锅里翻滚，油撞上水滴发出爆裂声。我被猝不及防的忧伤击中，却只能在黑暗里尖叫 再你妈的见！疯子、自然保护区的围墙翻越者、吃了毒蘑菇的斯图尔格正背对我坐在石头上，登山服的兜帽底下露出一块金属圆片。我知道它是新的金属牌，上面照旧写着他的身份：公园街医院精神科，L.P.斯图尔格。他有一次把这个象征身份的颈链扯断，就扔在我旁边的坡地。旧的金属牌上班斑驳都是划痕，下面还有一行烫金小字：控制灵魂对自由的渴望。后来这块牌子被路过的驼鹿一脚踢飞，我就再也没见过它了。然而非要追溯起来的话，我并不是因为吊牌认识的斯图尔格。我们算是老相识。

无论如何，新的我确实在槲树下了。旧的我想说，被胃酸腐蚀大概和下油锅是差不多的体验，在烹油地狱中我回忆起自己是什么时候变成蘑菇的，以及此中种种原因。这些回忆像裱在墙上的画，我在空无一物的时刻抬头仰望它们，就像《纳尼亚传奇》的主人公们为了逃避战争把头伸进衣柜。不同的是他们见到了狮子，而我不曾见到。公园街道下属的自然保护区里——至少在河的这一边，除了疯子和护林员以外我就只见过食草动物，比如旅鼠、驯鹿、驼鹿、孢子，以及后来引进的蒙古马（这些动物是小莱向我指认的。他说，驼鹿比驯鹿体型更大，鹿角一个外扩一个内扩。他还说这里的旅鼠种群很特殊，早在保护区成立前动物学家就花了很多时间研究，仍然不明白来自苔原的旅鼠为什么向南迁徙了这么远。“气候在发生变化！但其中逻辑我们还他妈的——解释不清！”）当然把我吃掉不是什么好事，所有动物在闻到我的气味后都会默默走开，除了疯子。

小莱变成蘑菇后最大的心愿是看一看河对岸有没有狮子，但是他的孢子一次飞不了那么远，我认为距离他的愿望实现还要很多年。向不远处望去，疯子斯图尔格正对着小莱的位置边呕吐边跳舞，我想象小莱——簇和我共同受苦的猴头菇，在四溅的呕吐物中与空气和腐殖质对骂。但我已经听不到他的声音。

我想，好吧，幸亏我们没有鼻子。

(二)

母亲在厨房里煎蚕蛹和蛤蜊肉。我和玛丽安躺在地毯上看天花板，姿势像两只翻开肚皮的猫。我和玛丽安讲，只要盯一会儿某个具体的事物或位置不眨眼睛，慢慢的眼前就会出现暗蓝的光斑，我小的时候想象那是存在于另一个世界的霉菌，偶然落到我的视网膜上生长。人的眼睛就像照相机，眨眼睛就像按动快门，又像一道感官上的闪电，再热闹、杂乱无章的影像都会被这道闪电打断。她点头，五官柔和明亮，神态专注又飘忽——是不属于小孩子的那种表情。我知道她在听，而且完全明白我的意思，所以不会露出好奇又似懂非懂的，试图表达“你和我说这个干什么？”的表情。她也不像其他小孩一样讲话稠密、善于回应，但我说什么她都懂。

油烟逸散出来，里面有黄油和姜的味道，厨房连带着门厅都有暖烘烘的香气。黄昏也很温暖，太阳如同裹在玻璃罩里的火落进一桶水，尽管不久就要熄灭，却也不遗余力地发热。从我们的角度仰视，对面楼栋不再成为阻挡，被平开窗框住的是最原始的、波光荡漾的天空和远处航标塔一样红白相间的烟囱。几十年或几百年前天空和烟囱就在这里，一切都没变。玛丽安躺在我旁边发呆。

有一次我说，玛丽安，我给你讲个故事。

每天下午，孩子们放学后，总喜欢到巨人的花园里玩。这是一个很可爱的大花园。园里长满了柔嫩的草，草丛中到处露出星星似的美丽花朵。还有十二棵桃树，春天开出淡红色和珍珠色的鲜花，秋天结出丰硕的果子。小鸟们在树上唱着悦耳的歌，歌声是那么动听，孩子们都停止了游戏来听他们唱歌。“我们在这儿多么快乐！”孩子们欢呼着。有一天，巨人回来了。之前他离家去看朋友，在那里一住就是七年。现在他回到家，看见孩子在花园里玩。

玛丽安说她听过这个故事，接下来巨人生气了，把孩子们赶出了花园。后来花园的春天迟迟不来，他觉得孤独。再后来孩子们回来了，巨人改过自新拆除了围墙。对吗，小姨？她眨着眼睛，有点急促地一口气说完。是这样的故事吗？

是的，是这样。我说，剩下的我们下回再讲，现在该吃晚饭了。

母亲把盘子端到桌上，有芫荽蘑菇汤，蚕蛹和蛤蜊。主食是几大块无酵饼，切成片的马苏里拉奶酪。她有个习惯，每次买菜都挑同一种买很多，成盒成罐地收纳进冰箱。有时候一周里吃的菜就是类似几种的排列组合。

玛丽安走过去坐到桌子前，她瘪瘪嘴，不动声色地等待着。小英今天回来吗？母亲问，她正背对着我们收拾灶台，清洗上面的油和泡沫。她给我发短信了，不回来，她和男友出去了。厨房没有朝外的窗户，也没有灯，所以光线很暗，我总是想象整个客厅的影子都堆积在厨房里。我听到母亲收拾的动静停了下来。她弓起背，用胳膊抹了一把眼睛。那你明天送玛丽安上学吧。她这一周都不打算回来了吧？

可能是吧，那要等到下周末，她再给我发一遍同样的短信。我咬一口饼，含糊不清地埋怨，同时意识到我并不是很在乎她什么时候回来，或者到底还回不回来。但是玛丽安有点失望，她甚至对失望都已经习以为常了：“晚上好公园街，现在是晚间新闻时间——”玛丽安按响了收音机，主播欢快又高昂的声音、吵吵闹闹的背景音乐在餐桌上跃动。她不去开电视，因为我们告诉她不能边看电视边吃饭。

你是不是不爱吃这些东西啊？我问，明晚我们点麦当劳。她扒拉着盘子里碎掉的蛤蜊肉，摇了摇头。你摇头是什么意思呢，玛丽安？母亲手里的汤勺停在半空。没什么意思，

我说无所谓，我吃什么都行。玛丽安小声说，抬头望向母亲，又开始不自然地眨眼睛。“公园街自然保护区近期引进了马来貘和蒙古马，下面有请动物保护专家——莱汀·芬利尔先生为大家讲解。”一会儿的功夫天已经完全黑下来。我深吸一口气说，玛丽安，去把灯和窗户都打开——

所以你把你小姨夹给你的菜都扒拉碎了，还一口也不吃，这是什么意思？母亲沉下脸，一字一顿地用家乡方言讲出这些话。我不懂，外婆，我不懂——她嗫嚅着，挣扎着开始解释，像一只被按在椅子上的猫。别说她了！这你也要挑刺——要骂应该骂符英，骂我那懂事的、不回家的姐姐，不要说玛丽安。我尖声叫道，同时用胳膊搂住玛丽安。我吃饱了，外婆。菜很好吃，但我不太饿。我早就认识路了，明早我自己坐电车上学。她自愿自吐出这些话，然后甩开我的怀抱跑进书房。

看啊，混血儿，这就是混血儿。玛丽安是得了失语症吗？只要我不问，话都不肯多说一句。母亲把勺子摔进汤里，与此同时书房响起关门声。我知道她接下来想说什么：你和你姐姐一个样。但是她把这话咽下去了，又沉着脸去阳台取衣服，边走边在胸前画十字。餐桌前只剩我自己一个人，我给自己盛汤，食不知味地嚼着蘑菇、蚕蛹和无酵饼。“插播一首歌，来自 O.O.R 乐队。”我调小了收音机的音量，但没有关掉。

“我听见你内心雷鸣万顷，我知道，你渴望休战！不需要提醒，我们就是鲜活的例证。跟我来，随我去，伫立于边界，背后是坚实的墙壁。举目千里，自食其力——我们可以成为巨人……”

(三)

四年前，药学专业毕业后，我进了一所医疗公司做销售代表，主要负责精神科 MECT (无抽搐电痉挛治疗) 配套设备的销售维护以及科普。我经常要去各地医院的精神科室以及住院部协访，公园街医院的 MECT 治疗室是我最早的客户。我在这里第一次遇到斯图尔格，彼时他的主治医生在门外向我介绍：这位是三号床病人，他每次用你们的仪器都不太配合。我说，这个我回去会向研发部门反映。医生说不需要反映，我只是大概说一下使用情况。病情严重到需要电击治疗的并不多，我们这里接诊的大多是轻症患者，而这个三号床——有点特殊，他是——过来几个人按住他！

主治医生的话被突然挣脱了约束带的三号床打断了。斯图尔格从治疗室的床上跳起来，向走廊尽头冲过去，边跑边扯下白蓝条病号服，随手甩到坐轮椅的病人脸上。隔壁刚推着器械出来的护士发出惊呼，路过的、其他诊室的医生们面面相觑。治疗室的护士探出身，摆了摆手表示没办法，于是主治医生跟过去堵在门口，这时候我还以为他能把斯图尔格带回病房。然而五分钟后战斗就结束了。医生肿着右半边脸摇摇晃晃地朝我走来，手里拎着被扯断的听诊器胶管。

他从更衣室的窗户翻出去了。看来药不能减量，现有的剂量还是不够，他自言自语。其他医生和护士很快镇定下来，在他离开去更衣室后就都散了。然而这令我很震惊，以至于完全忘记自己来这里的第一项工作（“西酞普兰更新了简处，增加了共病需要注意的事项，宣传手册一周后可以发给您——”我本来应该说这个。）我说，呃，医生，您不要紧吧？

不要紧，这不是三号床第一次跑出去了。医生捂着脸问，我刚说到哪儿了？这个斯图尔格，曾经是三号床的主治医生。后来三号床出院了，但是斯图尔格出现了一些精神问题，并且状况越来越严重。他成了三号床的新主人。

我问，他为什么向更衣室跑？

因为那里有他的柜子，一直没锁。他跑出去之前要脱掉病号服，换上他的登山服。他在没疯之前喜欢和同事去爬山。

那他就这么跑出去没问题吗？

晚饭之前他会自己回来的。你应该也发现了，他只会攻击试图阻拦他的人，在这一点上我认为还应该加量——医生说，我下楼去药房拿一些冰袋，麻烦你走之前告诉保安三号床又跑了，提醒他们注意。

我把斯图尔格的事迹讲给小莱听，小莱也表示很震惊。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他妈的发现一个问题。他脖子上挂着的吊牌——公园街医院精神科——他戴着这个牌子，是因为他曾经是精神科的主治医生？

我说我不知道。谁知道呢？我只知道疯子没那么多了，所以来公司精简部门，直接把对接精神科的部门取消，我就是这么失业的。如今疯子与猴头菇相比更算是珍稀物种。小莱短促地抗议：去你妈的。

我又问，你知道自己为什么变成蘑菇吗？

这时候小莱少见地不再漫骂，甚至变得有点忧伤。我能感受到这种不同寻常的气氛。我能想象一张忧伤的脸，忧伤的动物保护专家，莱汀·芬利尔先生。二十天前我刚找到第一株能够回应我的蘑菇，我们互相介绍了身份。我说我在晚间广播里听过你讲话，你是自然保护区的招牌。我还说，作为蘑菇竟然还有名和姓，有比这更悲哀的事情吗？你会给猪圈里的猪起名字吗？

你最好少说两句话。莱汀心不在焉地回答。

我明天就会忘掉我的名字。我说，就叫你小莱吧。你可以叫我 F。

他当时立刻表示妥协，随意，无所谓。然而被我问到变成蘑菇的原因，这好像戳到了他的痛处。他说，失去名字、变成一头猪圈里的猪，或者自然保护区里的蘑菇，这只是他无数次妥协中的一次——他上一次妥协造成了不可逆的后果。而不幸的是，妥协是一种环环相扣的行为。这就好像房子里只要发现一只白蚁，一块木制品上小小的缺角，过不了多久就会因为地基被蛀食而坍塌。

他说，你还记得那些从雨林区引进的貘吗？它们一夜之间就消失了。在深秋冬天还没正式到来的时候，在任何监控设备都捕捉不到的地方——它们消失了。

消失了，是指死掉了？

消失了就是消失了。区政府引进马来貘，原计划是要建造温室，模拟热带环境让它们生活。他们想从自然保护区里划出一小块开放给游客，来创造营收——至少他们是这么向我解释的。我在这个计划里签署了一些协议，出了一份力。但是当这些长鼻子的、性情孤僻又敏感的棕色幼兽终于被空运过来，他们告诉我：由于没有拨款，温室建造

不起来了。这些貘很快就不再有人照顾，被直接放进自然保护区的沼泽地里。

我能想象它们已经有一部分因为不适应环境死去了。我组织过募捐，想在秋天到来前把它们送回去。我甚至已经找到了足够大的空卡车、几个愿意帮忙的护林员。莱汀解释，我不是没想过这些，但最终什么也没做成——区政府和保护区主管都盯上了我，要求我不再插手。他们说如果我再“秘密地”联系人准备向雨林区走漏风声、运送动物，立刻就会被逮捕。于是我妥协了，直到又过了几个月，临近冬天的时候有熟悉的护林员告诉我：

这个本就不剩几只的种群消失了，在一夜之间。前一天晚上监控还拍到雌兽和雄兽在水边团团打转，年龄更小的幼兽在啃食苔藓。它们不怎么精神，但至少还活着。然而接下来第二天，第三天，影像里再没看到任何一只，他们花了一周时间翻遍草丛和沼泽，连尸体也没有找到。

小莱讲完后长叹一口气。我认为这就是原因，我妥协了，于是它们消失了，顺便他妈的带上了我。他接着总结：我真希望那时候我也疯了。我附和道，失业前没在电击治疗室看到你，我感到很遗憾。

(四)

在我和符英很小的时候，我们的父亲死于一场矿难。这好像是比矗立着的烟囱、永远不变的天空更久远的事情了。再往前推几年，父母牵着符英挤上船，我还只是母亲肚子里的胚芽。我没有来到公园街之前的记忆，也缺失了父亲去世的记忆，而玛丽安从没见过她的外公。老电影和纪录片里有些影像会断档，我们的记忆连起来就像这些影像，一切悲伤的部分只要没有重叠，就都成了烧焦的胶卷。我们绝口不提这部分。

符英回忆，童年时期最早觉醒的感官是嗅觉。最初，种植园的咖啡苦甜。太阳直射下海水的咸味和马厩的骚味。在往外望四处都是海的地方，她只进过一次人造泳池，婴儿泳池，氯水的气味有点刺激，但不至于让她觉得不舒服。离开家向北航行的船上，有汗臭和膻味，从锡克教徒的头巾和混血水兵的制服底下源源不断地冒出来。不知道船航行了多久，一路颠簸晃荡，妇人和孩子在布草间呕吐，沾血的棉布横尸船舱过道，人和动物的食物一起腐烂。热气蒸腾着酸味和血的臭味，她闻到了也吐。下等舱隔间里没有灯，符英和母亲睡在狭长的铝板床上，黑暗里她攥着被角，伸手去摸母亲的肚子，什么也感受不到，只有锈蚀的铝板呼出冷腥气。再后来她见到冬天，因为煤燃烧后又在空气里迅速冷却的焦糊味记住了冬天，父亲的葬礼上她也闻到这股味道。按理说夏天树和草的香味浓郁，但是她说她的嗅觉对这部分不敏感。来到公园街后她反而非常敏锐地认识了冬天。

小时候她经常带我玩，和我讲话。她讲故事前言不搭后语，我根据她说的气味推断缺失的记忆。我刚上高中的时候符英已经留了级，然后就从家里搬走了。事实上她搬走前也不常在家住。没人知道她在外面干什么，一周里有哪几天去学校，也没人管得了，起初几个月里社工看到她就会把她找回，从打烊的酒馆路边、汽车旅馆前台、保安室的门外、甚至是少管所里把她找回，然后上门找母亲理论。屡教不改后他们也放弃不管了。那时候母亲经营一家便利店，又没钱雇人，必须每天待在店里，没有精力一次次地像社工那样把她找回来。她的抗议方式是不闻不问，也不给钱，想着符英没有能力走远，总归要回来。

后来她确实回来了，身边跟着一个刚会走路的女孩。这时候我在家过高中最后一个暑假，她不声不响地搬走，失去联系已经是三年前的事情。女孩有一张白净的鼓脸，稀稀落落的褐色卷发和褐色眼睛，隆起的圆圆鼻头。我只需要看一眼，就会认出这张脸。她瞪大眼睛看我们，手绞着裙子上的花边，好像一瞬间就要哭出来。符英在女孩面前蹲下，不看我也不看母亲，只是低着头，握住女孩的手摆来摆去，像机械钟摆，也像招财猫。“玛丽安，打个招呼。这是你外婆。这是你小姨符月。”

“Fu。”女孩怯生生地向外蹦跳。“嗨呀……你们。我叫玛丽安。”

我下意识地望向母亲，不知道说什么。我以为她会絮叨着提问，或者尖声训斥我的姐姐，骂她没有良心，当着玛丽安的面。或者她会哭。再或者她接受了一切，试图掩饰、笑着逗弄玛丽安。我已经提前设想了会出现的一切极端情况。可是母亲只是抿着嘴，脸上没有表情，有一瞬间我觉得她的脸和身体一下子变得老态，真正被钉进“外婆”这个称谓里。母亲背过身去，声音颤抖地问符英：她受洗了吗？

“没有，所以我把她带回来了。”符英语气平静，像家庭教师布置作业，“你去教堂做礼拜的时候可以领着她。”

“那你呢？你又要走了？把她留给我和你妹妹？”母亲问。符英拨弄了一下头发，有点疲惫地摆摆手，带上了门：“我出去抽支烟。”

“你好，玛丽安。”我伸手接住她攥紧的拳头。这就是我们的见面。带着钝感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小动物，我小小的玛丽安。她明白什么呢？她会说什么呢？她甚至念不清我的名字。这个家里只有母亲信耶稣，我和符英都不信；我们天生就不信，而她是在父亲死后受洗的。我们的父亲死在距离公园街一百公里的矿场，留下不多不少的赔偿金，造成不少不少的信仰。这样看来，信基督是首先的，洗礼也是必要的。接下来玛丽安既要在耶稣那里受洗礼，又要在这个可能没有耶稣的真世界受洗礼，我怎么能告诉她呢？如果我是玛利亚，我会为她哭的。这个世界的雨水就像刀子，闪光的薄薄刀片，人们虚无的梦想和欲望像泡沫，或者遍地开花的蘑菇孢子。她会长成一个敏锐、敏感的小孩，如同圆钝的铅笔被削笔刀磨尖。

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们的境遇竟然如此类似被放逐到保护区的貘。而玛丽安像我和符英小时候一样。她也没有父亲。

(五)

一切要从何说起？我对小莱讲，我不是第一个变成蘑菇的人。他表示赞同，就像他确信他自己也不是第一个。此前公园街晚间新闻已经报道了好几起失踪案例，但是居民们大多不以为意。现在回想起来，主持人的表达很模糊。“萝拉·李女士的家人说，她向往常一样出门上班，晚上没回家，电话也联络不上。”“斯蒂尔先生今年 90 岁了，子女从外地回来看望，发现房子里没人。护工则表示她出门买菜前老人还在摇椅上看

报纸。”这些新闻的主人公身份毫无相似性，往往以“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作结。就没有人觉得很奇怪吗？小莱崩溃地叫道。没人他妈的看过《变形记》吗？他在床上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甲虫。啊，他妈的，我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自然保护区里的蘑菇。如果现在让我睁眼离开这个噩梦，我也能写书。我要送那个谋杀马来貘的主管进监狱。我说没人觉得奇怪，甚至那时候我都没注意。我的母亲路过电视机会瞥一眼，然后觉得他们小题大做：这不就是你姐姐吗？一个月要失踪三十次。找警察调查有用吗？那你呢？你觉得你的新闻——他妈的会是什么？

我模仿晚间新闻主持人的语气说：居家待业的F女士在救护车上失踪。气氛过于沉重，我本意是想把这一切当玩笑话讲出来，但是边说边意识到我并不存在的喉咙，或被冠以其他名字的某个器官组织被呛住，水涌进我的身体，我涌进水里。一双手掐住我不存在的脖颈，指甲嵌进肉里。原来是下雨了。我看玛丽安湿漉漉的眼睛，她平躺着，偏过头注视着我。痛苦像西西弗的石头滚落，带着积累的重力砸穿我的语言，砸破我的四肢和内脏，有什么东西淋漓漓地流淌出来，像被清缴的脐带和血水、胎盘。下雨了！小莱说。

我是在救护车上消失的，但是躺在车上的不是我。这个情节像推理小说吗？我苦笑，前言不搭后语地开始叙述。躺着的是符英的新男友，我甚至不知道他叫什么，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交往。我一点儿也不关心这些，就像我不关心符英什么时候回家。符英不在救护车上，她刚刚被警察带走了，因为躺着的这个人身上有刀伤。吊瓶里的点滴一滴一滴地滑落，恍惚间我平静下来，张开手掌看着手指上的血。我扔下刀，她捡起刀。接下来她就被带走了。恍惚间我靠着椅背，在救护车规律的呼救声中陷入梦境。醒来后我发现自己身在湿漉漉的草地上，向远看就能看到红色的围墙。那时候天也在下雨。雨中我打量起自己缺失的四肢，并不觉得寒冷或疲惫，好像所有感官都消失了。我疑惑地想，难道我们被赦免了吗？还是说，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地狱？

.....
母亲出门了。我接着给玛丽安讲巨人的故事。

这是花园里最远的角落，一个小男孩正站在那里。他太小了，手还挨不到树枝，只好在树旁转来转去，哭得很厉害。这棵可怜的树仍然满身盖着雪和霜，北风还在树顶上吼叫。“快爬上来，孩子！”桃树一面对小男孩说，一面尽可能地把树枝垂下去，然而孩子还是太小了。
巨人看见这个情景，心也软了。他对自己说：“我多么自私啊！现在我明白为什么春天不肯到这儿来了。”他十分后悔自己先前的举动。他轻轻地走下楼，静悄悄地打开前门，走进花园里。孩子们看见他，非常害怕，立刻逃走了，花园里又出现了冬天的景象。只有那个小男孩没有跑开，因为他的眼里充满了泪水，看不见巨人走过来。巨人悄悄地走到他后面，轻轻抱起他，放到树枝上。这棵树马上开花了，小鸟们也飞来歌唱。巨人对他们说：“孩子们，花园现在是你们的了。”他拿出一把大斧子，拆除了围墙。玛丽安沉默地听着她已经知道的情节，好像在期待我做出一些补充。她在故事快接近尾声的时候打断我，“我给母亲打了电话。我说我希望她回到这里来，我不喜欢她的新家。”我问为什么？新家就在附近，你不需要转学，不需要离开朋友。而且这样她就能每天送你上学放学了。接着我深吸一口气说，符英——我是说你母亲，她要结婚了。这不是什么秘密，我想，玛丽安什么都懂。她不应该被隐瞒。

话音刚落，她以第一次踏进家门的那种表情看着我，我永远也忘不了的表情。那种恍惚中被迫地接受了一切，快要哭出来，又因为在害怕什么而哭不出的表情。我的母亲最讨厌她这副样子，她会说，玛丽安，你想哭就哭，不要这么看着我和你小姨！你那是一副什么样子，是想要让人同情吗？母亲一旦这么说话，我就会失去理智，我甚至不知道到底是母亲的尖刻还是玛丽安的恐惧更令我难过。我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对玛丽安说：相信我，玛丽安。你和你的母亲一起生活会更好。她很爱你。

不是的，我不是说母亲不爱我。她咬着嘴唇，迟疑地说：如果我的母亲结婚了，我会有一个父亲吗？他可以对我做那种事情吗？他和我的母亲在卧室里做的那种事情？

我不想再回忆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了。一切都是这样发生的。我不记得我又问了她什么问题。最后我伸手去摸玛丽安的脸，却发现并没有泪水，原来只有我自己在哭。她难以置信地看着我哭。我早就不再害怕了，愤怒自上而下地劈开我，世界晃动、然后更为剧烈地震颤，像一场已经发生的地质灾害在多年后迎来余震。我冲进堆满影子的厨房开始翻找，尽力让自己冷静，但是徒劳无功。我拉开每一个抽屉，把抽屉里的杂物都翻出来摔在地上。小姨你要做什么啊？耳边响起微弱的喊声和哭声。最后我找到了。我在最下面的抽屉里找到了折叠刀。

太阳过于刺眼。公园街的夏天竟然有这样的太阳吗？日光之下无新事。我摇摇晃晃地走在街上，像走在我素未谋面的故乡。所有气味都撞上了我，如同给我一个迟来的问候，汗液，融化的沥青，树和草的气味，锈蚀的刀片，医院里消毒水的味道，一切味道混杂在一起在此刻的太阳底下蒸腾。我的姐姐没有试图阻拦我，她因为震惊而凝固在原地。我扔下刀，扯住她的衣服说：我是为玛丽安来的。走吧，我们回家，玛丽安还等着你。我想多年前母亲也是这样扯住我的衣服吗？母亲说，小月啊，我们去医院。这个孩子生下来吧，你的姐姐会给她起名字——

然而符英捡起了刀。于我而言陌生的男人手捂着腰侧伤口，倒在地板上抽搐。切碎了半支的香芹叶躺在案板上，锅里的水烧开了。房子里油漆和新家具的气味还没散尽，有点刺鼻。符英像从一场梦境中突然惊醒，她蹲下来，用手胡乱地抹地上的血。“你是目击证人。”她说。我的心脏和脑子上的血管在砰砰跳动，以同样的频率，胃里的东西翻江倒海几乎要涌出来。她摸出口袋里的手机扔给我，说：“叫救护车。先和他们一起去医院，再来公安局找我。”

她看我没有动静，走到身边用手臂环抱住我的肩膀。别露出这副表情，你和玛丽安一个样。她抬起干净的手背抹了一把我的脸。快站起来，把手上的血洗掉。

打完电话后我开始笑，很奇怪，我竟然忍不住发笑。我说符英，你还记得吗？我们小时候被本地小孩排挤。我记得你和他们打架的样子。你不擅长打架，因此总是挨打。

别人挨打了会蜷缩起来护住头，像遇到危险的穿山甲那样。但你不是。你带着门上拔下来的锁扣，在拳脚砸下来的时候拼命抱住对方的小腿。你举起锁扣，垂直扎下去——

(六)

风很急切。风从陆地吹向四方，如同急于离开的旅人涌向每一条海岸线。风摩拳擦掌，把河滩、树叶里的水汽、死去的蚁群灵魂收纳进行行李。风超度枯萎的槲寄生，把孢子背在背上。风打了一个大喷嚏。再见面就不是我了！它们说，不是劳碌又窃窃私语的我了！新的我是奔走呼号的白色群狮。我要向你们列举精神的三段变化：精神怎样变为骆驼，骆驼怎样变为狮子，狮子怎样变成孩子。*我的玛丽安，我小小的、透明的蕾梅黛丝。安稳地度过夏天和秋天吧。如果有人要你在冬天受洗，那你就去受洗。如果无主宰的真世界不能祝福你，那么我祝福你。

我问风：围墙外的世界坍塌了吗？风不回应我，呜呜地假哭，只见声音不见泪。月亮下一只角鹊飞过河滩，草叶上结了亮晶晶的霜花。我问途经身边的旅鼠：这是一场梦吗？旅鼠抖一抖绒毛上的水珠，围着我嗅来嗅去，如同滚动的毛栗子。一只沼泽绿蛙肚皮朝天，躯干已经覆盖了一层薄土，用不了多久就会腐烂，成为我的一部分。我的身体即将混沌而饱满。其他蘑菇发出不同音色的呼声，我听到手风琴和低音号的合奏：呜——呜——

斯图尔格来了。他边走边发抖，破烂的登山服灌入了风，兜帽像船帆一样鼓胀起来。他很高，而且比夏天的时候更瘦、更苍白了，如同一根掉色的荧光棒。我朝着风吹过的方向喊：斯图尔格，围墙外的世界不存在了吗？我为什么在这里？

斯图尔格盘腿坐在槲树下，眯起眼睛。我的孢子飘过去推搡他：你在做梦吗？你梦见什么？他的眉毛略微颤动，眼皮上翻，微微露出一线的眼白，仿佛黎明前积压的云层。孢子说：看啊，他嘴角在笑。他正梦见捕猎。

引用：风超度枯萎的槲寄生，把孢子背在背上。风打了一个大喷嚏。再见面就不是我了！

下雪了，这是第一场雪。我的孢子在土层里入睡，春天能不能醒来就看运气了，它们告诉我。不需要运气，这一切足够了，就让我在这里结束吧。我在最后叮嘱道。此前我隐约听见狮子的低吼声。温暖厚实的爪踏进我头顶雪地，世界像松糕一样柔软。我在梦境中说，斯图尔格，去找到小莱，告诉他这里有狮子。狮子来到河的这一边了。狮子驮着玛丽安，驮着长鼻子的马来貘一起来了。

巨人激动地跑下楼，出门朝花园奔去。他急匆匆地跑过草地，奔向孩子。来到孩子面前，他脸红脖子粗地愤愤说道，“谁敢把你弄成这样？”只见孩子的一双小手掌心上留有两个钉痕，他的一双小脚上也有两个钉痕。

“谁敢把你弄成这样？”巨人吼道，“告诉我，我去取我的长剑把他杀死。”

“不要——”孩子回答说，“这些都是爱的烙印呀。”

“你是谁？”巨人说着，心中油然生出一种奇特的敬畏之情。他一下子跪在小男孩的面前。小男孩面带笑容地看着巨人说道：“你让我在你的花园中玩过一次。今天我要带你去我的花园，那就是天堂。”

那天下午孩子们跑进花园的时候，他们看见巨人躺在那棵树下，已经死了，满身都盖着白花。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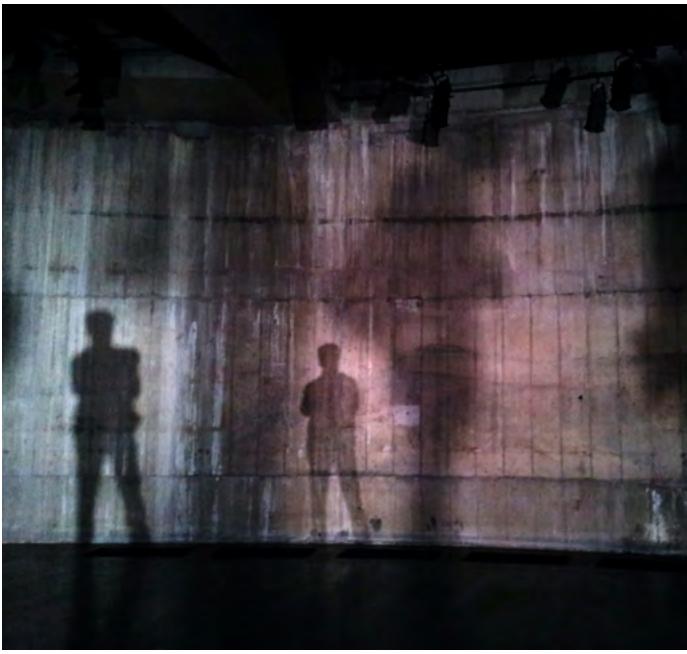


水陆两栖

金融专业学生，非常擅长摸鱼，JO厨，正在等待第六季第13集

第二回

这是“24小时文学聚会”作者的第二篇章。祝他们欣欣向荣。



图片来自 [Marco Bianchetti](#) on Unsplash

小说

梦成真

胡安·卡洛斯·奥内蒂 | 故事群岛

如这就是女人在找寻的东西，
也是前一晚醉酒的布兰内斯在舞台上找寻的东西

布兰内斯总开这个玩笑：他走进我的办公室（在我仍然拥有一间办公室的时候），或者走进咖啡馆（事情每况愈下，我甚至不再走进任何一家咖啡馆），双脚踩在地毯上，一只手握成拳，撑在桌上。他总戴着一条色彩鲜艳的领带，用一枚金色的领夹固定在衬衫上，他的那张脸——国字脸，刮得干干净净的，上面有一对深邃的眼睛，这双眼睛顶多只能专注一分钟时间，时间一到，它们便立刻泄了气，布兰内斯就像马上就要被瞌睡虫打倒，抑或马上就能清晰地回忆起他生活中某个永远无法再次经历的感伤瞬间似的——那张没有任何冗余的脸凸显在挂满肖像和海报的墙上，他让我先把话说了，然后努起嘴评论道：“因为您，当然了，是为了《哈姆雷特》才破产的。”或者：“对，我们当然知道。一直以来您都献身于艺术，要不是因为您对《哈姆雷特》近乎疯狂的爱……”

这么多年来，我不得不忍让那些可怜巴巴的人，剧作家、男演员、女演员、剧院老板、为报纸工作的戏剧评论家，还有这些人的家人、朋友和情人，白费这么多年的时间，只赚上一点小钱，只有上帝和我知道，这些钱会在下一个演出季被榨得分文不剩，除此之外，还得忍受水滴在我的光头上，拳击在我的肋骨上，那又酸又甜的滋味，以及布兰内斯让人完全摸不着头脑的嘲弄：

“对，当然了。对《哈姆雷特》无节制的爱让您走向疯狂……”

要是他第一次这么说的时候我就问他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要是我向他坦诚我根本不了解《哈姆雷特》，就像初读完一本剧本后我根本不知道它能赚多少钱一样，这个笑话就会被终结。但我怕我的问题会带来更多尚未形成的话，于是，我只能挤出一个苦笑，让他出去走走。就这样，二十年过去了，我仍然没有读过《哈姆雷特》，仍然不知道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但在布兰内斯提及它时，他脸上的表情和摇头晃脑的样子告诉我，《哈姆雷特》是艺术，纯粹的艺术，伟大的艺术，另外，尽管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但现在我明白了，《哈姆雷特》还是男演员或女演员，在当前的情况下，毋庸置疑，它还是一个屁股浑圆、穿着黑色紧身服的女演员，它是骷髅，是坟墓，是决斗，是复仇，是溺水而死的女孩。是威廉·莎士比亚。

因此，此刻，仅仅是在此刻，戴着睡觉时都未曾摘下过的、梳成中分的金色假发和根本不贴合口腔、害我说话漏风的假牙，在这个为破产戏剧人提供庇护的小城的图书馆，我看见了这个听过无数次的名字，一本深蓝色的小书，封面上印着下陷的金色字符：《哈姆雷特》，我坐进一把扶手椅，没有翻开书页，我决定永远不翻开这本书，永远不读哪怕一行书里的文字，这样，我就能向布兰内斯和他的玩笑复仇，那晚，布兰内斯到某个省会城市的酒店来见我，听我说了一会儿话后，他看着天花板和走进大堂的人，努了努嘴，示意他即将发表一些言论，然后，当着那个可怜的疯女人的面，他对我说：“我想……像您这样一个为了《哈姆雷特》而破产的人。”

我约他来酒店是为了让他在一出心血来潮的作品里扮演一个角色，在我看来这个戏应该叫《梦成真》。这出精神错乱的作品里有个没有名字的男性，这个角色只有布兰内斯能胜任，因为，在这个女人来找我的时候，除了他和我，剧团的其他人都逃去布宜诺斯艾利斯了。

女人正午时分就来过，但那时我还在睡觉，于是，在对她以及对这个炎热省份的所有人来说都意味着午休结束的时刻，她又来了。那时我正坐在餐厅最凉快的位置上，吃着圆形的米兰炸肉排，喝着在那儿能找到的最好的，也是唯一能喝的白葡萄酒。我不打算吹嘘说第一眼——女人站在挂着帘幔的门边，热气如同光晕一般包裹着她，进入餐厅的阴凉后，她张大眯缝着的双眼，侍者向她示意了我所在的位置，于是，她径直向我走来，裙子打着旋儿——我就看出女人心里装了什么，就看到了那个东西，那条柔软、飘逸却又狂热的带子正在逐渐展开，如同覆盖在伤口之上的绷带一般，它轻柔地拉拽着，试图剥离女人历经的孤苦伶仃的年月，试图将我捆住，将我和我在这个无聊的、被品味糟糕的胖子塞满的地方度过的时间捆住，捆成木乃伊。但确实有些什么，女人笑容中的某些东西让我紧张不已，她的眼睛也叫我无法忍受，眼睛下是一嘴不规则的小牙齿，她像入睡后用嘴呼吸的孩童一般展示着它们。她的头发几乎是灰白的，编成了麻花辫；她的穿着遵循着某种旧时尚，而且，就算在这些服饰刚被设计出来的年代，一位正经的夫人也不会这样穿，只有年少气盛的女孩才会这样穿。她的裙摆一直垂到鞋面上，那种鞋应该算是靴子，或者高帮皮鞋，裙子很长，是深色的，会在她走路时敞开，会随着她的步伐颤抖、收缩。她的女式衬衫镶有花边，很合身，一块巨大的宝石垂在她女孩般尖尖的胸间，衬衫和裙子原本联结在一起，却被腰间的一朵玫瑰分隔，现在想来，那朵饱满却低垂的花儿可能是人造的，它枝干上的刺竖立着，威胁着胃部。

女人年约五十，但我一直无法忘记，直到现在，想起她在酒店餐厅向我走来的那一幕，我仍然能感受到她身上那种属于另一个时代的少女感，它刚从沉睡中醒来，头发还散乱着，长时间的沉睡并没有使它衰老，但衰老可能在任何时刻降临，陡然降临，将它就地摧毁，因为岁月始终悄无声息地噬咬着它、消磨着它。正因如此，她的笑容让人实在不忍直视，面对着这样一个明明身处衰老与突然濒临的死亡的边缘，却对自己面临的危险一无所知的女人，人们明白，其实那个笑容懂得，或者，退一步说，至少那个笑容懂得，那些暴露在外的小牙齿能够证明，威胁着它们的东西尚未得逞。

此刻，一切都存在于这昏暗的餐厅中，于是，我笨拙地把餐具放在一边，站起身来。

“您就是戏剧制作人朗曼先生？”

我微笑着点头，请她坐下。她什么都不想喝；我隔着桌子偷偷地看着她的嘴，它是如此纯洁，仿佛未被触碰过，嘴上几乎没有什么颜色，就是从那里，从这张嘴的中心，传出她低沉的、带着些西班牙口音的声音，从她那两排不规则的小牙齿中间滑脱出来。在她小小的、平静的、努力圆睁着眼睛里，我什么也看不到。在等待她开口的间隙，我想，不管她即将说的话会将她塑造成一个怎么样的女人，一种怎么样的存在，都能够呼应并消解她奇特的外表。

“我来见您是为了一场演出。我的意思是，我手里有一出戏……”

所有迹象都表明她会说下去，但她停了下来，等待我的回应，微笑着，通过难以抵御的沉默将话语权交给了我。她很平静，双手交叠，放在裙子上。我把吃到一半的米兰炸肉排推到一旁，叫了一杯咖啡。然后，我递了一支烟给她，她摇摇头，笑得更开了一些，示意她不抽烟。我点燃自己的香烟，开始酝酿，试图旁敲侧击，隐晦地把她打发走，但是话语很快就从嘴里蹦了出来，尽管是以一种慎重的方式——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必须采取一种慎重的方式。

“女士，真的很遗憾……您从来没有演过戏，对吗？当然了。您作品的名字叫什么？”

“不，它没有名字，”她回答道，“很难解释……它和您想的不一样。当然，也可以给它取个名字。可以叫《梦》，或者《梦成真》，或者《一个变成现实的梦》。”

我明白了，毫无疑问，这个女人疯了，这让我感觉舒服多了。

“好的。《一个变成现实的梦》，这个名字不错。我向来很愿意，应该这么说，就主观上来说，我向来愿意无私地帮助那些刚刚起步的人。为国内的戏剧市场赋予新的价值。我收获的不是他人的感激，女士，尽管没必要和您说这些，但很多人迈出的第一步确实归功于我，这些人今天在科连特斯大街[1]收着高额酬金，每年还要拿上几个奖。他们已经不记得当年来找我，甚至可以说是我求我……”

连站在角落的冰箱边上一边赶苍蝇一边用餐巾纸扇风的侍者都意识到，对坐在我对面的那个古怪的人来说，我的话一文不值。我吹着滚烫的咖啡，用一只眼向她投去最后一瞥，然后，我说：

“总之，女士，您应该知道，这里的演出季已经是一败涂地了。我们不得不提前结束演出季，现在这里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处理一些私事。下个星期我也将离开，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在我们应该做什么这一点上，我又判断失误了。这个城市还不具备举办演出季的条件，尽管我已经退了一步，只上演独幕喜剧和类似的东西……您已经看到结果如何了。因此……但是，现在，我们还有一件事可做，女士。如果您能给我提供一份作品的副本，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后我会看看是否有机会……是三幕剧吗？”

她必须回答，因为我为了把球抛还给她，适时地闭上了嘴，向前倾身，把香烟屁股揿灭在烟灰缸里。她眨了眨眼睛：

“什么？”

“您的作品，女士。《一个变成现实的梦》。是三幕剧吗？”

“不是。没有幕[2]。”

“那么，是按场划分的。现在按场划分已经越来越普遍了……”

“我手上没有副本。它不是我写出来的东西。”她接着说。

是时候逃离了。

“我把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地址给您，这样一来，一旦您完成您的作品……”

她缩起身子，弓起背，但依旧抬着头，不变的笑容依然固定在脸上。我等待着，确信她即将离开，但是，下一个瞬间，她用手在脸上抹了一下，便又开始说话了。

“不，这和您想的完全不一样。这是一个时刻，一个场景，我们可以这么说，在这个场

景里什么都没发生，就好比我们在餐厅里上演一个场景，我走了，之后什么都没发生。不，”她回答，“和情节没有任何关系，一条街上有几个人，有一些房屋，还有两辆经过的车。我，一个男人和随便某个从对面店里走出来、递给这个男人一杯啤酒的女人。没有更多的人了，只有我们三个。男人拿着啤酒杯穿过街道，一直走到那个女人走出来的店门口，然后又一次穿过街道，坐在之前坐过的桌旁，坐在我身边，而我，从一开始就一直坐在那里。”

她停了一会儿，此刻她的笑颜已经不再是为我展开，也不是为了餐厅墙边那个半开的、铺着台布的立柜。之后，她结束了描述：

“您明白了吗？”

我本可以逃离这一切，因为她的描述让我想到了独幕剧，我和她说过了这个，又告诉她，在当下的环境中搞纯艺术是完全不可能的，没有人会去剧院看这种东西，或许整个省只有我一个人能理解这部作品，理解每一个动作的意义、两辆汽车作为符号的指涉，还有那个给男人一杯啤酒的女人和穿过街道、重新坐到她身边（坐到您身边，女士）的男人。

她看了看我，脸上的表情和布兰内斯不得不向我要钱或者和我谈起《哈姆雷特》时的表情类似：带有一丝遗憾，剩下的则全是嘲弄与反感。

“完全不是这样的，朗曼先生，”她对我说，“我们正在谈论的是一出我想看到、却不想让任何其他人看到的戏，没有观众。除了我和演员之外不需要任何人。我只想看一次，但这一次必须与我向您描述的别无二致，您得按照我说的做，仅此而已。好吗？既然如此，麻烦您告诉我完成这件事需要多少钱，我给您。”

面对着这样一个打开钱包、抽出两张五十比索的疯女人，再谈独幕剧或其它类似的东西已经毫无意义了。

“您可以先用这些钱雇演员，支付一些开销，之后还需要多少，您再和我说。”

那时我手头正紧，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给我回信、为我弄来几个比索之前，我根本无法从那个该死的钱眼里钻出来。于是，我向她展露了我最美好的笑容，边点着头，边把钱折成四折，放入马甲口袋中。

“很好，女士。我想我已经明白您想做的是哪种事了……”——说话时我不想再看她，因为我正想着布兰内斯，因为我不想看到女人脸上那个曾在布兰内斯脸上出现的嘲讽表情——“下午我就去处理这件事，如果我们能够碰面……或许今晚？很好，就在这里，届时我会把我们的男主角带来，您可以更详细地向我们描述那个场景，以便达成共识，以便《梦》《一个变成现实的梦》……”

或许是因为她已经疯了，也或许是因为她清楚，就像我也清楚一样，我不可能白拿她一百比索，因此，她并没有向我讨要收据，甚至都没想到这回事，和我握过手后便离开了，每走一步，她的裙子都沿逆时针方向打一个九十度的旋儿，她挺着胸穿过昏暗的餐厅，走入酷热的街道，就像回到持续多年的休眠的热度中，而她随时会衰败的、掺杂着杂质的青春就被保存在这里。

我可以在一间混乱、昏暗、墙面裸露的房间里找到布兰内斯，在植物、竹席和午后的湿热之后，但在找到布兰内斯之前，在说服他和我一起把那个疯女人花钱要买的东西给她之前，那一百比索会一直待在我的马甲口袋里，一分都不会少。我叫醒布兰内斯，耐心地等他洗完澡、刮完胡子、再一次躺下又再一次爬起来、喝完一杯牛奶——说明他前一晚喝醉了——又躺回床上、点燃一根烟，在完成这一系列动作之前，他拒绝听我说话，但就算在完成这一系列动作之后，当我靠近他所坐的梳妆台前的扶手椅时，当我倾身正式向他发出邀请前，他制止了我：

“看看这天花板！”

天花板是由瓦片铺成的，上面有两根或三根发绿的横梁，还有几张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美人蕉叶子，又长又干。我看了看天花板，他笑了，摇了摇头。

“好吧。说吧。”他说。

我将整件事告诉他，每讲一句布兰内斯就打断我一次，说一切都是我编造出来的谎话，或是有人想找点儿乐子，才派这个女人来找我。之后，他又问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了把事情变得简单，我答应在去除花销后，把收入的一半分给他，我告诉他，事实上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知道那个女人到底想从我们身上得到什么。但是，她已经给了我五十比索，而这意味着我们能去布宜诺斯艾利斯，或者，如果他宁愿在这里继续埋头大睡的话，至少我能去。他笑了笑，接着就正经了起来，说他想先看看我提到的那预支的五十比索。就这样，我不得不给了他十比索，但我很快就后悔了，因为那晚他来酒店餐厅时已经醉得一塌糊涂，他歪嘴笑着，垂下头，凑近冰盘，说：“您没有引以为戒。科连特斯大街艺术家的保护人，全世界所有引领艺术风尚的街区的保护人……一个为《哈姆雷特》破产了千万次的人要慷慨无私地为一个被忽略的、穿着胸衣的天才冒险。”

但是，等到她来了，等到女人出现在我背后——她一身黑、遮着面纱，手腕上挂着微型雨伞，脖子上则挂着块怀表——与我打过招呼后，她便向布兰内斯伸出手，脸上挂着她标志性的微笑——尽管人造灯光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它，于是，布兰内斯不再搅扰我，只是说：

“总之，女士，神祇指引您找到了朗曼。一个为了准确地呈现《哈姆雷特》不惜殚精竭力的人。”

听了这话，她看了看我们中的一个，又看了看另一个，似乎在取笑面前的两人；随后，她又严肃起来，告诉我们她很急，现在她要把整件事再解释一遍，以消除我们哪怕最微不足道的疑虑，等我们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她会再次出现。在柔和、纯净的灯光下，女人的脸以及她身上发着光的部分——连衣裙的某些区域、没戴手套那只手上的指甲、伞柄和怀表——仿佛摆脱了白日的折磨，重新做回了自己；而我则在那一刻确立了对她的相对信任，整个晚上我没有再怀疑她已经疯了，也忘记了这整件事都散发着一股欺诈的气息，我只把它看作一桩正常的、再普通不过的生意，这样我才得以彻底平静下来。事实上，有了布兰内斯，我不必再为任何事烦心。彬彬有礼、总在喝酒的布兰内斯此时正在与她交谈，似乎这并不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而是第二、第三次，布兰内斯为她点了一杯威士忌，而她则把它换成了一杯椴树花浸剂。就这样，她把原本应

该告诉我的一切都告诉了他，而我并不想对此提出异议，作为男主角，要是他能尽早搞懂这部作品，事情就会容易不少。女人想让我们呈现的舞台是这样的（和布兰内斯说这些的时候，她用的是另一种声音，尽管她没有看他，尽管说这些时她垂下了双眼，我仍然能感觉到，她用的是一种非常私人的讲述方式，就好像在讲述生命中某件隐秘的事，而之前和我说这些的时候，她用的是一种公事公办的语气，就好像在办理护照之类的手续）：

“舞台上房子和人行道，一切都是模糊难辨的，舞台上呈现的似乎是某个城市，从布景上来看，似乎还是个大城市。我从其中一间房子里走出来，我扮演的女人从其中一间房子里走出来，坐在马路牙子上，马路牙子边有一张绿桌子，绿桌子边，一个男人坐在一张高脚椅上。这就是您扮演的角色。男人穿着毛衣，戴着帽子。马路对面的人行道上有一家卖蔬菜和水果的小店，门口摆着一箱箱的番茄。这时，一辆汽车从马路上开过，与此同时，男人，也就是您，站了起来，穿过马路，我吓了一大跳，以为您被车撞倒了。事实上，您在车驶过之前就安全抵达了，您刚走到对面的人行道上，一个穿着运动服的女人就走了出来，手里还拿着一杯啤酒。您一口气饮尽杯里的酒，从马路对面走回来，这时又有一辆车从对向车道全速开过：您又一次有惊无险地过了马路，在高脚椅上坐定。其间我像个孩子般躺在人行道上。而您微微弯下腰，轻轻抚摸我的头。”事情做起来其实很容易，但是，我告诉她，我刚才又仔细地想了一遍，现在我们的问题是找到第三个演员，就是那个拿着一杯啤酒走出来的人。

“罐，”她纠正我，“一个带把手和盖子的陶罐。”

这时布兰内斯赞同地点了点头，对她说：

“没错，上面还有图案，而且上了色。”

她说的是。看来布兰内斯说的话让她十分满意，十分愉悦，此刻她的脸上露出了女人才会有的幸福表情，这让我简直想闭上双眼，似乎从小接受的良好教育训练我们不去看它。我们又回到另一个女演员的话题上，布兰内斯摊开手，承诺一切都已准备就绪，让我们不要担心，就这样结束了话题。我不得不承认，疯狂是会传染的，当我问布兰内斯他准备找哪个女演员来扮演另一个角色时，他回答，里瓦斯，尽管我并不认识任何一个叫这个名字的人，但我仍然什么都没说，因为布兰内斯的眼神中满是狂热。就这样，一切都已安排妥当，事实上，是他们两人打点了一切，有关表演的一切都不需要我操心。于是，我立马找到剧院老板，用一天的价格租了两天的剧院，条件是，我向他保证，除了演员之外不会有任何人进入剧院。

第二天，我找到一个搞得懂电力电子装置的人，为了六比索的日薪，他还要帮我完成重新粉刷和搭建舞台布景的工作。到了晚上，在连续工作了将近十五个小时后，一切都准备就绪，此时，穿着长袖衬衫的我早已汗流浃背，开始边就着啤酒吃三明治，边漫不经心地听那个男人讲述城市里的八卦。男人顿了顿，说道：

“今天我看见过您的朋友和一个女人在一起。就在今天下午，和昨晚你们一起在酒店餐厅的那位女士一起。这儿所有的人都知道。她不是本地人，据说她只在夏天来。我向来不惹闲事，但我看见他们走进了一家酒店。对，多巧，确实，您也住在酒店，不过他们今天下午去的那家酒店不一样……是那种酒店，您明白吗？”

过了一会儿，布兰内斯来了，我告诉他现在万事俱备，就缺那个著名的女演员里瓦斯了，除此之外，他还得搞定汽车的事情，因为我只弄到一辆，是那个今天帮我干了一整天活的男人的，我打算花几比索租下他的车，由他本人驾驶。尽管我这么说，但事实上，我心里已经有主意了，那个男人的车是一辆带折叠式车篷的老式汽车，因此，只要第一次驶过时收起车篷，第二次反向驶过时再支起来，问题就解决了。布兰内斯根本没有理会我，他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了，我实在不明白他喝酒的钱都是从哪儿来的。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或许他已经无耻到直接问那个可怜的女人拿钱了。这个想法让我如鲠在喉，我一言不发，继续吃我的三明治，此时，醉得不省人事的布兰内斯哼着小曲儿，在舞台上巡视着，他一会儿扮演摄影师，一会儿又扮演间谍、拳击手、橄榄球运动员，嘴里的小曲儿一直没停，帽子吊在后颈上，站在不同的位置上察看着每个角落，搜寻着鬼知道什么东西。每一分每一秒我都更加坚信，他用来买醉的钱是从那个可怜的、生病了的女人那儿拐骗来的，几乎可以这么说。我一句话都不想和他说。就这样，我吃完了面前所有的三明治，于是，我让那个男人又帮我拿了六个三明治和一瓶啤酒。布兰内斯终于厌倦了在舞台上晃悠来晃悠去，不合时宜的醉意让他变得多愁善感，他走了过来，坐在我身边的木箱上，两手插在裤袋里，帽子放在双膝上，浑浊的双眼定定地看着舞台。好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沒说话，我能看出他老了，金色的秀发已经变得暗淡、稀疏。留给他扮演花花公子，带女人去酒店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事实上，留给他干任何事的时间都不多了。

“我也没浪费时间。”他突然开口了。

“是，可以想象。”我草草敷衍道。

他笑了笑，突然正经起来，戴好帽子后，他站起身。他来回走着，边走边和我说着话，就像他曾经无数次看到我在办公室做的那样，在那间挂满照片的房间里，我来回踱着步，口述着一封献给那个女孩的信。

“我调查了那个女人，”他说，“看起来她的家庭或者她本人曾经很有钱，后来她不得不从事教师工作。但是没有人，真奇怪，没有人说她疯了。虽然她确实有些古怪，但还不疯。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来找您——噢！悲惨的哈姆雷特的养父，嘴边还沾着三明治的油……找您说这些。”

“至少，”我平静地说，“我不会没事找事到去窥探别人的生活。至少我不会吹嘘自己是一个古怪的女人的征服者。”我用手帕擦了擦嘴，转过身，一脸不耐地看着他，“至少我不会用鬼知道从哪儿来的钱去买醉。”

他手叉着腰地站着，凝视着我。他沉思着，继续说着惹人厌烦的事，但任何人都看得出来，此刻他正在思考关于那个女人的事，他对我的冒犯并不是真心的，只是为了在思考时干些别的事，以免我识破他正在想那个女人的事实。然后，他转过身来，蹲下，拿起啤酒瓶，又站了起来，他不慌不忙地喝完了瓶子里剩下的酒，嘴对着细长的瓶口，直到把瓶子里面的液体倒空。绕舞台走了几步后，他再次坐了下来，把瓶子放在两脚之前，用双手盖住瓶口。

“我问了她，她便告诉我，”他说，“我想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不知道您到底明不明白，不是把钱揣进兜里就万事大吉了。我问她，我们要演的究竟是什么，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意识到，她疯了。您想知道她说什么吗？一切都是她做的一个梦，您听到了吗？最疯狂的是，她告诉我，这个梦对她来说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她不认识那个穿着蓝色毛衣、坐在她身边的男人，也不认识拿着啤酒的女人，她甚至没有在和您布置的这条滑稽可笑的街道或者类似的地方居住过。那这一切到底是为了解释什么呢？她说，她睡着时做了这个梦，感觉很幸福，不单单是‘幸福’这个词所意味的，还有另一个层面的涵义。所以她想重现这一切。尽管这个想法很疯狂，但其中不乏合理之处。再说，里面也没有粗俗的爱情桥段，这点让我很满意。”

回住处休息的路上，每走几步他就在街道上站定——那晚天空很蓝，天气很热——擦住我的肩膀和衣领，问我到底明不明白，我不知道他想让我明白什么，或许是某件他也无法理解的事，他从未试图解释。

十点，女人准时出现在剧院，仍然穿着前一天晚上的黑色连衣裙，佩戴着前一天晚上的怀表，在我看，这身装束似乎和舞台上布置的简陋街区格格不入，似乎也不适合躺在马路牙子上，任由布兰内斯抚摸她的头发。但无所谓：剧场是空的，观众席上只有布兰内斯一个人，醉态一如既往，手上捏着永远不会缺席的香烟，他穿着一件蓝色的毛衣，戴着一顶灰色的帽子，帽子在其中一只耳朵的位置向上翻折。他很早就来了，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女孩，就是那个要从蔬果店旁边的房子里走出来、递给他一罐啤酒的女孩；一个和人物形象完全不符的女孩，当然，我的意思是，完全不符合我心中的人物形象，鬼知道她到底是什么人；一个忧郁、消瘦的女孩，穿的衣服和脸上化的妆都让人不忍直视，毫无疑问，布兰内斯是在随便哪家小咖啡馆里认识她的，某个晚上，他邀请她去街上走走，再用一个荒谬绝伦的故事把她骗过来。从她走路的样子判断，这是她第一次演戏，看到她伸长胳膊，把啤酒递出去，我简直想哭，想一把推倒她。我们的另一个女演员，那个穿着一身黑的疯女人，刚到剧院时，她两手交叠，放在身前，盯着舞台看了好一会儿，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她极其高大，比我印象中的更加高大，也更加瘦削。之后，她没和任何人说话，径直穿过舞台，隐入她出场那侧的舞台布景之后，脸上依然带着她那让人汗毛直立的、病态的笑容，尽管和之前相比似乎已经没那么明显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的双眼追随着她的脚步；我的目光牢牢地锁定着她那颀长的、穿着一袭黑衣的身影，紧紧地尾随着她，直到幕布的边缘将她淹没。

此时我站在舞台中央，十点已过，一切就绪，于是我举起手，用一记击掌向演员们发出开演的信号。就在那一刻，尽管还没有完全搞懂正在发生什么，但事情的脉络逐渐变得清晰，我开始明白我们被卷入了什么当中，但我永远无法用言语表达，就像你了解了一个人的灵魂，却无法用言语表达一样。我更喜欢通过手势提醒演员上场，当我看到布兰内斯和他带来的女孩走到了自己的位置上，便溜到幕后，此时那个男人正准备出场，他坐在老爷车的方向盘后，车子开始晃动，发出勉强能够忍受的噪声。我爬到摆在后台的箱子上，试图找到一个藏身之地，因为我和即将上演的愚蠢的一幕没有任何关系。我看到她从那间小破房子里走出来，像个女孩一般晃动着身体——她的头发，稀疏，花白，披散在背上，肩胛骨以上的部分则用一条色彩鲜艳的发带束着——她迈了几大步，毫无疑问，这是女孩专属的步伐，她刚摆好桌子，便出门到街上看日落，此刻她很平静，什么都不想；我看到她在布兰内斯的椅子旁坐下，用一只手托着脑袋，手肘撑在膝盖上，指肚倚在微张的唇边，她转过脸，看向某个遥远的地方，一个比我、比我身后剧院的墙壁更遥远的地方。我看到布兰内斯起身来准备过马路，我看到他一秒不差地在车开过之前穿过马路，而支着车篷的车则吐着烟，消失在舞台的另一头。我看到布兰内斯接过住在对面房子里的女人手里的啤酒，看到他将罐中的液体一饮而尽，把容器还给女人，而女人则慢慢地、静静地消失在门中。我看到穿蓝色毛衣的男人又一次成功地避开了一辆收起车棚的车，在它飞速驶过之前穿过马路，那辆车立即熄了火，停在我身边，在逐渐散去的蓝烟中，我远远望见坐在马路牙子上的女孩打了个哈欠，在地砖上躺了下来，头枕在被头发盖住的手臂上，腿蜷着。穿着蓝毛衣、戴着帽子的男人弯下腰，抚摸着女孩的头，他的手来来回回地抚摸着，缠进了头发里，他摊平的手掌出现在她的额前，又紧按在她色彩鲜艳的发带上，就这么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

我从箱子上下来，叹了口气，踮着脚尖走上舞台，此刻的我平静多了。开车的男人跟在我后面，惶恐地微笑着，布兰内斯带来的那个女孩也从门里走出来和我们会合。她问了我一个问题，一个很短的问题，只有一个词语，我回答了她，但我的视线始终落在布兰内斯和躺在地上的女人身上：布兰内斯仍然用手抚摸着女人的前额和披散的头发，没有停下，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场戏已经落幕，而最后的场景，也就是他用手抚摸女人头发的场景，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布兰内斯弯着腰，抚摸着女人的头，他伸长胳膊，用手指触摸她每一根灰色的发丝，从额头的发根一直到披散在肩上和背上的发梢。开车的男人仍然微笑着，他咳了一声，朝一边啐了一口。之前递啤酒给布兰内斯的女孩开始朝着女人和弯腰抚摸她的男人所在的位置走去。于是我转过身，让车子的主人把车开走，这样我们就能早点走，我走在他身边，把手伸进口袋，准备给他几个比索。此时，在我的右手边，也就是其他人所在的地方，发生了些奇怪的事，当我想过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时，撞上了布兰内斯，他已经摘掉了帽子，浑身散发着一股难闻的酒味，他在我的肋骨上重重地打了一拳，喊道：

“您难道没发现她死了吗，蠢货！”

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着，依然沉浸在这个意外带来的惊吓中，浑身酒味的布兰内斯像个发疯的人一般在舞台上上来回走着，递啤酒的女孩和开车的男人正弯腰查看女人的尸体，我突然明白了，这就是那个东西，这就是女人在找寻的东西，也是前一晚醉酒的布兰内斯在舞台上找寻的东西，看起来他仍在找寻它，来来回回、急急忙忙、发疯似地找寻它，我突然看清了一切，这一切就像我们每个人刚出生就明白的道理，但在那之后，任何语言都无法再将它阐明。

1941年

[1] 科连特斯大街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夜生活的中轴线，沿街有很多著名的酒吧和剧院。
[2] 剧本中通常用“幕”和“场”来表示段落和情节。幕指情节发展的一个大段落，即拉开舞台大幕一次，一幕就是戏剧一个较完整的段落，一幕分为若干场。场指一幕中发生空间变换或时间变换的情节，即拉开舞台二道幕一次，它是戏剧中较小的段落。



胡安·卡洛斯·奥内蒂

乌拉圭最重要的作家之一，生于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自1939年首部长篇小说《井》一举成名，奥内蒂创作了《无主的土地》《为了今晚》和包括《短暂的生命》《造船厂》《请听清风倾诉》等在内的“圣玛利亚”系列小说以及大量中短篇小说，被视为拉丁美洲“文学爆炸”时期的重要作品。1974年，奥内蒂因卷入反乌拉圭军政府独裁的斗争而受到迫害，流亡西班牙专心创作。1994年病故于马德里。

译者：徐恬

西班牙语文学译者，主要译作有乌拉圭作家马里奥·贝内德蒂的长篇小说《感谢火》，乌拉圭作家胡安·卡洛斯·奥内蒂的《短篇小说全集》（待出版）、卡洛斯·富恩特斯短篇小说集《幸福之家》（待出版）。

《梦成真》选自胡安·卡洛斯·奥内蒂短篇小说全集，由作家出版社授权发表。

故事群岛

威廉·特雷弗说，短篇小说是惊鸿一瞥的艺术。来吧，登上这个精选世界短篇小说的“故事群岛”，在惊鸿一瞥中，体味人生种种无奈、困顿、痛苦……



图片来自 [Clem Onoeghuo](#) on Unsplash

小说

毒药

露西·考德威尔 | 故事群岛

我想知道他是否也能闻到，
闻到它以缓慢的绿色螺旋从我身上弥漫开来

昨天晚上我看不见他了。他跟一个女孩在一起，女孩年龄只有他的一半，超过一半，他年龄的三分之一。那是在商人旅店的酒吧里，他们一起坐在覆盖子色的拷花丝绒长椅上，她用胳膊搂住他的肩膀，他也环绕着她，一只手松松地放在她的腰上。她正在大笑，脸正对着他，迷醉，欣喜。他们不停碰杯：几乎每喝一口鸡尾酒，他们都会碰一下杯。我独自一人，坐在吧台边的高脚凳上，等着我的朋友们——我多年未见的朋友们，即便在数年以前，他们也总是迟到。我点了一杯白葡萄酒，用颤抖的手端起酒杯。是他。这一点毋庸置疑。他的脸已经松垂了，头发尽管还是黑色的——肯定染过——但萎弱稀疏。当他站起身时，我发现他比我记忆中要矮。

但那就是他。

我已经很多年没见他了。我竭力用脑子计算出这个数字。十六年——十七年——将近十八年。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就在那里，跟一个只活了他一小部分年龄的女孩纠缠在一起。他现在应该快六十岁了。

他朝我的方向走来，我低下头看鸡尾酒单，用头发遮住半边脸，但我无法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他的目光掠过沿途那些女人，纤细的、美黑过的赤裸背部和镶着亮片的裙子，水台高跟鞋。他一眼都没看过我。很长时间我都深居简出，已经忘了人们在周六晚上如何打扮：我穿着紧身牛仔裤和西装外套，只是略施粉黛。我目送他沿着粉白条纹的地毯走到外面，朝洗手间走去，然后我转回身，去看他的同伴。

她低头看着手机，一条腿轻轻摇晃，快速打着字。一瞬间，她看上去的确很年轻。我猜她大概二十五岁左右，但其实不到那个年龄。我感觉胸口奇怪地紧绷起来。她收起手机，分开双腿，然后又交叠起来，扯了扯小黑裙的下摆。她拿起自己的空酒杯，头向后仰去，把残酒一饮而尽。她轻轻咳嗽了一下，把酒杯放回原处，并把头发甩到另一侧的肩膀上。她的妆太浓了：大笔的腮红，夸张的黑眼圈。她环视酒吧，然后又拿出手机，轻轻点击着，打着字。独自待在这种酒吧让她感觉很不自在。周围的人都比较年长，你能看出她有些难为情。坐在她对面椅子上的男人至少四十多岁了，脸部肌肉松弛，穿着西装，汗流浃背地喝着威士忌酸酒。当他再度出现时，我看到她脸上一阵放松，看到她扭着身子扑向他，亲吻他的脸颊。他们一起研究酒单，咯咯笑着，头亲密地靠在一起，这时，我突然意识到她不是他的情人。

她是他的女儿。

她是梅丽莎。十七年了。现在她应该十八岁。也许他们今晚出来是为了庆祝她十八岁的生日。随后，怀着一阵恶心的冲动，我意识到，我的感觉并不是愤怒，愤怒于她对他来说过于年轻了，也不是轻蔑，也不是厌恶。我的感觉更简单，也比这些更为复杂。

*

我不记得去诺克斯先生家是谁的主意。前一秒我们还在为他傻笑，推搡的肘部，甜润的呼吸，湿漉漉的脑袋挨在一起，下一秒有人说起了他的住址，说起了他的邻居、教堂和他妻子的事情，突然间，几乎无须决定，我们就打定主意要去那里了。是谭雅吗？

我们有四个人：唐娜、谭雅、丽莎和我。我们十四岁了，无所事事。那天是教师研习日[1]，这意味着不用上学，而我们又没有别的事情做。时值四月，寒意逼人，雨阵阵飞溅下来。复活节假期才结束不久，我们都还没有零花钱。九点刚过，我们就在凯恩伯恩公园碰头，但是，在一个湿漉漉的周一上午，那个时间的公园荒凉无比。我们一路游荡到儿童乐园，但秋千都湿透了，心不在焉地玩了几个回合后，我们放弃了。我们四人沿着斯登海姆大街往前走，经过我们的学校——主楼的灯还亮着，教师们的车像往常一样整齐地排成行，看到这些令人感觉很奇怪。

接下来，更多地是出于习惯，我们穿过马路去了迷你市场。我们凑了点零钱，买了几包草莓棒棒糖和侏儒宝石[2]，唐娜还偷了一把碳酸可乐棒。我们一边吃一边朝巴利哈克摩尔的方向艰难跋涉。雨越下越大，我们都还没带伞，最后只好去了肯德基，蜷缩在密胺树脂桌旁，轮流啜饮着一份百事可乐。

那里只有我们几个人。糖果、雨水和无聊让我们坐立不安，并且语带尖酸。我们开始讲一个故事，故意用很大的声音，说有个人点了一个原味鸡肉汉堡，当看到里面有蛋黄酱的时候，这个人抱怨起来。没加蛋黄酱，售货员说了。哦，有蛋黄酱。哦，没有。结果，是鸡胸肉上的囊肿破了，所谓的蛋黄酱正是其中流出的脓汁。

柜台后面的女孩看我们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我们意识到，如果她把我们赶出去，那就真的无处可去了，所以我们改变了策略，开始互相羞辱起来，我们钟情的男孩，我们约会过或者想要约会的男孩。

然后，几乎不可避免地，话题转向了诺克斯先生。

我们都迷恋诺克斯先生。任何人都不会费神去否认这一点。所有学生都迷恋他。他是法语和西班牙语老师，自己也有一部分法国血统，至少传言是这样说的。无论如何他有一部分异国血统，他必须这样——他跟其他老师是如此不同。他一头凌乱乌黑的长发遮住一只眼睛，还有永远的宿醉胡茬，他抽骆驼牌香烟。教师在校园的任何地方抽烟都是被禁止的，教师休息室也不行，但他无论如何还是抽了，在艺术区的员工厕所里，或者在管理员的小屋中，女孩们说。还有，如果你在休息或午餐后立刻碰到他，你就能闻到他身上的烟味。他开一辆阿尔法·罗密欧，亮红色，当所有其他男老师都穿皱巴巴的棕色和灰色时，他穿彩色丝绸衬衫和乐福鞋。在学期末的自由着装日，他会穿萝卜牛仔裤、高领马球衫和切尔西靴，尽管那是冬天，但他仍会戴一副飞行员太阳镜，像一个空档期的电影明星。他在教室墙上贴满艾玛纽埃尔·贝亚特、年轻的凯瑟琳·德纳芙和索莱达·米兰达的海报，他把佩德罗·阿尔莫多瓦的录像带借给自己六年级的学生。

但那不是全部。针对他的大部分指控，都源于他曾跟以前的一名学生有染，达维娜·卡尔弗特。那是八年前的事了，现在他们已经结婚。他为了她离开了自己的妻子，那是一桩真正的丑闻。为此他几乎丢掉工作，但最后他们没能开除他，因为他没有犯任何确切的、法律上的错误。

这发生在我们入学之前，但我们知道所有细节：每个人都知道。对一、二年级的学生来说，那几乎是一种加入小团体的仪式——在图书馆角落里遍览学校的旧杂志，寻找她的身影，仔细查看年级组、外国交换生旅行和颁奖日的粗糙黑白照片，看着她一路长大，成为他的情人。

达维娜·卡尔弗特，达维娜·诺克斯。她离我们的生活有多近，就有多远，让我们望尘莫及。据说，达维娜是她那一届的风云人物。她在整个北爱尔兰地区的西班牙语 A 级考试中获得第一名，法语第三名。达维娜·卡尔弗特，达维娜·诺克斯。当她还在学校的时候，他们之间没有发生任何事——或者，至少，人们无法把任何罪名安在他身上——毕业后的间隔年，她去了格拉纳达教英语，然后他去看她了。我们对此很清楚。因为丽莎的姐姐比达维娜·卡尔弗特低两级，当时在诺克斯先生的西班牙语 A 级班上。万圣节期间过后，他带着一大摞最新的西班牙语杂志回来了，包括《Hola!》《十分钟》和西班牙版的《Vogue》杂志。他们问他是不是出门了，去了哪里，他回以一连串带有挑逗性的西班牙语，他们都听不懂。但谣言像野火一般四起，说他去了格拉纳达，去看达维娜·卡尔弗特。果然，当她回来过圣诞节的时候，至少有两个人看见他们坐在那辆阿尔法·罗密欧里，车停在一条小路上，他们在接吻，然后，当那个学期结束的时候，他跟他妻子已经分居，正在办理离婚手续。

接下来那一年，他甚至不向班上的同学隐瞒了：当聊起周末种种的时候，他会笑着用法语或西班牙语说，他去了爱丁堡，拜访了一位特殊的朋友。人人都知道那是达维娜。

我们经常想象他第一次去格拉纳达看望她的场景。蜿蜒的街道和白色的中世纪建筑。蓝色、橙色和紫色的天空。他们一起步行前往洛尔迦故居和阿尔罕布拉宫，接下来，他们在某个铺着鹅卵石的广场上轻轻碰撞雪莉酒杯，那里有喷泉和吉普赛演奏者。也许他还会把手伸到桌子下面，轻抚她的大腿，一只手滑到她裙子下面，摩挲着大腿的曲线，当他抽出手来的时候，她会交叉双腿，然后又松开，挤压并释放大腿的肌肉，那种刺痛的压力让人难以忍受。

我想象过无数次，但我永远无法定格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在格拉纳达，和诺克斯先生在一起，你会怎么做？你会把他带到你的小出租屋吗？在寄宿家庭闷热的屋檐下，或者在一个合租的公寓里？不会：你会跟着他去他预订的酒店，阿尔拜辛一家雄伟而陈旧的国营古堡酒店，那里的四柱豪华大床；或者更有可能是新区一间籍籍无名的房间，工作人员不会问这问那，床上的白色床单有冷淡的四角，你能从浴室里听到房间的每一个动静。其中的羞耻——其中的兴奋。

在上纽敦路的那家肯德基餐厅，在四月那个下雨的周一教师研习日，我们知道诺克斯先生和达维娜住在哪里。那是在城外通往冰碗的路上，靠近高尔夫俱乐部，在邓

多纳德。走路要花四十到四十五分钟。我们没有别的事做。我们挽着胳膊出发了。到那里后，我们发现情况令人扫兴。我们沿国王大道走来，一路上经过很多奢华的住宅；而且，在见过跑车、太阳镜和名牌西装后，我们期待他的房子也会与众不同。但他街上的大多数房子和我们自己家差不多：平房，或者小小的半独立式红砖住宅，有树篱、草坪和杜鹃花丛。我们走在路的一边，然后又走到另一边。没有任何迹象能表明他住在哪里：没有一丝他的痕迹。

那时我们已经吵起来了。雨毫不留情地落下，谭雅开始担心会有人看见我们，然后报告给学校。我们反驳她——怎么会有人知道我们在干坏事呢？他们怎么知道我们上哪所学校？我们又没穿校服——但我们都有点不安。上午只过去一半，万一他因为某些原因离开学校，或者提前回家吃午饭怎么办？我们四个人都上他的法语课，我和丽莎还同时上他的西班牙语课：他会认出我们的。

我们该走了：我们知道该走了。漫长的雨中归途在我们面前展开。我们坐在一堵矮墙上，翻遍口袋和钱包，计算是否有足够的钱给每人买一张车票。当发现钱只够买三张票的时候，我们吵起来了：谭雅没有钱了，但是她付了棒棒糖的钱，还有几乎一半的百事可乐，所以让她走回去是不公平的。好吧，但因为她一个人而让每个人都走回去，那也不公平。还有，她住得最近：她要走的距离最短。但这是不公平的！局面反反复复，而且可能会陷入混乱——唐娜刚才威胁说，如果谭雅继续抱怨不休，她就会给她一巴掌。

就在这时，我们看见了达维娜。

丽莎认出了她，在一辆金属蓝的标致牌汽车里。那辆车从我们身边掠过，拐过转弯处，但丽莎发誓说车里的人就是她。我们跳了起来，激动地看着彼此。“好，我们走。”唐娜说。

“唐娜！”谭雅说。

“怎么，你怕了吗？”唐娜说。唐娜戴着厚厚的眼睛，这让她的脸看起来又小又刻薄，在一次争吵中，她隔着一扇玻璃推拉门把自己的妹妹推了出去。我们都有点害怕唐娜。“走啊。”丽莎说。

谭雅看起来马上就要哭了。

“我们就是过去看看，”我说，“我们就走路经过，看看那座房子。那又不违法。”然后我补充道：“看在他妈的份儿上，谭雅。”如果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压根不在乎谭雅，但当着其他人的面对她太不客气，那不合适。

“是啊，谭雅，看在他妈的份儿上。”丽莎说。

谭雅坐回矮墙上。“我哪儿也不去，”她说，“我们会惹上大麻烦的。”

“好吧，”唐娜说，“滚回家吧，你还在等什么？”她转过身，拉住丽莎的胳膊，然后她们一起沿着马路走去。

“走吧，谭。”我说。

“我有一种不好的感觉，”她说，“我只是觉得我们不该这样。”但是，当我转身去追其他人的时候，她从墙上跳下，跟了上来。

我们找到了那辆标致车停放的房子，就在路的尽头。它是一栋联排房子的左翼，篱笆疏于打理，小小的前草坪中央立着一颗发育不良的棕榈树。你怎么也不会想到诺克斯先生的花园里有一颗微型棕榈树。我们聚在马路对面，掩身于一辆白色面包车后面，冲着它傻笑。然后我们意识到达维娜还在车里。“她在干什么，”唐娜说，“那个傻乎乎的婊子。”

我们又站着看了一会儿，但什么也没发生。你能看到她的头和后肩的模糊轮廓，只是坐在那里。

“去他妈的吧，”唐娜说，“我可不想像个他妈的大傻帽一样在这里站一整天。”她转过身走了几步，等着我们跟上来。

“是的，”谭雅说，“我也要走了。我说了要回家吃午饭。”

我和丽莎都没动。

“你觉得她在干什么？”丽莎说。

“听广播？”我说，“我妈有时也那样，如果是《弓箭手》的话。她不想离开车，直到节目结束。”

“我猜是吧。”丽莎说，看起来很失望。

“走吧，”谭雅说，“我们已经看到他住的地方了，现在我们走吧。”

唐娜双手叉腰站在那里，因为我们无视她的存在而恼怒不已。“说真的，”她大喊道，“我要走了。”

她们期望我和丽莎能跟上来，但我们没有。一等她们走出听力所及的范围，丽莎就说，“天哪，唐娜今天把我的脑袋都要搞坏了。”说这话的时候，她瞥了我一眼。

“哈。”我含含糊糊地说。立场太鲜明是不行的。

这些天丽莎和唐娜亲如姐妹。丽莎妈妈和我妈妈是同学，我们两个自从婴儿时期就是好朋友了。我们有一起洗澡的照片，全身都是泡沫，用梅迪先生牌沐浴露瓶子敲打对方。从小学到中学，我们一直形影不离。但是最近，丽莎跟唐娜一起玩的时间越来越长，她们抽着从唐娜妈妈那里偷来的“丝绸剪”香烟，周末在公园喝白色闪电伏特加。她们两个都曾跟男孩子玩得很出格，不是完全的性行为，但很接近了，至少她们是这么声称的。我亲过一个男孩。比谭雅好一点——但是，这仍然让我在跟丽莎独处时感觉怪异而尴尬。我一直想象我们能一起做任何事，就像我们一直以来的那样。

我可以感觉到丽莎仍在看着我。我用一只脚后跟蹭了蹭地面。

“我说真的，快把我的脑袋弄爆了。”她说，然后板起脸，可以认出那是属于唐娜的表情，我让自己傻笑起来。丽莎看起来很高兴。“来吧，”她说，然后挽住我的胳膊，“你觉得达维娜是什么样的人？我是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完全明白。“嗯，她一定很美。”我说。

“你这个大拉拉。”丽莎说，戳了一下我的肋骨。

我也戳了她一下。“不，说真的。她肯定是：他为她离开了自己的妻子。她一定是个大美女。”

“还有吗？”

“嗯，还有她不在乎人们怎么想。我是说，想想那些流言蜚语。想想你跟你的父母怎么交待。”

“我爸爸会疯的。”

“是的，”我说。

我沉默了一会儿，看着标致车里那个模糊的身影。

“你觉得他们在学校发生过什么吗？”丽莎突然说，“我的意思是，肯定发生过，不是吗？不然你为什么大老远去看她？我是说，比如，你跟你的妻子撒谎，然后一路飞去格拉纳达。”

“我明白。我不知道。”

我以前就想过这个问题——我们都想过。但站在他家门口，他和达维娜的家，感觉尤其奇怪。她会不会放学后在他办公桌前徘徊？他会不会在某个地方停下来，让她搭车去某处？她会不会在他住的地方闲逛，跟他碰个正着，却假装是偶遇？她会不会假装在西班牙语语法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是谁先开始的？具体是怎么开始的？他们当中有没有任何一个人想到，故事会结束在这里？

“她那时应该跟我们差不多大。”丽莎说。

“我知道。”

“或者，比如说，大两岁。”

“我知道。”

到现在为止，我们肯定已经在那站了十分钟了。再多站一分钟，我们或许就会转身离开。但突然间，标致车的车门被猛地推开，达维娜从车里出来了。她就在那里：达维娜·卡尔弗特，达维娜·诺克斯。

可惜的是，我们脑海中的达维娜一直是光彩照人的，就像诺克斯先生教室墙上的电影女主角一样，但这个达维娜穿着松松垮垮的牛仔裤和雨衣，头发乱糟糟地扎成一个马尾，眼睛下面有黑眼圈。而且她在哭：她面部浮肿，旁若无人地大哭，眼泪顺着她的脸流下来。

我感觉丽莎拉起我的手，握紧了。“哦，上帝啊。”她低声说。

我们看到达维娜绕到车的另一边，从后座上解开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她举起他，然后把一个婴儿汽车座椅拖了出来。

我们已经忘了——如果我们压根知道过的话——诺克斯先生有孩子。他从来没有提起过他们，也不像其他老师那样把照片摆在桌子上。不知为何，你无法想象一个有孩子的诺克斯先生。

“哦，上帝啊。”丽莎再次说。

那个孩子正在嚎啕，我们看到达维娜奋力拖着他走过车道，另一只胳膊夹着汽车座椅，一直走上门廊。找钥匙的时候，她不得不把汽车座椅放下，然后我们看着她在包里翻来找去，然后又在大衣口袋里扒拉，最后终于找到了钥匙。她打开门走进去，门在她身后重重地关上了。

我们又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然后，我不由自主地说：“我们去敲她的门吧。”我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勇气，但话一说出口，我就知道我要去做这件事了。

丽莎转脸对着我：“你疯了吗？”

“来吧。”我说。

“那我们应该怎么说？”

“就说我们迷路了，想要杯水喝——我不知道。我们会见机行事的。走吧。”

丽莎盯着我。“天啊，你疯了。”她说。但她咯咯笑了起来。然后我们穿过马路，走上车道，然后站到了诺克斯先生的门廊上。“你不是真要这么干吧？”丽莎说。

“看我的。”我说，然后握紧拳头，敲了敲门。

我仍然记得接下来发生的每一幕。

达维娜打开门（达维娜·卡尔弗特，达维娜·诺克斯），手里抱着一个婴儿，那个学步的小孩赖在她腿边。我们脱口而出——是我灵光一闪想到的——说我们就住在拐角那边，正挨家挨户看看有没有人需要临时保姆。就在这一刻，我和丽思，我们又成了一个战队。我开个头，她就接着说完。她说什么，我就添枝加叶。我们听起来很镇定，而且完全合乎情理。达维娜说，谢谢你们，但宝宝还太小了，不能离开人。丽莎问我们能不能留下详细资料，说不定几个月后会用到。达维娜眨着眼睛，说好，当然。然后，当她去拿笔、从电话簿上撕下一张便签的时候，我们跟着她寸步不离地进了客厅。丽莎称我为茱蒂丝，而我叫她卡罗尔。我们写下茱蒂丝和卡罗尔的名字，然后编了一个电话号码。我们所向披靡。我们难以自持。达维娜问我们上哪个学校，丽莎毫不含糊地说，邓多纳高中。达维娜问，你们今天为什么没上学？我说今天是教师研习日。突然间，我想知道是不是所有学校都在过教师研习日，然后一阵恐惧流遍全身，但达维娜只是说，哦，然后就没再问别的了。

我们意识到她现在要送我们出去了，但在她找到机会之前，丽莎问那个婴儿叫什么，达维娜说，梅丽莎。名字很好听，我说。达维娜说谢谢。我们赞美着那个婴儿，她皱成一团的小脸和蜷曲的手指，然后我想象着诺克斯先生的孩子在我身体里生长的样子，突然一股巨大的热浪流过我的身体。这时，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达维娜说，姑娘们，我相信你们也看到了，我这会儿真的很忙，然后丽莎说，是的，是的，当然，我们得走了——她又开始傻笑起来。我能看到那些傻笑在她身体中升起，能看到她嘴角掀起和扭动的样子——我说，是的，当然，但你介意我先用一下厕所吗？

达维娜再次眨了眨眼睛，一双通红的眼睛，似乎她能意识到一个陷阱，却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然后她说，没问题，但楼下的马桶堵了，小鲁本喜欢往里面冲东西，他们还没来得及叫水管工，我得去楼上。直接上楼，左手边第一间就是。我能感觉到丽莎在盯着我看，但我没有和她对视，我只是说，谢谢你，然后就上楼了。

浴室里到处都是诺克斯先生的气息——嗡嗡作响。他的睡衣挂在门后，他的电动剃须刀放在水槽边上，他的林克斯除臭剂的罐子放在窗台上。马克杯里有他的牙刷，水槽里有他的胡茬，洗衣篮里放着他的脏衣服。我跪下来将洗衣篮打开，认出了他

的衬衫，一件光滑的淡蓝色衬衫，上面有黄色的钻石图案。我伸手冲了冲马桶，这样嘈杂声就能盖住我的动静，然后我打开水槽上方的镜柜，在一定是属于他的架子上，我用指尖掠过那些瓶子，掠过剃须膏、装着处方药的棕色塑料瓶、还有六个装的杜蕾斯避孕套，其中有两个不见了。

我全身的皮肤都在刺痛，在我不知道会刺痛的地方刺痛着——手指之间，膝盖后面。在那排避孕套上，我撕下其中一个，沿着铅箔齿痕轻轻扯开，把它塞到我的牛仔裤里。我把盒子放回原处，跟原来一模一样，然后关上了镜柜。

我盯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的脸看起来红红的。再一次，我想知道，他第一次注意到她的时候，她是什么年龄？我发现我已经忘了在这里待了多久。我打开水龙头，最后一次环视四周。然后，在没有计划的情况下，在不知道自己会这样做直到真的做了的情况下，我发现自己用手握住了窗台上的一个香水瓶，并且重新摆放了一下其他香水，这样就不会显出空隙了。无论如何你都不该把香水放到窗台上——连我都知道这一点。我把它塞进我的外衣口袋，用左臂挡住衣服上的凸起，然后关掉水龙头，下楼去找丽莎了，她正向我投来绝望的目光。

来到外面后，她不敢相信我所做的一切。她们没人会相信。我们追上了唐娜和谭雅，她们还在大路上等着我们。虽然感觉像是过去了一辈子，但她们离开我们后，时间只过了大概十分钟。丽莎说，“你们永远不会相信她做了什么。”声音中充满自豪，她告诉她们，我们是如何敲门并走了进去，走进诺克斯先生的房子；如何跟达维娜交谈，如何逗弄那个婴儿，我又是如何用了他的卫生间。然后，我接手了这个故事。我没提避孕套的事——那是我的，只属于我——但我给她们看了那瓶香水。那是一个深色的玻璃瓶，用掉了四分之一，深紫色的，紫得发黑，上面有一个圆形的玻璃瓶盖。瓶子上用精致的金字写着：“毒药，迪奥。”

“我不敢相信你偷了她那该死的香水！”唐娜说。

谭雅盯着我，好像她就要大病一场。

唐娜从我手中接过瓶子，打开瓶盖，把它对准丽莎。

“滚一边去，”丽莎说，“不要把那玩意儿喷在我身上。”

“那就喷我吧。”我说，她们都看着我。“来吧，”我说，“喷我。”我卷起毛衣袖子，露出手腕。

唐娜将喷嘴对准我。一股香水喷涌而出，阴沉的浓郁的充满禁忌的味道。

“呕，”谭雅说，“闻起来像狐狸似的。为什么会有人想让自己闻上去是这个味道？”

我小心翼翼地把两只手腕对在一起，举到脖子旁边，两边各点了一下。这是我闻过的最浓烈的香水。那腐臭的充满绿意的气息把我弄得有点恶心。它闻起来不像你想象中的达维娜·卡尔弗特会选择的香水：一定是他买给她的，一定是他自己喜欢。我想知道，在他们出门之前，他会不会把她喷在她身上，她会不会举起手腕，为他裸露自己的喉咙？

“你准备怎么处理它？”丽莎问。

“我们可以把它带去学校，”我说，然后突然间，我的心又开始狂跳，“我们可以把它带去学校，在他的课上喷它，看看他会怎么样。”

“你这个该死的神经病。”唐娜说，她笑了，但那笑中含有敬畏之意，有史以来第一次。

“你不能这样，”谭雅说，“我不想跟这发生任何关系。”但是，我们现在都准备无视她了。

“我和丽莎明天有西班牙语课，”我说，“午饭后立刻上。我们到时候就干。对不对，丽思？”

“你觉得他会怎么样？”丽莎睁大眼睛说。

“也许，”我说，“下课后他会把我们留下，把我们按在他的桌子上打出脑浆来。”我带着开玩笑的口吻，她和唐娜都笑了，我也笑了，但我想起了藏在口袋里的避孕套，那种刺痛的感觉又回来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紧紧闭着眼睛，以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想象他们在格拉纳达见面的场景，当进行到他解开她的吊带衣服、脱下她的裙子、让她躺到床上那一部分时，我的整个身体开始颤抖。

第二天的西班牙语课上，我们照着计划做了。上课前，我们挤在书包上，喷出了毒药，我们解开领带，把它喷在喉咙洼陷的位置。我们激动得发狂。他丝毫没有意识到我们曾经离他有多近。他的避孕套也在我身上。睡觉时它在我枕头下面，现在又被塞进我的校服口袋里。交叉双腿时，我能感觉到它的铝箔边缘在摩擦我的大腿。诺克斯先生走了进来，坐在桌子边上，问我们周末都做了什么。

我的心砰砰直跳。我突然希望自己备足了俏皮话，一些能引起他注意的东西，或者能让他微笑，但我没有。我发现自己说出了脑海中浮现的第一句话，只为了成为那个说话的人。

“我购物。”我用西班牙语说。

“我相信你经常去购物，但在这个例子中，应该用过去式。”说这句话时，他直视着我，挤着眼睛，露出戏谑的微笑。看见我说话他似乎很惊讶，或者说很开心。我从来不是那种自信的、在课堂上无需鞭策就开口发言的人。“再说一次，女士。”

女士。我从来不属于他称为“女士”的那些女孩。我可以想象他称达维娜为女士。他说西班牙语的口音流畅而性感。当然，她应该也是。他们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对话，超越所有其他人的想象。

“我买东西。”我说，紧紧追随他的目光。

“很好，买了东西，买了什么？”

“我买了什么？”香水的气味让我头晕目眩，我似乎无法理清自己的思路。

“是的，你买了什么。”

“我买了……买了一种新香水。”

“很好。”他冲我笑了笑，“去买东西，买了一瓶新香水。很好。”

“你想闻闻吗，诺克斯先生？”丽莎脱口而出。

“丽莎！”我嘘声道，既高兴又惊骇。

“谢谢，丽莎，但是不行。”

“你确定吗？我觉得你会喜欢的。”

“谢谢，丽莎。下一个谁发言？”他环视房间，等着其他人举手。我说出来了：我不敢相信我说出来了。我觉得自己的脸涨得通红。丽莎在我身边闷声发出一阵傻笑，但我没理她，而是一直看着诺克斯先生。他并没有躲闪。

下课后我们在教室逗留，慢悠悠地收拾东西，想知道他会不会把我们留下来，但他没有。我们离开房间，笑嘻嘻地搂住对方，但我们在虚张声势，我们都在哄骗自己说我们并不失望。或者至少我是这样。也许对丽莎来说，这仅仅是个大玩笑。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期待什么，但我的确期待过一些事——一个认同的时刻，一些东西。那天，我最后一节课是数学，课上我和谭雅坐在一起——我们的其他朋友都没参加高等数学课。我们一起走出学校。谭雅住在斯托蒙附近，跟我不顺路，但我有时还是跟她一起步行回家。自从我爸爸搬出去后，妈妈就回去工作了，而我不喜欢回到空空荡荡的房子里。而今天，这样做还有更大的吸引力：我知道这是诺克斯先生开车回家的必经之路。

我们走到万斯沃斯，穿过繁忙的交叉路口，然后走去上纽特纳兹路。在卡斯尔希尔斯路上，当我们走到斯托蒙长老会附近的红绿灯时，我让我们两人在那里不停游荡。我确保自己面向车流站立，等待着那辆阿尔法·罗密欧从我们身边经过。我从骨子里知道，它一定会的，它必须这样。当它真的经过时，我转身看着它，视线一刻也不曾离开，直到它完全消失不见。当我转回身的时候，我知道我内心的一些东西已经发生了变化。

那天晚上我花了一个小时学习额外的法语词汇，练习西班牙语时态，决定第二天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让他注意到我。第二天，我又和谭雅一起步行回家，第三天也是，很快，我便每天都跟她一起回家了。从学校到她家有二十分钟的路程，大多数日子里，当我们到达上纽敦兹路的时候，他的车早就不见了。但我摸准了他哪天给六年级的学生召开课后语言俱乐部，或者参加员工会议，在那些日子里，我会试着安排我们的行程，说服谭雅跟我一起去迷你市场，在那里选糖果或看杂志消磨时间，然后在教堂旁边的红绿灯那里流连，希望能看见他的车。

在那些日子里，哪怕只是瞥到它穿过绿灯飞驰而过，我也会感觉自己正一路飞奔回家。丽莎和唐娜又成了朋友，而丽莎仍然没有邀请我去参加她们的凯恩本之夜，但我突然间不在乎了。连续三个周六的晚上，我都让妈妈以为我去了丽莎家，然一路走去诺克斯先生和达维娜的房子，我在那里经过了两次、三次、四次、五次，看到他们各自的车停在车道上，还看到了窗户里的灯光，有一次甚至瞥到了他在楼上房间的身影。

它一定会发生。我知道它一定会发生。

我已经发现了，最有可能看见他的车的日子是周二或周三，有一个周三，当我让谭雅在她家那条路的尽头逗留时，诺克斯先生的阿尔法·罗密欧终于在红绿灯旁停了下来。

他就在我旁边。几米之外。这是真的。它正在发生。有那么一会儿我无法呼吸。“他在那里。”我说，谭雅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说：“不要，清醒点，你在干什么？”

“诺克斯先生！”我大喊，朝汽车挥手，“诺克斯先生！”

他的车窗开了一半——他正在抽烟——他弯下腰看向外面，然后按了一下按钮，把车窗完全打开。“喂？”他说，“怎么了，都还好吗？”

“诺克斯先生，”我说，“我们需要搭车，你能载我们一下吗？”

“不要！”谭雅嘘声对我嘶吼道。

“求求你了，诺克斯先生！”我说，“我们真的要迟到了，这件事很重要。”

信号灯仍是红色的，但它们随时会变成琥珀色，然后变成绿色。

“求求了，诺克斯先生，”我说，“你一定要答应我们，求求了。”我已经习惯了每天上法语课或西班牙语课的时候涂一抹毒药——尽管丽莎告诉我它闻起来很怪——我现在仍能闻到它的味道，达维娜的香水，在我身上，我想知道他是否也能闻到，闻到它以缓慢的绿色螺旋从我身上弥漫开来。

他吸了一口烟，把它扔出窗外。“你们要去哪里？”

谭雅再次低声嘶吼，抓住我的胳膊，但我挣脱了她。信号灯变成琥珀色了，当它们变成绿色时，我打开副驾驶车门，坐了进去。我就在那里，在诺克斯先生的阿尔法·罗密欧里。它正在发生。

“你要去哪里？”他又问了一遍。“任何地方。”我说。他看着我，扬起眉毛，笑着哼了一声，我以为他会让我下车，但他没有，他只是发动了引擎，然后加速离开，在侧翼后视镜里，我瞥见谭雅一脸痛苦，半张着嘴巴，我看了看身边的诺克斯先生——诺克斯先生，我在这里，现在，终于，在诺克斯先生的车里，我和诺克斯先生——我也开始笑了起来。

事后，我忍不住告诉谭雅，告诉她他是如何吻了我，一开始很温柔，他的嘴唇很柔软。然后越来越用力，用他的舌头。我告诉她，他是如何松开我的领带，解开我的衬衫，他落在我皮肤上的手指是如何冰凉。我告诉她，他是如何把手伸到我的裙子下面，指尖往上滑，然后用手指勾住我的内裤，把它们拽了下来。

“他没有，”她说，惊恐地睁大眼睛。我对她发誓：“他有。”她的惊恐促使我继续说下去，我说一开始很疼。我说出血了。我说是在他的阿尔法·罗密欧的后座上，在高尔夫俱乐部附近的一条死胡同里，一开始他先把外套摊开，事后他抽了一根烟。

一旦我告诉谭雅，我就不得不告诉唐娜和丽莎，丽莎也斜着眼睛说我在撒谎，我拿出避孕套给她们看：这是证据，我说，他给我的，好下次用。

我没想到谭雅会向她母亲哭诉这一切——所有这一切，包括我们去他家的那次。我们为此惹上了大麻烦，但他的麻烦更为严重。

我妈妈一问我，我立刻就崩溃了，我告诉她这一切都是我编的，但她不相信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编造，不明白为何我一开始就知道要编什么。在一系列痛苦的电话中，

她和谭雅的妈妈认定诺克斯先生对我、对我们所有人都施加了不健康的控制。她们一致认为，无风不起浪。她们联系了校长，结果如下：诺克斯先生被叫到管理层面前，被迫辞职，而我则被送去看一位辅导员，他试图让我谈论我父母的离婚。然后，到了秋天，我们听说达维娜已经离开了诺克斯先生，带着她的宝宝们去了她母亲家。一定是她最恐怖的噩梦成真了，一个最微弱的暗示，即她的丈夫、两个孩子的父亲，会再一次那样做。她比任何人都清楚，并不存在无辜这种东西。

我认为她是对的。

我不相信那是一次性的。

那天发生的事情是，他载着我在路上开了五分钟，在车库前掉了个头，沿着马路另一边往回开，让我在离上车地点不远的地方下了车，然后他说：“不会再有第二次了，你知道的。”然后大笑起来。但是，在他把我放下时，我能看见，即使在说不会再有第二次的时候，他的表情仍是似笑非笑，眉毛扬起，这种事以前发生过。而且有一种直觉，是只有十四岁的女孩才会有的：我会加倍努力去诱捕他的。要是我没告诉谭雅就好了。

我举起酒杯，喝了一口，然后又喝了一口。诺克斯先生和梅丽莎还在对着鸡尾酒单傻笑，来回翻阅着纸页。“劳驾。”我说，转向吧台，对离我最近的酒保说。他没有听见我说话，继续削着橘子皮卷。“劳驾。”我又大声说了一遍。他举起手指：等一下。但我接着说，“你看到那边那一对儿了吗？窗户旁边那一对儿？那个黑发男人和那个金发女孩？”他皱了下眉，放下橙子，看了看他们，然后又看看我。“我能帮他们买单吗？”我脱口而出。

“你想请他们喝酒？”

“是的，不管他们点什么。全部。我想付全部的账单。”

“我去帮你叫一下酒吧经理。请稍等。”

我的心砰砰直跳。这很冲动，也绝对愚蠢。我的朋友们还没到，当诺克斯先生喝了两杯酒要求结账的时候，我们应该还坐在这里，我该怎么向他们、或者向他解释呢？酒保会指出是我付的钱。即使我要求他们不要透露，不要出卖我，我的名字也会出现在信用卡小票上，所以他会知道的。他会知道吗？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名字对他还有任何意义吗？当然会有。一定会有。

我在凳子上转了个身，再次看向他们。梅丽莎，一头金发，嘟起的光洁的嘴唇和蓝色的眼睛，看起来不太像她。说起来，她跟达维娜也不是很像。他们在假装争论着什么。她甩了甩头发，歪着头，双手叉腰，一副愤愤不平的样子，而他握住她赤裸的上臂，捏了捏，轻轻摇晃她。她尖叫起来，然后大笑着把头向后仰去，他俯身在她耳边喃喃低语。

她必须是他女儿。她必须是。

“女士，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酒吧经理隔着吧台弯过腰来，试图引起我的注意，“对不起？”

“对不起，”我说，“我走神了。”

她必须是他女儿。

“我知道你想给窗边那对客人买杯酒。”

“没有，”我说，“对不起，我弄错了，我把他们当成别人了。”

“没问题，”他说，平静，专业，“还有别的能为你做的吗？”

我看着他。他等待着，礼貌地歪着头。我差点说：“你能问到他们的名字吗？”然后我意识到，无论结果怎样，我都不想知道。

[1] 教师研习日（Baker Days），英国学制中教师接受培训的日子，在此期间学生不用上学。

[2] 侏儒宝石（Midget Gems），是英国玛莎百货生产的一款糖果，后因含有对侏儒人士的歧视而改名。



露西·考德威尔

北爱尔兰小说家、剧作家。1981 年生于贝尔法斯特，毕业于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金匠学院。已出版三部长篇小说和两部短篇小说集。2021 年，她的短篇小说《所有人都刻薄又邪恶》获 BBC 国家短篇小说奖。

译者：刘伟

出生于 1982 年，拥有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及公共管理博士学位，先后供职于北京大学及国家电网，现为自由撰稿人、译者。译有詹姆斯·索特《这一切》。

《毒药》（Poison）选自露西·考德威尔短篇小说集 *Multitudes* (2016)。由群岛图书授权发表。

故事群岛

威廉·特雷弗说，短篇小说是惊鸿一瞥的艺术。来吧，登上这个精选世界短篇小说的“故事群岛”，在惊鸿一瞥中，体味人生种种无奈、困顿、痛苦……



图片来自 [Josh Anderson](#) on Unsplash

小说

昏暗的餐厅

费利斯贝托·埃尔南德斯 | 故事群岛

我总是不自觉地被他人生命里
戏剧化的经历所吸引。

曾有几个月的时间，我受雇在一个昏暗的餐厅里弹钢琴。我只有一个听众，但她并不关心弹琴的人是谁；而我，也并没有发自真心地为她演奏。在不同曲目的间隙里，我们彼此保持着沉默；我的思绪在寂静中滋长，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跳跃、延展开去。

起初，我是通过钢琴协会找到那份工作的。钢琴协会的男孩们经常能帮我在专奏流行音乐的乐队那里谋得一些演出的机会。不久之前，他们还赞助了我的一场音乐会。一天下午，协会的负责人把我叫到一边，对我说：

“嘿，我给你弄到了一份小差事，虽然报酬不多（他的眼睛里开始闪现某种不怀好意的光芒），不过，也许对你的前途大有帮助呢。一位孀居的阔夫人想找人每周为她弹奏两次。一次分两节，每节一小时，她每小时付你五十比索。”

说到这里，他忽然停住了——隔壁办公室有人在喊他，他离开了一会。

他大概觉得，我不会乐意接受这样低酬劳的工作。因此，他刚才用半开玩笑、半严肃的语气劝我接下这份差事，说现在工作难找，抓住主动找上门的机会才是明智之举。

其实，我很想告诉他，我对这样的工作机会求之不得，因为我需要走进不同的人家去看一看，但我很难把这一点向负责人解释清楚。

他回来的时候，我正陶醉在自己的思绪中，感觉有些飘飘然：我想，那位夫人大概参加过我的音乐会，对我的名字已有耳闻，她也可能是在报纸上看到过我的照片，或是关于我的报道。想到这里，我急忙问他：

“她点名要我为她演奏吗？”

“不，她只说要找一位钢琴家为她演奏。”

“古典音乐？”

“我不清楚。你自己和她沟通吧。这是她的住址。你说找穆涅卡夫人就行了。”

那是一栋带有大理石阳台的双层小楼。刚走到门厅，里面气派的格局就令我大为震撼。门厅的墙上镶嵌着的大理石比阳台上的那些还要精细，它们的颜色深浅不一，看起来还保持着在遥远的原产地时的模样，与周围的环境并未融成一片。

我走到通往庭院的门前，镶嵌在门上的斜角玻璃望着我——它们占据了门面上的绝大部分位置，而门上的木制框架则显得相对细窄，整扇门看起来就像是一位穿着低胸衣或是低腰裙的女士。门帘质地轻薄，就好像那扇门只穿着内衣就被我撞见了。透过门帘，我看到了一株几乎和棕榈树一样高的蕨类植物，它正随风轻轻摇曳着。我按了一会门铃，一个大块头的女人从庭院深处缓缓走了出来。直到她打开门的一刻，我才看清：她嘴上叼着的是一根金黄色的香烟。她开门见山地问道：

“您是钢琴协会派来的？”

我点了点头，她让我进了门，转身朝庭院走去，转身前似乎做了个手势让我跟着她。我现在仍然记得她第一次开口对我说话的那个情景：她的双唇很饱满，点燃的香烟在两瓣嘴唇间晃动。她带我来到了院子里的一个角落——刚才我在门口往里看是看不到这个位置的。她垂下目光，示意我坐到一旁的椅子上。我刚坐下，就开口问她：“您是穆涅卡夫人吗？”

“如果穆涅卡夫人听到您这么说，她会把我们两个都赶出门去的。不过您别担心，我就是负责接待您的人。”

她打开通往餐厅的门。门玻璃上画着一幅鹳鸟风景图。女人的脑袋刚好对上了玻璃上那只鹳鸟的头——鹳鸟的嘴里衔着一条鱼，正要把它吞下去。

我几乎无暇欣赏这个种满了植物和贴满了彩色釉面砖的宽敞庭院，因为那个金发的女人很快就回来了，手里还拿着一小盘甜点。她在我身旁的一张椅子上坐下，又把小盘子搁在了另一张椅子上，对我说：

“您不会等很久的。我教她每次进门之前都要按门铃。我之前告诉过她，如果出去的时候把门开着，家里可能会遭贼。”

我想要说些什么，却发不出声音，就仿佛我在一个口袋里努力翻找我的声音，过了许久，我才终于找到了它。

“她的品味很好。”

然而话音未落，女人便打断了我：

“不是她的品味好，而是之前住在这儿的一位绅士品味好。他是个医生，后来因为女儿死了，就把这座房子卖给了现在那位；接手房子的时候她还很年轻，但已经是个寡妇了，而且还是个有钱的寡妇。”

她把烟灰弹到了摇摇欲坠的小盘子里。

“不过那位医生在的时候，家里并没有钢琴。家里的钢琴是现在那位买的；不过，她一直因为这件事懊悔不已。”

我瞪大眼睛望向她——嘴巴也可能大张着。她似乎很喜欢我倾听的方式，因为她最初表现出来的冷漠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没完没了的唠叨。她喋喋不休，直到主人出现才住口。她最喜欢谈论的是有关穆涅卡夫人的事情；不管她把话题扯到哪里，最后总是会不自觉地把话题慢慢地绕回到穆涅卡夫人身上。

我问道：

“穆涅卡夫人同您一样高吗？”

女人大笑起来：

“我们刚搬到这里的时候，我得把所有的镜子都移到低处。我是倒霉透了，每天要弯腰照镜子。”

忽然之间，她的话题又跳回到了钢琴上：就好像她刚才离开了一个正在炖煮的锅，而现在又不得不回到炉灶前搅拌。她说：

“她为买钢琴这事儿可是悔得连肠子都青了。她那时候买钢琴是为了她当时的一个男朋友。他为她写了一首探戈舞曲，又以她的名字“穆涅卡”来命名那首曲子。然后，有一天晚上，他说要坐船去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想不想有人去送他。不过，穆涅卡执意要去，我就陪她去了港口。但他却迟迟未出现，直到船快出发的时候，他才匆匆赶到——手里挽着另一个女人的胳膊，两人一起飞快地跑上了舷梯。

盛甜品的盘子似乎再次摇摇欲坠，我赶紧伸出手去接。她看出了我的意图，让我不用担心。然而就在这时，门铃响了，她抓起盘子飞快跑向门口，然后便消失在了那片鹳鸟捕鱼的风景之中。

不久之后，我看到一片紫色的影子压在了门厅通往庭院的那扇门上，并听到了指甲不耐烦地敲击着玻璃的声响。大块头的女人打开了门，一个身材矮小的女人立刻走了进来，开始和大块头讲起有关屠夫的事情。我感到那个刚进门的女人斜着眼睛看向我，她的侧影展现在我的眼前。尽管她看起来上了年纪，但并不算难看。但我仍然记得当她缓缓地转过脸，和我正面面对视的那一刻心头涌起的感觉：那张脸是如此的狭窄，那一瞬间，我感到毛骨悚然：就好像我路过一排正面看上去还算体的房子，但当我走到它们的侧面的时候，却发现那些建筑没有进深：房子只有三面，除了正面之外，另外两面搭在一起，围成了一个尖角。几乎可以说，她的脸只存在于侧面：从正面看上去，她脸部的宽度勉强容得下两只眼睛，而眼睛却还是斜视的：左眼的目光正对前方，而右眼则望向右侧。为了弥补面部的狭窄，她梳了一个海角头，里面掺杂着各种颜色的头发：黑色，深浅不一的棕色，以及几缕脏兮兮的白色。在“海角”的最顶端，各色头发汇集在一起，扎起了一个小小的发髻。

她朝我走来，我们的目光在沉默中交汇。我们就这样对视着，直到她穿过庭院，走到我的这一侧。

“您是他们派来的钢琴家吧？请跟我来。”

她顶着头上的“海角”，带我走到了餐厅门口。她的头发梳得那样高，却只能勉强到达那只嘴里叼着鱼的鹳鸟脚爪所在的高度。当我们拉开大餐桌旁的椅子的时候，椅子脚划过地面发出的噪音犹如吼声一般在空中回响。

微弱的光线透进餐厅里，颜色暗淡的家具在其间若隐若现。在如许的昏暗之中，这间餐厅保存着一份独特的寂静。女主人的声音忽然响起，听起来仿佛是对这份寂静的亵渎：

“我家族，”她挪开了目光，我不知道该看向她的哪只眼睛，因为我不知道她正用哪只眼睛看着我，“我家族里所有的成员都很尊重音乐。我希望有人能每周到我家弹奏两次音乐。”

忽然，外面传来呼喊她的声音，原来是屠夫到了。她站起身的时候，晃了晃挂在胸前的一条金链子，那条链子很长，在她的胸口绕了几圈，尾端系在她腰带的左侧。餐具柜上竖着两只椭圆形的托盘，它们正对着外面的院子，收集了从院子透进餐厅的唯一一点光亮。餐具柜上挂着一幅画，上面画着的鱼儿也透着微白的光芒。我的手掌因为反复摩挲桌布，已经变得麻木，而桌布此刻已经变成了暗绿色。当女主人回到餐厅的时候，我准备切入正题。

“夫人想听什么类型的音乐？”

“音乐还分什么类型？就弹那种大家都喜欢听的、流行的音乐。”

“没有问题。我可以试试您的钢琴吗？”

“您早该这么做了。”

“请问钢琴在哪里？”

“就在您身后的那个角落里，您没看见吗？”

“抱歉夫人，我没有注意，因为光线太暗了。”

她把一盏脚灯挪到了放钢琴的角落里。在摸索插座的过程中，她绊了一下，嘟囔了几句。最后她找到了插座，脚灯的光芒照亮了那架泛着深樱桃色的小钢琴。试完钢琴之后，我又说了一声“没问题”。就在这时，我忽然冒出来一个疑问：

“您觉得两首曲子间隔多久比较合适？”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弹完一首曲子之后，您觉得要停多久才能接着弹下一首？还有……”

“喝一杯日式咖啡的时间。”

我最后又说了一句“没问题”，向女主人确定了上门弹奏的日期，便告辞了。

我第一次上门弹奏的那个下午，穆涅卡夫人一开始还是不在家。大块头的女管家把我带到了餐厅，开始和我聊天。大块头女人告诉我，她名叫菲洛梅纳，不过从孩提时期开始，大家都叫她多莉，名字的由来与她小时候流行的一部电影有关：电影里那个女主人公悲惨地跳海自杀了，她的名字就叫多莉。后来，据我观察，不管是菲洛梅纳还是穆涅卡夫人，她们都不知道其实“多莉”在英文中就是“小穆涅卡”^[1]的意思。而不知道为什么，我非常害怕为她俩捅破这层窗户纸。最后，多莉和我聊起穆涅卡夫人的一个兄弟。多莉说，穆涅卡夫人为她的兄弟谋得一份差事，还承诺说，如果他继续表现得“安分守己”，她就把自己位于普拉多区的一小处房产转到他的名下——那处房产就紧挨着她的避暑别墅。

她说说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我的一只手掌已经睡着了——此前，它一直在摩挲着旁边一把椅子上的压花皮革。

就在这时，穆涅卡夫人按响门铃，我赶紧把椅子挪到钢琴前，把琴谱放在琴谱架上，准备等她一进来就开始弹奏。穆涅卡夫人一进门，就把手伸到了腰带的左侧，拉出了那根大金链的尾端——原来那上面系着一块小小的怀表。链子和怀表的比例极不相称，看起来就像是用井绳拴着一只小狗那样怪异。她对我说：“您可以开始了。”然后在餐桌的一端坐下。不知为何，她的手不断地摩挲着桌布，就和当时的我一模一样。

我弹起一支探戈舞曲，然而就在曲子快要结束的时候，那个金发的大块头女人出现了，她提高了嗓门，企图盖过钢琴声：

“夫人，您把茶壶放在哪儿了？”

多莉的所作所为在穆涅卡夫人看来却有别的含义：她请人来家里弹奏音乐，还为此付钱，相当于她雇了一个剧团为她进行私人表演，是一件需要严肃对待的事情。然而，那个家伙却闯进来打断了演奏，破坏了这个家贵族式的庄严与优雅。于是，她站起身，生气地说：

“以后再不准像这样闯进来，大喊大叫地打断我的音乐！”

那个大块头女人转过身，正要离开。然而，就在这时，穆涅卡夫人却忽然大声叫住她：“多莉！”

大块头女人立刻回答道：

“穆涅卡夫人？”

“去沏马黛茶。水壶就在卫生间里。”

探戈舞曲已经弹奏完毕。我环视着餐厅里的家具，内心不断勾勒着那位医生的形象。这所房子的有些地方让我想起了那些被匆匆遗弃的圣墓，而那两个女人钻进了这座房子，亵渎了这里最神圣的回忆。餐具柜的最上方摆着一包已经开封的马黛茶。玻璃柜里的水晶杯被堆放得挤在一起，只为腾出空间塞下一瓶普通的餐酒。

多莉悄悄地把马黛茶端了出来，我在沉默中开始弹奏“忧伤圆舞曲”。穆涅卡夫人啜了一口马黛茶，望向屋外的庭院。她和餐具柜上的那两只托盘一样，只是静静地坐着，感受着从外透进来的一丝光亮。我并没有请求她为我打开脚灯。我凭着记忆，弹了几首曲子。在两首曲子的间隙里，我的思绪飘忽不定。穆涅卡夫人似乎并不在听音乐，她只是把马黛茶搁在桌子上，然后把一只手静静地放在了桌布上。

在之后的几次拜访中，主仆二人在我上门之前就把一切准备就绪了。在穆涅卡夫人喝完她的第一杯马黛茶时，我已经弹完了第一首探戈舞曲。她静静地坐着，而我则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

当我在穆涅卡夫人家里工作了一个多月的时候，马黛茶没有按时准备好的情况再次上演。那天下午，穆涅卡夫人的神色有些异常，她走到我的身边，让我和往常一样弹琴，不过她说这次会在另一个房间里听我弹奏。她又让多莉为她沏马黛茶，还告诉她茶壶就在卫生间里。当多莉回到餐厅的时候，穆涅卡夫人已经不在了。于是，多莉趁机告诉我说：

“就在两年前的今天，穆涅卡夫人目睹了自己的未婚夫挽着其他女人的胳膊登上了汽船，所以你最好小心点，别出什么岔子。”

多莉用“你”而非“您”称呼我，这让我觉得很恼火。我正要发作的时候，穆涅卡夫人走了进来。那天下午，她在餐厅反复出现，又反复消失，就像是晴天里忽然而至的阵雨。

几天之后，钢琴协会的人忽然把我叫去，协会的经理对我说：

“穆涅卡夫人要求我们给她换一位钢琴家。她说你的性格有点阴郁，弹的曲子也不够欢快。我是这么回答她的，我说：‘夫人，他是我们协会最好的钢琴家。’我还告诉她，你可以改变一些曲目，并用更加生动的方式演奏。”

听完经理的话，我感到心情沮丧。一想到要“用更生动的方式”弹钢琴，而且还要向多莉提出继续对我使用敬语的要求，我就一点也不想去穆涅卡夫人家弹琴了。然而，就在我走到餐厅的时候，碰见穆涅卡的兄弟来家里做客，意想不到的是，穆涅卡夫

人的兄弟恰好是我的一位熟人。他看到我之后，立刻站起身和我握手，并对我说：

“最近您过得如何，大师？我已经听说了，您的音乐会举办得非常成功，我还在报纸上看到了关于您的报道和您的照片。我在这里衷心地祝贺您。”

穆涅卡夫人开始左顾右盼，似乎她眼睛的缺陷让她天生具备了审视他人的能力。她发出了一声感叹，打断了我们的对话：

“什么？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和我提过您上过报纸！”

她的兄弟继续说道：

“怎么没说过！有一回我们两个上了同一份报纸，我们俩的照片中间就隔了一个专栏。就是我被任命为俱乐部秘书的那一次。”

这时候，穆涅卡夫人开口道：

“就是俱乐部的主席也对你表示祝贺的那一次。”她又说了一句：“跟我来。”

我低下头，看着那紫色的长裙穿过昏暗的餐厅向外飘去，而紧随其后的，是她兄弟的黑色裤子。

我开始回忆那间和穆涅卡的哥哥年轻时相识的咖啡厅——那个时候我受雇在咖啡厅弹琴。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大家都叫他“小蜘蛛”，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一直忍受着这个绰号，要知道，他的脾气可不好。现在，我打算把穿着紫色长裙的穆涅卡夫人纳入到她兄弟的故事里去。我对他的回忆可以追溯到多年之前，但穆涅卡夫人却在这个故事里姗姗来迟。尽管那个场合并不适合沉浸于自己的思绪，但我忍不住当场就在脑海里将小蜘蛛的妹妹加入他的故事，然后重塑我对他的回忆。在我看来，是她主动要加入这个故事的，这个举动就犹如强行挤上一辆满载的公交车。

我和“小蜘蛛”相识的那间咖啡馆位于一栋带有悬空阳台的大楼的底层。楼前的几棵大树掩映着咖啡馆的大门。任何想要进入咖啡馆的人都要和大门作一番斗争。门上有一个巨大的黑色门把手，看起来就像是一只裁缝用的熨斗。当人把手搭到门把上的时候，它不会向一个固定的方向转动，而是松松地左右旋转。这扇门似乎在嘲笑咖啡馆的每一位来客。如果有人要进来的时候，咖啡馆里恰好有人站在门玻璃前不远的位置——门上的玻璃上沾满了污垢，如果距离过远，就看不见外面的情形了——他很可能对来客做一个推门的手势，意思是：“进来！推门！”接着，如果来客推门的力气过猛，那么门就会发出“嘎吱”的抱怨声，但它到底还是会让人进来。不过，人刚一进咖啡馆，那扇门就会猛地弹回来，仿佛在报复刚才来人的粗鲁。

小灯投射出的昏暗光线和人们外套的颜色大都淹没在了咖啡馆缭绕的烟雾里，就连我们演出所在的舞台前面的那排柱子也被烟雾所笼罩。演出的有三个人：小提琴手，长笛手，还有我。舞台也似乎被那股烟雾托起，一直升到了靠近白色天花板的地方。我们几个就好像是天国的乐手，通过袅袅的烟云，将那似乎无人聆听的乐曲从天堂引入人间。就在我演奏完一首曲子的时候，人群的嘈杂声便扑面袭来——那是一种响亮而均匀的嘈杂声。冬日里，我们几个都昏昏欲睡。我们坐在舞台的栏杆旁，向周围张望，目光漫无目的地在各种事物上游走。偶尔，我们会把目光聚集在一群围坐在大理石桌前的宾客的头顶，看他们如何把咖啡端到嘴边——从我们的角度看，那一杯杯咖啡，就像是一个个的小黑点。咖啡馆里其中的一个服务生是个近视眼，他总是戴着一副镜片很厚的眼镜，到处走来走去。尽管他戴着眼镜，但找起东西来行动还是非常迟缓。他的鼻子充当着罗盘的作用，不断地左右煽动着鼻翼，直到指向目标，才会停下动作。他一手举着托盘，另一只手不断在人前比划。他离婚了，又结婚了，家里养着几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我们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仿佛在看一艘在岛屿之间穿梭航行的小汽船，看着它时而搁浅，时而弄错卸货的港口。这一切都发生在深夜。然而晚间表演和深夜的演出是不一样的。区别不仅仅在于人们知道一个是在晚间进行，而另一个则是在深夜进行，还在于两个时间段的观众不同，点的饮料不同。每到晚间演出的时候，咖啡馆楼上的政治俱乐部的成员会下来光顾咖啡馆，他们的人坐满了设在咖啡馆最里面的两张桌子。几乎俱乐部的所有成员都是小蜘蛛的朋友或是追随者，他们是来见他的。这些人坐在远离吧台的角落里，久久地观察着小蜘蛛，等着他调好鸡尾酒，他们才会前去和他交谈。每当这时，吧台上会亮起一盏很明亮的灯，而小蜘蛛的白背心、白衬衫和牙齿会在灯光下变得雪亮。与他身上的这些亮白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领结、眉毛、瞳孔和头发的颜色——它们都是纯粹的黑色。他脸上的皮肤是橄榄色的，这种颜色中和了他脸部突出的黑色与白色。他脸上的某些部位被刮得特别干净，尤其是眉毛上方的那一块——他的原生眉毛又粗又浓，为此他把眉毛特意修得和鞋带一般纤细。

在调酒的过程中，小蜘蛛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没有人知道他是何时拿起、又是何时放下一个瓶子的，也没有人能看清他的手在触碰到物品的那一瞬间，那个物品是如何作出顺从的反应的。他手边的那些瓶子、杯子、冰块和滤网似乎都是有生命的，并被赋予了完全的行动自由。即使它们没有立即遵照指示行事，也无伤大雅，因为它们清楚自己的职责所在，会适时地各归其位，各司其职。人们唯一能大饱眼福、观赏小蜘蛛调酒的具体动作的时刻，就是他卖力地摇晃着鸡尾酒调制器的时候。有几次，我路过咖啡馆最里面的那两张桌子的时候，听到有人发出感慨：“看得出，他是个有个性的人，不是吗？”

小蜘蛛知道每个时段最受欢迎的鸡尾酒是哪一种。因此，他会将最受欢迎的酒品一次性调制很多杯。每当他用调酒器将鸡尾酒摇匀之后，便借助手腕的力道将调酒器里的酒液一口气分倒进许多个杯子里，动作如行云流水，宛如天成；仿佛受到家族的召唤一般，每一滴液体都本能地落入了玻璃杯之中。在把调制好的第一种酒液倒入杯中之后——这些液体看起来属于黑色人种，他立刻就开始调配另一种液体——这一次属于白色人种，然后他用同样的方式将液体倒入杯中，为它们组成了新的家庭。紧接着，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到了：他拿起一只长柄的勺子，灵巧地划过那一排杯子，将每只杯子里的水滴家族都迅速地搅动了几下。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每只杯子都唱出了不同的音调，意外地组成了一段音乐。这就是我们每天唯一能期待的惊喜：这些看起来相似的杯子，在小蜘蛛的排列组合下，每天都能神秘地奏出不同的乐曲。

忽然之间，小蜘蛛披上了他那件修身的黑色外套，戴上了那顶边沿看起来如刀刃

样锋利硬朗的宽边帽。他转身绕到吧台的另一侧，咖啡馆的老板、同时也是小蜘蛛志同道合的朋友，会在那里给小蜘蛛递去一杯朗姆酒。小蜘蛛的政客朋友们已经离开了，他们将在俱乐部里等待他。有几次，当我目送那些政客离开的时候，忽然想起了一些关于小蜘蛛的旧事。他曾有过一个女朋友。有一次，那名女子请求小蜘蛛允许她去参加一个舞会，小蜘蛛拒绝了，但她最后还是去了。很快，小蜘蛛就得知了这一切。他断然地提出了分手，还在分手时说了很多冷酷的话，仿佛在女子脸上甩了几个响亮的耳光。有一天下午，女子来咖啡馆找他，但他派了一个服务生去把她打发走了。不久之后，就传出了那名女子服毒自杀的消息。

起初，他和我们几个的关系非常要好。不过，某天之后，他就开始疏远我们。我们演奏所在舞台的栏杆上挂着很多小彩灯，而他负责在我们演奏之前把彩灯点亮。有一次，小提琴手发现，每次小蜘蛛点亮彩灯的那一瞬间，恰好就是我们奏响开场曲的第一个和弦的时刻。于是，某一天晚上，我们决定和他开一个玩笑：我们几个同时奏响了某一个和弦，就在和弦声突兀地响起的那一霎那，彩灯也骤然亮起，这一景象吸引了在场客人的注意，他们纷纷鼓起掌来。然而，小蜘蛛在吧台后愤怒地来回踱起步来，好像下一刻就会暴跳如雷。从那天起，他不再和我们打招呼。不过，多年后——那时我已经不在咖啡馆弹钢琴了，我们在街上相遇，他咧开嘴朝我灿烂一笑，热情地与我打招呼。于是，我们再次成为了朋友。

那天下午，在昏暗的餐厅里，他也主动和我打了招呼。离开之前，他对我说：“您放心吧。您可以一直在这个家里安心工作。”

我松了一口气，不管怎么样，我的音乐会还是起了一点作用的。不过，我记得还有一件事困扰着我，但在那一刻我却怎么都想不起来。很快，我想起来了：多莉用“你”而非“您”称呼我。而就在我想起来的那一瞬间，她踮着脚尖跑了进来，朝我伸出手。无奈之下，我只能和她握了握手。就在这时，她开口对我说：

“祝贺你。”话音未落，她就一溜烟跑走了。

在接下来的几次演奏上，穆涅卡夫人又回到了餐厅里，一边听音乐一边安静地喝着马黛茶。而我则任由自己的思绪驰骋。

自从那日小蜘蛛帮我解围之后，我在这个家的地位有了提升。穆涅卡夫人很少会在弹奏的时候打扰我，她总是啜饮着手中的马黛茶，直到茶水变凉，才会慢慢抬起头，将那两道倾斜的目光定格在某处，仿佛在凝视着昔日的回忆。然而，在某一天傍晚，当我的弹奏接近尾声的时候，穆涅卡夫人的声音忽然划破了餐厅昏暗的上空。她开口的那一刻，我的思绪正停留在一个离她非常遥远的地方。她的话语击中了我，沉静的氛围忽然被打碎，我的脚猛然一动，用力地踢在了钢琴上；在共鸣箱发出的回音中，穆涅卡夫人沙哑的笑声骤然响起。她重复了一遍刚才的问题：

“您刚才弹的那支探戈曲叫什么名字？”

这首曲子名叫《你走了，哈哈哈》，我的第一反应是把曲名告诉她，不过我转念一想，她可能会觉得这个名字是在影射她那位和别的女人乘船跑了的情人。于是，我打开灯，准备直接把琴谱拿给她。她猜出了我的心思，阻止道：

“不必了，您直接把曲名告诉我就行。”

我用一种怪异的声音念出了曲名；她让我重复了一边，然后立马说道：

“老天啊，听起来像个狂欢节的名字！”

我不希望这个曲名勾起穆涅卡夫人的悲伤回忆。但是，我总是不自觉地被他人生命里戏剧化的经历所吸引。我一直希望我的音乐会能帮我实现一个愿望：让我结交更多的人，然后进入他们的家，窥探他们生活里的故事。

某天下午，我正在思考着关于发生在人们生命里的悲剧，忽然我发现餐厅里弥漫着烤乳猪的味道。于是，我对多莉说道：

“这乳猪的味道太难闻了！为什么不把它拿出去？真是可惜了这么优雅的餐厅……”

多莉恼火起来：

“难道乳猪不应该在餐厅出现吗？你难道想让我把它摆在客厅里吗？”

烤乳猪就摆放在不远处的餐具柜上。它被盛在一个蓝色的搪瓷盆里，上面盖着一块白色的餐布。多莉快步走出了餐厅，不过她很快就折返回来，对我说：

“我明白了，你也想分一块烤乳猪吃。”

我竭力为自己辩解，然而多莉却连珠炮似地朝我放话，想要盖过我的声音；她还试图抓住我的双手。我奋力躲开多莉的手，她却拼命想要抓住我，我们彼此间慌忙拉扯的姿势在空中留下道道剪影。四只手在挥舞中扇出了阵阵的风，扑在了我涨得通红的脸颊上。最后我把双手反剪到背后，不甘心地对多莉说道：

“听着，今晚十点，你到后街上来。到了后街上，你会看到一棵树，那棵树的枝叶非常繁茂，一直伸到厨房的窗口。我就不让你从前门进来了，因为我已经订婚了，不想这个时候传出什么闲言碎语。”

我想打断她的话，但她已经抓住了我的一只手。我粗鲁地甩下了她的手，正当我在反思自己的粗暴行为时，她继续解释着她的计划：

“你爬到树上去，然后十点钟的时候从厨房的窗口跳进来。我到时候会把乳猪准备好，除此之外还有一瓶红酒。我们可以好好放松一下。”

最后，我终于找到机会开口了：

“如果穆涅卡夫人知道了怎么办？您觉得我值得为了一块烤乳猪丢掉工作吗？”她吃惊地望向我。沉默片刻，她对我说：

“九点半的时候我会把熟睡的穆涅卡夫人扶上床，我甚至不用给她脱衣服，她就可以那样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

“怎么可能？她睡得那么沉吗？”

多莉放声大笑起来：她一屁股坐到了椅子上，踢掉了脚上的红鞋，然后把赤脚勾到了椅子腿上。她开口对我说：

“每次你一离开，她就开始喝红酒。吃晚餐的时候，她要就着红酒；吃甜点的时候，她也要就着红酒。等到她喝得酩酊大醉，我就把她弄上床。”

多莉注意到了我脸上的表情，语气变得激动起来：

“她反反复复地对我说，要规规矩矩做事；反复和我强调她的身份有多么尊贵；她

还一直告诫我，不要和她的访客套近乎，甚至不许我和她的兄弟搭话。然后，她就醉得像只猪了。”

我低下了头，她立刻问道：

“所以你究竟决定了没有？到底要不要来吃乳猪呢？”

我开始编造一些拙劣的借口，以此推脱；其中最愚蠢的借口莫过于我告诉她：我害怕从树上掉下来。她很快就明白了我的意思，把嘴撇到了一边，俯身穿上了鞋子。

临走的时候，她对我说：

“快滚吧，你这毛还没长齐的小东西。”

在那不久之后的一个下午，当我来到穆涅卡夫人的家门口时，多莉并没有出来接待我，取而代之的是一位长着络腮胡子的男仆——他穿着马甲，里面衬衣的袖子上布满了条纹。他把一封信交给了我：里面附有我的薪水，还有穆涅卡夫人的一封信，她通知我以后都不用去了。

在那之后，我无所事事地度过了一段时光。我甚至一度产生了某种荒唐的念头：我要爬到后街的那棵树上去看看多莉。

在一个夏天的早晨，我被一阵沮丧的情绪击中，过往的所有失败回忆都涌上了我的心头。音乐会的成功举办并没有让我变得富裕起来，也没有给我带来其他任何我所期望的东西。就连结交新的朋友、借此踏入陌生的家门这样的愿望也落了空。我唯一踏足的陌生空间是那间带有昏暗餐厅的房子；我在穆涅卡夫人醉酒的故事里捕捉到了一点悲剧的气息，而至于多莉，我觉得她的身上没有任何戏剧性可言。

有关这一切的思绪在我的脑海里缓慢发酵，我把双手背在身后，在普拉多的一条街道上散步。就在这时，我感到有人在我一只手的掌心里挠了挠。我转过身，多莉的脸庞浮现在我的眼前。她对我说：

“我看到你从我家门口经过，我就一路跟着你过来了。”

“什么？您不在穆涅卡夫人家里工作了？”

“你说那个老太婆？恐怕她这辈子都忘不了我。有一天下午，我对她说：‘您可以另请高明了，我明天就不干了。’她回答我说：‘我现在又怎么惹到你了？’”

“然后，我就对她说：‘您什么也没做，问题在于我，是我要结婚了……和您的兄弟。’我的话音刚落，她忽然浑身抽搐，口吐白沫；因为，就在那天的早晨，她刚把一套小房子转到她兄弟名下——就是我们现在住着的那套。”

我们一直在慢慢地踱步，但当她提到小蜘蛛的时候，我停下脚步，定定地看着她。她拉着我的一只手，说道：

“来我们家看看吧。这个时候，小蜘蛛一般都在工作。”

我挣脱了她的手，回答说：

“不了，改天吧。”

她勃然大怒，表情就和我拒绝爬树那天一样；她张开嘴对我说：

“滚吧，滚吧，你这可怜的钢琴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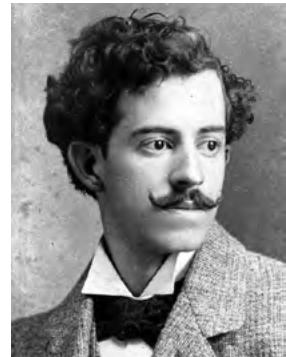
[1] 译者注：Dolly 在英文中有“玩具娃娃”的意思，而穆涅卡夫人名字中的“穆涅卡”在西语中是“muñeca”，也含有“玩具娃娃”的意思。作者在这里应该是暗指，主仆二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名字有相同的含义。

费利斯贝托·埃尔南德斯

二十世纪中叶乌拉圭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他的小说有着散文诗的特点，情节简单，节奏舒缓，用词松弛而慵懒。费利斯贝托·埃尔南德斯最初是以作曲和钢琴演奏开启艺术生涯的，后来，他的文学创作越来越受重视，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日益绽放出愈加璀璨的光芒，影响了科塔萨尔等众多后辈拉美作家。

译者：周好婕

西班牙语文学译者，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在读博士。主要译作有乌拉圭作家费利斯贝托·埃尔南德斯的短篇小说集《无人亮灯》、波多黎各作家路易斯内格龙的短篇小说《花园》《为了瓜亚玛》等。



故事群岛

威廉·特雷弗说，短篇小说是惊鸿一瞥的艺术。来吧，登上这个精选世界短篇小说的“故事群岛”，在惊鸿一瞥中，体味人生种种无奈、困顿、痛苦……



图片来自 [Thom Holmes](#) on Unsplash

小说

坠落的晕眩

玛丽·科斯特洛 | 故事群岛

他们都在走向死亡，她想，
我身边的男性都在走向死亡。

鲁思有一阵子没有想起她的前夫马特了。马特的哥哥保罗却在这时打电话来，说他死了。电话铃响时，鲁思正抱着埃米莉往小床上放。有一滴水落在了她的头上。她抬头，看见天花板上已有一片灰色的水渍，那形状让她想起多年前在科学书上看到的阿米巴虫。“马特被杀啦。”保罗说。

他用的是“被杀”这个词，有一瞬间鲁思仿佛看见他站在街上，子弹正朝他呼啸而来。“他是今天早上在约旦去世的。登山事故。”

他是跟朋友莫里斯一起去的。家里人都觉得应该告诉她这个消息。

“莫里斯也死了吗？”她有些不太习惯保罗的声音，很久没有听到了。她盯着地板，感觉自己正在慢慢蜷缩起来，感觉马特就站在她的身后，正转动一个把手，慢慢地把她折叠起来。

她站在卧室的窗边，一边倾听着埃米莉呼哧的喘息声，一边向外俯望花园。下午天色灰暗，十分寂静。在她以前住的那个房子里，马特修了一条碎石路，直通花园的小棚。如今，有时她晚上在楼上准备床铺的时候，还会时时听见马特在楼下活动的声音，同时吃惊地发现心里突然涌起一阵欣喜。接着，她就立即克制自己。那是戴维——是戴维在清理洗碗机、打开后门、把垃圾放出去。但是她听到的是马特的声音，马特在楼梯上的脚步声，他在夜间走动的声音。就仿佛马特跟着她一起来到了这段新的婚姻里；就仿佛他给这个新房子、这个新丈夫打上了自己的印记。

她与马特的婚姻持续了十年。他比她大，从一开始便准备好了要孩子。她那时并不想要孩子，不想要任何人分流他的爱或者改变她当时无以言喻的幸福。在所有其他的事情上，他们完全一致。几年后查理出生，她才发觉自己以前都错了——因爱生爱，真是如此。但是马特的感受并不相同——他感受被冷落了。他开始长时间地上班，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她妈妈告诉她，男人有了婴儿都是这样的，孩子长大就好了。

埃米莉的哮喘入冬后渐渐发展成为慢性的。每天夜里，她的呼哧声响彻全屋，鲁思或者戴维整个晚上都得时不时上楼去看看。尽管喘成这样，埃米莉却能睡个通宵，这个苍白柔顺的孩子。查理就很不一样，他是个很欢腾的男孩，很少睡觉，对屋子里的各种声音都超级敏感。他还不到一岁，她就得把闹钟从他的卧室里拿走。他十八个月大的时候，某个星期天他们一起开车到都柏林山脉里的一家饭店吃饭。查理追逐一切移动的物体。他把晚餐吐到自己的红毛衣上，挡住服务员的去路，围着桌子绕来转去，找来进餐的其他小孩玩。鲁思或者马特一次又一次地离席，悄悄把他领回来。饭后，马特结账，鲁思试图哄查理坐进他的小推车。接着，她的电话响了，是妹妹安吉从伦敦打来的。

她站在饭店的门廊里，看着他们穿过停车场。马特一手牵着查理的小手，一手推着童

车。时不时地，有一辆车在旁边的马路上飞驰而过。马特弯下腰整了整查理的鞋，她看见孩子后脑勺上的淡黄色卷发在风中飘扬。她离开门廊，朝着汽车走去。有什么东西不太一样，空气中凝滞或者悬浮着某样东西。安吉在电话里告诉她要有自己的生活。马特放开查理的手，他把童车折叠起来，打开后备厢。一阵大风吹过，一缕头发击中了她的脸，她扭过身，想听清楚安吉正在说什么。等她再转过身来，马特正在冲过停车场入口。一阵尖锐的刹车声。她眯了眯眼睛，看见那个红色的物体飞向空中。它落下来时，速度比上升时快得多，她看着它落下，居然荒谬地觉得很有美感。马特站在那个位置，她还以为他伸出手去就能终止这一坠落。

保罗在随后的一周里打了好几次电话，告诉她马特遗体运回的一些最新进展。“使馆的人正在努力呢。现在就是等着了。”他说。

“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岩壁很陡吗？”

“不是。才刚上了三个坡。他们才刚出发。他没站稳——又没系绳子和队友绑在一起。”她一直想象的是个很长的坠落过程，从几千英尺的高度，从令人眩目的白雪高坡。他一直对这些很着迷，难以抵抗那空旷的沉寂、山脉的神秘和它们的召唤。

“他去得很快，”保罗说，“肯定没有受苦。莫里斯今天找人把尸检报告从阿拉伯文译过来了……”他停顿了一下。“内伤……你想不想知道这些，鲁思？”

他的腿没有摔断——那双长长的、肌肉强健的腿还在，过去他睡觉时常常把双腿压在她肚子上，让她动弹不得。

“你去接他吗？”她问。

“不去。安娜觉得我应该去，不过莫里斯准备送他回来。我会去机场，和灵车一起开回西边。”

听到“灵车”二字，她把话筒紧紧地压在了耳朵上。她还以为他会一直活着，她再找他时总能轻松找到。她从未想过会是这样。她从未想过他会从那些古老的岩石上摔落下来。她从未预见过他会从天上掉下来。

“鲁思，”保罗说，“我知道你现在已经有了新生活，但是……”

“我去参加葬礼，”她说。接着，“有没有别人……女人，我是说。”

“没有。据我们所知没有。”

她又想起了什么。“会不会是因为心脏病突发？”

“不是。他的心脏很好。”

那个四月的早晨，就是保罗开车把他们送到公墓的。她和马特坐在后排，白色的棺材就放在他们俩的腿上。一小群送葬者正准备离开公墓。有一个妇人一眼看见那个白色的棺材，立即就抓住了身边人的胳膊。鲁思不停地扭头看他们。接着，神父开始祷告。她听见风中传来一声清脆的响声，扭过头，那里，一排又一排，是成百上千座一模一样的坟墓，每个都装饰着风铃、玩具和小饰品。有一瞬间，她的心飞扬了起来。她扭过身准备告诉马特，但是他正面向坟墓站着，被手里托着的棺材的重量压得摇摇欲坠。她妹妹正在朗诵一首诗，声音里开始出现哭腔。鲁思看见妈妈的鞋子陷进了泥里，接着看见弟弟吃惊的眼神。高墙外，汽车呼啸而过。突然，她很担心这些坟墓会裂开，就像红海一样从中劈开，将它们盛装的东西喷洒在那条繁忙的公路上。她闭上了眼睛，再睁开时，看见父亲正倚着一棵树站着。

第二天，他们自己开车穿过城市来到公墓。马特将手插在兜里，围着坟墓转来转去，仰头看着天空。她轻轻地摇着那些花束，把里面积攒的雨水倒出来。离开时，她伸手挽住了他的胳膊。第二天，他不愿意再跟她去。她求他也没有用。她开始独自去公墓。她很难想象查理躺在那地下，而当她能想象这一画面时她就害怕了。她强迫自己想些别的事情——正从她头顶天空飘过的云、童年时家附近的海滩上光滑的圆石头、那天早晨她父母在厨房里吃早餐的场景。

几个星期后的一天傍晚，马特来到厨房。她妈妈和妹妹刚刚离开，她正站在水池边洗杯子。

“对不起。”他说。

她转过身，看着他。“我只希望我们俩时不时地一起去那里。这个要求很过分吗？”

“不，我是说，发生了这件事，我很抱歉。对不起，我没有一直牵着他的手。”

她转向水池。“这不怪你。”

一个巨大的水泡在她的拇指根部形成。映照在其中的脸大大的，有些变形。不等这个水泡炸裂，她想，他就会离开厨房。

“我们俩都有错，”她接着说。“我们压根就不该要他。我一直就知道像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别人告诉她，慢慢地，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会挺过来的。是的，她想。马特会在某个傍晚回家，而她会从书本上抬起头来，接着他会给她讲一个工作上的笑话，有那么几分钟，他们会回到以前的状态，回到没有要他之前的状态。一开始他们不会说很多，但渐渐地，他们会开始提到他的名字。他们会活下去。

“他们应该去把他接回来，戴维说：“要是我是他兄弟，我就会去。他紧挨着她坐在沙发上，把电视频道调来调去。她昨晚整夜无眠，想着：“我们抛弃了你，马特，我们把你留在异乡，锁在那个冰冷的柜子里。”

“飞机几点到？”戴维问。

“从希思罗机场出发的最后一班爱尔兰航空飞机。”

他在电视屏幕上调出图文信息页，他们一起默默地浏览。

“正点 22:00，现在已经晚点 40 分钟了，”他说，“天啊，等他们到梅奥已经是凌晨了。”

他看向她：“我跟我妈妈说过了——我们明天早上可以把埃米莉送过去，出发时先拐过去。”

她皱了眉，摇头说：“你不需要去。”

“天啊，鲁思，你不是打算自己一个人去那里吧。”

“我没事的。求你了。”她不想让这个新生活、这个第二段生命的任何一部分接触她的第一段。“求你了。”她说。

“你干吗非要去呢？这么做有什么好处？”

他转过脸，感觉受了伤害。九点钟的新闻结束。天气预报开始了。第二天将会是干燥晴朗的一天，傍晚会有大雨从西向东发展。她盯着屏幕上的爱尔兰地图。在新挖的坟墓旁边，潮湿的梅奥泥土已经堆很高了。

“我去煮点茶。”戴维说。

他们坐在沙发上，喝茶吃饼干。戴维皱着魔似地，不停刷着航班的最新信息。终于，在23:48，它降落了。

“现在去睡吧。”他柔声说道。

查理死后的那一年，他们去梅奥海岸线上的一个小岛租了一所农舍。那是三月份，他们很晚才睡，醒来时涛声阵阵，卧室里洒满阳光。白天他们一起环岛漫步，翻过沙丘，进进出出那些小小的港湾，穿过那些原生态的迷你海滩，仿佛他们是最早踏足这些沙子的人类。他们离开小岛，去攀登克罗帕特里克山，云层分开时，他指给她看他们在克鲁湾的那个岛。那天傍晚，一个渔夫在码头上给他俩照了一张相。马特伸手搂着她的肩膀，她的头发被风吹得向后扬起。几分钟后，他脱掉衣服，顺着潮汐向海里游去。她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他，看着他的光胳膊在水里扬起又放下。她想起多年前有一次他带她去徒步旅行，横穿威克洛山脉。他们走了一整天，过溪流时他一直握着她的手。到达最高峰后，他站在她的身后，鼻息直扑她的脸颊，同时伸出一只胳膊，就仿佛整个风景、这整个山脉是他专门为她召唤出来的。就仿佛在说：“瞧啊，你或许有你的书可看，但是看看吧，看我能给你带来什么。”

她站在码头上，等着他游回来。那天夜里，在农舍里，伴着点亮的烛光和呢喃的无线电，他们一起慢慢地做晚饭，喝着葡萄酒，听着海浪击打岩石的声音。她好几个小时都没有想那孩子了。她闭上眼睛。“现在，我们挺过来了，”她想，“我们熬过来了。”

那天夜里埃米莉醒了，大哭不止。戴维把她抱到他们床上。水从天花板滴落到桶里。凌晨三点，正是夜深人静的时候。灵车正在向西开去，前灯在黑暗里划出一个通道。很快它就会拐过一个弯，克罗帕特里克山的巨大黑影就赫然耸立在前方。

“睡吧，”戴维轻声催促，“睡吧……明天这一切就都结束了。”

她听着每一滴水扑通落入桶中。她现在知道了，马特给她打上的印记是永久的。她迷糊睡去，做了一个梦。空旷的房子里电话铃不停回响，响了很长时间。她接起来，原来是马特，从国外打来的。电话里有电流干扰声，接着是哔哩哔哩的尖锐声音，就像莫尔斯电码。突然，他的声音传过来了。“猜猜谁死了？”他说。

白天天气一直很好。教堂里神父一遍又一遍地提到马特的名字。保罗读了一段《圣经》，一个小提琴手演奏了一段节奏缓慢的乐曲。在最前排的长椅上，马特的妈妈和姐妹们端坐着，一动不动。她们身后坐着保罗，他的背影看起来很像马特，他身旁坐着妻子安娜和他们的儿子，都是十来岁的大小孩子了。黎巴嫩香柏木的棺材放在三米开外。她能感觉到他那紧闭的眼睛正在凝视自己。这样突出其来的显灵开始令她眩晕。一束阳光从高窗射下来，正中神父的脑袋，有灰尘颗粒从那高举的圣饼上飘落下来。她侧了侧头，追着那缕倾斜的阳光。一件往事涌现心头，那一天——傍晚——正值秋天，查理去世十八个月了。仿佛受某种本能驱使，她出门散步，走在街上的时候太阳消失了。她感觉到有雨坠落在头上，却强迫自己前行，因为在那个时候每一个点滴的细小胜利都很重要。但是，雨滴越来越大，她转过身，匆忙赶回家。她在前门窗户附近站了一小会儿，向里张望。他正坐在沙发上打电话。她仅仅看见他的身影，便感觉好多了。接着，她用指尖轻轻敲了敲玻璃，想吓他一跳——噢不，是想给他一个惊喜，让他知道自己提前回来了。他却一下子跳了起来，惊慌地把电话扔回底座。她后退到草坪上，足底碾碎了一只蜗牛。

“你给谁打电话呢？”

“没人。我没给谁打电话。”她盯着他眼中的金斑，它们正在颤动不已。

他出门后，她按了重拨键。一个女人接了电话，“喂”，之后又是一声“喂”。背景声音里有孩子，有电视，或许是间厨房。鲁思挂了电话，重新再拨，电话那端的女人便沉默了。

还有一些其他的迹象也令她心跳加速。最终，她明白了他希望被她发现。他没有表示出任何歉意。而她，鲁思，则变得越来越疏远。他每天都能感觉到她沉默的指责——她用死气沉沉的眼睛指责他。好几个月过去了，她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她无法想象没有他的生活。接着，那个厨房里的女人开始打电话来，平静地指名要找他，于是鲁思离开了。

人群站了起来，有链子发出的轻微声响，一缕焚香飘向屋顶。棺材被推了出来，人们跟在后面步下山丘，来到墓地。所罗门的战车是用香柏木制成的吗？黎巴嫩香柏真会哭泣吗？她在脑海中回想他在城里的房子——桌子上的账单、水池里的碗盘、客厅里的自行车。她觉得他的死亡也将自己置于死地。她想象着死亡的阴影怎样在他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跟随着他，计算着时间。他早上起床，处理一天的事务，晚上躺下休息，这么过了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但是倒计时已经开始——他已经朝着那个时刻冲去，而她也正在冲向自己的那个时刻。

成群的海鸥在墓地上盘旋着、尖叫着。送葬的人们聚拢在一起。浪涛拍打着海岸，《玫瑰经》的吟诵声此起彼伏，将她包围起来。保罗站在敞开的坟墓的那一边，低着头，身侧各站着一个儿子。她想起了埃米莉，她在家里睡觉，胳膊和小小的拳头向上举起，放在头侧的枕头上。她想象着戴维夜里在地板上走来走去，将埃米莉火热的脸蛋紧贴在自己脸上，或者此刻他正坐在厨房里，望着窗外。她闭上了眼，她不该离开他们的。远处，教堂的钟声敲响，她抬起头，看见安娜的脸上泪水淋漓，觉得难以理解。她们的目光隔空相遇，胶着了一会儿。鲁思感到一阵软弱，她在安娜的脸上搜索了片刻，接着转向她身旁那个女人的脸，然后她慢慢地、漫不经心地看着人群中的那些女人，一张张脸看过去。她或许就在这儿，她想，那个厨房里开着电视的女人或许就在这儿。我可能早就认识她。我可能现在正和她一起向山下走去。她盯着一张又一张女人的脸。“是你吗？”她不出声地向坟墓对面发问，“还是你？抑或是你？”

接着，安娜身侧有什么动了。她儿子把胳膊放下来靠在身侧。鲁思转而凝视他的脸。次子，小保罗。她上次见他的时候，他还是个小孩子，最多七八岁。现在，他瘦瘦的脸上有

着十五六岁孩子特有的那种青涩面容，骨骼还没有完全发育定型。他还没长成呢，她想——她开始研究他的脸庞、眼睛和身体，从中寻找与马特的相似之处，想象一下这孩子将来长成之后的面貌体态。男孩直直地盯着前方。接着，他的眼皮快速颤动，翻了白眼，一片湿迹出现在他裤子前档部位，并顺着裤腿向下扩展。他沉重地摔倒在地上，脑袋磕着坟墓的边缘。保罗和安娜在他身旁跪下，神父的祷告结巴了一下停了下来。接着，男孩的四肢僵硬抽搐起来，整个身体都开始颤动。他的牙关紧咬，脸不停地捶打着泥土。保罗半站起来，向神父示意——让他放心，并请他继续。接着，他弯下腰，将一只手放在儿子抽搐的背上，等着。人群一片死寂，神父的声音几不可闻。男孩的身体震颤摇摆，鲁思站在那里动弹不得，被这危险的情境紧紧抓住，就仿佛有一根电线将她与男孩以及他那娇嫩紧绷的大脑联接起来，就仿佛那些走火的神经细胞在他的身体里流窜之后正在离开他，跨越他们之间的距离，降落到她的身上，而她也会被这场神经细胞的进攻击倒在地。

接着，风暴平息。震颤减轻了，他的四肢慢慢静止下来。鲁思屏住了呼吸。有那么几秒钟，天地无声，她感觉身体中有一部分变化了，变轻了，进入了一个新的维度。她模糊地感觉到马特就在身边。她看见那个男孩，像婴儿一样，躺在地上。他的成长被暂时中断，逻辑和记忆被暂时地抹去。在他娇弱的脑膜上留下了烧焦的痕迹。他睁开了眼，头抬了起来。保罗和安娜扶他起来。他站在那里，脸色苍白，神情茫然，复活了过来。人群向后退了退，他们三人像梦游一样地离开了，弯着腰，相互依靠在一起，宛如一人。送葬者们再次聚拢，神父继续祷告。在那远处的路边，她瞥见保罗打开了汽车门。她想象着他们三个坐在后座上，小保罗坐在中间，两边各有一只手伸过来抚摸他，再次把他拉回人间。现在，他的缺席令她愈发觉得孤单。神父吟诵着祈祷词，送葬者们比以往更加大声更加卖力地跟着吟诵，棺材向下放入坟墓。她看着它消失不见。她与那孩子的唯一联系现在也走了。“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音量之大，吓她一跳，“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终有一天，马特的痕迹也会消失无踪。土块落到棺材盖上，她抬头望天，突然间感觉失去了亲人。曾经，他们的眼泪为对方而流，他们的心为对方跳跃。在对方的沉默中，他们感受过欣喜，也体会过孤独。最终，他加速逃离悲伤的魔爪，逃离他那深不可测的自我。他曾经做过的那些事情，他的背叛，并不是不可原谅。她明白了，做一个伤害者，要比做被伤害的人，更加困难。

陌生人伸出手来拥抱她，强壮的手握住她的，逃无可逃。她祈愿天空会裂开，将这些送葬者赶回他们的汽车里去。她想逃离这块墓地，去往他们在海湾里的那个小岛，白天跑过长草，跑过沙丘，直至到达那处原始海滩和那些未来人迹的沙子。天黑后她就躺在那里。她会向着沙子轻呼他的名字。她会告诉他，没有什么付出能比得上第一次的付出，第一次付出的东西不能再被付出，第一次收获的东西也不能再被收获。她会告诉他，她以后再不会跟以前一样了，她的付出、她的收获、她的爱再也不会和以前一样了。正是在他身上，她第一次经历了所有的可能性、所有的美、所有凝聚的希望。现在，他走了，带走了某些东西，某些再也无法挽回的东西，而她却被留在这里，有了缺陷，不再完整。

傍晚，雨从大西洋上横扫过来。她离开了梅奥，在黑暗中开车东行。迎面驶来的车灯开始令她眩晕。她靠边停在路肩，凝视窗外。她将随处可见他坠落的身影。雨刷沉重地摇来晃去。他们都在走向死亡，她想，我身边的男性都在走向死亡。

她重新驶入车流。她不该来的。她不该聆听马特的回音，不该让他把自己召唤到这里，以这样的方式。她看着道路前方扑面而来的白色虚线，想象着汽车是爱尔兰地图上的一个小点，正在慢慢地爬过它的中心，而后方，被她甩得越来越远的，是梅奥、黑夜和大雨，雨水正在向下渗透，将泥土、石头和木头的纹理变潮染黑。

玛丽·科斯特洛

爱尔兰作家，生于爱尔兰西部戈尔韦市，现居都柏林。2012年出版首部短篇集《瓷器厂》，2014年出版的首部长篇小说《学院街》相继入围都柏林国际文学奖、科斯塔新人小说奖和欧盟文学奖，荣获爱尔兰年度小说奖。

译者：陈丽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爱尔兰研究中心副主任，著有《爱尔兰文艺复兴与民族身份塑造》《时间十字架上的玫瑰——20世纪爱尔兰大房子小说》，译有《图绘：女性主义和文化地理的相遇》。



《坠落的眩晕》（“This Falling Sickness”）

选自玛丽·科斯特洛短篇小说集 *The China Factory* (Stinging Fly Press, 2012)。

Copyright © Mary Costello 2012.

Reproduc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c/o Stinging Fly Press

故事群岛

威廉·特雷弗说，短篇小说是惊鸿一瞥的艺术。来吧，登上这个精选世界短篇小说的“故事群岛”，在惊鸿一瞥中，体味人生种种无奈、困顿、痛苦……



非虚构

蒲园记事之道听途说

伊险峰 | 长乐路百业指南

放心，我们都记着呢。

这一期有很多道听途说：不是二手消息，是行走在道和途的过程中，真正听到的看到的东西。

看挺有意思，就记下来。

大都在蒲园周边，所以还是蒲园记事名下。

大事或重要的事其实发生不少。6月头几天，市中心招人喜欢，喝酒的布满巨富长，吓坏了坚定的清零派，从此我们这里噩运连连。



01

“你胖了。”

我看到顺丰的吴彪期站在蒲园门口。我猜是他，他看起来和原来大不一样。我说你胖了。

“我胖了十公斤！两个月什么也不干，天天躺在床上。”他说。真的是他。

保洁阿姨胖出了双下巴。想着要给儿子上大学准备钱，上完大学还要结婚，她本来应该一周工作日每天给幼儿园做两顿饭，给四家做小时工，她还是一个考证爱好者，厨师证或者营养师证，理疗师证之类有很多。两个月之后，她胖了。

襄阳北路上开酒吧的小胡三月中旬成了无症状感染者，只带着一个手机连充电器都没有，就被送去了隔离医院。那时候上海不讲方舱。呆了十四天，出来之后浦东浦西隔

江而治了，他回不了浦东——如果通着的，他可以居家隔离，就只好住了黄码酒店，住七天还是十四天出来，要转到绿码酒店，他还是没有身份证，那时候倒是有了充电线，人家跟他说你要去派出所开个证明就行。于是小胡夜里十二点去派出所，街上除了野猫野狗只有成堆的垃圾，这世界完全不认识了。开了证明，住了绿码酒店，等待中就又是一个月过去了。他每天生活的范围就是床到洗手间，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吃难吃的盒饭，看手机。5月18日他终于放出来了。闭环在他的小酒馆里。他总结说，两个月，什么也没干，花了两万块钱，胖了10公斤。出来之后，他还是继续胖下去，我们说你保供了忙了不吃盒饭了，怎么还控制不住？

“我有厨师了，想吃啥就点啥。”

02

“你剪头了。”

5月29日，是居委会郑重其事研究出来的一个可以放风两小时的日子。居委会通知说了，各小区的时间要错峰出来，到时候安排。头一天，我看到居委会小胡，说明天约了剪头，你定下蒲园什么时间放出去了吗？他说没事，明天你随时都可以出去。剪头的地方在西北路。杨樱有一天路过那里，看有一个理发店居然在营业。加了微信，说可以约在二十九号。其实那时候满大街都是剪头的，但我觉得这很不太像样子，我要在正儿八经的地方剪头。

29日去的时候，半裸的理发师探头打了个招呼，然后就不见了。期间来了两个外卖，一一替他收下。看看了满地的头发，决定先在室外等。

半个多小时以后，理发师出现了。补穿了一件花衬衫，道歉说不好意思我在蒸馒头。他是海拉尔人，对面食有追求。剪头的时候请我品尝了他刚蒸好的馒头，我说你的馒头好，碱味儿尤其正。

问他，你们美发行业有复工证明吗？他说没有。我说没有的话，没有人管吗？他说有啊，前天来了市场管理的人，一直在这里等到最后一个剪头的人剪好，看着他关门。我说但你不还是在开吗？他说没事。不怕吊销你执照什么的？他看了看镜子里的我：“要不我也没有执照。”我喜欢他的人生观。

回到蒲园，每个人看到我都是：“出去过了？剪头了你。”

当第六个人这么说的时候，我开始反思过去两个月里我的蓬头垢面的形象是不是已经深入人心了。

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已经有二十几天了，我也喜欢盯着别人头发问，头发在哪里剪的，在朋友圈里看到有人聚会，头发看起来很利落，也要问，你们头发是怎么弄的，看着很整齐，是剪过了还是靠分泌头油？他们都很诚实，也乱，照片看着不错主要是发蜡或者摄影技巧。

弄堂里的人也有剪过头发的，那是豆爸的作品。豆爸是个台湾人，多才多艺，可以装灯泡，可以剪头发。还能跟我们炫耀他们台北市长得了新冠之后继续为民工作的事。我们礼貌地向他表示了祝贺和更谨慎的羡慕。

03

“我也没有办法……”

街道的人说全乱了，没办法……

但他们会花二百块钱一位请保安来限制你自由。他们跟你说话的时候，表达“我们都是老百姓，现在这情况没办法，忍一忍吧。不忍怎么样，能解决这事得有伟人……”

“你是伟人啊？”他上下打量着我，吃准了在座两千五百万人都算是垃圾，没有伟人。

还给街道打过一次电话，那次是晚上了，一位女士接的，她听起来很高兴，没准是吃到了瑞士卷。我说我是陕南居委会居民，你们这没完没了的测，今天半夜搞一个核酸，明天喊三天静默这种，你们到底在想什么，有没有一个准数。

她很高兴地说，就快了，就快了。那是五月十八日。我们已经锻炼出来了面对渣男的本能。任何人跟你说时间你都不要相信。我当然也不相信她说的“就快了”。

渣男的表现有两种，一种是婚前渣男，就是你说过两天来看我结果一等就是一年多那种。还有一种是婚后渣男，就是“我有什么办法，我还不是为这个家好”。我还不是为了清零。

04

“听说居委会不牛逼了。”

5月31日下午，宁波路一个烟纸店的爷叔走到大街上，很大声地说了这句话。

那天上海发布说，6月1日零时起，除中、高风险地区和封控区、管控区外，各区、各街镇及各居村委、业委会、物业公司等，“不得以任何理由限制居住本社区的居民出入”。

爷叔低估了权力只要没有被剥夺，他们就会想着反攻倒算。闭着眼睛也能想得出来，瞎忙了两个月的居委会不甘心被诋毁，不甘心被政府推卸责任到他们头上，而他们又不敢对欺负他们的市政府有不同意见，那就只能证明过去两个月里他们是对的。清零是对的，赶人去方舱是对的，配合疾控办的名单抓人是对的，与警察配合的所有动作都是对的，消杀是对的，物资发放好不好，那是工作能力和方法问题，工作方向和工作目标是对的，现在我要变本加厉地证明这些是对的。

那天我们还担心，那个逼着孕妇写保证书的居委会工作人员会不会被人打一闷棍，是不是还敢走夜路，那个扔了别人团购的蛋糕，说干得漂亮，还要干湿垃圾分类的志愿者会不会被人揪了头发，那个拿着喷壶斜倚在人家鞋柜上轻浮的警察是不是要被居民指出来，那个挺着大肚腩的要记录人家三代老警察是不是有了反思。

当然我们是幼稚了。那些黄浦区的红色棺材板子徐汇区的动物园绿网子静安区的白栏杆迅速布局。他们什么也不说，他们就表示，我们还在。像病毒一样顽强。他们用

另一种方式证明没有清零。病毒和他们。

05

“那你报警吧。”

冲破重重封锁阻挠，我们终于见到了我们当下可以找到的最大的官僚机构，居委会。这是我们诸多悖论中一个很小的悖论。我们反对无理由静默。那要跟居委会表达。我不想在电话里说，那我就要去居委会。去居委会就要先违反静默。我们的保安最有意思，他一直在主张我们住户应该去居委会去闹，为什么阴性阳性都不分就把人关起来。我请他打开锁的时候，他说我不能给你开门，得居委会同意。我对他的逻辑性和讲原则十分佩服。我说那应该你给居委会打电话，说有居民要求出门，他眼看要砸门了。我们保安在这一点上表现很优秀，果断地同意了。

保安接通电话，跟我说你跟他讲。我就跟居委会的人讲，我说我要去你们居委会，他说居委会现在没有人，昨天晚上大筛去了。我说那我会去街道。你得让师傅把门打开，要不我就砸了或者报警。他说你报警吧。我表现得像个人渣，我把电话还给保安，说好了，你开吧。保安就开了锁。

我出了门，掀翻第二道昨天夜里突然增加的白栏杆——后来我知道它们是有名字的，叫“铁马”——把它们推到一边。门外的特保来不及制止，但他训练有素，首先举起来手机，拍照或者视频。Professionals。

正确的说法可能是无师自通，而不是训练有素。他们大多是6月1日才招聘上岗，都是5月30日解封刚放出来的人，憋了两个月，生计无着，想着趁这几天挣个房租出来。这是大悖论。他们关了两个月，不是应该跟我此刻共情的吗？才不是。往往在这些终极悖论上，我无法理解人类和人性。

06

“你们去哪儿？”

四月中旬那会，短暂地可以出去走动的几天。在胶州路假肢厂那儿，一个穿蓝大褂的女人一边打电话，一边说了一句，你们干什么去，这好像是对我们说的。但那时候我还习惯路上有人就会突然跟你说话。没当回事，继续往前。

没多远，路边又出来一个穿蓝大褂的男人，这回我们看得清楚，他盯着我们问：你们做什么的？你们要去哪里？我说，你是谁？你管我去哪儿干什么？他还没有习惯于做一个自信的人，就愣了。隔几秒想好了，在背后喊，你怎么这么说话？我一边走一边回头说，别人从这里过，你凭什么问人家做什么？我还没问你为什么这么说话呢。

后来，你知道，他们的自信心不断增强，以至于我面对这样穿着一次性蓝大褂不明身份的人问我这种问题的时候，我都要踌躇一下。

居委会门口也围着铁马。我们跟相熟的小李小果店的小李爸爸和程女士聊天。他们旁边弄堂里的居民早上已经为不能出入抗争过一回了。110来了。无果。又走了。我们聊天。旁边站着蓝大褂特保。此时一位女士拎着豆浆和蛋饼，目不斜视，从围栏里走过。我旁边的特保突然对蛋饼女士大吼：“你从哪里来的？你怎么回事！”女士很不解地看他，说：“我住在这里”。特保一点不恼：“你是怎么出去的！封控不许出家门！”女士还是很冷静：“我就这样出去的呀，我去买早饭呀，早饭总要吃的。”

我在旁边说：“你是干吗的？人家走路，你为什么这么凶对人家？”“我是防疫的！”“你凭什么防疫啊？你防疫有什么依据？”“你凭什么问我依据啊？你谁啊？”我们俩头脑中各自的天线准确地捕捉到对方不友好的信息。“我要去居委会。”“你打电话。”“我不打电话。”“那你报警。”

这样的对话大概重复了5个来回，重复本身没有任何意义。

后面更狗血了。我们把打抱不平、我们要去居委会、你是哪儿来的防疫的、你们有什么理由限制一个街区自由、操你妈、你是傻逼、你才是傻逼之类组织在一起。要说我不具备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有的涵养和优雅的气质，没有表现出任何谈吐和文化上的优势，沦为四五十岁一男的，我的对手试图用这种评价方式来震慑我，我没想出它究竟有什么致命性。

最后我拉开铁马，走进了弄堂里的居委会。

07

“你们哪能来，哪能走啊”

陈书记确实很辛苦。说话有气无力。忙一夜了。我们讲了这种动辄两天的剥夺人身自由，是不妥当的。我们把在街道说的话又讲了一遍。我们还说以往政府甩锅给你们，你们应该知道政府急了什么都可以不要，过去两个月，他们抛弃了科学，抛弃了理性，抛弃了哈佛教育和复旦专业背景的防疫组织，抛弃了全球共识，抛弃了市场原则的分配，抛弃了言而有信的传统，抛弃了脸面，抛弃了前一天还说同向而行的人民，所以最后关口抛弃你们居委会也不是啥意外的事，你们现在应该谨慎一点，不要在被政府抛弃的时候，再被居民们厌弃，毕竟他们说你们是居民自治组织。

我们现场也应该没有这么势如破竹的排比，大意是这样吧。

对的，差不多就是这个时候我们还讲了枪口抬高一寸的道理。

我不认为陈书记十分了然这句话。虽然这句话最近被引用的比较多，但这句话大多是从枪口指着的那边的人说的，我还没见过一个拿枪的人说这样的话。这说起来是一件很丢脸面的事，很显然这其中有着本质不同。

而且陈书记这些天没有回过家，闭环忙很久，解封之后也不得消停，如果我是居委会的人，看网上到处都是批评我的，我除了初始的愤怒委屈，接下来的选择肯定是不听，远离这些信息，从本能上这么做都无可挑剔。所以，对面这人在说什么？什么枪口？就这么说吧。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有什么诉求，指望他们立刻把静安白的栏杆撤走，请

好的大蓝袍小哥再请走，不那么容易。这事街道同志们说得很明白，没用，除非你是毛主席。他说伟人。当伟人是一个单数的某个人的时候，那一般说都是指毛主席。我们说，像门口的穿蓝衣服的特保，不要对居民这么凶，这一点是应该能做到的。陈书记接受这个建议，但她还说这事是街道请的，他们能说上话，但不归居委会管。又说我们的小区不应该上锁，她也同意，并且说特意说不要上锁的。然后就抄起手机去安排。

然后，我们就想不出还有什么能解决的了。

我们临走还没有忘了问一句，怎么出去呢，理论上是不出不进的。这一点居委会的同志很有政策水平，还是那个有气无力的口吻，“你们哪能来，哪能走啊”。

08

“我在列文治呢。”

浪帅开始在定西路的一家酒店里隔离，我问他有什么吃的。他说不缺。我问要啤酒不，那时我有四罐札幌啤酒。他说要。叫了跑腿，送给他一根粗大的香肠，一根粗大的黄瓜，一根尖椒，四根胡萝卜，觉得这些看起来很东北大丰收，就又把半盒酱送给了他，看了看冰箱，又把一罐子花生米也给了他。那是4月14日，在第一个五天的浦西全域静默之后，又漫无目的地过了将近十天，大家终于意识到要搞吃的东西。

后来，隔几天问一下他是不是还在酒店里。一切是否正常。

到五月底，说是解封了。我想起来，问浪帅，你现在流浪到哪里了。

他说：“我在列文治呢。”

有人在四月下旬的时候不断被炸号，做了公民。有人到五月底的时候，已经在泰国了。在酒店里抱着手机过了俩月的小胡老板在研究马耳他。

有人研究泰国，有人研究新加坡，有人在新西兰想改开。

这位等待改开的是我们熟悉的成功人士。我想了一下，为什么他们宁可等改开，也不想想为什么改开最后会走到这样的死胡同里。大约是成功人士总是相信自己所向披靡的成功路径，这路径当然包括大环境的改开，这路径依赖决定了视野和格局。大大小小的刻舟求剑，其实无处不在，组成了我们的社会。最大的是“不管白猫黑猫”理论，最近的是“上次我清零了，这次我也一定要清零”，还有成功人士坐在船上等改开。

09

“请尽快到楼下采样。”

我从4月18日那天起总是听到马路对面传来扩音器里的声音：

“339弄的居民注意了，请尽快到楼下采样。封控楼的居民除外。”

那个男声相对年轻有力，有金属声，感觉至少穿越了六十年。

对面是徐汇区。长乐路339弄。4月徐汇区往所有管辖内居民门上贴封条的时候，我们因为在一街之隔的静安区，可以把安全感留在“对面也开始了”的惊恐微信里。

到6月5日，这声音还在，喊的还是一样的话，只是时间更久。多出来的是砸门声。时间更久是因为大家都不敢出来，担心被抓到大巴上被拉走。有遛狗的人回来，大白在盯梢，一直跟到家里来。这事儿想起来感觉特别猥琐。隔一天，在街头遇到坂本龙马，他发牢骚说他弟弟在家里遛狗被跟踪，我说原来是是你家的狗。

那天他竖了中指给穿大白服的警察。后来他不见了。

10

“想想核酸检用钱核算”

阿木灵只有半包烟了。我问他抽利群吗？他说他正好抽利群，我给他一包，又问他一天抽多少，他说抽一包半，我又给他拿了四包。那是4月19日。他很高兴，继续去批评西医内科没有血压计这事。那段时间他是我们小区的知识分子。

后来他做弄堂诗人。诗写得很不怎么样。比如5月3日那天他写了一首诗：

窗外桑果鹊欢吃得忙

我的冰箱蔬菜已断愁

起来忙叮咚敲咚响

可惜太早了还敲不响

只好干等叮咚班上来

疫情保障供讲法定权

忙得不采不理也无奈

一万消费不需十分光

当下化一百还抢着付

想想核酸检用钱核算

诗人与我面对同一棵桑树，我尝过此树上的桑葚，认为完全达得到上市水准。诗人用手写输入法，偶尔会有错字，比如“不睬”，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原谅的。诗人的风格比较粗犷，没有什么章法，但表达还是很清楚，比如在五月三日那天就提出了核酸检测的成本如何计算的问题。这是拜里弄知识分子深厚底蕴所赐。

后来阿木灵做弄堂美食家，比较成功。倒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美食，而是一直对甜兮兮的美食表示向往与热爱，在他的美食辞典中相继出现的有静安面包房、提拉米苏、炼乳、红宝石、奶油小方、豆沙小面包等等。

阿木灵败走麦城是有一天心血来潮艺高人胆大地在群里贴了自己一张和萨克斯风的合影。群里的女士看到照片纷纷觉得可以开音乐会了，阿木灵迫不得已只好声明：“我是音盲而已，只是好白相，买只玩玩而已！绝对不会演奏的！”还加上了“对不起！”这是弄堂音乐家末遂事件。

阿木灵的本行还是做知识分子，在做知识分子的时候输入法都有如神助，错字很少。在弄堂艺术家之前，5月24日他作为知识分子发表声明：

正告南京西路街道办事处！我长乐路570弄一直以来处于阴性防范区域！但封控至今足不出户已五十多天，你们可以对发放物资为所欲为，这是你们的权利！但你们也该懂得疫情期间的我们该保障的权益！今天是连续三天抗原核酸检测最后一天如果仍全部阴性！希望你们不能把大铁门锁上了！我不想为难可亲的居委更不想委屈志愿者的关心！而在此正告街道拿出锁门的红头文件！于法于情于理按文件执行！若无视无理我砸锁是正当的！

第二天我等着给他当下手，他并没有下来。但是6月1日解封他是真心高兴，在群里说：

明天国际儿童节，童心未泯！
明天蒲园清零日，谢志愿者！
一响谢XX！
二响谢辉哥暨夫人，
三响谢罗圣防控门。

罗圣防空门是我们异常铁面的保安老罗。这个比喻挺恰当。
第二天他真的弄响了电子爆竹。上下午各一回。

11

“咱出去走走。”

5月的一个早上倒垃圾，看走路常常舞手舞脚的保姆和老头儿从门口过。保姆说，“想他们了啊”。老头儿说，“有点儿”。保姆说，“过两天就好了，他们就能来看你啦。”老头看我出来，盯着我看，我想我不是你儿子。不要乱来。
不过老头儿眼睛看起来比腿脚要更利落一些。说话也不错。

又有一回在大门口遇到老头儿和保姆，我打招呼。老头儿看没有锁，跟保姆说，咱出去走走。保姆说，出去干啥。老头不响。然后就折回来了。

后来有人说，老先生住在7号号楼里，96岁了，本弄堂最长寿者。离休干部。
我每次见到他都要问老先生好。
有一次在弄堂大门口，我说：“老先生好！”
老头儿转向保姆：“他为什么可以出去！”
我说：“我只是拿个快递！”

12

“一个大西瓜，中间切一半……”

长期被关在一个小空间里，人会疯掉的。但更关键的还是时间久了不锻炼身体是不行的，第一个月在弄堂里走路的人还不少，第二个月就跟片场里的群演一样，形形色色的人走来走去。
再晚一点，人更放松，有人已经开始双手举着晾衣杆走，以前上班在泰兴路上总有一壮汉高举双手走路，感觉像是义和团进京赶考，也像在接收什么宇宙能量。有次我偷偷试一下，发现，这样走路还要动用一点核心肌肉群的，可能是一种正确的锻炼方式。
再后来，羽毛球、滑板之类的也都在，多才多艺台湾人豆爸开始教人练太极拳。“一个大西瓜，中间切一半，他一半，你一半”。

人命运迷离难以掌握时，各种口诀会跑出来。我看上海发布的读者评论里有一条：病毒退散！一个拿刀忍者emoji对着绿色病毒emoji，连发三遍。这就很义和团了。

13

“学问与经济，到此何所施”

想找闲书看，排解郁闷。翻出史景迁的《前朝梦忆》，没想到就像酒入愁肠，也看得惊心动魄。讲张岱遇改朝换代，前朝风光大族不再，生计几乎无着。有一段说起自己生活，“连夜挑粪灌溉，拯救枯萎的茄树、南瓜，或者嫉妒邻人桑树枝叶繁茂能养蚕”，张岱在园子里打转，环顾几乎枯槁的树，束手无策，只能自问：“学问与经济，到此何所施。”

然后又看到他颇有名气的墓志铭：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

你说在这两个月封闭之中，想聊怕是十年之前，不扰民，虽然与民争利从未断绝，但多少还有克制的羞耻之心，不一样真如隔世？

14

不说话的诸位

阳台上有几只猫，它们不怎么说话。最常来的是：
金爷。很温和很粘人的一个公猫。经常与大黑猫和坏耳朵大白吵架。吵架时整个弄堂不得消停。金爷跟我们的关系最好。他穿梭在哑巴家房顶和我们的阳台之间，自由。

暴躁小白。没有猫粮的时候，这只母猫会咩咩叫。给它倒猫粮的时候一定要万分小心，因为它一定会伸出左手来打你。它根本控制不了它自己。有一天夜里，我以为它是另一只小白，大意了，结果被它打在手上。这个时候才想到问题严重性——封城之下，没有地方打疫苗啊。要死了。用酒精湿巾消毒，喷外伤创可贴，然后天天盼着暴躁小白来，只要它不死，我就不会死。

小黄。暴躁小白的敌人。它们也是捉对吵架的。冬天它生了两个小崽，安可小白和绝情小白。小黄在生完它们后，母爱让人感动。我们给它小鱼干，它要叼起小鱼干，跃过阳台围栏，穿过围墙，跳过一个大门，飞奔过空调外机管子的长长的独木桥，给两只小猫吃。小黄母爱到有点魔怔，有两次明明没有小鱼干，只是一根小树枝，它端详半天，然后奋不顾身叼起小树枝，跃过阳台围栏，穿过围墙，跳过一个大门，飞奔过空调外机管子的长长的独木桥，去找它的小崽。小黄是一个称职母亲。能超越它的只有宽仔，那是一个伟大母亲的故事，在湖南路上，2020年12月30日死于一个降温的风雪夜。

坏耳朵大白。它的耳朵伤口长年不愈合，主要是成天抓。它是小黄的情人。安可小白和绝情小白的爸爸。没有什么其它可能，它们都是灰色小三角眼，两只眼睛跟电梯开门按钮一样标准。

绝情小白。6月2日那天，它在阳台花盆里生了五只小猫，当天死掉一只。第二天，6月3日早上看，剩下四只还好。但整个白天看绝情小白在对面的楼顶上逡巡，并没有过来喂奶，犹豫是否要干预，第二天早上再看就只剩下一只了。嘴里也已经生出密密的黑黑的生物，真是悲惨景象。那几天看《海鸟的哭泣》，讲北大西洋上的海鸟们爱情和生活，甚至还有伦理，它唯一的好处是让我们超脱一点，知道这东西叫自然界。因此，在6月4日正式有了名字叫绝情小白。

安可小白。小黄的另外一只幼崽，它和绝情小白是真正把办公室阳台当作自己家的小猫。在五只小猫都死掉之后，它们的妈妈绝情小白来得就少了，但安可小白依旧常来，感觉像是试图找到不见的小猫。

大黑。大黑对人始终保持警惕，很谨慎。但在猫界，它大受欢迎，几乎会跟所有母猫结伴而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花花公子。

还有几只猫，它们只是偶尔来。

15

6月7日黄昏散尽的时候，襄阳北路长乐路口站着一个熟悉的背影。抽烟。除此之外一动不动。

“梁先生？”我在他背后打招呼。

梁先生举着烟，闻声转过头来，他背后兵荒马乱：一群穿着大白的人从依维柯上卸黄色的铁马，拖着拉杆箱的人匆匆走过街头，闪着蓝红警灯的警车呼啸而过。一改往日下班时的嘈杂和欢快，此时心事重重的街头，显得梁先生的背影格外空旷和寂寥。他应该是做完核酸就站到这里了吧。

2个小时以前，居委会宣布全员核酸，来发核酸管的居委会干事小胡老老实实：肯定要封，不知道是2天，7天还是14天。

梁先生看着背着两个包，抱着一个简易猫砂盆的我：“侬要走啦？”

我说：“是的呀，说是可能14天。”

他没什么表情，脸又转过去看着十字路口：“弄不好了。上海这个样子。弄不好了。”他对面襄乐包子铺已经关门。包子铺隔壁，原本是梁先生阿爷经营的老虎灶，他出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小的时候从这里穿过半条襄阳路到现在是iAPM的环龙浴室去洗澡。这是梁先生长大的街区。将近60年过去，他一直说，这里变化不大的。

如今这兵荒马乱，他矗立其中，抽烟不响。

我在找一辆共享单车，可以把乱七八糟的杂物分一点上去。居委会主任电话里的声音还在耳边：“14天，还在等文书。你们不住在这里的人要走快点走。”

梁先生看着我刷开一辆车：“好走伐？”

“可以的。保重啊梁先生。”

“都保重。再会。”

“再会。”

题图来自视觉中国；插图作者：陆冉

伊险峰

出生于辽宁海丰张，满族。人生第一份工作是沈阳铁路局职员，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媒体，也写东西。

长乐路百业指南

我们打算用文字记录一个街区的即时生活状态，它像亚马逊森林一样，高密度兼容形态各异的人物。每天都像不可预知的探险，唯有时间不可阻挡。





凉山深处

非虚构

驯服与被驯服的： 在拉萨繁育藏獒

周雨霏 | 田野中国

“我爱藏獒，不像有些人那样天天讲些大道理，
我是通过实际行动。”

狐狸久久地凝望着小王子。

“请你……请你驯服我！”他说。

“没问题，”小王子回答说，“但我没有多少时间。我还有许多朋友要结识，还有很多事情要了解。”

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小王子》

不跟梅姐做爱，我就什么都没有了，我会失去一切所有的。我真不愿意丢掉这份工作。
我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习惯了这样的享受，我不在乎做小藏獒。

陈冠中《裸命》

我将狗写作（dog writing）视为女性主义理论的一支，反之亦然。

唐娜·哈拉维《伴生物种宣言》

01

我在拉萨的藏獒老板有两辆车。一辆丰田陆地巡洋舰，白色，用来接人。一辆金杯皮卡，也是白色，用来拉狗。

暂且叫他李总吧。我在李总的藏獒养殖场里做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藏獒经济。待久了之后，每次一见他开哪辆车来，我和工人们大概就知道他今天要办什么事，至少知道是要办人的事，还是狗的事。

这天，狗场上午的工作结束之后，他从皮卡换到丰田，准备进城跟朋友吃个午饭。出发前，他用抹布擦车玻璃。拉萨西郊开发区的灰特别大，人要戴口罩，车要经常擦。坐在副驾的嫂子回过头，问我：“小周，国外的街道肯定是一尘不染的吧？”

我说：“也不一定……”

嫂子和李总是四川同乡，小几岁，也是藏獒养殖方面的专家。李总说，她给藏獒配种的技术无人能比。别人配不上的，她能给配上。别人配上了怀不上的，她能让怀上。他负责推广销售，她负责饲养繁育。其实李总自己对饲养繁育也是亲力亲为，每天都到狗场检查工人工作，有时还亲自打扫狗圈，接生时整晚整晚地守在母狗身旁。因为夫妻俩的共同努力，他们的藏獒配成率、存活率和销量都很高。

那是 2018 年，十月，正值藏獒配种季。配种季持续整个秋季，不过每一条母狗能配

种的时间就那么几天。纯种藏獒一年只发情一次，“不像人，随时都在发情，”李总说。一年就那么一次，一次就几天，错过就再等一年。所以拉萨周边尚且活跃的几十家藏獒养殖场，最近都在紧锣密鼓地部署今年的繁育计划，热火朝天地给藏獒配种。今天上午，李总和嫂子刚配了三对，下午还要配两对。他们狗场有一百来条成犬，加上别的狗场拉过来委托配种的狗，让他们每天都忙个不停。嫂子换过了衣服。跟李总对车的选择一样，嫂子对服饰的选择透露出她每天要办的事。要下狗场干活时，她穿朴素的工装，沾染灰尘和狗的排泄物；要进城见人时，她穿整洁精致的时装，冬天多是貂皮大衣。十月的拉萨还不至于穿貂，今天她穿薄呢子大衣。

李总穿牛仔裤和皮夹克。擦完玻璃，他坐进车里，一边启动一边说：“拉萨必须要有灰。拉萨要是没得灰了，说明都开发完了，事情就不好做了。”

藏獒养殖只是李总在拉萨做的一件事情。另一件事情是房屋出租和拆迁。更准确地说，是等着他的出租屋拆迁。开车往返于机场、狗场和出租屋的路上，李总经常会大手一挥，向座上的客人们介绍：

“这个地方以前是我的狗场，拆了……那个地方以前是我的出租屋，拆了……这个地方，李克强来的时候，说要拆了修医院和学校……”

坐李总的车很有意思。你会发现，他脑中装载着一张独一无二的拉萨地图。他几乎

不识字，所以不认普通路牌，而是把拉萨所有的路都记在脑中，并标上自己的路牌。这些路牌包括但不限于：买过他狗的地方、要拆迁的地方、他开过狗场的地方……出租屋这片地，以前也是李总的狗场。那是 2010 年前后，拉萨藏獒的鼎盛时期，李总和嫂子一共有五家狗场，八千多个平方，一千多条狗。近两年藏獒走下坡路之后，狗场全拆了，修了出租屋，租给来拉萨打工的人，等着拆迁赔钱，据说是三年之内。现在这个狗场是去年重修的。

房子是临时的，布局潦草。人的生活也是临时的，房子里摆设粗略。大卡车一辆接一辆，从门前的 318 国道呼啸而过。流浪狗们在卷起的风沙里交头接耳。国道的另一侧，是光秃秃的拉萨河谷。河道裸露出河床。挖掘机一列又一列，开进河道，将河沙挖起，不知道要运去哪里，继续修什么房子。

车窗里，不时有人影往后闪过。是朝圣的人，骑行的人。他们用肉体抵御风沙，向拉萨的中心进发。同他们一样，要想进入拉萨，我们首先要穿过甚嚣尘上的开发区，然后经过空旷的“鬼城”柳梧新区，路过火车站、罗布林卡，然后终于进入拉萨更长久、更稳固的城关区。那里没有风沙，有很多绿化。但跟他们不同，我们的目的地不是石头做的布达拉宫或者大昭寺，而是天海路上的火锅店。

陆地巡洋舰驶上了车水马龙的天海路。天海路也属于老城区了，与布达拉宫直线距离一公里。这里跟开发区的氛围完全不同，但依然跟我以前想象的拉萨相距很远。要不是招牌上还写有藏文，你会以为自己回到了四川的某个汉地城市。天海路有很多火锅店，以及其他各种四川饭店、茶楼、棋牌室、洗脚房、美容院、按摩店、KTV。不止天海路，城关区的很多街道都是如此四川。每个在拉萨的四川人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告诉你，拉萨别称“小四川”，因为这里有很多很多四川人。来拉萨之前，我没想到自己的四川人身份会变得这么好用，让我在抵达两天后就结识了关键受访人李总，住进他的出租屋，然后住进他的狗场，成为他的藏獒养殖学徒。太方便了，可这毕竟跟我以前想象的拉萨相距很远。

这天中午，吃过汤锅肚包鸡，我忍不住告诉李总，下午我要放假半天。然后就奔去了八廓街，也就是围绕大昭寺的中转经道，拉萨最古老、最核心、游客最多的地段。我融入转经的人群，悄悄地暂时忘记四川或者小四川这回事。逛小店，吃小吃，挑选佛珠和藏服，努力把自己打扮得更像、更像一个藏族人，仿佛这样才对得起我的专业——人类学！穿上一件刚入手的潮牌藏服，我接到了李总的电话。说他们在天海路吃晚饭，叫我也去。我已经吃过晚饭了，但必须要坐他的车跟他们一起回郊区，于是就坐公交车来到他们所在的一家涮羊肉馆子。

进入包间，李总和几个四川老板朋友已经吃得差不多了。他们看见我居然穿了个藏服，很是新奇，说还挺好看哈。我有点骄傲，又有点不好意思。他们说一会儿去唱歌，问我去不去。我不去也无处可去，就说好。他们便一边打电话叫别的朋友，一边开车来到附近的一家很大的 KTV。是一栋几层高的、看起来很奢华、很“欧式”的楼，隐在一条小巷子的一个院子里。院墙上的霓虹灯，亮着五个红字：“西藏伊甸园”。



02

伊甸园门前很多车在排队，几个穿西装的男服务员迎来送往。我被其中一个领进一座很大很亮的豪华包间。不知为何，地上堆满了鼓鼓囊囊的彩色气球。我是第一个到的，找了个角落坐下。突然感觉藏服跟这个环境很不搭调，就脱掉了，露出里面灰色的套头毛衣。好像还是很不搭调。毛衣跟狗场，还有出租屋更搭调。没办法了，就这么穿着灰色毛衣，以及运动裤、运动鞋，坐在安静的大包间里。

老板们都去接朋友了。我起身去厕所。出了包间，在七拐八拐的过道里找厕所，发

现来往往好多人，好像都是在准备开展工作的服务员。进了女厕所，更是吓了一跳，挤满了人！全是在上厕所、排队、照镜子、叽叽喳喳讲四川话的女服务员。看她们那热火朝天的阵仗，仿佛这是今晚最后一次上厕所的机会。怎么会有很多服务员？这里得有多大？她们几乎全都穿着高跟鞋、丝袜和紧绷的短裙。让我更加感觉穿毛衣、运动裤、运动鞋的自己很不得体，甚至幼稚。我费劲拨开人群，找坑位，然后又费劲地摸索回包间的路。

终于，包间里陆陆续续来了七八个人。不必说，都是四川人。把气球踩爆，热热闹闹地相互介绍。基本上都是男老板。嫂子没来，和其他老板的嫂子们一起打麻将去了。聊着聊着，一个特别活跃、嗓门特别大的大叔大手一挥，大声一喊：“上菜！”老板们安静下来。门一开，走进来八个服务员。她们面向我们，整整齐齐、一动不动地站成一排，恬静地微笑，双手交握于身前。全都穿着白衬衣、紧身短裙、丝袜、高跟鞋，妆容精致。与其说服务员，似乎更像是办公室白领，或者空乘员。老板们嘻嘻哈哈地观察、评论、上前打量，开始挑选。挑出来一个留下了，其他的都出去了。又进来十个。这下我才有点明白她们提供什么服务。大嗓门大叔站在她们身边，手舞足蹈，像个活动司仪：“愿意结婚生子的，上前一步！”服务员们恬静地微笑，站着不动。

这时，大叔突然转向我大喊：“博士！你来选！”

我吓得赶紧摆手。

我其实是一个稍微有一点社恐的博士生，没有见过什么世面，突然置身此地，找不到恰当的体系来理解眼前的事。她们明明跟我一样，都是女性，都是二十多岁，甚至还都是四川人。可我坐在这里，她们站在那里。她们是我完全不理解的女性。

这么看了一会儿，竟突兀地想起我们狗场里有顾客来挑狗时的情景。不同的是，挑狗的客人比挑服务员的客人安静得多。他们在老板或工人的带领下，慢慢踱步于狗圈之间的通道中，用犀利的眼神打量每一条狗。喧哗的是被挑的狗。它们在圈里上蹿下跳，或狂吠或低吼，有的扑到铁门上，把门震得咣咣响；有的用牙齿咬住栏杆撕扯；有的气急败坏地咬起了同圈的另一条狗。没经验的顾客（通常是游客），这时早就吓得魂飞魄散，逃跑时还不忘用手捂住口鼻，以遮蔽狗腿蹬起的漫天灰尘、地上溅起来的屎尿以及狗嘴里喷出的唾沫。而有经验的顾客，则依然保持着镇定，与狗圈隔开一两米的距离，继续沉静地检视每条狗最细微的品相和步态。这时李总一定会在一旁扯着嗓子推销：“这条铁锈红，骨量大，结构特别好！你看这个爪子，你看这个步态，这个神态……这个黑虎，爸爸是我们西藏有名的天龙，妈妈特别凶……这条铁包金，牧区刚拉过来的，正宗的原生版，短毛型虎头，现在正流行的版型，尾型也是标准的菊花尾……”顾客侧过头听着，不发表任何意见。

压抑着狂跳的心，我一动不动地坐着，模仿一个不露声色的藏獒顾客。

大嗓门大叔吓唬过我之后，又转过去面对服务员们，仰头大喊：“我选胸部比我大的！”他的胸部一点也不大。服务员们继续微笑。

女服务员们接受挑选的过程中，来了一个男服务员。他谁也不看，以仪式般虔敬的态度，用开水把所有的杯子逐一涮了一遍。

二十分钟后，基本上每个男客人都挑了一位服务员，亲切地坐在一起。一位比较年轻的男客人没挑，他跟一位比较年轻的女客人组成了一对。还有一位比较年长的女领导没挑，但她热闹地起哄、开玩笑。令我舒了一口气但也不理解的是，李总没挑。他一直抿嘴笑着坐在我旁边，看着整个过程，时不时拍手大笑。别人叫他挑，他就摆手。有人叫我坐到另一个地方去，他就赶紧叮嘱我别走，走的话他们就要给他挑人。我也觉得还是挨着他坐比较好，于是我俩就那么坐着，成为全场唯二没有组对的人。他见我紧张的样子，就问我：“你们同学一起出去是不是都唱素歌？”我没有听过“素歌”这个词，但听到就懂了：“你看我像唱素歌的人吗……”

开始喝酒。我则开始一遍又一遍地拒绝劝酒。为了安全，不喝酒是我给自己的田野调查定下的纪律。最初他们都要怪我，做出生气的样子，我就更强硬地拒绝。果然几轮之后，他们不再理我，自己喝自己的。我终于放松下来，吃点瓜子和榨菜，观察四周，甚至开始在手机上写田野笔记。在逐渐高涨的气氛中，我获得了一种奇怪的自由。

一个看起来很和善的老板走过来，对我说：“你就充耳不闻，当没看见……但这也是你们人类学的实材……进入社会，就是要经历这些，你多学习。”我说好的好的，把这番话记了下来。

李总也不喝酒。真不知道他来这里干嘛，总不至于像我一样搞田野调查。他酒也不喝，也不组对，居然还掏出手机，在微信上卖起狗来。别的老板在大声地相互劝酒，跟自己的服务员搂抱、聊天；他在大声地回复顾客的问价，介绍狗的版型、谱系。我居然对他的工作热情产生了一丝共鸣。有时他收到文字信息，就伸过来叫我念给他听。我就努力洞穿喧哗，向他念出：“我很喜欢你的狗！能不能便宜一点？！”

喝了一会儿，十一点过了。终于开始唱歌了，我都快忘了这是一个KTV。灯光变暗，调出闪烁的效果。听老板们唱歌我才意识到，唱荤歌跟唱歌关系不大。他们乱唱一气，为的是与服务员打闹、跳舞，以及每首歌结束之后碰杯。碰杯时，我才发现包间里还有一个服务员，她没有跟任何人组对，但忙前忙后。主要是倒酒，以及每首歌唱完的时候，她要赶紧按暂停，以便大家起身碰杯。

而李总，真是来唱歌的。他叫我帮他点一首歌，是唯一一首我记得歌词的歌。从摇摇晃晃的人群里走出来，他清清嗓子，庄重地、抑扬顿挫地唱了一首陈星的《流浪歌》：“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亲爱的妈妈……”

这首歌像一个咒语，在这个跟流浪沾不上什么边的场合，召唤出了我年幼时在大街上听到它的记忆——它是许多行乞、卖艺之人会用大喇叭播放的歌曲。李总为什么要唱这首歌？有那么多的歌，为什么他只记得这首歌的歌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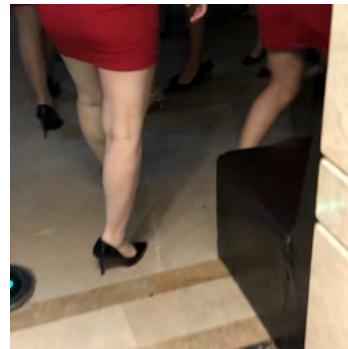
唱完一遍之后，李总不满意，又点了一遍。这次他把手机塞给我，叫我帮他拍视频。我蹲在包间中央的地上给他拍。拍了一条他还不满意，唱第二段的时候让我再拍一条，并对我拍摄手法做了一些指导。

专心致志地拍完之后，我环顾四周。一位穿西装、腰上别个对讲机的女士带着几位

同样穿西装的男士推开门进来敬酒，然后出去了。一位老板把一位服务员抱起来，扔在了另一位老板身上。大嗓门大叔则骑到他的服务员身上去了。服务员们皱着眉头，继续微笑。

而这边，李总突然把手机伸到我眼前，叫我看他拍的藏獒配种视频，今天下午刚配的。他看上去严肃而热情，跟平时向我介绍养殖产业时的样子并无二致。明显是觉得我下午玩儿去了，没有认认真真搞研究，错过了重要的研究实材，所以现在要给我补上。屏幕上，两条半人高的长毛狗臀部紧紧相对，静立在狗场中央的泥地上。毛太长，遮住了它们的眼睛，但没遮住它们一吐一吐的长舌头。脖子上都拴着铁链，末端由两个工人分别拉住。两个工人在上面交谈，两条狗在下面交配。李总的镜头上下左右挪动着，寻找最佳机位。我想象他蹲在两三米外，努力拍出两条狗宏伟的气势，就像他方才指导我蹲在两三米外拍他一样。

“拍照的时候，相机的位置一定要矮于公狗！才好看！”李总强调说。



03

藏獒是可以自己配种的。在藏族牧区，牧民们用来看护牲畜的护卫犬（羌巴犬），也就是汉语说的“藏獒”，会在发情季满山跑，相互吸引、相互寻觅。有时，一条母狗发情之后，会有数条公狗们一起尾随她，都想与其配种。但并非所有公狗都能配上。这不仅是因为公狗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还因为母狗自身有很大的决定权。她只会在合适的时间跟她中意的公狗配种。当她不喜欢的公狗靠近她，往她背上爬时，她随时可以一屁股坐在地上，让公狗无能为力。

只有少数牧民主人替自家母狗选择配偶。大多数牧区护卫犬自行配种。可在藏獒养殖场中，自行配种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乱配”有严重的后果，被视为工人的严重疏忽。每一年，每一条母狗要搭配哪一条公狗，都必须经过老板精心的设计和控制，为的是产生最优质的后代。

不仅控制谁配谁，还要控制怎么配。在养殖场给藏獒配种，至少是在李总的养殖场，需要四个人协同工作：

母狗被牵到空地中站好。两名工人扎稳马步，稳住母狗的上半身。李总走过来蹲下，稳住母狗的下半身，让她双腿分开，把她的尾巴偏向一边拉住，露出暗红色的外阴（称为“桃子”）。公狗从圈里放出来。通常牠会跑个一两圈，到处嗅一嗅，撒泡尿，然后直奔母狗冲过来，仔细嗅闻母狗的桃子，然后开始往母狗背上爬。爬的过程中，嫂子会迅速走过来蹲下，用鸡蛋清润滑公狗伸出的鲜红色阴茎（称为“雀雀儿”），并且帮扶其找准桃子的位置。雀雀儿进入桃子之后，她会紧紧抓住两条狗的臀部，让其紧扣在一起，这样可以保证公狗不管如何耸动，雀雀儿都不会掉出来。通常耸个十秒左右，公狗就会想要从母狗身上下来。这并不意味着配种结束了，因为公狗的雀雀儿在母狗的桃子中并不是一次性射精完成，而是首先会胀大，然后固定其中，接着再缓缓射精。这个固定的状态称为“连上了”或者“锁上了”。锁上之后，公狗的前腿会跨过母狗的一侧身体，落在地上，然后另一侧的后腿也随之跨过来。牠四脚着地、转过身去背对母狗，这样两条狗就可以反向站立，而臀部依然紧紧地扣在一起。公狗缓缓地持续射精，整个过程从几分钟到几十分钟不等。即便是锁上了，嫂子依然不能松懈，她继续紧紧抵住两条狗的臀部，让牠们保持紧扣姿势的时间长一点，等到她觉得把稳了，再放开。这是因为有时公狗没锁好就往下爬，雀雀儿就会掉出来。等到完全锁好、站好之后，就可以让两个工人一人牵一条狗的铁链，把牠们稳定在适合拍视频的站位。

在拉萨的养殖场里，成年藏獒的肩高几乎都不低于70公分，即便母狗也是。最高的公狗甚至逼近90公分。给这些巨兽配种会耗费相当的劳力。这还仅仅是在假设母狗都积极配合的条件下。很多时候，母狗不配合。虽然养殖户都会凭借经验，仔细地检查母狗发情的程度，估算母狗排卵的日期，只在最合适的那一两天安排配种，可很多母狗不愿意被安排。公狗往背上爬的时候，她们会试图挣脱，试图扭转头去咬公狗，甚至咬人，至少是夹住尾巴，往地上坐。工人的很多力气都被花在了稳定母狗上。在别的狗场，我见过一种比工人的蛮力更加便捷的“刑具”：养殖户们自制了配种架，把母狗绑在上面，任其如何挣扎都无法动弹。

即便如此，养殖户们依然称养殖场中的配种为“自然”的。视频中，李总对着两条相互锁住、同时也被铁链锁住的狗，向微信群友们宣告：“两条藏獒自然交配成功！”所谓“自然”，是相对于人工授精而言的。獒圈（藏獒爱好者的圈子）中有小部分獒友（藏獒爱好者）认为，人工授精可以降低配种的劳动成本，同时提高怀孕的几率和效率。几年前藏獒热的巅峰时期，人工授精还可以为知名种公的主人牟取更多配种费，因为一精可以多用。同一条公狗一次射精产生的精液，可以分成多份，注入多条母狗。

精液冷冻之后，还可以长期储存、长途运输。

我只看过一次人工授精，在别的狗场。那位老板先用类似“自然”配种的方法，让公狗爬一条母狗，但不允许牠插入。爬得差不多了，就把牠拖下来，给牠手淫，让牠射精在一根试管中。然后再把精液导入一根粗的注射器，用注射器把精液推入别的母狗的桃子。

李总给狗配种从来不采取人工授精，因为他不相信人工授精，只相信自己的技术，相信他八年来不断摸索、积累的经验。在他的狗场做田野调查，我想要学会并用人类学视角去理解的关键，就是这一套囊括配种、接生、养育、治疗在内的繁育技术。学习了几个月，几乎所有的步骤我都实践过了，但一直没有亲自尝试配种。李总不让，我也不敢，因为给藏獒配种实在是很累，技术难度很大，而且非常危险。被惹怒的公狗母狗可能会突然咬你一口。

所以在配种的场景中，我一直都只是一个旁观者，只在少数时候帮忙拉过一下狗链。其他时候我都站在两三米外观察，在手机上不停地记笔记，同今晚的工作方式一样。在李总狗场里的十个月，我总共看过 116 次配种，视频更是不计其数。今天上午也刚看过。可是此时此刻，我不得不埋怨李总，为什么偏偏要在这个场合给我看配种视频？身边的人类肢体交错，与屏幕上的犬类肢体交错，交错在了一起。掩饰着窘迫，我不知道该看向哪里。

李总却熟视无睹，泰然自若。给我放完、讲解完视频之后，我们继续安静地坐了一会儿。突然他对我说：

“拉萨的小姐百分之八十是四川的。丢人得很。她们坐台六百，出台两千。一个月收入万把块钱的人，在歌舞厅玩一晚上就把钱花光了。社会复杂得很，乱得很。唱到四五点不会累。我以前也是开歌舞厅的，我和你嫂子九五年就开歌舞厅了。”

我震惊地看向他。

他继续若无其事地说：“一开始是素的。后来也有小姐。一共三年半。做这个生意倒霉得很，因为拿女人的身子卖钱。我再也不做这个了。所以现在嫂子也看我看得紧得很。老男人了，想法多得很。”



04

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亲爱的妈妈
流浪的脚步走遍天下，没有一个家
冬天的风啊夹着雪花，把我的泪吹下
走啊走，走啊走，走过了多少年华
身边的小草正在发芽，又是一个春夏
陈星《流浪歌》

“我和你嫂子在老家开歌舞厅，亏了二十几万。那时候，二十几万吓人。乡下修房子又花了二十万，相当于现在的两百万。两口子拿着五千块，打算出门闯荡。

“有个朋友是工商局局长。他问我是不是不相信风水？我说不相信。局长说，那你这么勤快的人，怎么会找不到钱？就请人算了八字，给我改了名字，还叫我‘去西方’。

“去了西方，你这辈子大富大贵。”

“就去了缅甸。后来想起来，其实缅甸算是南方。你嫂子在百家乐当大堂经理，我做二手车。哪知道买了一辆从赌场偷出来的车。那时用掌中宝手机，一个老乡打来电话问，你是不是买了一辆车？很严重，赶快走，出问题了。

“我当时刚买了两个商铺，很大，还没有任何证件。还买了五辆车，桑塔纳时代超人。一接到这个电话，我手机卡都扔了，充电器都没带，就走了。结果边境证过期了，海关很严，出不去。幸好有个老乡在中国边境那边开餐饮，跟边境的人熟。他过桥送外卖过来，我们装成他的员工，这么回了国。

“然后跑到西双版纳，住了一个月。我从家里出去的时候，别人都说儿子不孝，没挣到钱就不要回去。就没面子回去。换了几张手机卡，那时候电视看得多，心想这样就不会被追踪。其实我们卖车完全是合法的！还想过去老挝，但宾馆里的老乡跟我说，老挝更吓人，杀人的事情更多，才没去。

“我们在缅甸的时候，看到过犯人游街。先把他们的耳朵割了，然后枪毙。那才叫残忍！刀太钝了，半天割不下来。你嫂子不敢看，我去看了的。

“后来就联系到了拉萨的老乡。他说快过来拉萨，这边发展可以。我们两口子就来了拉萨，到现在已经十一年了。一开始做家电，做了三年。有一天，我看到别人家一个小狗，黑不拉几的。一问价钱，一万多，心想怎么这么贵。戴了个红脖圈，说是藏獒。那时我听都没听说过藏獒。在我们老家，小狼狗卖三四百就很好了。过了几天，又遇到一个抱狗的人，也是藏獒，卖五六千。我觉得这条可以，就花四千买了。

那是我买的第一条藏獒。

“然后就开始到别人的狗场打工，学养狗。积累到经验之后，就自己开狗场，开始到牧区去找狗，主要是措美、措那县（西藏山南地区）。古堆乡的狗是最好的。为了找狗，我们把那里牧区都翻遍了。

“拉萨才是西方。我一到拉萨，运气就变得非常好。任何狗都是一下就卖掉了。而且刚修狗场，就遇到拆迁赔钱。我的狗狗给我带来好多财富哦！去年我爸爸去世，一百多桌酒席都摆不够。不是我们李氏家族最富的，但绝对可以写一本书。

“也遇到过困难。我们现在的这个村有个村霸，非要我买他的沙子，不买就要开十几辆大货车来揍我。我的警察朋友跟我说，只要他们一动你，就马上倒下，我们就马上来把他们踢走。后来他们真的开了挖掘机来挖我的房子，说我占了村委会的地。那地明明是我买的！他非说我多占了两三米，必须挖掉。当时我就拿个砖头，坐在那挖掘机上面。他没敢动我。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每天在我们家吃饭的那个，我的表弟，你知道吧，他其实是我的保镖。

“但我跟其他男的不一样。他们喜欢打来打去，我从小就喜欢小动物，就喜欢扯点草草喂兔子。十一二岁的时候，我就找小土狗来卖。结果晚上放在家里不停地叫，就被家人掏（骂）。第二天把狗卖了，一角钱一条，最贵的一条卖了两角。

“藏獒跟其他狗真的不一样。小周，这个你一定要写进去：我爱藏獒，不像有些人那样天天讲些大道理，我是通过实际行动。有时你嫂子不支持我买狗，我就偷着背着去买。我经常对我的朋友说：你们是闻了狗味吃不下饭，我是不闻狗味吃不下饭。

“三四年前，我是个很坏的人。每天睡到十一点自然醒，下午就到拉萨城里鬼混，凌晨三四点才回家。狗有工人和你嫂子管着，我完全不管。你嫂子抱怨得很多。现在我改邪归正了。

“然后藏獒就走下坡路了。我们把狗全都卖了，两年没养狗。每天就是闲到起，就是耍，又是睡到十一点自然醒。中午请客吃饭，晚上请客吃饭。下午一场牌，晚上一场牌。你嫂子喜欢这样的生活，可能也是年纪大了，累了。但是我不喜欢，我喜欢进取。所以我去年我又开始养狗了。

“以后我打算在拉萨买两个商铺。现在狗场这个地方据说七年后要拆，到时候我把狗场往后移一点，路边上再修出租房。现在的奋斗，都是在为后代积累财富，让他们不用太担心钱的问题。

“等这些房子拆完，就回四川了。在老家养几条藏獒，养起耍。挖个鱼塘，再修个练歌房，朋友过来就一起钓鱼、唱歌。”

05

看来李总是真的很喜欢唱歌。但今晚他只唱了一首歌，然后一直跟我聊天。他的生故事我前后听过多次。多次之后，逐渐拼凑出完整的形状。但这是我第一次听他讲歌舞厅的事。为什么拿“女人的身子”卖钱倒霉，而“狗狗”就带来好多财富？我沉浸其中，体会叙事的逻辑。周遭的喧哗短暂地退散了，直到大嗓门大叔拎着一个提包推门进来。

他从提包中取出一摞粉色钞票，递给一位服务员，让她分给其他人。服务员们簇拥上去。我看到一位服务员眉飞色舞地数她的那几张钞票，数完之后拉开前襟、塞进内衣，大张手臂跟她的老板抱在了一起。

我再次收回视线，移到一个空白的角落盯着看了会儿。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来这样的场合，没有相应的准备，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眼神去看她们，更想不到任何办法把看到的东西整合进我的论文。我只知道下一次唱歌，我肯定不会来了。我应该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少到拉萨来，在养殖场里好好学养狗。比如，我应该更勇敢一点，主动参与配种的工作。

其实有些时候，在养殖场里给藏獒配种，也不都是强迫、被动的，因为也存在非常积极的母狗。如果安排她们在最适合的时间，跟她们中意的公狗配种，她们一点都不会反抗，甚至不需要工人的强压，因为她们会自己大张开四条腿，坚定地、稳稳地站在地面上，尾巴偏向一边，露出桃子，等着公狗过来。有时，她们因为疼痛而嗷嗷大叫，甚至在地上打滚，但依然会坚持到最后。

甚至，有时公狗还没准备好、茫然四顾的时候，她们会转过身来吸引和引导公狗进入状态。

李总给一条叫天霸的公狗配种时，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天霸是我们狗场的明星种公，因为牠的体型非常大，毛很长，而且皮子非常吊。吊就是松弛而下垂的意思。獒圈讲究藏獒品相上的“三吊”：吊嘴、吊眼、吊膀胱。天霸的三吊都很极致。李总非常重视天霸的配种，期待牠今年的后代能够在体型和品相上，继承、超越天霸。

李总已经把高大壮硕的天霸牵出了狗圈。为天霸选定的那条母狗也牵了过来。这是一条刚刚成年的红母狗，没有名字。这是她第一次配种。今天是她最容易怀孕的一天。李总用手把她双腿分开，尾巴偏开，轻轻抠她的桃子，工人在前面抵住母狗的头。母狗站立不动。天霸在空地里慢慢走了两圈，闻了闻母狗的桃子，然后竟趴了地上。“天霸！怎么睡瞌睡了，日你妈的。装什么斯文，快上来！给我说这个婆娘可以，你怎么不相信！”

天霸还是趴在地上。李总把母狗牵开，这时天霸突然站了起来。“是不是要爬了？”赶紧把母狗牵回来。结果天霸上前闻了闻母狗桃子，又坐下了。

等了几分钟，天霸还是不起来。李总想到个办法，和工人一起把母狗抱进了天霸的圈，果然天霸跟着我们进来了。

“你是不是在外面害怕嘛？一直装处，他妈的！”

回到圈里的天霸看起来状态积极一些了，又去闻母狗的桃子。

“你在这儿头才愿意配呢？你才是喜剧！”

李总让工人给母狗拴上铁链。母狗不愿意，想挣脱。“你还怕链子吗？”李总正想给母狗取掉铁链，这时天霸又过来闻了起来。李总赶紧叫工人抵住母狗的头，他则蹲下扶住母狗的臀部。天霸抬起右上肢，又放下了。然后又抬起，准备往上爬。终于

爬上了天。天霸开始耸，母狗嘘嘘地叫。李总叫两个工人一起用力把天霸往前推。耸了两下，天霸不动了。李总纳闷了：“我咋觉得这公狗不耸呢？要配不配的。”但母狗惨叫了两声，说明天霸确实有在耸。工人们于是慢慢把天霸前腿放到了地上。结果刚一放下，两条狗就分开了。

“怎么没锁上呢？”

“掉出来了。”

母狗还在继续挣扎，跳到了一边。李总摸摸她的头，牵住她对天霸说：“快来！你婆娘跑这里来了！”

虽然母狗刚才挣扎了一下，可是现在又乖乖地站稳了，回过头看天霸。天霸呆了一会儿，又走过来闻母狗。母狗挣扎，李总把她固定住，双腿分开。母狗又站定不动了。天霸闻了闻，又坐下了。

“快点儿来。这个婆娘可以！小妹妹这是！”可天霸已经躺平在地上，好像完全失去了兴趣。

李总又气又想笑：“老子！”

公狗不愿意配种的情况少之又少，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冲上来就配了。母狗不愿意的话，可以强压。可如果公狗不愿意，又有办法呢？

李总抓起母狗的尾巴，去抚天霸的大吊脸。天霸还是躺着。即便躺着，天霸的品相都是那么好。李总由衷地赞叹：“今年天霸真大啊！”摸摸牠的大爪子，欣赏起来，好像暂时忘了是在配种。突然又反应起来，赶紧喊道：

“快过来！”

同时把母狗臀部推向天霸，抬头对嫂子说：“没问题吧？上回让天霸配另一个母狗，爬了三下就配起了。”

然而这回确实没那么顺利。天霸又起来闻了闻母狗，试着爬了爬，然后又躺下了，如此反复数次。我有点厌倦了，在手机上机械地标记着天霸躺下又站起来的次数。母狗一直被工人们抓住，好像也有点厌倦，挣扎了一下。李总干脆叫工人把母狗放开，牵着铁链的末端，把她推到天霸面前。

母狗走向天霸之后，一个掉头，突然和天霸肩并肩站在了一起，还主动去闻天霸的头。李总顺势把天霸的耳朵翻起来，让母狗闻。

“快來呀天霸！哎就怕配不起，焦人得很。”

天霸也掉了个头，又闻了闻母狗桃子。嫂子也走过来戳戳母狗桃子，把尾巴偏开，腿分开。母狗很配合。天霸继续闻着。

李总又情不自禁地欣赏起来：“哎，放在六七年前，天霸好管钱哦！那么大的狗儿！那时候哪有这么大的狗？我都没见过。”再一次，天霸闻够了母狗，走到墙边上坐着，还回过头看这边厢的我们。

“哎呀！你这样子光看，是看不出儿来的。快爬！”

要是换成一条小一点的种公，工人还能把牠抱着放在母狗背上。可天霸实在太大了，根本抱不动。

李总再次把母狗推到公狗面前。“天霸你看！母狗来亲你了！快起来！”母狗和天霸又相互闻脸，但依然没有下一步动作。

“哎呀天霸！你丢不丢人嘛！”

李总走上前去，直接把母狗抱起来放到了天霸背上，开玩笑似地说：“来！你爬牠！”天霸回头看，还是坐着。李总干脆把母狗的铁链完全取下来，让她在圈里自由走动。天霸一见母狗朝自己走过来，赶紧站起来，和母狗转着圈地相互闻臀部。两条狗都摇着尾巴，都比刚才兴奋了许多。天霸走开，母狗就跟在后面闻。她还去闻了闻公狗撒在地上的尿，然后自己在那里也撒了尿。

李总掏出手机开始拍视频：“（普通话）各位朋友好，今天是X月X号，你看我们这只红色的丫头，这只天霸，准备自然交配。（四川话）天霸！”

两狗又相互闻了闻。这时，令我、工人们和李总都很惊奇的一幕发生了：母狗上半身直立了起来，主动把前肢搭在了天霸背上。

李总像给母狗配音似地说：“（四川话）来嘛！你不来的话，我来了哟！你妈的哟，好气哟！天霸！你真是，让美女来爬，太丢狗了！不是丢人，是丢狗！哈哈哈……天霸！你看这个美女要爬你！你还是要主动一点嘛！”

“（普通话）各位朋友好，这是我们十个月的母犬，两百四十斤的天霸，准备自然交配。今天是X月X号上午十一点。

“（四川话）天霸！（转过来对我们说）你看这个母狗都晓得爬了！”

试了一次没用，母狗落回地面上，走了两圈。然后她又站了起来，上半身再次搭在天霸背上。

狗没有表情，或者说没有人的那种面部表情。母狗的面部没有任何变化。可我发现，就连我也在情不自禁地给她填充内心独白，体会着她的主动，感应着她想对这条疲软的公狗传递的信息。

06

在汉语、英语和藏语中，“母狗”都是一个骂人的词。“Bitch”自是不必说。小时候学英语时，最早接触到这个词，就是在电影中经常出现的“son of a bitch”（狗娘养的）这个固定搭配。“Bitch”所指的对象其实很难总结出共同点，但似乎抛出一句“bitch”，就足以透露所指的败坏程度。这让我在很长时间里，对这个词都难以启齿，甚至是在开始做这个人狗关系的研究之后。我的导师喜欢养狗，有时会跟我聊到繁育的事情。他居然可以对“bitch”这个词直言不讳，这让我很震惊。然后我才意识到，“bitch”本来就是母狗的意思。母狗就是母的狗而已。母狗有各式各样的，就像女人有各式各样的。

然而藏獒养殖场里的母狗几乎只有一种样式。她们都是被安排的母狗，不同的只是被安排的程度。我没想过，若是将一条母狗完全放开，她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或选择，就仿佛她还在草原。原来母狗也可以把前肢搭在公狗背上，母狗也可以去爬公狗。

或许，这才是“自然”，这才叫交配。而交配，首先是一种交流。交流可能是复杂的，曲折的，徒劳无功的。没有什么是确定的。这是多么明显的事情，而我居然从来没想到过，而一直将配种默认为一套人施加于狗的、志在必得的技术。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身边突然多出来一个女生。她看起来非常年轻，最多二十岁的样子。开始我以为她是晚到的客人，后来意识到她也是服务员，因为她跟一位老板组成了一对。她也漂亮，也是四川人，但跟其它服务员的气质完全不同。她没有化妆，甚至皮肤有一点黑。也没有穿白衬衣，而是着一袭淡蓝白花的吊带长裤连体服。脚上是简朴的平底凉鞋。及肩的、没有烫染过的头发随意地披着，没有修过的眉毛粗犷地飞着。就像一个在海边玩儿的文青。她如此特别。我被她吸引了，忍不住一直瞄她。

她和老板喝酒、聊天，也迎合。但她的迎合有些心不在焉，大多数时候弓着背、撑着下巴坐在那里，嘻嘻哈哈地四处打量。一股天真烂漫的劲儿。突然，她摸了一下我的腿：“姐，我可以抽烟不？”被她摸到的地方像触了电，给我一个激灵。赶紧说可以可以。她便抽起烟来。老板敬酒，她就碰一下干掉，继续抽烟。

我对整个世界的兴趣都集中到了她身上。她还上学吗？是四川哪里人？来拉萨多久了？是不是新来的，所以穿着自己的衣服？是自愿来的吗？等一下，什么叫自愿？看起来自愿就是自愿吗？

还有关键是，为什么她看起来并不“职业”，跟其他服务员那么不一样？为什么她看起来那么……清纯？等一下，我为什么会想到“清纯”这样的词？我对她们原本的想象，就应该是“职业”吗？她们只应该有一种形象吗？那我应该想象什么？我还可以想象什么？

但或许，她也并非看上去那般清纯。面对眼前的一切，她好像显得有些过于淡然了，甚至淡漠，一种因熟悉而生的厌倦。相比之下，比她大好几岁的我，可能都要比她更“清纯”一些？对书呆子来说，田野调查可能是人生中最激烈的一次社会化体验。我诚惶诚恐地模仿，小心翼翼地自保，努力做一只静止在墙上的苍蝇。而她，同样是置身其中，又抽身其外，却似乎毫不费力，甚至完全无所谓。

然而，真的可以无所谓吗？会不会只是因为她的老板对她比较客气，她才有了无所谓资格。跟旁边所有人都不同，他们俩虽然并排坐在一起，却隔开一点距离，只是相敬如宾地碰着杯。这也是我一开始没认出她是服务员的原因。她之所以看起来比其他服务员都要淡然，可能只是因为没有遇到大嗓门老板那样的顾客？她的不同，是否依然只是被安排程度的不同？如果没有任何的安排，她会是个怎样的人呢？

由于害羞，我没有跟她搭话，只是坐在她身旁激烈地揣测着她的身世。

有一点我是明确的，那就是我的“身世”跟她以及她们所有人都明显不同。并不在于成长背景，或受教育程度，而在于我自始至终的观察姿态。人类学的方法是参与观察，是参与+观察。可我好像从未百分之百地参与到我所观察的场景中去。不论是在狗场，还是在这里，我都最终变回一个安全的旁观者。田野调查是危险的，跟着一群中年男性老板做田野是危险的，可这终究只是对危险生活的一次模仿。无论如何，我不会被绑在配种架上，不会被扔来扔去。

我随时可以离开，代价不过是一篇论文。身为一个旁观者，我也随时可以扭过头去，只看我想看的东西。而她们呢？



07

天霸和小母狗的那次配种，到最后也没有成功。母狗被牵回她的狗圈。天霸继续趴着。李总很沮丧，但也没有办法，只能庆幸前几天天霸已经跟另一条母狗配过了。狗场里还有很多种公，都等着要配种。配种季的安排，一天也不能乱。

“母狗”这个词给人一种下贱败坏的感觉；而“公狗”这个词，则给人一种强壮勇猛的感觉。尤其是“种公”，仿佛有取之不尽、贪得无厌的精力，仿佛专为配种而生。然而实际上，有很多种公并不符合这种想象。天霸就明显不是那样的种公。会有配不上种的种公吗？这么窝囊的种公，不是该被淘汰吗？

其实恰恰是天霸的“窝囊”，或者说温顺，才使牠成为了明星般的藏獒。跟母狗一样，公狗也有各式各样的。可就藏獒来说，公狗的多样性，似乎比母狗获得了多一点点的承认。

绝大部分情况下，獒友们偏爱凶猛的藏獒，尤其是公狗，因为牠们看起来更大、更威猛、更有震慑力。凶猛的狗单独拍照、拍视频会特别好看，但是就没法随便与人合影了。天霸这样温顺的狗却特别适合与人合影。任何人都可以蹲在牠身边，牵着牠的铁链，掌着牠的皮毛，与一头身形两倍于自己的巨兽摆出亲密的姿态。所以每当有旅游团或领导来狗场参观，天霸是一定要牵出来展示的。

冻得直跳。

上车之后，老板们说有点饿，接着老婆们去吃宵夜。

那位和善的老板从前排探过身来，对我说：“这是我们拉萨的文化、风土人情。你可以稍微点一下。”另一个老板急了：“这些夜生活怎么可以写？！不要写！”

到了一家冷锅鱼，或许也是在天海路吧，不记得了。大堂里居然有一半的位置都坐了人。连体服女生吃了一会儿，就埋头在手机上打起了“吃鸡”。老板们叫她去买烟，她不耐烦地撒娇说：“我先吃鸡！等一会儿！”老板们就没逼她。

一个老板说“你们年轻人就是喜欢耍手机。我老二也在打这个游戏。”他说的是他孙子。两个老板一边吃，一边讨论起了商会的事情。说着说着，音量越来越大，居然吵起来了。还站起来，想打架的样子。本来没人理他们，一见真的要打起来了，大家才赶紧拉架。两人是真的动了情绪，继续指着鼻子破口大骂。其中一个说：“你们这些当官的！有权力就要负相应的责任。没有担当！对不起 XX 人！”

XX 是这些人共同的四川老家。

只有连体服女生，还在全神贯注地“吃鸡”，但也不忘时不时夹口菜吃。她的老板吵得都要打起来了，她居然毫无反应，只抬头看了一眼。后来越吵越激烈，实在劝不住了，李总就开车先把另一位老板送走了。

吃完饭后，连体服女生一边继续“吃鸡”，一边站起身来，头也没抬，跟着她的老板上车走了。一位嫂子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阴阳怪气地说：“三点过了，送到屋头去。”她的老公，也就是那位和善的老板，刚才也抱过服务员，此时在她身边不发一言。

李总回应说：“好丢人嘛，可能才十六七岁。”

回狗场的路上我睡着了。很快就到了。不知道是因为半夜的开发区空空荡荡、畅通无阻，还是因为我睡着了。

已经四点了。工人老表起床，来给我们开门。老表五六十岁，也是四川人，说是李总的亲戚，但不知道是什么亲戚，只知道李总叫他老表，我也跟着叫他老表。老表和另一个老乡一起来李总的狗场干了几个月了，一个月四千，包吃包住。坐飞机刚到拉萨那天，就被李总直接接到狗场，开始干活，一天也没有歇过。所以他们虽然来了拉萨，但却从来没有真正去过拉萨，最近只去过镇上洗澡。而我们之所以能够去拉萨，都是因为有他们守在狗场。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这是一间空出来的工人宿舍。从出租屋搬出来之后，李总同意我住在这里，方便每天参与狗场的工作。我躺在床上，准备直接睡了。可是太晚了，反而睡不着。心好像又沉重，又空洞，一下一下，呆滞地捶着。但也听不太见，淹没在四面八方喧哗的狗叫声中。

（人名、狗名皆为化名。藏文歌词的汉文版由作者翻译。）

本文是“[在场非虚构写作奖学金](#)”第一季得奖作品。“在场非虚构奖学金”由 Matters Lab 与文艺复兴基金会共同发起，意在为独立写作者提供奖金与编辑支持。

题图及文内图片由作者提供



冯琳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博士生。译著《人类学与认知挑战》。公众号：不由自知。

田野中国

基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面向大众实践公共写作，用文字留住日益消减或者瞬间消失的各种现实。



非虚构 潜入！ 小学语文课本编辑部 吉井忍 | 吉井忍的二次会

“国语这门课到底能做什么？
我个人认为是一种耐心和思考能力的培养。”

我有一个侄子现在小学二年级，他不喜欢国语课（相当于中国的语文课）也不喜欢我，要知道他最近在国语课上学过什么，经过几番僵硬的对话勉强问出一句：“いなばのしろうさぎ（因幡之白兔）”[1]。这是一个日本传说，出自编纂于公元 712 年的日本神话集《古事记》，主人公“大国主神”性格善良、救过兔子，现在又被称为结缘之神，可谓是日本最著名的神之一。但我小的时候，这部故事最多出现在爸妈给我念的睡前故事里，并不在国语课本里。看来随着社会的变迁，小学课本内容也产生了一些变化[2]。

小时候接触到的语文教材对一个人的思考模式和自我认同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一个共同体的核心概念形成也具有导向性作用。为了更进一步了解日本的课本（一般称为“教科书”），我在东京都中野区一所教育中心翻阅几本国语教科书，刚开始只挑选故事和小说试图进行分析，而该中心的一位教育研究支援员，是曾在东京几所公立小学校任教三十多年的退休小学校长，他嘱咐我看课本必须要看整体，因为课本本身拥有一个完整的结构。“有的人没能学好一门课，就是因为这个人的了解只限于一小部分，而并没有把握整体知识的链接，”他跟我说。但他也赞同首先关注小学国语课本，因为他认为国语科是所有科目的基础，而国语科的基础从小学开始。

日本小学和初中的教科书目前有三个大前提：检定制度、广域采择制度以及无偿制度。日本中小学教科书从明治时代一律由文部省（现文部科学省）组织编写、即“国定”教科书，该措施对统一国民思想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 1948 年起，日本政府对中小学教科书实行“检定制度”，各科教科书的编纂都交给了民营出版社，他们根据文科省的指导总则《学习指导要领》编写教科书，并提交至文部科学省教科书检定调查审议会。

日本各都府县的教育委员会将所管辖的地区划分教科书选用区，每年六七月份在每一个区域举办“教科书展示会”，由当地教育委员会、教师与家长代表来翻阅各家的教科书，以便选用每个科目教科书时的参考。各地选出的教科书由各都府县的教育委员会来做统计，各家出版社按其数量印发教科书，以区域内的民营书店作为发行所（即“教科书取扱店”），书店负责把教科书送到区内的各所学校（广域采择制度）[3]。教科书四年改版一次，等于是公立中小学校每一个科目的教科书，在四年之内须选用同一家的教科书。

教科书的价格经文部科学大臣批准，据 2018 年统计，小学平均每一册教科书价格

为 378 日元（约合人民币 20 元），初中为 547 日元（28 元），一般消费者在民营书店兼任的“教科书取扱店”也可以购买。1962 年日本制定了《义务教育诸学校教科书无偿供给法》，开始实行义务教育学校教科书的免费供给制度。

据文部科学省 2019 年统计，小学校教科书的日本民营出版社共有十六家，小学校教科书总印数为 6992 万册，各出版社的市场占有率前三位为东京书籍、光村图书和教育出版[4]。这十六家出版社并没有负责所有科目，按各家的特色和优势注力于几个科目，如作曲家市川都志春举办的教育艺术社（东京都）是音乐教科书的领先、小学音乐教科书的市场占有率为近七成，拥有百年历史的东京书籍（东京都）在小学英语科的占有率为近六成，在小学社会科的占有率为 55.3%。

小学国语教科书的排行以光村图书出版（东京都）为首，市场占有率为 67.6%，比前年高出 7.1 百分点。该出版社的全名为“光村图书出版株式会社（Mitsumura Toshio Publishing Co.,Ltd.）”，已有七十多年历史。光村图书这个名称也许对中国读者来说比较陌生，但《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和其醒目的黄色封面大家应该很熟悉。人民教育出版社与光村图书策划并编写的这一套日语自学读本，自 1988 年发行以来受到了广大中国读者的喜爱，发行量已逾 500 万套。

2020 年度（2020 年四月至次年三月）的小学校国语教科书的总印数为 1127 万册，其中光村图书的发行量约有 742 万册，远超第二位东京书籍（212 万册，占有率为 19.3%）。上述退休小学校长也跟我说，这家出版社的通称是“国语的光村”，擅长通过语言和文学作品培养孩子们的词汇、思考力和感性。光村图书在语文方面的优势是有原因的，1949 年创办时的中心人物石森延男（Ishimori Nobuo, 1897-1987）和垣内松三（Kaito Matsuzo, 1878-1952）是儿童文学和国语教育的专家，当年就有二十万个小学一年级学生使用他们编写的国语教科书，日本儿童最多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光村图书的中小学国语教科书印量达到两千万。

01

四年的“出书”周期

“我从小喜欢看书也会写故事，春假之后返校[5]领取的国语教科书，我一口气就把它看完”，野田由美子（Noda Yumiko）笑道。她是光村图书第一编辑部国语课主编，2003 年入社至今一直担任小学国语教科书编辑。“这份工作我做了二十年了。虽然我小时候喜欢看书，但大学的专业选择了经济学，考虑就业问题时我就想，还是为这个社会做点事比较好。社会的基础就是人，所以决定去在教育领域找工作。”对编辑这份工作并没有相关知识和背景的她，在光村图书的编辑部开始工作之后有两件事印象很深刻，一个是教科书的制作周期，还有编辑这份工作的实际内容：

“我一开始以为编辑的工作就是在办公室里看稿，但其实我们跑外面的时间也挺多的，拜访学校、参观学生上课，随同业务人员拜访各位老师，也会跟各界学者们见面。有一次跟公司前辈一起拜访儿童文学家，回来路上他跟我说编辑是不能呆在电



《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封面



教科书展示会，摄于东京都中野区教育中心。



光村图书的小学国语教科书封面，由插图师暨造园家大野八生（Ono Yayo）。大野老师画的图有故事，就会让你想翻开看看，而且每天看都不觉得腻，”野田由美子说。



野田女士



野田女士（右）和光村图书董事山本智子女士。
山本女士曾负责中小学国语教科书编辑。

脑前的，他的这一句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说到四年一次出书的出版周期，这的确是和一般出版社的节奏很不一样的地方。其实我之前都没想到做教科书得花这么多心思和时间。”

日本公立小学校使用的教科书根据文部科学省的《学习指导要领》制作，该《要领》每十年进行一次改订，2017年公布的最新版本在“面向社会开放的教育课程”的大主题之下设定了三个学习目标：“获取知识和技能”、“培养思考力、判断力和表现力”以及“和社会和世界相处，度过更好的人生”。在这个目标之下设有各科目所要达成的目标，而国语科的重要方向有三个：（一）在日常生活所需的范围内理解国语，并能够适当地使用语言；（二）在日常生活的范围内，提高沟通能力、传达能力、思考力以及想象力；（三）把握语言的重要性，并培养出积极提升其操作能力的心态。根据该《要领》内容，编辑与外部编辑委员用两年的时间进行多次的沟通与开会，探讨教科书的编纂大方向、结构与教材的选择。光村图书的小学校国语科编辑委员共有四十二名（含三名校订负责人），以国语教育专家甲斐睦朗（Kai Mutsuro, 1939-）为首、包括汉学家阿辻哲次（Atsuji Tetsuji, 1951-）、记者池上彰（Ikegai Akira, 1950-）和作家工藤直子（Kudo Naoko, 1935-），还有中小学教师以及文法、教育心理学、人类科学等各领域的专家，整体年龄段分布也比较均匀。经过两年的探讨和编纂，出版社先制作审查用的样书，在第三年的春天提交至文部科学省接受审查。教科书调查官在半年的时间里进行审查，出版社按照其建议做修改与调整，这过程也另外需要几个月。检定结果的发表时间在第四年的春天，不合格时对方会提出建议，出版社按其建议进行修改。经过“教科书展示会”，每个地区选出中小学校每门课所使用教科书，之后出版社赶紧完成“供给本”（即颁布给学生的版本）的制作，印好的教科书经各地书店，在第五年春天来到学生手中。

02

从一千篇文章精选

野田由美子受访时准备了一些参考资料，其中一本最新版的《小学国语科学习指导要领》贴有不少便签条、书边上有些磨损，能看出她已经翻过无数次。据她介绍，文部科学省的《学习指导要领》只提到儿童该学到的目标和方向，并没有提到具体教材名称、文学作品或作家的名字。换句话来说，只要其内容和用途符合“要领”，教科书上的教材选择和决定权就在编辑手里，教科书上有的内容是编辑邀请作家或专家写的新文章和新故事。光村图书的编辑们共享一个教材资料库，大家觉得适合作为教材的文章都存档起来，以便互相讨论。野田由美子也为了找出更合适的“好素材”，周末经常在图书馆看书，也会去书店接触新书信息。

“幸好我并不讨厌看书，把周末的时间都泡在图书馆也不觉得辛苦。教科书上的文章不像我们看书用的，孩子们在课堂上要读好多遍，国语的每周课时为‘九七五’，低学级（一、二年级）每周九节、中学级（三、四年级）七节、高学级（五、六年级）五节，他们每天至少有一节课是会翻到国语教科书，所以文章内容和语言要‘耐读’。也可以反过来说，只要符合《要领》要求，什么文章都可以上教科书。当然，文字内容和词汇的难易度必须符合该学年的学习进度，文章需要适当的长度。我们倾向于把一个完整的作品给学生看，所以高学年用的作品长度最长也在五六千字之内，中学年是三四千字，低学年就一两千字，刚好有这个长度的作品其实很难找。做出一套小学国语科教科书，我们至少要看超过一千篇文章。”

经过这些门槛被收录到教科书的文章到底有哪些？我们可以看一下光村出版的小学四年国语教科书下卷。

“小学国语教科书，低学级和中学级用的一般分为上下两册。就像我刚跟您说，在小学阶段每天都要上国语课，分上下两册可以保持新鲜感，从春天到夏天用上册，结束很长的暑假，秋天返校时就换到下册，用到次年冬天。到高学级的国语教科书是一年通用的。”

扉页印有一首诗，描写从远方飞来的天鹅与其白色羽毛，是福岛县出生的诗人羽曾部忠（1924-）的作品。光村出版的每卷国语教科书扉页上有一篇很短的诗歌，从一年级到三年级是窗道雄（1909-2014，本名为石田道雄）的作品，从四年级到六年级换到羽曾部忠。

除了扉页上的这些诗，光村出版从一年级到六年级一共介绍三十八首近现代诗歌，作者包括谷川俊太郎、和田诚、寺山修司、金子美玲等名人，这些三十八首的语言质朴平易、甚至俏皮活泼，有的作品更像是文字游戏。“能否赏析作品细节先搁着，在小学阶段让孩子喜欢上诗歌这个表现形式比较重要，”野田由美子说道。

教科书从第二页开始有目录和“观望国语的习计划”，从这里可以看出，四年级学生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将要学习三篇故事和两篇“说明文”，以及三首诗。

下卷第一篇故事是《狐狸阿权》，作者新美南吉（1913-1943）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插图由粕谷昌宏（1937-）负责，光村图书和这位著名绘本作家合作已有三十多年。有点淘气，孤独而善良的小狐狸“阿权”和青年兵十的故事目前在光村图书以及其他所有出版社的国语课本里（含东京书籍、教育出版以及学习图书版本），可谓日本最著名的故事之一。学习这篇故事的目的，光村图书设定为“读出各角色的心情变化，并和同学们一起讨论”。

接下来的几页中，学生学到秋天的传统行事（理解传统文化）、班会基本流程（培养沟通能力），也会学习到以“月亮”为主题的三首诗，水上多世（1935-）的《满月》、小山峰子（1936-）的《月亮》以及谷川俊太郎的《月亮》，学完这些还会制作自己挑选、编辑的诗歌集。

学到这里应该是十月中旬，下卷第一篇的说明文是文物修复专家增田胜彦的《为世界之骄傲和纸》，学生学习到对客观事物做出说明时的文章结构，也会用各种渠道去查询日本其他地方的传统工艺，并把查询结果汇编成一个小册子与同学们分享。下卷第二篇故事是《梧桐树》，著名作家椎名诚（1944-）为这本教科书而写的新作品。椎名诚是一位“多产”作家，活动范围涉及到科幻小说、青少年小说、剧本、导演或



小学四年国语教科书封面，分上下卷两册



《学习指导要领》



文部科学省指定的“教科书给与用纸袋”设计，四月开学时小学一年级用的新课本被装在这个纸袋，交到学生手里。纸袋上印有面向家长的说明文：“这是面向义务教育中的儿童和学生，由国家无偿提供的教科书，请珍惜使用。”



《狐狸阿权》绘本封面 (Asunaro 书房, 1998年)，图为粕谷昌宏。《小千的游戏》封面。该作品是作家阿万纪美子 (1931-) 的代表作，1982 年由 Akane 书房出版，1983 年获得小学馆儿童出版文化奖。插图由绘本作家上野纪子 (1940-2019) 提供，光村出版的教科书从该绘本选用插图。

随笔等，作品风格豁达开朗、充满生命力。“四年级的国语教科书一共有五部故事，上卷的《白色的帽子》属于幻想小说，《一朵花》是描写战争的，接着有下卷的《狐狸阿权》和《下头一场雪的日子》，我们觉得需要一篇给人感觉更活泼、以现代生活为背景的内容，”野田由美子说道。《梧桐树》描写出主人公少年对一位老年人和一棵梧桐树的感情和心理变化，该作品文末还有三部“包含与大家同龄的人物”的其他作家作品介绍。

过年后的第一月份，学生学习到下卷第二篇说明文《追溯鳗鱼的秘密》(塚本胜巳著)。鳗鱼是充满了未解之谜的生物，水产学博士塚本胜巳花了三十六年究明日本鳗的产卵场与其繁殖模式，文章中有五张地图、五张图片以及图表和画图各一张，这篇教材的学习目标为“了解文章和资料的组合及其效果”。

夹着关于写作技巧的一些内容，四年级教科书上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作家安房直子 (1943-1993) 的《下头一场雪的日子》，她的文章优美感人，也带有敏锐的洞察力。光村图书为这篇文章邀请著名插画家寺门孝之 (1961-)，他的插图饱满色彩，略微脱离现实世界感觉非常适合这篇故事。

03

经典为何能够成为经典

翻阅现在的国语教科书，作为七〇后的笔者不得不感到有些陌生。从内容来看，四十年前的昭和时代教科书上有过更多的故事，学生的作业以作文为主。野田由美子介绍，《要领》所提示的内容与社会的变化同步的，《要领》有所改变，教科书的结构也自然会产生变化，比如平成时代的宽松教育措施中，小学国语的每周课时被删减，教科书的页数也少了一些。令和时代的国语教科书更加注重学生的沟通与表现能力，这是应对世界信息化的教育方向之一。

但不管是教科书的变化如何，有些作品超越时代、一直留在课本上，可谓是一种经典。一年级的《拔萝卜》(俄国儿童故事)，二年级的《蜂斗叶》(工藤直子)，三年级的《小千的游戏》(阿万纪美子) 和《魔奇魔奇树》(斋藤隆介)，四年级的《狐狸阿权》(新美南吉) 和《白色的帽子》(阿万纪美子)，五年级的《雁王》(椋鸠十) 以及六年级的《山梨》(宫泽贤治) 和《海之生》(立松和平)。

其中一篇《小千的游戏》是让人难忘的故事。笔者小时候使用的不是光村图书版本，但在图书馆读过这部故事。该书日文名称为《ちいちゃんのかげおくり》，“ちいちゃん”是小女孩的小名，“かげおくり”是利用视网膜上残像的一种游戏，白天背向太阳站立，注视投在地上的影子数到十秒，然后抬头将视线慢慢上移，就会在青空上浮现白色影象。整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小家庭被战争摧毁的经历，虽然国语教科书的《要领》上没有出现“和平教育”一词，但光村图书版本的四年级国语上卷还有一篇关于战争的故事《一朵花》(今西祐行著)，在其他出版社的国语教科书上也有几篇类似的故事。

野田由美子否定国语教科书与和平教育的关联：“这篇教材我们确实刊登很久，也许刚开始的目的是透过主人公少女的行动和心情要让孩子们思考和平。但我们目前的采用标准还是以《要领》为主，我们选择这篇教材主要是因为适合孩子们读出情景和主人公的关联以及人物的心情变化。当然也可以说，这样使用期间比较长的文章，小学老师们对作品的理解和授课技巧也会提升，这可能是使用所谓经典的一个好处。我们并非有意识地采用经典作品，但有些作品确实有一种超越时代的力量。”

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

进行采访的六月中旬，刚好是提交新版教科书至文科省，野田由美子正在等待审查结果。但她还不能松口气，因为编辑工作不只是教科书本身的编纂，还有面向小学教师的“指导书”，对一家民营出版社来说这部分的收入和教科书一样重要。

这个“指导书”我小时候也看到过，有一次我翻了班主任桌子上的一本教科书，哪一门课有点忘了，但我发现虽然那本书的封面和我们学生的教科书一样，但内容比我们的详细很多，除了课文之外印有密密麻麻的小字，明显是给大人看的。班主任走过来跟我说了一句，我不好意思地离开了他的办公桌。

现在的指导书比过去的更复杂更详细，除了课文内容的说明之外，还有授课实践案例、指导用资料（包括图片、视频、相关信息）以及考卷例子等。光村图书对这方面服务也非常体贴，这一小部分我们在官网上可以看一下，比如上述小学四年国语教科书下卷，他们为教师准备的内容有：各位作家的纪念馆信息、关于惯用词的视频介绍（由日本文化厅提供）、传统工艺相关的视频（由日本文化厅提供）以及和纸地图（由全国手工和纸联合会提供）、班会流程的要点说明（由 NHK 提供）以及关于作家和诗人们其他作品的书单等。

野田由美子还负责数码版本的制作。日本教科书的数码化已经达成 98%，据她介绍目前纸版教科书和数码版本的内容是完全一样的，而采用方式按学校有所不同，有的学校让学生自己选，课堂上能看见有的学生拿平板，有的学生翻开纸质教科书上课。“我们也有所预想，总有一天要做数码版本的，但以为这应该是几年后的事情。这次疫情中很多学校不得不进行网上授课，这在某种程度上促进教科书的数码化，”野田由美子说道。

日本的教科书出版社都是民营的，没有所谓的“国营企业”，这一方面支撑了教育自由，但也故此产生了各出版社之间的竞争意识。《读卖新闻》在 2016 年 1 月 22 日报道称，有不少教科书出版社以“谢礼”的名目把现金或“图书卡”等礼物给教育委员会委员、校长和教师，金额从两千日元到五万日元等不同，夏季和冬季的送礼时节也寄了礼物。据该报道，《要领》方针表示“摆脱宽松教育”的 2009 年和 2010 年，即教科书内容也发生大幅变化的几年，各出版社透过“谢礼”与教育现场人员交往的次数更频繁。可以想象教科书出版社的生存也不容易。

说回光村图书的小学国语教科书，若一切顺利的话，新版在 2024 年的春天可以到学生手里。对野田由美子来说这将是第五次出新版教科书，问及对于新版教科书的想法，她思考了一会，然后回道：

“每次做新的教科书时，我们都很重视小孩本身，先要看现在的小孩需要什么。目前的社会和国际情势的变化非常快，等学生成年的时候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也没法想象。那么为了即将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的孩子们，国语这门课到底能做什么。我个人认为是一种耐心和思考能力的培养。现在的环境给人感觉太容易找出一个所谓的正确答案，但若在全新的环境中要生存下去，你得耐心寻找答案。我认为这些能力是通过国语科也可以培养出来的。”

采访结束之后，我们三人开始随便聊，光村图书的董事山本智子坐在角落几乎不说话，反而到这个时候讲得比较多。她曾经担任过初中国语教科书编辑，她说自己初中时代就用过光村图书版本，有汉学家竹内好翻译的《故乡》，但现在只记得“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这句话，还有非常生动的杨二嫂。山本智子笑道，很多学生就这样，我们介绍谷川俊太郎的《早晨的接力》，学生只记得开头一句，很多时候连作者名字都不记得。她续说：

“教科书一旦离开我们手里，老师怎么用它或孩子们怎么看它，只能任他们去了。但有时候我又想，若其中一两篇文章或者某一句能够留在心底、长大之后他们还会偶尔想起来，也许这样就挺好了。”



东京一所私立小学“青山学院初等部”国语科教学实景。该校从 2020 年度第二学期开始，为每位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提供一台的电脑设备，国语科上也采用了数码版的教科书。（图片由光村出版提供）

相关链接：

[光村图书出版株式会社](#)

[小学校学习指导要领（2017 年告示）](#)

文内图片若无标注，均由作者拍摄；题图来自 [Jacob Plumb](#) on Unsplash

[1] 《因幡之白兔》故事内容：大国主神共有八十一个兄弟（八十一个神），他们听说在因幡国（今鸟取县）与一位美女“八上比卖”，故此一同出发去求婚。半路看见一只全身没有皮的裸兔，问其理由，原来它欺骗鲨鱼让它过海，结果被愤怒的鲨鱼剥光了皮。八十一个神叫它用海水洗浴再迎风晒干，兔子照做，结果全身龟裂痛苦不堪。大国主神因为背负八十一个兄弟所有的行李袋，走得很慢，来晚了一步，看见这只兔子感到可怜，帮助它治好皮肤。兔子高兴，就作出了“称虽然背负着行李袋却能获得八上比卖的芳心”的幸福之预言。

[2] 根据文部科学省发布的《学习指导要领》，日本神话与其传统语文从 2011 年开始正式被编入到小学国语课本，随后各个出版社纷纷推出神话全集。

[3] 透过教科书发行服务可以获取的净利润比销售书籍或杂志的还要少，现在越来越多的书店（尤其是个人经营的小书店）不愿意负担起这项服务。（出处：全国教科书供给协会官网）

[4] 《内外教育》2019 年 12 月 27 日，第 10-11 页。小学校第一至第六年级国语科教科书的总数为 11274471 册，其中光村图书的发行量是 7423711 册（全六年级共 10 卷），东京书籍为 2119864 册。

[5] 日本一般学校四月开学。



吉井忍（Yoshii Shinobu）

日籍华文作家。著有《四季便当》、《四季便当 II》、《东京本屋》等。作品获 2016 诚品书店阅读职人大奖。

吉井忍的二次会

二次会是上班族大家一起去喝酒、喝完第一家后自由参加的第二轮聚会，大家谈得更加舒坦的场合。这个系列采访的是接地气、尘满面的日本普通民众。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非虚构

工厂 | 定海桥往事⑤

路明 | 生活亲历者

工人阶级的定海桥，
煤烟与机油味的定海桥，
上海暗藏的脊梁

陈禾说，他天不怕地不怕，唯独害怕两样：一是赤佬，二是纺织厂女工。

赤佬就是鬼。上海人见鬼，就是“碰到赤佬”。小时候，姆妈上夜班，舅舅带陈禾姐弟三人兜定海路。舅舅怀里抱一个，手里牵一个，屁股后面跟一个。入夜的定海路热闹无比，说书的，变古彩戏法的，照西洋镜的，讲相声的，卖柴片馄饨的，卖梨膏糖的，炸油墩子的，赤膊打拳卖蛇药的……最有劲的是公鸡算命，八九斤重的芦花大公鸡，威风凛凛，啄一张牌，牌里暗藏玄机。还有唱江淮戏，又叫淮剧、江北戏，戏里有神仙鬼怪，有才子佳人，有黄色小调。舅舅看得津津有味，三个小把戏瞌睡连天。回到家，上床，灯一关，舅舅开始讲鬼故事。陈禾吓得躲到被子里，实在憋得不行了，撑开一个小洞呼吸。从那时起，陈禾对黑夜产生了恐惧。白天肆无忌惮，夜里灯一关，总觉得黑暗里潜伏着说不清的东西。后来舅舅说，其实他也害怕，讲出来，就不怕了。

舅舅比姆妈小十岁，说是陈禾的长辈，其实就是大哥哥。陈禾踢球，舅舅端张板凳，坐在场边看。夏天，陈禾和姐姐弟弟去复兴岛捉知了。碰到暴雨，三人找地方躲避。舅舅到处寻不着，急得跳脚，见姐弟们回来，盛怒之下，命三人罚跪，捉到的知了放掉。姐姐哭着认了错，舅舅让她起来。弟弟偷藏了一只知了，其余的放掉，也被赦免。陈禾不服，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攥着好不容易抓来的知了，死活不肯低头。一个钟头，两个钟头……情愿一直跪下去。姐姐和弟弟找舅舅求情，其实舅舅也心疼，巴不得就坡下驴。陈禾摇摇晃晃地立起来，膝盖肿成馒头。舅舅眼泪汪汪，摸他的头，他妈的，就喜欢你这犟脾气。

因毗邻黄浦江，交通运输便利，自十九世纪末起，定海桥周边陆续建起工厂。1890年，中国最早的机器棉纺织厂——上海机器织布局成立。此后，日资大康纱厂、裕丰纱厂、公大纱厂、英资密丰绒线厂相继建成。加上机器造纸局、杨树浦水厂、杨树浦发电厂、中华造船厂、中国肥皂有限公司……至20世纪20年代，这里已经是全国闻名的工业基地。1933年，上海工人数量占全国的53.27%，其中三分之一在杨浦。发表于《新青年》的《上海劳工状况》一文写到，“近年来上海的工厂，一天发达一天了。其中纱厂为最多数，那贫民的生计，便因此一振。杨树浦一带，竟可称他为一个工业社会”。建国后，大型工厂收归国有。裕丰纱厂成了国棉十七厂，公大纱厂成了国棉十九厂，中国肥皂公司成了上海制皂厂，定海桥男人心心念念的华光啤酒厂，前身是英国人的怡和啤酒厂。讲出去，哪一个不是响当当，上海工业的骄傲。不同于南京路的繁华，淮海路的优雅，灰扑扑的定海桥，工人阶级的定海桥，煤烟与机油味的定海桥，上海暗藏的脊梁。

自陈禾记事起，工人便是辛苦而光荣的。“上班”是天大的事情。清晨，自行车洪流滚滚，涌向定海路、平凉路、杨树浦路。夜里，纺织厂灯火通明。碰到加班，工人第一反应是“今

朝为国家多做贡献了”。无论在定海桥的哪个角落，抬头可望见杨树浦发电厂高耸入云的烟囱。机器轰鸣的年代，从冒烟的形状，可辨识今日是否有雨。

姆妈在国棉十七厂上班，做挡车工。同车间有个著名的劳动模范，叫黄宝妹。黄宝妹出身贫苦，根正苗红，21岁入党，见过八次毛主席。导演谢晋来十七厂拍摄电影《黄宝妹》，黄宝妹演黄宝妹，姆妈亦有出镜。一代纺织女工的身影，留在黑白影像中。厂里的小姐妹来串门。小姐妹对陈禾讲，晓得吧，电影里有些黄宝妹的事迹，其实是你姆妈做的。姆妈就笑笑。陈禾晓得姆妈的苦衷，阿爸成分不好，姆妈也受牵连。能够参演革命电影，是要感谢组织信任的。

陈禾的阿爸是十七厂的门卫，解放前参加过帮派、拜过“老头子”，后来被揭发，打成历史反革命。陈禾四岁时，阿爸被送去大丰农场，劳教三年。阿爸为争取减刑，拼命劳动，加上伙食恶劣，急性盲肠炎发作，没救过来，离释放日期不足三个月。

53年，上海纺织企业支援内地建设，舅舅去了武汉国棉二厂。舅舅是细纱车间的技术员，据说水平一流。纺织厂粉尘厉害，舅舅得了严重的肺气肿。病愈后，每年回上海休养，依旧住在定海桥家里。

舅舅走后，姆妈一个人扛起家里的担子。姆妈烧菜，陈禾搬只小板凳，一旁剥毛豆。姆妈做棉袄，陈禾撬边、剪纽扣洞。邻居对姆妈说，这个儿子，算是养着了。

陈禾十八岁，进了国棉十九厂，当一名钳工。从学徒做起，每月工资17块8毛4，一年后涨到19块8毛4。碰到车间里的老人，都叫师傅的。学本事，态度要端正，嘴巴要勤快，犯错就认，不懂就问。师傅长，师傅短。陈禾总结，越是有本事的师傅，脾气越是臭，吃软不吃硬。做生活认真点，适时递上两根香烟，师傅一高兴，点拨两句，受益大了。

头一个师傅叫李根发，青工们上班第一天，李师傅出了道题：一根铁丝悬空，拿一把凿子、一把榔头，怎样把铁丝切断？年轻人的反应差不多，榔头做砧，凿子去凿。错！反过来，凿子抵住铁丝，榔头夯上去，才使得上劲。李师傅说，做生活，第一动脑子，第二才动手。大家都服气。

李师傅是独眼龙，年轻时，铁屑溅入眼睛，抢救不及，失去了视力。这是钳工常见的工伤。往后，车间里再发生这样的事故，不用送医院，直接找李师傅。李师傅拿一把钢皮尺，酒精灯上消毒，独眼炯炯有神，手稳如泰山，钢皮尺直角探入，挑落眼中铁屑。没出过问题。

除了李师傅，车间里还有个独眼龙，姓吴。大家不叫吴师傅，直接喊瞎子。瞎子也不介意，整天嬉皮笑脸，一张嘴能说会道，尤其受女工欢迎。瞎子技术一般，玩乐器是一把好手。竹笛、胡琴、唢呐、琵琶、大鼓，吹拉弹唱，没有不会的。大家讲，凭瞎子一个人，撑得起一个民乐团。

张师傅，人称鸟贼鱼。一是指技术好，车铣刨磨样样精通；二是形容长相：皮肤黑，胡子邋遢，鼻毛外露，加上喜欢抽烟喝酒，几天刷一次牙，身上气味复杂。一般工人，发工资那天，买包五角钱的牡丹，平时抽前门、飞马、勇士，再不济，阿尔巴尼亚钻石骆驼牌，1角2分一包，有股让人难忘的臭脚丫子味。张师傅只抽8分一包的生产牌。烟瘾大到什么程度，据说一天只点一根火柴，跑到医务室，一歇讲腰痛，一歇说风湿，骗来一点虎骨酒。一边上班，一边吃老酒。人极聪明。手表坏了，自己拆开修。人家手表厂有一套专门的工具，这位师傅用榔头和老虎钳。有一次，张师傅心血来潮，用砂纸磨了一根秒针，装进表盘，两针手表变三针，居然能走。另外一次，搞来一个旧柴油发动机，装在自行车上。下班，开着上了平凉路。引擎轰鸣，黑烟滚滚，要多拉风有多拉风。

周师傅白净斯文，像知识分子，擅长精加工。厂里要开模、出标准件，头一个想到他。周师傅磨过的铁块，表面平整到能相互吸住。周师傅讲，单一把锉刀，按挫纹分，有单绞挫和双绞挫；按挫齿分，有粗齿、中齿、细齿；按用途分，有木锉、普通锉、锯用锉、整形锉；按刀面分，有方锉、扁锉、三角锉、菱形锉、半圆锉、刀形锉。陈禾听了头晕。周师傅还讲，十把锉刀里，九把是不平的。一般的金属面，挫到后头，中间总会凸一点。这时把锉刀略微拱起的一面朝下，省时省劲。最后，换最细的锉齿，用靠后的一段，来回轻拉，生活就漂亮了。

曹师傅是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绰号“大班”，来自一段显赫的经历。抗战时——那时还叫公大纱厂——东洋领班带着太太来厂里。有个工友跟曹师傅开玩笑，平常你神气，敢不敢抱日本女人？曹师傅年轻气盛，说有啥不敢的，冲上去一把抱住了。一声尖叫，领班直接掏枪，曹师傅撒腿就跑。工友看傻了。事后，曹师傅好几个礼拜没敢来上班。曹师傅负责纺车维修，哪台车出故障，曹师傅只要上前听一听，就晓得问题在哪里。“第三级滚轴有裂缝”，拆开一看，分毫不差。

赵嘎斯负责烧嘎斯(gas)，现在叫气焊工，也是四类分子。赵嘎斯原先在沪东造船厂，后来沪东船厂和中华船厂合并，生产军工产品，赵嘎斯属于政治上不可靠人员，被调到十九厂来。焊接最重要的指标，是焊缝不能有气泡，不然影响密封性。当时用一批日本进口的焊条，每次焊完，总会检出气泡。厂里认为焊条有问题，要求退货，日本人不认。于是打官司，日方派专家来上海，现场焊接，现场检验，碰到赤佬，一个气泡没有。等于说，焊条没问题，是你们不行。赵嘎斯站出来，客客气气，请专家再焊一次。果然发现玄机。十公分长的焊条，专家只用掉八公分，问题就出在剩下的两公分焊条上。厂里打贏官司，赵嘎斯没受表彰，只领到一块肥皂。另一次，是在“深挖洞，广积粮”时期，十九厂奉命挖防空洞。厂里有一辆报废的卡车，赵嘎斯自己画图纸，自己动手，配上引擎、轴承和钢丝，改造为吊车。用陈禾的话，人家老卵有资本的，不服不行。

当然，也有名不副实的，混日子的，滥竽充数的。不稀奇。一个技术工人，生活做的哪能，一看便知。手上、脸上沾满油渍，工具摊了一地，不用讲，大灵不灵的。真正的高手，衣裳干干净净，工位井井有条，腔调不紧不慢，生活清清爽爽。这是工人阶级的基本修养。

纺车需定期检修，叫平车。六个月一次小平车，三年一次大平车。大平车第一天最辛苦，全部零件拆下来，小到一颗螺帽，重新擦洗、上油，再组装、调试。陈禾有个师兄，每次碰到大平车，必定请病假。平时也没个干活的样子。有次师兄坐着打瞌睡，陈

禾假装不小心，一整桶机油翻到师兄身上。师兄满身油污，狼狈不堪。陈禾笑着说，不好意思啊，抱歉抱歉。这样不敢响。

运动一来，厂长、车间主任相继被打倒，生产几近瘫痪。陈禾等一群青工，整天游手好闲，东游西荡。借着大串联的东风，陈禾先去了武汉，看望舅舅和舅妈，再去长沙，反正坐火车不要钱。各地有红卫兵接待站，提供免费住宿。吃过火宫殿的臭豆腐，徜徉过“橘子洲头”，十九厂的革命小将兵分两路，一路去韶山，一路南下广州。开往广州的列车挤得水泄不通，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酸腐味。陈禾躺在行李架上，尽量放平四肢，捱过闷热喧嚣的一夜。

陈禾有个朋友，之前串联时，帮过一个被开水烫伤的女生。女生感激，留下通讯地址，此后便书信往来。女生叫阿水，家住广州，父母是印尼华侨，信中再三嘱咐，来广州一定找她。阿水带着大家爬白云山，逛越秀公园，吃荔湾的小吃。大家七嘴八舌，教阿水讲上海话。一行人中，阿水对陈禾最为热情。陈禾有些不自在，避开了阿水的目光。

一个礼拜后，接到“复课闹革命”的电报（学徒也算学生），大家只好回上海。阿水送到火车站，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声对陈禾说，回去给我写信。陈禾涨红了脸。火车照样拥挤不堪，这次连行李架都睡满了人，陈禾只好站到厕所里去。包里塞了好多香蕉，在上海属于稀罕物，打算带给妈妈和姐姐弟弟尝鲜的。回到家一看，全烂了。厂里的运动也搞得火热。张师傅给揪出来，罪名是生活腐化。大家啧啧赞叹，看不出来，乌贼鱼居然还轧姘头。对方是同车间的“黑里俏”，模样挺标致，不知道图啥。革命小将组织批斗会，一听说是生活作风问题，男青年最起劲，全跑来听。小将喝道，张XX，老实交代。张师傅就一五一十交代，怎样眉目传情，怎样勾勾搭搭，怎样去的人家家里。讲到关键地方，张师傅一句带过。小将大喝一声，慢慢讲！讲重点！底下笑翻了。

周师傅借调去国棉十六厂，一来二去，跟一个坐办公室的女人好上了。女人的丈夫是杨运（杨浦运输公司）造反派头目。说起杨运，杨浦区造反一只鼎，搞武斗最厉害。女人拿了家里两万块钱，同周师傅私奔，南京、庐山、武汉、成都、北京……一路白相过去，快活得像神仙。半年后，钞票用光，只得返回上海。女人的丈夫带了四卡车人，堵在上海站出口处。人人揣三角刮刀、削尖的铁管、摃尺、角铁，杀气腾腾。幸亏瞎子多个心眼，给周师傅发电报，叫他提前一站下车。陈禾和瞎子偷开了厂里的吉普，在真如站接到周师傅和女人，悄然回到定海桥。

革命高潮过去，生产秩序逐步恢复。铿铁块的铿铁块、拧螺丝的拧螺丝，仿佛一切照旧。在师傅们的言传身教下，陈禾的技艺突飞猛进。没过几年，升为六级钳工，代表华东地区参加全国青工大比武，拿到第二名。一身的好本事，师傅教的：自尊，瞎老卵，目中无人，师傅教的：吊儿郎当，天不怕地不怕，师傅教的。师傅们的最后一课，是以身试法，充当反面教材，让陈禾对男女间情事保持谨慎和清醒。

领导注意到陈禾。每周四是厂里的干部劳动日，干部们下车间，与工人们同劳动，其实就是打扫卫生。书记招呼陈禾，小陈，来，一起扫地。陈禾不愿意，我又不是干部，叫我干什么。工友们起哄，乖乖不得了，陈禾要升官了。陈禾就骂，不要触我霉头好不好。李师傅气得把陈禾拉到一边，怎么拎不清，书记这是要提拔你。陈禾不情愿地去了，抄把扫帚，东扫一下，西扫一下。书记笑笑。

说起来，与领导保持距离，算得上工人阶层由来已久的一种骄傲。在师傅们的语境中，当领导，活干得怎样不重要，关键是会做人，会来事，会拍马屁，某些节点还要会送东西。他们坚信，自己之所以没升迁，关键就耽误在这一点上，并以此为荣。工人们尤其看不上那些摇笔杆子、动嘴皮子的，认为这帮逼样除了溜须奉承一无是处。佩服的也有，总工程师、高级知识分子，应知应会，理论实践一肩挑。还是朴素的专业主义，政治上不成熟的。

组织上通知陈禾，去运转班当值班长。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下一步，可能就是车间副主任。运转班是纺车转动的地方，纺织厂永动的心脏。在十九棉，一个运转班有一百六十多辆纺车，工人三班倒，纺车昼夜不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女工。技术好的女工，一人负责三台纺车，需要一刻不停巡视，一旦发现断线，马上接好，不然影响产品质量。看上去，是人在管机器，实际上，人被机器管着。机器不停，人也不能停。锭速每分钟一万六千四百转，每个手指都磨得发白发亮。长期处在高噪音、高粉尘的环境中，女工的嗓门普遍大，脾气普遍暴躁，开口就是妈个逼。某任厂委书记说过一句名言：黄浦江的水，纺织厂的嘴。男工要么负责维修、给纺车加油，要么就是值班长，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个别结了婚的阿姨，路数比较野，动不动调戏男工。开心了，或者不开心了，四五个阿姨一拥而上，扒掉男工的裤子，有时还往屁股上淋点机油。男工不能翻脸，算一条潜规则。谁都明白，这是她们日复一日的枯燥劳作中，仅有的一点乐子。要请病假，必须发烧到38度以上，低于这个度数，医务室只给开一个条子，上面写两个字：照顾。照顾的意思，就是少看一台车，或者少上半小时的班。一个人干活少了，势必别人来顶上。当男值班长面对五六个“照顾”的女工，格么问题来了，优先照顾啥人。一旦摆不平，风言风语满天飞。陈禾当时二十五岁，没结婚，人长得俊俏，出于“男孩子在外要保护自己”的心理，拒绝了组织的调令。

那天瞎子来找陈禾，神秘兮兮，拍着陈禾的肩膀说，你这臭小子，最近看上哪家的闺女了。陈禾莫名其妙。瞎子卖关子，我都晓得了。陈禾说，屁快放，我还有生活要做。瞎子没辙，只好从实道来。原来是同厂的雪珍师傅，拜托瞎子，替她女儿跟陈禾牵个线。雪珍一发嗲，瞎子胸脯拍得震天响，包在我身上，莫得问题！

陈禾说，不去不去，没那功夫。瞎子说，你小子，身在福中不知福，不晓得雪珍女儿有多漂亮。人家还是化工学院的大学生，哪点配不上你。陈禾说，哪点都比我强，我不高兴可以吧。瞎子开软档，再三央求，帮一记忙，随便哪能，跟人家出去一趟，他就算完成任务，雪珍那边有交代。陈禾好气又好笑。

陈禾之前谈过一个女朋友，算是初恋。女孩也是十九厂的，小时候练游泳，皮肤晒得黑，笑起来特别好看。下了班，两人去厂里的俱乐部，打打台球，要么并排坐着，看俱乐部里的电视。一起坐25路电车去外滩，然后走回定海桥。后来运动来了，女孩子

参加造反派，跟着人家开会，贴大字报，轿车进进出出，有时通宵不归。陈禾不开心，说过几次，没用，格么就算了。为此难过了一段时间。后来女孩托人跟陈禾讲，她肯定是清白的，希望能和好。陈禾没响。就这样子，结束。

雪珍家在十九厂宿舍，女儿经常看見陈禾走过，有天鼓起勇气问妈妈，前面过去的小赤佬是啥人？说完脸就红了。雪珍心里有数。厂里召开对敌斗争大会，雪珍把女儿带去，专门看陈禾。陈禾稀里糊涂，啥事不知道。倒是好多工人赞叹，雪珍的女儿真好看。

陈禾答应瞎子，见一见雪珍女儿。他有三个要好的小兄弟，成天混在一起。陈禾说，下班后陪我走一趟。小兄弟们一听，这种事体，阿拉不去的。陈禾说，走走走，屁话这么多。于是四人一道前去。小姑娘一看就傻了，也不知道该说什么。陈禾开口，说送你回家吧。小姑娘点点头。一路上，陈禾和小兄弟高谈阔论，小姑娘低着头走在后面。送到地方，说声再会。陈禾挺高兴，任务完成了。

几周后，收到雪珍女儿的信，约在外滩天文台见面。陈禾没多想，信扔到一边。雪珍女儿算好陈禾上下班时间，假装碰到，笑一笑，打个招呼。陈禾不放在心上。

陈禾在厂队踢球。一场比赛中，陈禾被一根埋在土里的铁钉划伤，当天发烧到四十多度，送到医院一查，破伤风。住院的日子里，雪珍天天带女儿探望。大热天，小姑娘又是揩席子，又是打扇子。陈禾过意不去。那天姆妈来病房，看了心里欢喜。姆妈坐了一歇，就说要回去了。雪珍母女也不管陈禾了，坚持送姆妈去车站，还给姆妈买了电车票。后来陈禾跟姆妈开玩笑，你值4分钱车票，4分钱把你买通了嘛。这事过去一年多，舅舅肺病复发，住进杨浦区中心医院。陈禾每天一下班就去病房，接替姆妈照顾舅舅。夜里支个躺椅，脚搁在舅舅床上。一天生活做下来，陈禾腰酸背痛，刚要睡着，舅舅推他，大毛，走盘象棋？陈禾说，不走。一会又被推醒，大毛，起来吃根香烟？陈禾骂，册那，啥人高兴吃香烟。舅舅说，我听人讲，医院里各式各样赤佬最多，一到夜里全出来。啥人睏着了，魂灵头容易被勾走。说得陈禾也怕了，只好坐起来，点一根烟，陪舅舅说话。

舅舅说，有个事我搞不懂。陈禾说，讲。舅舅说，我这个外外（外甥），又不瘸，又不聋，又不傻，工作又不差，一表人才，二十好几了，怎么连个女朋友莫得。陈禾不响。

舅舅说，听你姆妈讲，有个女师傅家的女儿中意你，你看不上人家？陈禾低头说，没有看不上。舅舅说，心里惦记别人？陈禾说，也没有。舅舅说，那是为啥。陈禾说，跟伊，好像没啥言语讲。舅舅说，感情靠培养，你都不给人家机会，讲什么讲。陈禾闷了一会，说，小姑娘姆妈，欢喜跟男工人发嗲，花头精足，厂里人传闲话，我不大喜欢。舅舅说，你买人家的猪，不买人家的槽，小姑娘人好就行，她姆妈关你什么事。陈禾不响。舅舅说，再讲了，女人发发嗲，很正常，也是聪明，戆大才吭哧吭哧死做。陈禾说，好了，不要再讲了。舅舅说，男人家，胆子要大，要勇猛一点。陈禾就笑。舅舅说，你以为你舅舅怎么跟我好上的，当初单位安排我俩去东湖疗养院，吃好夜饭，我约她散步。一看周围没人，我就把她抱住了。陈禾笑说，舅舅也是个下作胚。舅舅说，什么下作，正常的。都像你，闷声不响，好姑娘都被人抢光了。

窗外传来一声鸡鸣，陈禾看时间，凌晨三点半。舅舅说，鸡一叫，赤佬都收回去，可以放心睡觉，就怕鸭子叫，要收人。陈禾说，哪来的鸭子。舅舅屁股一撅，睡过去了。陈禾睁着眼到天亮。七点刚过，陈禾爬起来，冷水冲把脸，昏头昏脑去上班。舅舅心里晓得，他这病其实看不好了，无非是拖些日子。到九月，舅舅来上海，接舅舅回武汉。舅舅出院那天，陈禾回到家，看见雪珍母女也在。舅舅坐在桌边，看着陈禾说，这事定了，舅舅做主。舅妈褪下金戒指，戴在小姑娘的手上。

婚礼那天，姆妈请来饭店的大师傅，借了邻居家的桌椅碗筷，弄堂口支个大棚子，热热闹闹摆了十几桌。舅舅和舅妈从武汉赶来。喜字一贴，鞭炮一放，毛主席语录一念，像做梦一样，陈禾结婚了。

陈禾问妻子，你约我去天文台，约了好几次，我都没答复，你去了吗？妻子说，每次都去的。

接到舅舅病危的电报，陈禾赶紧去火车站，买最快的一趟车去武汉。还是没见到舅舅最后一面。追悼会上，舅舅神色安详，像睡着一样。陈禾晓得，舅舅从不朝天睡。舅妈哭得晕厥过去。想起舅舅说，男人家，胆子要大，要勇猛一点。陈禾潸然泪下。舅舅也变成赤佬了。

阿水写信来，扯东扯西。陈禾回信，亦不提感情。直到一天，阿水下了火车，直奔陈禾家里。见陈禾一手抱婴儿，一手调奶膏。阿水面色煞白，扭头就走。

北火车站月台，人群熙熙攘攘。阿水接过陈禾手里的行李，笑笑说，不好意思，没心理准备，失态了。陈禾说，没啥的。阿水说，以后大概不会给你写信了。陈禾说，嗯。阿水说，你说上海话怪吧，很多意思反着来的。欢喜一个人，就是要吃苦头。再会再会，是再也不会。陈禾黯然。一声汽笛，火车动了一下。阿水还想说什么，陈禾说，上车吧，车子快开了。阿水突然扔下行李，用力拥抱了陈禾。随后捡起包袱，头也不回地上了车。列车呼啸而去，带走一个时代的记忆。

浦西封控第五十一天，陈禾坐在房间里。房子是十九厂原来的宿舍。自从定海路老房子拆迁，陈禾便租下这套一室户，打算简单装修。三月底传来消息，浦西要封四天。施工队跟陈禾打招呼，还有些零碎生活没做好，要等一等。他手一挥，不用等了，老子自己动手。

3月31号晚，上海人叫小年夜，陈禾带着工具、换洗衣服、两包香烟，一个人住了进来。四天过去，生活做掉，形势发生变化。他，七十六岁，老卵了一辈子，被困在这气氛复杂的毛坯房里。

邻居大多是十九厂的老职工。厂早没了。连同国棉九厂、十二厂、姆妈的十七厂、密丰绒线厂、杨树浦发电厂、上海制皂厂、中纺机、自行车三厂、手表几厂、上钢多少厂、上无多少厂……一道消失在国企改制的大潮中。走在定海桥，抬眼可见废弃的厂房，如巨兽的遗骨，经历过工业文明的启蒙，也见证了工业时代的落幕。

十七厂最后的日子，整体搬迁至江苏大丰，正是陈禾阿爸当年送去劳教的地方。跟阿爸一样，再也没回来。

师傅们彻底吃瘪。全市五十三万纺织工人，绝大多数下岗，其中有十八位女工应聘当上空姐，成了报纸的头条新闻。杨浦六十万产业工人，十年不到，剩下六万。菜场、公交车上、弄堂深处，谈论的全是“买断”、“内退”、“再就业”。为了从这批次下名单上划掉自己的名字，或者争个低保，每月多几十块补助，去厂里吵，拍台子，放狠话，哇哩哇啦，其实都明白，工人阶级，没戏唱了。

送礼蔚然成风。有人开玩笑，那几年杨浦穷是穷，整条头的中华牌香烟，卖得最好。儿子出生没多久，陈禾和妻子离了婚，为一些如今看来不值得的事。他脾气犟，认死理，局面闹到不可收拾。法院出来，妻子——已经是前妻了——在门口等他，眼眶红肿，银牙咬碎，只逼出一句话，就这么算了？陈禾面色铁青，扭头就走。到没人处，痛哭了一场。

妻子远走香港，听说嫁了个有钱人，后随夫君赴加拿大。大洋此岸，陈禾当爹又当妈，把儿子拉扯大。这些年，喜欢陈禾的女人不少，对感情，对婚姻，他始终心有余悸。就这么算了吗，他苦笑一声，就这么算了吧。

我问陈禾，一个人睡在这陌生房间，会害怕吗？毕竟他说过，以前出差住招待所，灯必须彻夜亮着。陈禾沉默了一会，说，再跟你讲两件事吧。

刚解放那会，我还小，我们这片地方经常有国民党飞机来轰炸，工业基地嘛。有天夜里，我被爆炸声惊醒，光着脚跑到阳台一看，杨树浦发电厂起火了。复兴岛有驻军，探照灯全部打开，高射炮打在天上，一串串的。舅舅在厂里值班，家里只有姆妈。姆妈叫我进来，给我们三个穿好衣裳，抱着妹妹，领我和姐姐下楼。不晓得是冷还是害怕，我就一直发抖。后来姆妈抱紧我，我才不抖了。那天后半夜，我是靠着姆妈睡着的。

姆妈一直活到九十岁。那天夜里，姆妈睁大眼睛，一歇讲这个来看她，一歇讲那个来看她，都是过世的长辈。我也怕了，隔着被子抱住姆妈。我说姆妈，不要吓我呀。第二天早上，姆妈就不行了。我叫，姆妈，姆妈。伊睁开眼睛，看牢我，讲，大毛，不要怕。声音轻得像蚊子叫。我就哭了。我说姆妈，我晓得了，侬放心，大毛晓得了。你说怪吧，他平静地说，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怕了。



路明

大学教师，物理学博士，写作者。

生活亲历者

如果我们相信他人的存在，如果我们关心，那么我们写下的就有了意义。这是一个非虚构栏目，讲述亲历者的生活，但这生活里折射的往往不只是亲历者一个人。



图片来自 JuniperPhoton on Unsplash

非虚构

言者何罪

熊景明 | 小鸟文摘

曾经有一个人，说了一句真话，
付出青春年华

本书作者出生在甘肃定西农村，1957 年考取西北工业大学，进入令人羡慕的飞机设计专业。农家子弟在大学里适应得不错，他在省高校运动会短跑得了第二名，被选拔参加大学足球队。可以光宗耀祖的大好前程，因一句悄悄话被人告密而断送。“甘肃有饿死人的现象”这句话不过说出一个事实，对任何人都没有伤害，却暴露了那时需要严守的“国家机密”。中共中央在 1963 年 7 月 23 号发出的文件，要求批判处理占大学生人数千分之二的、政治上反动的学生。按这个比例，陕西“揪”出陈秉祺在内的十多名“反动学生”。他被送劳改，两年后被判 20 年徒刑，1979 年毛时代结束，才获得自由。少小离家老大还，此时母亲已经作古，不相识的小孩唤他做“爷”。他荒谬的遭遇，人生的悲剧，折射出整个民族的一段苦难历程。他被无辜定罪的原因，正是毛时代民族灾难的根源：人民没有知情权和思想、言论的自由。

饥荒，自古有之。中国大陆 1959—1961 年的大饥荒被视为二十世纪人类的最大灾难，其特征在于：在既无战乱，又无天灾的年份，有数千万人饿死；广袤的中国，从南到北，饥民都是生产粮食的农民，有人就饿倒在堆积粮食的仓库边；民间禁止公开甚至私下谈论饥荒。从给毛泽东写万言书的彭德怀将军，到本书作者这样的年轻学生，道出真言，就可能失去人身自由。

不允许说真话的社会，自然被谎言和谬误绑架。陈秉祺家乡的县志记载：1958 年 4 月 18 至 5 月 26 日，定西县召开二届二次党代表扩大会议，关起门来开了整整开了 39 天的会，名曰整风反右。会议制定了一系列行动计划，包括苦战一年，建厂四万个”，而当时定西县人口大约 22 万。甘肃日报报道了定西大跃进的成果：“定西一夜办起十个大学”。全县男女老幼在内，平均约五个人办一个工厂。这样的疯话，为何竟然成为党和政府的决议呢？很简单，如果有人不赞成，就成为批斗对象，可能被划为右派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立刻被剥夺说话的权利，受到严厉的惩罚，祸及家人。从官员到民众，为了自保，容忍荒唐和不义，以致社会好像得了神经病，疯狂举动接二连三。伟大领袖说一声“人民公社好”，不用下达文件，全国党政干部唯恐落人后。

定西几个月内就实现公社化，建立公共食堂，“农家锅灶全部取消”，一律在食堂吃饭。全县建立公共食堂 2376 个。1959 年，定西集结十万人，将土地深翻，即将土地表层养育农作物的肥土深埋 [1]。被称为大跃进的大疯狂是大饥荒的前奏。人民日报上赞扬甘肃“惊天动地的引洮工程”。工程计划修建一千多公里渠道，需通过崇山峻岭 200 多座，跨过河谷、沟涧 800 多处；要修建水库、水闸、涵洞、泄洪等建筑 1100 座，要把 18 座大山，从山顶劈开一个槽，使水流通过，最高处需下挖 180 公尺。从定西、天水、平凉 3 个专区近 20 个县调集十多万干部和民工。苦干了三年，十二个春夏秋冬后，以失败告终。这类令民不聊生的荒诞事，举国上下无一幸免。后人看来，十分不解，为什么没有人说“不”？答案同样简单：没人敢说，说了立即受到制裁。

1959 年 7 月，甘肃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向中央打报告“因缺粮和浮肿致死的现象和人口非正常外流的现象已严重存在”。报告自然是党内机密文件，但也被中央定性为“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提供炮弹”。甘肃上万干部因言论“右倾”受到批判。天水区就揪出一百零三个“反动集团”，成员达 700 多 [2]。他们的命运，以及数以千万计有良心，说真话的人的命运，大概都与本书作者相似。对甘肃大饥荒的起因、过程、灾难惨重的程度等，杨继绳的《墓碑》一书有详尽的记述和分析。按他提出的证据，估计甘肃大饥荒死人在 100 万以上。

直到 1990 年，众人还心有余悸，定西县该年出版的县志，对那场大饥荒也不敢直抒，只说两个公社“有剥树皮、宰耕牛、人口外流等问题”。不过，有心人将事实藏在统计数字后面。定西的饥荒开始前的 1958 年，死亡人数 2882 人；到 1960 年，死亡人数高达 14611 人，比正常年份多出一万多。县志说，定西 1960 年 7 月的县委扩大会议，“对人口死亡、外流、大家畜建设问题有所重视，但未提出实际对策，故死人问题继续发生”。“12 月 16 日，县委扩大会议，提出‘抢救人命’的口号”[3]。到饥荒严重时，中央要求各省每天提交饿死人数的报告。大饥荒发生，县委知道，中央知道。

言论自由的限制，从延安整风时代就开始了，1949 年之后，随越来越高昂的万岁呼声及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而推向极致。1957 年大鸣大放开始，以为从此可以结束谎言时代的人，纷纷自投罗网。失去话语权的民族进入之后三年疯狂的大跃进，喘息未定，又开始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疯狂。毛死去后两年，1978 年，陈秉祺还在狱中，申诉潮开始。许多人委托他代笔写申诉书。“很多案子十分简单，用不了两百字就可以说清楚。一个老头，把毛主席石膏像挂在脖子上，骑自行车回家，被抓了‘现行反革命’，判六年。另一位老先生，把‘打倒右派’，写出‘打倒左派’，把‘万寿无疆’写成‘无寿无疆’，被判十五年”。今天听起来匪夷所思的“罪状”，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累闻不鲜。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更不用说升斗小民，除了毛泽东一人，均被剥夺了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陈秉祺的朋友张九能，是极为少数没有被洗脑的年轻人，1970 年 3 月 5 日，这位在三年前提出要组建“争取人权同盟”的理想主义者，在长沙被枪决，结束了他三十年的一生。同一天，中国另外一位思想者遇罗克，在北京被枪决。

被打入最底层之后，人性中的善与恶都表露得更充分。他描绘在死伤频仍的采石场，设施简陋的煤矿服苦役的犯人，为争取“表现”而相互倾轧，也有人冒险保护同伴“我们像是在沙漠中被暴风雪困住的几只山羊，依偎在一起，用自己的体温去温暖对方”。书中记录的许多无辜受难者的经历，尤其是越狱的故事：挖地道，钻地下水道，夜游渡河，情节就像好莱坞电影。都有真实的姓名地点，读来令人心寒。“高强度的劳动和随时可能发生的工伤，好像大家都不觉得什么，唯独饥饿是最大的、时时刻刻都不能摆脱的，难以忍受的折磨。”被击毙的逃犯尸体摆在出宫必经的路边，将写有逃跑的下场的牌子立在旁边，以警示大家。”书中记述了一个在煤矿做工，来自农村的犯人，为了逃脱下井的危险，他装成腰有病，三年来躬身 90 度走路。等到刑满释放，他要求留下。比起饥饿的故乡，煤矿的生活“天天像过年”。

1961 年，陈秉祺不忍见家人在乡下受饥饿煎熬，他借故休学，试图帮家人“搞到口粮”。让人想起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在美国的华人崔琦。他出生河南农村，12 岁随亲戚到香港。成名后，记者问他道，如果你不离开乡下，结果会怎么样？回答出人意表：如果我不离开，三年困难时期我父母可能不会饿死。中国文化中这份浓浓的亲情，贯穿全书。感谢并钦佩作者，用许多感人细节，记录了那个年代的农村的苦难，也让我们看到中国农民的坚韧和智慧。作者的父亲德高望重，曾被乡亲推举，主持在 1960 年饿死的村民的超度。“方圆七、八十里，还有外县的人都赶来送上亡人牌位及香火，最后一天晚上烧纸的时候，整个一个河滩，火海一片，哭声一片。”

陈秉祺让我们听到时代的哭声，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曾经有一个人，说了一句真话，付出青春年华；一个民族，如果不正视历史，还原真相，给人民予思想和言论的自由，还会付出惨痛代价……

[1] 《定西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 年出版，38-46 页

[2]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107-160 页

[3] 同上

本文为《毕业之后——上世纪六十年代一个“反动学生”的经历》（香港九江文化出版公司 2013 年版）序言。

熊景明

1943 年出生于昆明，1979 年移民香港。1988—2007 年主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工作，其间参与多项中国大陆的农村扶贫项目，并编撰数本中国研究论文集。近年从事民间历史写作、推广、资料收集。

小鸟文摘

这是一个免费频道。我们希望更多读者可以以此了解更多。





图片来自 Kyrylo Kholopkin on Unsplash

非虚构

乌克兰：超越“后苏联” 伊莱亚娜·纳凯斯库 | 小鸟文摘

只有跳出古老的两分来理解东欧，
我们才能开始把握这场战争的意义，
想象新的团结。

“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实际上非常理解对方。这也许是这场反常的、不必要的战争……最令人辛酸的讽刺之处”，乌克兰记者娜塔莉亚·古梅纽克 (Natalya Gumenyuk) 写道，“我们了解彼此的心态。我们懂对方的语言。我们共享苏联的过去。”古梅纽克的比较强调了这点，即两个看起来如此相似的国家，可能多么不一样。

这两个国家的共同点让许多外国评论者感到困惑，并误导了他们。凭自传小说《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 成名的 J.D. 万斯 (J.D.Vance) 和国会女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 (Alexandria Ocasio-Cortez)，在政治上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但起初，他们都认为，美国没有必要对乌克兰的战争进行军事干涉。他们看起来认为，这不过是东欧人在和其他东欧人斗，一场局部冲突而已。虽然他们后来都改变了自己的意见，但他们短暂的一致表明，西方对乌克兰的误解时常创造出奇怪的同盟。

当然，以下事实也没有提供多大帮助。报道战争的记者主要是白人，他们大多是来自西方的男性面孔。有外国名字的很少，有外国口音的就更少了。在采访乌克兰人时，媒体往往会被他们塑造为惊恐、哭泣的目击者，而几乎不会把他们呈现为本国历史的专家。媒体上也看不到在后社会主义移民潮期间来到西方的数百万东欧人，他们的数量可是远远超过了 20 世纪 80 年代过来的少数难民。更早的那批难民显眼，是因为在冷战的语境下，他们关于社会主义创伤的叙事符合这边的需要。后来因为东欧社会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开放后遭受的巨大冲击而移民西方的人，则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忽视。

关于战争的巨大误解——即认为它只是内讧，是冷战的后续，是苏联时代酝酿的怨恨地释放——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不受阻碍，相当一部分的原因就在于这些人的沉默。事实上，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一样，东欧也为多种全球力量所塑造：从根源上说，这场战争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父权制威权主义和其他形式的性别主义、种族主义和全球迁移（其轮廓是由之前的所有迁移构成的）脱不了干系。只有跳出古老的两分（自由的西方 vs. 威权主义的东方）来理解东欧，我们才能开始把握这场战争的意义，想象新的团结。

虽然冲突是在民族国家的层面上展开的（虽然也有像联合国和北约那样的跨民族国家实体在背景中徘徊），但把这场战争放到作为一个地区的东欧语境中去思考至关重要。在下文中，我将回忆过去的一段时光。那时我所体验的东欧，是一个有自己的规则、主题和局限性的独立世界。大约在社会主义终结十年后，2000 年，我参加了乌克兰哈尔科夫的福罗斯夏令营。当时俄罗斯和乌克兰都还对来自西方的新鲜事物开放，在多年的审查后，知识分子也在尝试与他们的西方同行对话。20 年后，虽然在经济和军事上建立了各种同盟关系，但东欧依然既不是西方也不是第三世界，而它也以自己的方式与全球世界的问题遭遇。

*

出租车为避开一辆对头车而突然转向，迎面而来的灯光使我们一时无法视物。我试着看了看手表，猜测还有多久才能到。我们走的方向对吗？有没有迷路？无从得知。车子已经驶出辛菲罗波尔城外还算有灯光的双车道高速公路，进入一条被树林包围的更狭窄的路。我知道这趟旅行要花一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我没料到路上会一点光都没有。我没理由不信任出租车司机，但我也没法和他交流。他不说英语、罗马尼亚语、法语甚或德语，我则不说俄语或乌克兰语。那是 2000 年夏天，还没有手机。我在一个语言不通的国家，在一条荒凉的路上，在晚上，在我一个不认识的男人驾驶的车上。我不停地告诉自己，我在夜里被绑架的可能性不比在白天大。这个想法不怎么令人安心。终于，我看到一片光，原来是一条街，和不远处的一幢高楼。司机停下车帮我拿包。我们沿着有装饰彩灯照明的曲折小路走过公园。不远处传来波涛声。我呼吸着黑海吹来的微风。我抵达了目的地，第四届福罗斯性别研究夏令营。

这次夏令营是哈尔科夫性别研究中心在麦克阿瑟基金会拨款资助下，在黑海边上的一个克里米亚度假小镇福罗斯举办的，目的是在后苏联国家建立性别研究这个学科。福罗斯夏令营每年一届，从 1997 年到 2008 年一共举行了十多届。它鼓励全东欧的教学人员来学习性别研究课程，组织学术中心。哈尔科夫中心出版一个期刊和一套丛书，并分发学员制定的教学大纲。我已经在自己的母校创办了一个女性研究中心。事实上，在来之前，中间我还在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待了一年。在那段幸福的时光里，我想读什么就读什么，因为我第一次有机会进入一家由美国开设的图书馆。我期待在夏令营找到共同体。我的收获要多得多。

我从来没有被同时当作西方人和罗马尼亚人来对待，可那年夏天，人们就是这样对我的。大多数参加夏令营的学员来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包括乌克兰、俄罗斯、格鲁吉亚和白俄罗斯。我们之中那些后苏联空间以外的地方来的人被认为不一样，在积极的意义上如此。在我分享巧克力棒或香烟的时候，同行们会交换赞许的目光。除我外，还有三名学员来自后苏联空间以外的地方，包括两位来自捷克共和国的青年学者和我的室友塔妮娅。前者流利的英语让我羡慕，后者则很快和我成了朋友。她告诉我，她教的科目双重地不存在：南斯拉夫经济学。当时巴尔干战争已经结束。

酒店里的野兽派建筑和家具明显有社会主义过去的痕迹。从社会主义角度来看，它们还算不错。酒店的阳台俯瞰黑海，足够宽敞到不但能容纳桌椅，还放得下一张床，这样，人可以到外面伴随着波浪的声音入睡。宾馆有一个疗养院，它让我想起社会主义时代和祖父母一起度假的情景。宾馆也提供一些服务，比如说泥敷、水按摩和矿泉浴，如果有医生介绍，这些服务是免费的。在社会主义时代，我的祖父母、父母和几乎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去过疗养院并享受过这样的服务，相关的费用通常由他们的工会承担。疗养院的医生给我开了介绍，于是我也泡了酒店的矿泉浴。

参加夏令营的学者大多是处在职业前期或和我一样还是研究生的社会学者、历史学者和经济学家。他们来自第比利斯、圣彼得堡、哈尔科夫和莫斯科。夏令营的工作语言是俄语和英语，学员们早上听讲座，下午参加讨论。在海风习习的房间里，我们中的一些坐在地板上，另一些则靠在椅子和沙发上。在炎热的天气里，用我们必须阅读的复印材料给自己扇风。我们可以使用复印机、图书馆和打印机，我们还拿到了我们自己的研究机构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法提供的书和装订好的论文集。

一些主持研讨班的学者和一个松散的和平活动人士网络“黑衣女人”(Women in Black) 有联系。该组织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和前南斯拉夫战争。我们认识到，民族主义和支撑它的父权制是敌人——考虑到我们地区复杂的历史，这个认识来得恰到好处。我记得，我们用很长的时间来讨论像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弗拉基米尔·普京（当时还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和弗拉尼奥·图季曼那样的民族主义领袖所谓充满男子气概的壮举，过程中笑声不断。我们得知，有女人会给他们写情书，寄自己的裸照。相对于我们过去对社会主义领导人、我们的“国父”的革命之爱来说，这算是一种进步吗？晚餐时，我们边喝酒边继续讨论，边笑边抽烟，虽然我们不是所有人都说同一种语言——有些人懂英语，其他人讲俄语或乌克兰语，还有其他一些语言——但显然，许多历史经验对我们来说是共同的。

*

20 年后，东欧已经分裂了好几次：一些国家加入了欧盟，一些国家加入了北约，其他国家则依然处在这些空间的边缘。虽然 2014 年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但福罗斯疗养院依然接受预定。乌克兰的女性主义者还在继续努力。现在，所有主要的大学都有了女性中心。不过，在俄罗斯，异见遭到了压制，就像女性主义朋克摇滚乐队“暴动小猫”(Pussy Riot) 的成员，在对普京与东正教会的紧密联系表达抗议时得知的那样。30 年的全球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也给一些人，特别是白人，带来了史无前例积累财富的机会。历史上第一次，整个星球的财富都集中到了极少数白皮肤的男人手中。看起来，不是所有这些男人都对把他们的巨大财富和政治权力结合起来感兴趣。但这只是运气和倾向问题：今天他们还在发射穿燕尾服宇航服的宇航员操纵的火箭，明天他们就可能决定用媒体在数百万人心中播种他们最稀奇古怪的幻想。今天他们还在给自己的女朋友造天然形成的岛屿、那么大的游艇，明天他们就可能决定入侵一个有四千万人口的国家。谁能阻止他们？

当然，过去也有一些独裁者在臣民头上积累了大到无法控制的权力；也有一些人通过许多人的痛苦，在自己手中积累多到难以想象的财富。但我们当代寡头的财富规模之巨大，使一切此类与过去的比较都失去了意义。我们需要提醒自己，他们也是人，是也会变老、反复无常、小气、爱抱怨、好摆布人、说到底不一定明智的人。但他们的突发奇想可能毁灭数百人的生命。

只有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才可能正确理解普京的行动。他也是这些寡头之一。虽然藏得很好，但他的财富可能超过了 2000 亿美元，这使他成为这个星球上最有钱的三个人之一。如此，与其说普京是某种威权主义过去或共产主义遗产（毕竟，它在 30 年前就结束了）的产物，不如说他更多地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产物，而他的行动，也可以说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积累逻辑的延续。

自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当政的最后时刻以来，没有一个独裁者听起来如此精神错乱，如此自欺欺人，如此枉顾现实。1989年12月，齐奥塞斯库坚称，一定是境外势力操纵了原本顺从的，只想要社会主义和他的领导的人民——与此同时，工人们正在他发表最后讲话的阳台外抗议他的统治。没有什么能刺穿他的信念，显然，甚至在被带到行刑队面前时，他也坚持那么认为。没有什么能刺穿普京关于据说对俄罗斯的边界构成威胁的瘾君子、纳粹和性变态的怪异想法，也没有什么能刺穿那个为战争而捏造的万能借口：对方挑衅在先。

同样，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不是俄罗斯的战争，这是普京的战争。根据非营利性监督组织“无国界记者”的报告，在被评估的180个国家中，俄罗斯的新闻自由度排第150名。但在俄罗斯，依然有将近六千人在反对战争的抗议活动中被捕。2月25日的《新报》(Novaya Gazeta)采取了俄语—乌克兰语的形式以示反抗，普京警告其主编——诺奖得主德米特里·穆拉托夫，威胁他国际奖项也不能护他周全。俄罗斯的女性主义者也号召抵抗战争，并概述了战争对大多数平民和女性的影响。

毕竟，有钱人总没有办法避开战争的危险。富有的乌克兰人总能坐私人飞机离开自己的国家；他们可能已经取得多国国籍，在哪里都不需要难民身份。另一边，是穷人，没有资源或关系的家庭出身，没法逃避义务兵役的他们只能参军。拜登政府希望能够通过制裁，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俄罗斯的寡头，但制裁引发的通货膨胀已经对普通俄罗斯人的生活造成严重影响。普通乌克兰人也在携带自己的财物，徒步逃离他们被包围的国家。

*

奇怪的是，在福罗斯夏令营时，我们竟然没有想到阶级分析。我们讨论女性的历史、性别社会学、后结构主义和女性主义理论，阅读像克罗地亚女性主义者斯拉芬卡·德拉库利奇(Slavenka Drakulić)那样的女作家。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我们所有人的共有经验——贫困。我们的国家也没有进行经济改革。我们没有批判新自由主义，虽然我们是它的第一批受害者。

当时我的梦想是到西方旅行，比如在巴黎或伦敦生活，参观科隆和哥本哈根，米兰和巴塞罗那。因为没钱，所以这一切只是梦想，就算有钱，我也没签证。当时，我需要签证才能去西方旅行。我的东欧同行全都一贫如洗。我们挣扎着，靠微薄薪水付账单，通过慷慨的西方同行分享的复印材料阅读后结构主义理论。

就像在穷人那里经常会发生那样，我们变得执迷于神秘的经济带来的希望。朋友们会尝试最稀奇古怪的计划，突然有一阵，某人发财了，没人知道钱到底是怎么来的，而每个人也都想知道。可大多数尝试快速致富计划的人，最后只会变得更糟，他们失去所有积蓄，有时还会把自己的家也搭进去。

在福罗斯夏令营最后几天中的一天，我们去克里米亚最大的城市塞瓦斯托波尔玩。我走在老城区通往海事博物馆的阳光大道上，地上的黄叶宣告着秋天到来：那条街和它周围破败的景象可能出现在从斯普利特到塔尔图，从布拉格到圣彼得堡的任何地方。在社会主义下，它是我们不太关心的过去留下的痕迹。

毕竟，社会主义建起了现代的、舒适的公寓大楼。在它倒台后，这样的街道又变成了我们无法逃避的贫穷的象征；要是我们能够修复它们，那么我们就会恢复和我们在社会主义之前过去荣耀的联系，我们的城市就会看起来和西方一样。但那个下午，我看到了它们徒然神往的、不完美的诗。和我们一样，它们也是见证者。

事实证明，在回到罗马尼亚时，并没有什么全职岗位在等我。到10月份，我找到了三份相对稳定的零工：管理一个关于家暴的项目，在大学兼职教书，和翻译。这样，我才能（每月）拼凑出相当于150美元的收入。这个数不是在事后，为方便美国读者理解才换算过来的，当时我们就这样理解自己的收入。在多年失控的通货膨胀之后，政府已经把列伊的价值贬到了原来的万分之一，罗马尼亚货币也因此而变得如此不稳定、如此难以理解以至于没有人会以它为单位来思考。

我的收入算是平均水平，按当时罗马尼亚的标准来看，还不算太差，虽然每一份工作需要的时间都超出我最初的估计。除薪水外，它们都更像是全职工作。我几乎没时间睡觉。我还记得去超市时的那种无助感，因为单是买酸奶、面包、意粉和苹果，就花去了我一半的工资。在月末的时候我还得借钱，但我推测，在那个时候，每个人都这样。不过，那时，和更东边的同行，无论是俄罗斯人还是乌克兰人比，罗马尼亚人的收入高多了。我得知，格鲁吉亚人每个月的生活费只有15美元，每天还只有几个小时有电。我记得我还问过，“你是说50美元吗？”

“不，15美元”，那个女人回答说。

那是2000年。但当时距离社会主义在东欧所有国家倒台已经有十年了。人们几乎没有理由想象情况会变好。

我开始申请有女性研究博士项目的美国大学。我对别的东西不感兴趣。在我把四份厚厚的申请资料寄出去几个月后，我的雅虎邮箱收到一封简短的邮件：我被一个博士项目录取了，同时还得到了为期四年的助教奖学金。给我发信息的是一位美国教授：姐妹加油，她说。我想表示感谢，但我没法想象有什么平等能够克服我们之间的地位差异，无论是从行动自由、权力还是财富的角度来说。

那时，我还不理解东欧人身上“白人性”的不稳定，以及何以这个不稳定，把我们楔入了权力与无权之间复杂的中间地带。现在我意识到，在不反思种族所起作用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理解乌克兰战争和西方对它的反应。学者们创造了形形色色的名词来表达与白人性接近的种族化范畴，但也许，理解东欧人代表的种族矛盾，最简单的方式是理解这点，即我们是白人但不是西方人。也许，在被用来针对罗姆人的时候，这个白人性表现得最为明显，它表明，我们是有权力的一方。罗姆人是乌克兰的一个少数族群，它在这个地区有着漫长而痛苦被剥削的历史，曾遭受过长达半世纪的奴役。

但非—西方人的身份又表明，在世界上我们是无权的一方。CBS新闻的查利·达加塔认为，东欧人“相对文明”、“相对欧洲”。虽然他已经为此而道歉，但这个惊人之论向我们直白地展示了在西方人眼皮底下摊开的全球等级座次。一方面，相较于其他地区的有色人群，东欧人又“文明”又“欧洲”，更“像我们”（西方人）。

比如说，几年前，媒体报道叙利亚难民危机的方式就截然不同。另一方面，东欧国家

又被认为只是“相对”文明，只是“相对”欧洲。对西方来说，只有在被拿来和他者——有色人群，信仰其他宗教的人群——比较的时候，乌克兰人才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然后，它又会被放到某种从属、次要的位置上。

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总统说，乌克兰人正在成为“欧洲的平等成员”而努力，这个努力不大可能取得成功，即便乌克兰入欧的进度已经奇迹般地加快了。根据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来判断，甚至加入欧盟，也不一定就会带来繁荣，大多数东欧国家都经历过一波又一波的人口外迁。对东欧家庭来说，家庭成员分别在三、四个不同国家生活相当常见，这是社会主义倒台后社群联系进一步解体的结果。只有少数波兰和罗马尼亚公民从欧盟拿到还算可观的经济上的好处，许多人依然贫困。

出国工作的机会可能缓和了贫困最恶劣的影响，可随之而来的是人才流失，东欧国家的医生和护士正在流向西方，后者没有投资他们的教育却享受了他们带来的红利。在欧盟，东欧工人依然被看作不受欢迎的二等或三等公民，哪怕他们对当地的经济来说是必要的。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罗马尼亚的农业工人还被空运到德国农场，在不卫生、不安全的条件下工作。

因此，在回应这场战争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又回过头去不加批判地使用像“自由世界”这样的表达。就像普京不只是后殖民主义的产物，也是、并且也许主要是贪婪的新自由主义产物那样，乌克兰也不只是一个后社会主义国家，它还是全球移民回路的一部分。逃离乌克兰的难民不只是乌克兰人和罗姆人，还有印度学生和各种背景的乌克兰黑人。东方 vs. 西方的老框架没有考虑种族化的经验，也没有考虑一些乌克兰人有望获得，而其他乌克兰人不可能获得的白人特权的程度。但只有把种族，把种族化语言的作用——这种语言不但给人们的经验和痛苦划分等级，还决定了谁（具体而言，因为接近白人而）值得同情——也考虑进去，我们才能走向真正的民主，一种无论肤色和民族出身，人人都能切实体会的民主。

*

2月27日星期天，俄罗斯人用火箭炮袭击了哈尔科夫和那里的三十八所大学和多个思想超前的性别研究中心。平民不是职业军队的对手。

在开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只希望战争消失。美国已经把本世纪变成了一场永无止境的战争，我担心乌克兰会成为这场战争的下一个实例。摧毁公寓楼的导弹，被破坏的基础设施，在被炸毁的混凝土残骸间寻找过去生活痕迹的平民——这些影像熟悉得令人心碎。战争已经在破坏乌克兰城市的生活环境了。留在哈尔科夫的平民，但凡住得离杂货店近，还能冒险出去购买生活物资就觉得自己幸运了。在美国安全生活的我，能问的唯一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还没有上路？

后社会主义空间的区域团结也正在再次出现。“暴动小猫”最近在推特上发了一个关于哈尔科夫被炸毁的中心的视频，她们回忆说，就是在那个性别研究中心，她们第一次读到女性主义书籍。乌克兰难民也在摩尔多瓦、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得到庇护——与乌克兰边界线最长的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还被认为是欧洲最穷的国家。在像英国、欧盟西部国家和美国那样的富国还在观望，还在考虑要不要出力、出什么力的时候，它们救了急。

据报道，边界发生了种族主义冲突。战争和灾难加剧了已有的等级和脆弱；LGBTQ难民的生命面临的威胁增加了好几倍。不幸的是，大量在后社会主义框架内思考的主流东欧知识分子回避一切对西方民主的批评，并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们就一直在怒斥政治正确。但东欧的新一代学者和活动家已经做好了接受反—种族主义政治的准备。这种政治具有全球视野，强调交叉性视角，并以最弱势的人的需求为中心。有色人种记者已经表明，优先使用种族范畴来进行分析，对理解这个地区来说至关重要。从东欧的历史经验中——在历史上，这里的人一直是二等公民，是非西方的白人，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下的穷人——应该出现一种新形势的团结，一种把从第一世界到第三世界所有地方的穷人和有色人群关联在一起的团结。与要求白人性（现有的框架只会短暂地承认我们是不完整的白人）或“文明”（无论它意味着什么）相反，我们可以从边缘，依靠我们的社会主义记忆，要求结束全世界的寡头统治，结束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给所有人真正的民主和自由。

伊莱亚娜·纳凯斯库

罗马尼亚裔美籍作家、学者。她在终结罗马尼亚的社会主义和齐奥塞斯库独裁统治的起义中长大，后来到美国攻读女性研究的博士学位，现在是罗格斯大学女性、性别与性研究系的教学助理教授。目前，她正在写一本有关社会主义童年的回忆录。

译者：王立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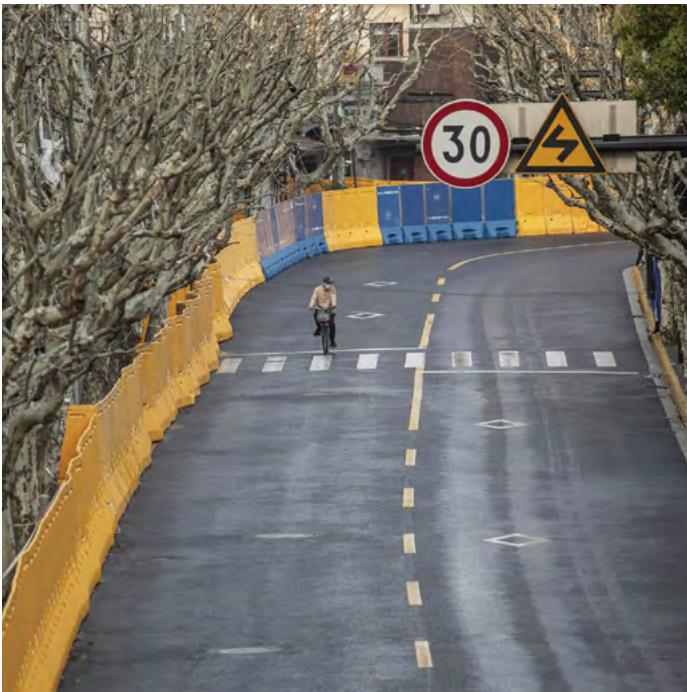
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比较政治学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原文来自 Ileana Nachescu, “Ukraine: Beyond the Postsoviet”, Boston Review, March 4, 2022. 经作者授权翻译。

小鸟文摘

这是一个免费频道。我们希望更多读者可以以此了解更多。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等领域均有贡献，是国内少数将社会学理论与实证结合出色的社会学者，著有《“青年”与中国的社会变迁》《城市中国的逻辑》等，编有《移民上海》《寻找住处》《都市大开发》等。

最近十几年，陈映芳致力于转型社会研究，去年在台湾出版《秩序与混沌：转型中国的“社会奇迹”》一书，是近年难得关于中国社会现实的学术专著。在书中，她试图解释一个被称为“中国稳定之谜”的现象：

“在 20 世纪 70 年代特别是 90 年代以来的社会经济 / 社会体制变动中，中国发生了诸如价值规范大转折，数百万职工下岗，数亿农民流动，土地 / 城市大开发，社会急剧分化……这样的一系列社会剧变，可是，总体而言，社会群体之间并没有发生激烈的冲突，城市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骚乱，人们的生活秩序看似也没有崩溃……所有这些，究竟是如何可能的？”



上海市民哀悼胶州路事件的罹难者。
图片来自 Wikimedia

档案

转型中国何以稳定？ 陈映芳访谈

曾梦龙 | 小鸟访谈

“大家充分意识到了现代城市文明和个人命运的关系，它的被破坏对我们每个人意味着什么。”

在过去的讲座和课堂上，陈映芳曾多次把胶州路事件当作案例，向学生讲解“何为城市文明”。

胶州路事件指 2010 年 11 月 15 日下午，上海胶州路 728 弄 1 号一幢 28 层的公寓大楼（教师公寓）发生火灾，造成 58 人丧生、71 人受伤。火灾发生后，上海市民自发、持续地展开追悼活动，并在“头七”那天，10 多万人来到受灾大楼现场，并然有序地向罹难者鞠躬、献花，被外界赋予“上海觉醒”、“公民社会”等意义。

陈映芳觉得，“上海觉醒”、“公民社会”这类说法，有过度解读和拔高之嫌。火灾之后，除了受灾群体自身的维权行动，公众没有展开以立法或体制变革为宗旨的公开大规模联合行动，政府也只是象征性地将 11 月 15 日设立为上海的“城市公共安全日”，没有对城市防灾体制和市民防灾系统做出重要改变。

不过，事件仍然有着积极意义。“芒福德反复地强调，城市就是一座剧场，正是在城市中，人们表演各种活动并获得关注，而社会戏剧的出现需要借助于各种集体活动的汇集和强化。从这个意义上讲，胶州路上参与集体祭奠的市民，是通过扮演‘文明的市民’的角色行为，表达了对现代城市文明和社会公正价值的集体认同，并成功地向全社会展现了其对理想价值规范的实践能力。”陈映芳在新著《秩序与混沌：转型中国的“社会奇迹”》中写道。

她认为，“作为对中国国情特殊性的一种反证，长期以来，‘上海’的都市性一直被赋予了中国现代性的意义，成为‘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可能性’的想象依据。这样的想象在某些特殊的时空中，会一次次被论证和强化。事实上，自 2020 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上海因为在承担繁重的国际航运任务的同时，以较为开放的防疫模式恢复、维持了经济生活秩序，并多次较为快速有效地控制了本土病例的扩散，由此再一次被网民们誉为中国现代化的榜样。”

在“文革”时期度过童年、少年时代的陈映芳如今是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她 1977 年考入江苏师范学院（1982 年改名为苏州大学），本科和硕士均在历史系就读。到了 1980 年代末、1990 年代初，“焦躁不安”的她有机会赴日本京都大学访学，却难以维持自己的历史专业兴趣，转而到大阪市立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

博士毕业回国的 20 多年来，她将上海作为中国研究的田野，在青年、城市、家庭

2022 年春天，上海因疫情封控两个月，涌现各种乱象，让人百感交集。一些人哀呼上海何以至此，另一些人转而批评上海。随后多地疫情的爆发和处置，又让不少批评上海的人意识到，病根绝不是单一城市的问题。那么，如何理解此次疫情中的上海，以及在更大图景下思考中国社会的转型？于是，我在 5 月联系了陈映芳教授，希望她能谈谈疫情期间她在上海的生活、感受和观察，也就《秩序与混沌》中的一些问题加以讨论。

陈映芳说：“城市治理中的国家 – 社会关系演变，以及城市生活秩序的脆弱性，原是我这两年重点关注的几个问题，去年我们团队成员就一直在浦东一些社区做调研。但无论如何也没有预想到，突如其来的灾难性事件是以目前这种方式降临到这座城市，说实话也没料到我们自己会统统被卷入到这样的生活危机状况中。”

谈及封控中的生活，陈映芳称，相比失业、老人等群体，自己和家人有稳定的工资收入，身体也侥幸没有遇到特殊状况，另外所在区疫情相对较轻，应该说比其他封控更严的区域的居民要好过太多，所以她不愿多讲自己。

但是，两个月的封控生活，她的学术研究和日常生活几乎处于停摆状态，只剩下了生存功课和情绪起伏。应对一次次的核酸检测，参加小区的团购群团购食物。除了教学工作，单位还要求导师们关注学生的生活情况，每天向学院汇报。

“前段时间根本看不进书，也不上电脑工作。我知道一些有毅力的朋友在做记录，这座城市发生了什么、自己经历了什么。我连这种心思都没，每天为食物的储备和蔬菜的保鲜焦虑，余下的精力都化在消解情绪上了，网络上不时会有令人震惊的新规定和各种道义灾难的信息传来。”

作为社会学者，在以往的社会调研中，陈映芳曾到过各种社会问题的现场，包括大灾害的现场。但这一次，跟所有人一样，遇到了超出想象的历史性事件。她面临的首先一个挑战就是——如何解释、定义眼下发生的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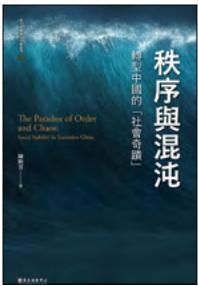
“我在《秩序与混沌》中曾专门讨论过‘例外状态’、‘情景定义’等问题，也对中国社会转型的意义框架作过解释。可今天发生的事情显然需要新的解释。疑惑和愤慨是普遍的，几乎所有人都在问，这到底是因为什么？”

“当然，我相信许多人渐渐作出了自己的判断，依据常识及逻辑、历史参照等，而且也可以看到不少共识。至于客观的社会事实，相信以后的学者会有揭示和分析。但社会学不仅要确认社会事实‘是什么’，更需要解释‘为什么’，尤其是在社会层面，对各种主体间关系的突变，一些群体、社会角色的行为规范的异常等等。如何解释？它们确实困扰着我。”

“此外，还有一个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上海这座城市在中国的命运。周围一些朋友比较悲观，我也是，因为很容易联想到近代以来上海和其他一些城市的命运，甚至联想到明清时期的江南等，历史上那些相对先进发达的地区和城市曾遭遇的被牺牲的命运。”

“尽管这样，我还是期待上海能够浴火重生，这不单是上海的事，而是关系到中国的文明化进程的问题。我们讲人类社会的文明冲突，通常会以民族 / 种族、国家、地域或宗教为单位，但其实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或冲突，同样存在民族国家内部。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商业文明之间的不同，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紧张，不同的政治文明之间的冲突等等。城市文明属于现代性范畴，它不仅包含了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和生活 / 生命的保障体系，它也在孵化现代的政治文明。”

“不仅如此，城市的健康发展也直接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价值目标、生活方式。这些年正在重新形成的个体和共同体的关系，人们的生活结构，社会联结的方式，还有正在持续转型的城乡关系等等，无不与健全的城市社会能否形成有关。相信这次大家充分意识到了现代城市文明和个人命运的关系，它的被破坏对我们每个人意味着什么。”她说。



01

市民、青年、知识分子

回想疫情，陈映芳对社交媒体上呈现的一些上海市民行动，印象深刻。比如，上海许多小区里的居民拿着锅碗瓢盆搞的阳台音乐会，还有网上的音乐会、纪录短片，年轻人唱 rap 之类，看得她热泪盈眶。她想起以前周立波的海派清口曾激发出上海市民的身份认同，但那有点偏于地域化和被窄化的上海人身份。而这次的各种艺术表达，包括不少本土方言艺术，一下把这种认同扩展为公共性、现代性的东西，形成一种具有普遍市民身份认同的城市共识。

一群防疫人员试图带走“密接”的阴性市民隔离，但被市民拒绝。一位身穿印有“警察”字样防护服的人称：“如果你拒绝被转运，将会受到治安处罚。处罚以后，要影响你的三代！”那位年轻的居民平静地回答道：“这是我们最后一代，谢谢！”

“以前中国有家族连坐、保甲连坐，这次搞楼栋、社区连坐，最后居然威胁要牵连到三代。”那位市民的决绝回答把整个华人世界都引爆了。我听到‘最后一代’四个字的当时也被震到了，马上联想到了我想象中的真正完整意义上的‘市民’。市民不是说不要孩子，而是我自己就是完整的个体。作为个体的人本身即是人的目的，你不要拿任何共同体（如家族、后代、国家）来胁迫我，我不接受这个胁迫。”陈映芳说。

上海徐汇区湖南街道高邮路的一个老奶奶，据旁人介绍她是研究沙林毒气的化学专家，她用专业知识向居委会论证开放空间消杀不仅毫无作用，还会危害居民健康、污染水源。而且，她还用亲身经历提醒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在读研究生，那时我们学校处理三种人。有的人很单纯，很听毛主席的话，戕害了那些教授，（最后）坐牢了。所以我们这里有些人做事情的时候，也要动动脑筋。我这合法吗？不要说政府叫你做什么，但事情是你做的，你是成人。领导不一定是对的，脑袋长在自己头上。”

另外像一位身着红衣、佩戴口罩和面罩的男性市民，高声地向防疫人员和警察普及法律知识。他称，法律有授权才能行使公权，法无禁止我就可以行使私权；消防法规定，任何组织都没有权力堵塞消防通道；公安穿着制服执法，有可能超越法律范畴执法，那也是违法；“硬隔离”，要拿出书面文件的公示。“做事要有法律依据，不是领导为所欲为，不是无法无天的时代。”该男子说。

陈映芳觉得，这样一些市民具备了个体独立意识和专业化知识（或基本的防疫知识、法律知识），在面对不正当的执法行为时能够理直气壮地表达出来。他们懂得如何维护自己的私权，包括监督公共权力应该怎么执法。这类现象在这次上海及北京等城市的封控中，到处可见。这意味着市民拥有健康的民权 / 私权意识，同时有能力在城市这座舞台上，将个人的生命、生活安全问题拓展为一个城市公共议题，从而与公权力展开价值规范博弈。这应该被理解为城市文明、亦即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成就。

除了看见市民的行动，陈映芳这次还听到了一种声音，说上海的知识分子群体不行，很少见有站出来发声的。同时，也有上海的人文学者在强调启蒙的重要性。在她看来，启蒙有着近代性，在中国无疑仍有重要意义。但是，这一次，摆在我面前，同样迫切、且更具挑战性的，是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有机知识分子的专业化实践型行动。

“在这次城市危机中，突出的问题，不是民众观念上的蒙昧或行为规范的落后，换句话说，不是市民迫切需要被启蒙的问题，是城市管理中‘例外状态’如何被确定，以及法治原则和专业化管理、社会共治如何被落实的问题。而市民最需要的，是以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保护自己的生活 / 生命安全，以法律手段来抵制权力对自己权利的侵害。所以我们不难看到，那些法学专家、医学 / 防疫专家们忠实地他们专业理念和职业伦理的发声和行动，是多么珍贵、重要。”

“我理解社会对‘知识分子’、‘青年’等群体在中国转型过程中的角色期待。但是，对于近代以来已经形成有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的相应传统、且已形成有市民群体的城市，在那些对德先生、赛先生以及法治理念等早已有普遍共识的社会里，每个市民都可能是强大的方方。事实上，我们每天都看到强烈的表达，向全社会、全世界传播。很多人的自媒体上都有现场记录，有封控日记，有的学者朋友新开了公众号，记下封控生活中的精神感受和思考所得，还有不少摄影家在街头拍摄记录（前些天，上海一些艺术家曾在网上举办了一个展览，《献给静默的上海》）。”

“我觉得，这次上海市民的很多表达在高位，很艺术。对人性的呼唤，对自由的渴望，对生活荒诞性的深刻揭示，对市民普遍遭遇的生活危机和次生灾难的广泛共情，对城市作为市民共同体的命运的担忧……比起我们社会科学的概念化思考，艺术所表达的价值更普世，其精神性更强大。而且，从中我们能感受到表达者的精神自信和人格完整。所以，这一次，我深感不是文人学者启蒙谁的问题，而是我自己每天在被市民启蒙，从年长的爷叔阿姨到年轻的说唱艺术家。虽然这么说可能是在为自己的无力感辩解。”

SYLLABLES OF SILENCE
献给静默的诗篇

2022年的上海春天，几多况味。
春光在空无一人的街道渐渐逝去，
晚樱烂漫怒放，又兀自凋零。
鸟鸣依旧清澈，
但我已无法分辨夜莺与乌鸫。
没有开幕的展览已经闭幕，
时间，被摁下了暂停键。

我们给静默拍了很多照片，
也写了很多献给上海的诗篇。
在重新感知时间的此刻，
我们邀请了20位
经历了长达2个月居家隔离的“上海人”，
他们是艺术家、摄影家、诗人、学者，
他们也是亲历者、记者、言说者，
呈现这场献给静默的展览，
亦是为了忘却的纪念。

《献给静默的上海》展览截图，
原链接已不存在。

相比之下，她觉得现在许多知识分子身处的大学，恰恰是市民意识、现代性的洼地。从制度上看，大学还保留着单位制，有着一整套管理体制，像近代知识分子那样生产并传播“新知”、培养“新人”，对今天的人文知识分子已非易事。“我很希望今天的国际形势和国家 – 社会关系所呈现的局面，能够成为一种历史性的契机：让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家可以反思自身的局限性，能够击破一些依附于宏大概念的幻象。”至于“青年”，通常指青年学生，曾是陈映芳长期关注的对象。最近每年五四青年节，我几乎都能看到有人转发她在 2015 年和历史学者唐小兵的对话《你怎样，时代就怎样——关于青年问题的对谈》。但是，这两年她越来越不想谈这个话题，因为在她看来，中国对青年的期待是近代产物，但这种角色已经解体，实际功能也已弱化。“现在每年大家还在呼唤青年，是因为公民社会、公民期待被压制。跟近代拯救民族共同体的政治性、正义性角色不同，现在年轻人从小到大被高度规训，而他们的角色规范是不辜负家庭、社会、产业化资本的期待，尤其是大学生，往往是些高度角色化的好孩子。这次上海 70 多万的大学生被封控在校园里，不少学生被限制在宿舍里，生活被严格管理。他们的家长和老师特别担心的是他们的心理状况。而他们自己，也很努力地尽量不让家长担心、不违背学校的规定。”“很难想象，古今中外是否还会有另一个相似的例子存在。我不太愿意将我们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去观察、分析，只希望他们能身心健康地度过这个特殊的困难时期。我愿意相信将来他们进入社会后会逐步完成自我教育，在独立的工作和生活中成长为成熟的市民。所以，每年来一次青年期待，我都觉得难为情。我觉得成年人最好自己先成熟起来，自己想想自己的责任吧！有没有扮演好市民、公民的角色？”正如她在 7 年前的对谈里提及，“胡适说，真正成熟的社会，成年人应该成为改革社会的主力，而在中国，成年人都站在后面，却把青年推到时代前沿，中国青年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如果成年人自己未能为下一代创造较好的政治环境，自己已先期去政治化，这种情况下去指责年轻一代的政治文化，这有失公允”；“在人们被允许、鼓励退回到私领域的过程中，年轻人的保守化几乎是很难避免的”；“公域不存，则私域难保。从私域重回公域，在私域生活之外扮演公民角色，这是如今中国不同世代的人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2021 年，张文宏陷入舆论漩涡时，陈映芳写过一篇文章《“保卫张医生”，我们想要保护什么？》，里面讨论了城市管理的专业性和例外状态。这些话题在今年的上海疫情中更凸显价值，比如防疫问题应该交给专家；例外状态可能成为国家权力扩张的契机被制造；城市管理有点回到唐朝“坊市制”城市的味道，将居民和市场分开，采用军事化和政治化的管理方式。她想起：“1949 年，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和南京的方式是很不一样的。共产党高层清楚地意识到，如何解放和接管上海，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上的形象。陈毅专门对军队作了教育说服工作，强调要让世界看到共产党有信心学习管理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这次上海封控期间，正好遇到“上海解放”73 周年的日子（5 月 27 日），她注意到，有关当初解放军进上海时是如何保护城市秩序、如何不影响市民生活的这段历史，在网络上被热传。



家庭力红利和策略失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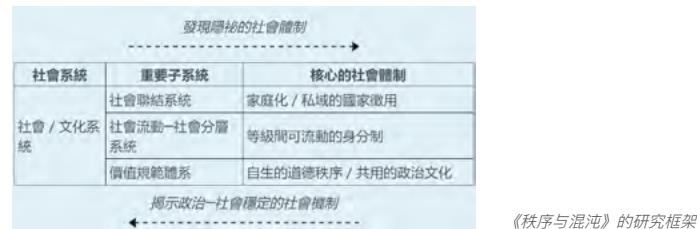
如果说陈映芳对上海疫情的观察只是一个切片，那么她在《秩序与混沌》中的论述则是长时段和多维度观察中国社会的棱镜。

正如前面提及，《秩序与混沌》希望解释 1970 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发生剧变，何以保持稳定？陈映芳称，关于这个问题，过往研究比较偏政治学解释（如威权韧性、精英凝聚力、城市稳定），社会学领域则偏重国家中心主义视角（如周雪光、冯仕政等人关于国家治理的研究），而她希望“重新发现社会”，回到社会中心主义视角，而且，不是狭义的社会中心主义，是在回溯古典社会科学基础上的跨学科研究。

首先，她将制度分为根本制度、中层制度、操作性制度三个层次。以城市开发研究为例，城市土地国有制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根本制度，中层制度指城市开发体制，操作性制度则是动迁安置条例等。

中层制度又被她称为“社会体制”(system / subsystem of society)，陈映芳认为，社会的变动、国家的重建，往往是经由这些社会体制的创设、更新来实现的，但是相比根本制度和操作性制度，社会体制往往比较隐秘，不被人察觉或者认知清楚。所以，“发现隐秘的社会体制”成为她揭示“中国政治—社会稳定机制”的分析路径。

接着，她将社会体制分为社会联结系统、社会流动—社会分层系统、价值规范体系三个重要的子系统加以研究，解释其对应的核心社会体制分别是家庭化 / 私域的国家征用、等级间可流动的身份制、自生的道德秩序 / 共享的政治文化。这三个核心社会体制也成为我们理解 40 多年来中国社会剧变和稳定的关键。



在社会联结层面，城市社会的单位制和农村社会的人民公社制解体以后，个体、社会、市场、国家之间的联结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陈映芳认为，“家庭化”是这期间最具影响力的内容之一。在急速的市场化、城市化进程中，家庭纽带、家庭责任的重新强化，一方面支援了个体的社会流动、生活保障，同时也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机制。比如在后文革时期，家庭是吸纳几千万名知青回城的重要主体，包括家庭提供居住条件、父母让出就业岗位、家庭成员帮助建立婚姻家庭等；

在 1990 年代后期开始的职工下岗大潮中，享受退休待遇的老年父母普遍为中年下岗的子女及孙辈的生活、教育等提供了经济支持；

随着 1990 年代公共产品供给的市场化，三代合力购买住房，以及家庭共同保障成员的教育、医疗等需要，成了大多数家庭的生活模式；

在公共幼托机构萎缩、社会育儿设施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祖辈隔代抚养的方式被延续下来；

在包括打工潮、出国潮在内的社会流动大潮中，各种形式的家庭合作，助力了流动者实现其流动目标。

“如果说中国近几十年来的经济奇迹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所谓‘人口红利’、‘流动人口红利’的话，我们同样可以说，在社会大转折时期的社会稳定的奇迹，很大程度是得益于这样的‘家庭力红利’。”陈映芳在书中写道。

不过，她指出这种“家庭策略”（转型期以个体和家庭的上升流动为共同目标、以实践家庭成员间互助合作关系为基本形式）并不能长久持续，具有条件性，而且当前正处于失灵，面临危机。

比如，“老年人将养老保障的期待转向社会，并接受老后主要从市场购买长期照护服务的事实，从而开始改变与子代的经济一体化关系；女性开始拒绝被性别化、无保障的家庭照料劳动责任，乃至抛弃原有家庭关系或放弃家庭再生产的计划；留守儿童现象的长期化……所有这些，实际意味着行为者对原有家庭目标和家庭协作关系的选择性改变——这构成了当下中国社会中‘家庭策略’渐趋于失灵的普遍情形。而农村中大量失养老人、留守儿童及夫妇长期分离家庭的存在，亦反映了在目标—手段关系失衡背景下，家庭策略正趋于失灵的趋势”。

所以，陈映芳认为，如果缺乏公共政策的配套支持，转型期成功的家庭策略很难长久持续；如果国家和社会不能为个体和家庭赋予相应权利，家庭的价值地位也将被国家主义和个人主义所压倒或取代。

关于中国的家庭演变，人类学者阎云翔近年提出一个有影响力的观点，1990 年代以来，中国正在形成不同于传统家庭主义的“新家庭主义”(neo-familism)——一个体重新嵌入家庭是由于社会发展的局限让人们难以获得其他社会支持，面对种种不确定性的挑战压力，人们只能策略性地选择回到家庭内部寻找安全性。

“阎云翔老师是文化阐释，我在功能层面讲得多一点，更关注法律制度和城市政策，觉得现在家庭策略在功能层面已经衰退，不大可能再延续下去。这是我和他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也矛盾，讲的都是关系性和建构性，是有条件的。”陈映芳说。

社会流动缓和了不平等

在社会流动—社会分层维度，陈映芳希望解答的问题是，在国民平权没有制度化落实，而贫富之间又高度分化，且作为理想类型的中产阶级并未真正形成的现状下，社会冲突是如何被避免的？

她认为答案的关键是“等级间可流动的身份制”。关于身份制，她强调这不仅仅是一个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问题，而是一个国民身分等级制。它由户籍身分、职业身分、居住身分以及政治身分等子系统综合地组合而成的一个完整复杂的社会分层系统。而且，它还是一套社会管理制度。

以社会保障制度为例，1990 年代后，中国开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但仍旧继承了旧制度的一些不平等，还诞生了新的等级化制度。

比如，城乡二元体制，像中国人均卫生费用的城乡比在 2003 年为 4.0，2008 年为 4.1；

城市社会保障的等级化、干部特权化，像退休制度中的老干部保障特权、职工退休的双轨制度”（企业职工退休待遇低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医疗保险与住房保障中的区别化待遇（党政机关、事业机构享有医疗补助、住房补贴）；

低覆盖率、低度保障，像社会保险并未覆盖全体国民；保障程度也偏低，“因病致贫”成为社会问题；“住房难”成为城市贫困阶层和流动青年的突出问题，被视为城市秩序的一大隐患。

陈映芳称，公众对于公务员公费医疗保障制度和干部医疗保健制度的批评，也是这些年来的焦点问题。像 2006 年的一则消息称，原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曾披露中科院调查报告的资料，政府医疗投入的 80% 为 850 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该报道在一时引来网民对“干部特权”的强烈反响。尽管后来相关当事人曾就此报道及相关资料存在“不实”的情况作了说明，但此报道至今仍然广为流传，而政府和权威机构也没有就“公共医疗资源”的实际分配情况给出任何资料或说明。

为了回应民众批评，政府也做了一些以“民生”说法替代“民权”的改革，但并不彻底。像公务员公费医疗保障的问题，地方公务员已经开始改革，但中央公务员的改革按兵不动；干部医疗保障则直接被排除在改革目标之外，政府没有做出任何承诺，相反，这些年来，中央政府各部委和各地政府有关“提高”干部医疗保健水平的各种政策文件不断推行，中国医学界也已经建立了“干部医疗科”的学科体系和医疗体制。

“权力阶层对特权的持续需要，已经构成当下中国身分等级制度被维持和再造的重要体制内动力。客观上，这套制度对既有权力集团和进入党政体制的年轻精英群体的利益照顾等，亦构成了今天中国政治秩序稳定性的重要基础之一。”陈映芳在书中写道。



尽管有着种种不平等，但这几十年，这些制度并未被根本取消，也没有引发大规模和广泛的抗议。究其根源，陈映芳认为，作为“公平性”的替代要素，“流动性”既有效缓和了由社会分化所带来的现实矛盾，也有效地将“平等”、“公平”这些价值规范的制度化目标，演绎成了未来理想。“开放—流动”成为国家治理的核心机制。

她称，相关的国际比较研究显示，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民众，中国的民众更愿意将自身的状况及社会不平等的现实放到社会渐进式发展、或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制度发展不平衡的变动过程中去理解，或将改变贫困、实现社会平等的希望寄托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或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之上，而暂时忍受当下的不如意、不平等。

需要注意的是，所谓“开放—流动”是建立在等级化的“身份制”基础上，民众为了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生活机会、公共资源等，必须向上流动获得更高身份。地方政府则基于经济理性和政治理性，利用这个特征，将地方公民社会权的供给体系与城市发展、城市间竞争的经营体系有效结合，创造出了一系列的身分资格供给的操作化政策。

比如，政府出售城市户籍、政府出台一些相关政策，像购房入户、人才入户、购房换取常住居民户口、购房获得“蓝印户口”（满一定年限后可申请正式户口）、以土地换城镇户口、户口黑市交易、事业编制交易、城市增容费、超生子女生活抚养费，等等。

陈映芳将此称为“身份财政”，它和“土地财政”成为互相配套的地方政府逐利方式，共同构成“中国式财政体制下的掠夺型地方国家”(predatory local state) 的运行模式。但是，就像今天许多人感受到的那样，这种基于身份制不平等的社会向上流动不可持续。最简单的，中国经济不可能再像前几十年那样高速增长，向上流动的机会也少了许多；同时，民众也不太可能一直接受政府有关“公平 / 平等”等承诺迟迟不兑现，长期保持不合理的等级身份制，像最近越南改革户籍制度的消息在国内就引发不少舆论反响。

“上述分层体制在这几十年的延续，是以转型过程中社会经济的一些特殊情形为条件的。这些条件包括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及其民众总体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的开放度及其身分／阶层间的流动状况；还有社会生活家庭化过程中家庭纽带的维系和家庭保障功能的有效发挥，特别是下层家庭的家庭协作能力的保有等。不难想象，一旦这些条件消失，潜在于制度的国家延期兑现问题，即可能显性化为社会危机。”陈映芳在《秩序与混沌》中写道。

04

社会共识形成与制度化

第三个层次是价值规范体系。陈映芳称，一般社会学不太关注这个，但她做城市开发、城市运动等研究时，特别重视这块，它和上海疫情也有联系。实际上，国家和社会的博弈，各自背后都有一套价值规范体系构成支撑。

她认为，在今天中国政体延续、法治不健全的情景下，政治—社会的“稳定”绝不仅是经济发展、城市发达或威权政治治理技术升级的成果。转型过程中，民众也形成和维系了一套价值规范和生活秩序，其核心是自生的道德秩序／共用的政治文化。

陈映芳从三个案例出发阐释了自己的观点。第一个是中国数以亿计流动群体的居住贫困问题。她发现，他们虽然普遍生活在城市的贫困社区中，但生活秩序尚未崩溃。这显然不是得益于政府公共政策，而是流动群体之间渐渐构建起一个生活互助、共生协作的社会网络。在此过程中，一些由他们共用的规范伦理得以形成，赢得社会普遍的理解。

当然，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机会，和大量非正规的低端居住市场的存在，是他们在公共住宅系统之外，得以勉力维持居住生活秩序的必要条件。但是，陈映芳认为，人们之所以能忍受这样的现状，也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拥有改变生活的希望，眼前的生活只是他们为了提高个人及家庭地位、为了孩子读书考大学等必须付出的代价。一旦他们意识到，这种付出不可能带来希望的生活，其道德规范和生活方式就可能发生改变。

而且，如今城市流动群体虽然有着自助和互助，维持着一套生活秩序，但他们并未发育出组织。至于政府或其他社会组织，也没有为他们建立起一套扶助系统。她觉得，这种情况让人忧虑，如果持续下去，这群人的居住生活秩序可能解体，无家可归问题也会爆发。



第二个案例是她家旁边一个菜场的拆迁事件。在漫长的拆迁过程中，陈映芳观察到民众和政府在博弈时，共同形成了一套“违规”但“合理”的法律文化和政治文化。简单说，在转型社会，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都不会严格遵照法治的要求行事，道德或情理会成为双方工具，并在法外规则下展开协商和谈判。

“在此过程中，正式规则的权威被不断消解，社会建设目标模糊扭曲，而一些功利主义的新体制被不断创设出来，以道德主义消解法律主义的政治文化也持续地被强化。”最后一个例子是本文开头提及的胶州路事件。正如陈映芳所论述，和日本等地的历史不同，这些年来，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公共安全灾害，就结果而论，它们在中国似乎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体制变革，或国家—社会关系的根本变化；国家在应对突发性灾难，以及重建灾后政治—社会秩序的过程中，显示了强大的能力。

但她认为，在一次次灾难中和灾难后，社会共同情绪的形成和表达，以及人们对理想价值的伸张等行为，亦应被视为普通人参与改变价值规范框架的行为，是长时段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和今年一些上海市民行动的意义类似，是我们能从悲观中找到乐观的原因。

“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大家一步一步积累。经过这样的实践，就留在社会里头了，形成历史记忆。以后再有契机，知道这是可以做的，是好的。当年胶州路上市民所实践的现代文明，早已溢出上海。就像前往郑州地铁站自发献花的河南民众、还有对张文宏等医生表示支持的全国各地的网民告诉我们的那样，对每一个生命的尊重和保护，以及专业化的管理、理性的社会共治，这些正成为这个社会中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的价值和规范。”陈映芳说。

05

承诺、等待、边界状况

在民众逐渐形成一套理想价值规范的同时，陈映芳也注意到，相比 2000 年前后，2010 年以来，国家治理体制和国家—社会关系，正发生种种未可预测的变化。比如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大城市，曾经广泛存在于城市贫困区域和城乡结合部、城郊地

区的各种“违规”空间，包括业主自行搭建的建筑、曾多年经营的低端租赁房、街头摊贩、自营商店等等，近几年来纷纷被拆除、关闭或整治。曾栖居其中的流动劳动者及其家庭，在城市人口清理”运动中，被大量驱赶。他们多年辛苦在流入地建立的生活秩序、社会网络等，亦随之被破坏……

“就体制变化看，从一些重要制度到具体政策、国家治理方式的变动，多显示了与人们对‘社会转型的进程和方向’的期待相背离的种种迹象。这样的状况，被一些学者定义为‘转型陷阱’，或‘改革停滞’、‘改革倒退’。但在此过程中，包括自由派知识分子和体制内外的改革派在内，社会各方总体上表现出了相对忍耐克制的政治态度。”

如何看待这种变化？陈映芳认为，“过渡期政治”是理解这个问题的框架。从近代中国的转型历史看，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例，其碑文内容涵盖了 1840 年以来的历次革命运动，包括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争、胜利渡长江等。以小见大，这也意味着新政权对近代以来过渡时代的延续性确认。而且，我们在 2012 年“十八大”提出的 24 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也可看出，它们并不是单纯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是糅合近代以来文化、政治精英们所宣导的各种价值理想和社会建设目标。



人民英雄纪念碑。
图片来源：Wikimedia

在过渡框架中，权力系统需要同时承受两方面的压力：变革制度的压力和价值框架的束缚。一方面，权力系统需要持续地保持“制度还在变革中”的姿态，以不断释放过渡期目标的“可期待性”；另一方面，制度变革的主导者还需要不断地对人们的理想目标要求及价值质疑作出响应，以证明过渡期目标方向的正确性。

在转型过程中，权力系统可能会形成违背时限承诺、消解目标压力等一套操作模式。这时，民众，尤其在社会精英群体中间，“等待”和“坚持”成为一种特殊的政治伦理。从比较的角度看，世界许多国家的转型也都都有一个忍耐或者期待的问题。

“实际上，我们把自己的感受放进去了。研究转型问题，也是一个等待，看社会精英群体怎么定义当下这个艰难的过程。”陈映芳说。

不过，“等待”不可能无止境。她在书里引入“边界状况”的概念加以说明，指权力任性及社会混沌的严重程度，有可能导致权力失控、或民众失去最后耐心的那么一种状况。而在过渡型社会，一旦过渡性失效，亦即权力团体的改革意图和承诺兑现机制的“不可期待”成为某种社会共识，那么，既有的社会转型框架将陷入边界状况。

回到现实，陈映芳称，2010 年代以来，随着国家经济富强目标的初步实现（2010 年中国 GDP 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民生目标的逐步落实（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接下来，执政团体如何更新合法性资源，将平等公平价值、民主法治目标等切实地确定为民众可预期的国家现代化阶段性新目标？这成为社会—国家之间框架博弈的核心议题。不难看出，这些年来，权力支配团体释放的政治信息和采取的各种举措，对民众有关国家现代化的愿景一次次造成冲击。同时，社会—国家之间的框架博弈空间，也越来越狭窄。

“社会转型是新的秩序形成，我们这几十年靠着社会混沌里的某种秩序，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体在灵活调适，法外空间也保留着，慢慢形成社会共识，所以没有整体崩溃、解体、大动荡。但是，各方面都有一种条件性，它们只在某个历史阶段可行。民权、法治、民主的延期支付或者说替代性，都是有时效的，不可能是永远漂浮在远处的目标。因此，老百姓愿意相信这个框架存在，愿意等待是很重要的。如果这个结构被打破，大家都不愿意看到。”陈映芳说。

曾梦龙

1993 年生，宜宾人，高中学理，大学学文，毕业于四川大学新闻系。2016 年毕业后一直做媒体，没赶上最好的时候，但也不是最坏的时候，关心出版、知识和人。

小鸟访谈

人的公共生活需要明亮的对话。我们试图通过访谈直接进入知识人的内心和大脑，展现他们的个性与风格、思考和洞见。相比单纯的书，你会看到和理解一个鲜活的人。





图片来自 [Matthew Henry on Unsplash](#)

档案

如果承诺管用， 还要法律做什么？

张依依 | Newsletter

全球新近发生的 19 条科技、环境和文化消息。

01

科技 / 技术

经济重振的紧迫之下，京沪陆续发布复工复产时间表。但不是所有事物都会自然重置，城市重新开始流动时，一些防疫手段被保留，甚至强化，作为常态管理的一部分。三月，从一轮疫情中恢复的深圳开始落地[名为“电子哨兵”的设备](#)。已出现的版本中，这种机器大多集成扫码、测温、人脸识别功能，强调对个人身份、健康码、核酸/疫苗情况、行程轨迹等信息的联动和统一显示。

[新闻稿里](#)，相较于人工核验，“电子哨兵”的优势在于效率，“每人只要 2~3 秒就可以完成查验”，面对高峰时段的密集人流，也不会漏掉任何异常者。比起主动出示二维码，这种被动核验更加隐蔽无感。它们嵌入了城市基础设施，与居民生活融为一体。

这是一种趋势。

5 月中旬，[北京市交通委宣布](#)，将推出公交一卡通、地铁乘车码与健康码信息的自动关联（5 月 28 日起已经逐步落地），很多北京人都收到版本升级的提醒，不授权信息获取就无法进站）。针对这项措施，[清华大学法学院劳东燕](#)发文表示：“人脸识别 + 健康宝 + 票务系统的三位一体正式形成……意味着，不仅个人的特定身份与社交关系，还有行踪轨迹等，都被掌握无遗，随时随地会被识别出来。”

“这类举措有着重大的隐患，并且会相当程度上消解之前为个人信息保护所做的法律努力。”她写道。“所有人的信息安全，只寄托在一句承诺上，即不会用于防控之外的其他场景。”

“问题在于，如果承诺管用，还要法律做什么呢？”

2020 年，[当自家小区安装人脸识别门禁时](#)，劳东燕尚可依据近年新出台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进行维权，推翻居委会的决定。两年后，她面对的已然是一个全面铺开也无可申诉的局面。

劳东燕表示，由于立法远远没有跟上，数据库的打通对个人信息保护来说是毁灭性的。信息泄露之外，还存在滥用的风险，这时的主语不再是网络诈骗犯，而往往是拥有权力的执法者本身。

如何想象这种滥用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堕胎权”纷扰中的美国出示了一种可能性。随着[美联邦最高法院的一份意见草案泄露](#)，人们对堕胎非法化的未来感到极其担忧。[一份来自隐私倡导组织 STOP 的报告显示](#)，过去几十年，美国以移民执法、国家

安全、打击毒品为名建立起的监控系统和技术，随时可以，甚至已经被用来对准孕妇、监视、跟踪她们的行动，并阻止她们堕胎。

比如，有一种名为“地理围栏搜查令”的新手段，它允许执法部门搜查互联网公司数据库（比如谷歌的用户地理位置历史数据），获取特定时间、特定范围内所有活跃移动设备的信息。

宪法第四修正案的存在让个人免遭不合理的搜查，但这样的反向搜查却没有受到相应限制。自 2018 年发出首张以来，地理搜查令在 2020 年增长到每年一万多张，占美国所有搜查令的一半以上。（与此同时，北京 5 月的这波疫情中，“电子围栏”一词也被频繁使用，通常指代[利用 GPS 定位技术限制指定区域内的人员流动](#)。）地理位置，佐以网购、支付、网络聊天和搜索记录等信息，足以拼凑出一个人完整的行动和行为轨迹。报告特别指出，如今十分火热的健康追踪应用，尤其是女性用于记录月经周期的程序，也成为警方的重要数据来源。

这很好地说明了数据库打通的危险，它让执法者能轻易地将特定行为定位到个人，用于对其的跟踪和指控。“允诺会带来便捷与解放的网络与数据技术，最后异化为一项规训的技术。”劳东燕写道。

正是因此，5 月 24 日，40 多名美国民主党国会议员联署呼吁谷歌停止收集和保留客户定位数据。[信中还指出](#)：相比于谷歌设计的 Android 操作系统，iPhone 收集和保留的位置信息要少得多。[arstechnica 报道称](#)，谷歌的定位隐私设置的工作原理一直是个令人困惑的问题，甚至一些谷歌员工也对此有疑问。

谷歌的身侧，以隐私保护为主要业务的一些公司已经开始兴起。[《连线》报道](#)，主打加密电子邮件服务的 ProtonMail 近日改名 Proton，立志成为一个不保存用户数据的谷歌。“从根本上来说，我们相信保护用户数据的最佳方式就是首先不要拥有它。”Proton CEO Andy Yen 接受采访时说道。

IN THE NEWS

[当我们不能直接说“死”，会发生什么？](#)内地观众已经越发习惯“话不能好好说”的情况，死、坏、烟、凶手，[任何带负面的词汇都会被删改](#)；短视频则更加荒诞，emoji、缩写和同音词的混用让人时常对真正的内容摸不着头脑；TikTok 上，#unalivemeplease (# 不让我活) 有 920 万浏览量，#unaliveing (# 不活了) 有 660 万，也都是因为 # 自杀 # 这个话题本身不被允许存在。

不论是出于审查、好心还是免责的目的，网络对负面的，尤其涉及生死的事物诞生出诸多创造性的说法。长此以往，会怎样？

[《连线》讨论了这种委婉转述的影响](#)。乔治城大学的语言学教授 Deborah Tannen 认为，当人们迂回地去表达时，其实暗含一个信息，“这件事是不能说出来的”，就像一个见不得光的秘密。这会加剧这个词背后的耻感和污名化。而措辞的选用，[慕尼黑大学 2021 年的一项研究显示](#)，也会影响人们是否积极地寻求帮助。

“我们应该被允许在不受审查的情况下，去谈论沉重的东西。”一名受访者表示，不能说“死”可能让人们对此产生偏见，寻找替代词的过程也会让严肃的话题变得像是在开玩笑。

[康涅狄格州要招一名警长，专门打击网络错误信息](#)。此人将拥有 15 万美元年薪，预计将负责搜索 4chan、Gettr 和 Rumble 这样的小众网站，以及一些主流社交媒体平台，在错误信息传播开来之前找出，并勒令平台删除它们。根据州政府的说法，这是为保卫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

“坦白讲：我认为这个做法非常愚蠢，甚至极其危险。”网络文化观察者 [Ryan Broderick](#) 在他的时事通讯 Garbage Day 中评价道。“你知道 200 万美元（该项目整体预算）该怎么花么？与其雇人每天上网搜索 4 次 site:4chan.org Connecticut，不如多花点钱建设更好的政府网站和官方账号，让它们可以兼容各类设备、保持及时更新、清楚且准确地发布信息，这不比啥都强？”

“那之后如果还有额外的钱，还可以支持本地新闻业，这样人们才不必再依赖 Telegram 上的 QAnonMom1776（某阴谋论频道）来获取有关自己社区的新闻。”

[无人驾驶上路](#)。6 月 2 日，加州监管机构向通用汽车旗下的 Cruise 颁发许可，为其商业运营扫平了最后一道障碍，也让旧金山成为美国第一个可以坐到无人驾驶出租车的大城市。今年 2 月，这家公司已经开始提供免费的深夜试驾，得到许可后，预计将在几周内陆续推出付费服务。服务时间是晚 10 点到早 6 点的非高峰期，时速不允许超过 30 英里 / 每小时，也不得在大雨、大雪或大雾的天气下运行。

[谷歌禁止在其 Colab 服务上运行 Deepfake 项目](#)。Colab 是谷歌提供的一个可编写和执行 python 代码的云平台，在 AI 研究社区中被广泛使用。近期媒体发现该平台更新条款，对 Deepfake 相关的项目进行了限制。

所谓 Deepfake，对大部分人来说，指的就是利用 AI 来进行换脸的技术。从中诞生出许多广为流传的换脸鬼畜。最近的新闻则是马斯克的脸和声音被合成到一条视频中，来[推广一种名为 BitVex 的加密货币](#)，当然人们很快就发现这是场骗局。但正是这样层出不穷的事件，导致这项技术自出现以来便深受诟病。

[Techcrunch 报道](#)，2019 年到 2021 年，网络上的 Deepfake 数量从 14000 增长到 14.5 万。弗雷斯特研究公司曾预估，到 2020 年底，Deepfake 诈骗将导致 2.5 亿美元的资金损失。

[纽约州为独居中的老年人派发陪伴机器人](#)。比起 Siri 或 Alexa 这样的智能语音助手，这个名为 ELLIQ 的机器人更加主动和友好，它会与用户闲聊，玩认知游戏、帮助其与亲人紧急联络，跟踪锻炼、服药等活动。在设计上，它强调使用自然语言模式与用户进行交流，而不是简单地听取预先设定的指令。开发者还表示，ELLIQ 会记住用户的生活细节，以此调整自己的性格，如果用户喜欢大笑，它就会讲更多的笑话。

这是纽约州应对老龄化人口的一步，政府与 ElliQ 母公司合作，向州内符合条件的老人居民免费发放了 800 部 ElliQ。据估计，目前有 1400 万 65 岁以上的美国人独居，且随着婴儿潮一代的老龄化，这个数字在未来十年还会增加。孤独将成为一个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将机器人作为解决方案仍是实验性的一步。

02

环境 / 生态

蓝色星球状态更新：炎热且非常、非常干

鸟飞绝，人踪灭。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邦，严酷的热浪正在挑战各个物种的生存极限。每天都有数十只高空飞行的鸟，比如鸽子和鹰，从天坠落。

“街道上到处都是死尸。狗、猫、奶牛。人们同样试图逃离。他们在室内跑步，整天整天地泡在运河、溪流和湖泊里，而无法这样做的人，则昏倒在街边，生命垂危。”英国经济学家 Umar Haque 写道。

他将此形容为一场灭绝事件，“我们的文明会在到达 50 至 60 摄氏度时崩溃。砰，噗，消失”。而在经历最热三月之后，进入五月，印度和巴基斯坦已经踩到了这条线。5 月 1 日，巴基斯坦的讷瓦布沙阿气温达到 49.5 摄氏度。酷热的天气在印度造成至少 25 人死亡，在巴基斯坦造成至少 65 人死亡。

“这是‘没有春天的一年’。”巴基斯坦气候变化部长在一份声明中说。今年热浪的不寻常之处在于，它来得比往年早得多。印度通常在五六月份开始入夏，但今年三四月份就已经开始快速升温。

受此影响，印度的小麦产量预计将比去年低 4%。5 月 14 日，印度全面禁止小麦出口。作为全球第二大小麦生产国，印度此举“震惊了国际市场”，全球小麦价格瞬时飙升 6%。在此之前，粮食危机已然出现，受混乱的供应链和变幻莫测的天气影响，食品价格达到十年来最高水平。小麦出口大国乌克兰遭到入侵后，危机再度加剧。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3 月份表示，处于饥荒边缘的人数已从 2019 年的 2700 万跃升至 4400 万。在此背景下，全球更加依赖于来自印度的小麦。因此，七国集团（G7）的农业部长们对印度的禁止出口的决定进行了集体谴责。野村证券的分析师 Sonal Varma 在一份报告中表示，动荡中亚洲各国的食品保护主义正在抬头，这些措施最终可能加重全球的食品价格压力，尤其是对于亚洲和非洲的居民。

高温下人体会如何变化？首先，你会感到乏力、无精打采，因为身体正在努力将血流推向皮肤表面，帮助散热——体内的水和盐分随着汗液排出，你开始变得苍白，感到湿冷，头晕，虚弱，恶心，痉挛——过度出汗堵塞了你的汗腺，腋窝、腹股沟、颈部出现密密麻麻的红疹——体温到达 41 摄氏度以上，身体开始停止运作，细胞分解，器官损坏。

“就像一个被逐渐煮熟的鸡蛋。”人体生理学教授 Stephen Cheung 说，“鸡蛋从液态变成固态是因为蛋白质发生了变化……如果你的体温持续升高，最终你体内的蛋白也会变成这样。”

全世界失眠。科学家追踪全球智能腕表的睡眠数据发现，气候变化引起的高温还在剥夺人们的睡眠，相当于每年十一晚的睡眠被缩短。按照目前的趋势，到 2099 年，炎热的夜晚将侵蚀每人每年 58 小时的睡眠。

水位骤降，露出古老的进水阀，和尸体。西部大干旱之下，美国最大的人工水库米德湖水位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水库 1971 年启用的一个老旧的进水阀门露出水面，以及其他一些无人知晓的历史碎片，比如一具被枪杀，装到桶中抛尸的遗骸。不断浮现的尸骸引发了人们的狂热猜想，唤起对拉斯维加斯黑帮横行时期的岁月记忆。但对于气候学家，这算不上激动人心。截止 5 月 30 日，米德湖的水位是 1048 英尺，比满池水位低了整整 200 英尺（约 61 米）。据预测，到 9 月，这个数字还将自由落体到 1037 英尺左右。米德湖为美国三个州和墨西哥的 2500 万人提供水源，这将极大加剧目前的干旱和缺水。

至于有多紧缺呢？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数据，今年是加利福尼州有记录以来最干旱的一年。在洛杉矶，人们被要求减少 35% 的用水量；室外浇水被限制到每周一次；由于没有足够的浇灌用水，数万英亩的土地被闲置；墨西哥北方的边境城市，居民每天只能获得 6 个小时的供水。

这是一场环环相扣的灾难，“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NASA 水文学家 JT Reager 告诉 BBC。全球变暖，降水和降雪减少，水库干涸，然后野火开始肆虐——截止五月中旬，美国已经有超过 2000 平方英里的土地和 170 多栋房屋被野火烧毁。水电原本是加州重要的电力来源，占总发电量的 15% 左右，但由于水库缺水，这个比例今年夏天预计将被砍掉一半，导致电价上涨，天然气使用回升；持续干旱加剧了对地下水储备的过度抽取使用，导致地形沉降，卫星图显示，2020 年到 2021 年仅一年，加州中央谷地地区整体下沉了近一英尺（约 30 cm）。

与此同时，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达到 400 万年来最高。2021 年，人类向大气中排放了 360 亿吨二氧化碳，为历史最高水平。工业革命之前，二氧化碳水平一直保持在 280 ppm 左右，而今年 5 月的测量数据是 420.99 ppm，较之去年同期仍在增加。

NOAA 指出，这个水平可以与 410 万至 450 万年前的上新世比肩，当时的二氧化碳水平接近或超过 400ppm，海平面比现在高出 5 到 25 米，足以淹没许多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城市，大片的森林覆盖着北极苔原。

数据来自茂纳洛亚火山顶部的气象站，上世纪 50 年代末，科学家 Charles David

Keeling 开始在那里观测，由此得出的长期记录被称为 Keeling 曲线。他也是第一个认识到，尽管存在季节波动，二氧化碳水平每年都在上升。二氧化碳是最主要的温室气体之一，它的作用就像一张毯子，将地球接受到的来自太阳的能量包裹围困在地球上。

“令人沮丧的是，我们缺乏集体意志力来减缓二氧化碳的持续上升。”Keeling 的儿子 Ralph Keeling 说道，如今他仍在持续父亲开创的这项事业。

03

文化消费活动

韩国电影、电视、流行音乐进入全球视野。BTS（防弹少年团）现身白宫，韩国电影人在戛纳电影节斩获两项主竞赛单元奖项，K-pop 音乐人出现在全球各地的音乐节舞台……

“在美国，那些过去认为《江南 Style》只是昙花一现的人，现在正在广播里收听 BTS 和 Blackpink；电视方面，‘看见你的声音’和‘蒙面歌手’这样的韩国节目如今随处可见。”资深制片人 Lee Jooick 表示，“这是一个奇迹，韩流没有理由不能再持续 5 年或 10 年。”

2020 年，韩国在艺术和文化相关的知识产权方面首次实现了贸易顺差，韩国央行（Bank of Korea）的数据显示，这一趋势在 2021 年得以延续。如今，韩国最大的一些经纪公司和制片公司都在寻求与美国市场的合作。“这与几十年前相比是一个讽刺性的逆转，当时韩国电影人非常担心被好莱坞电影的入侵所消灭，甚至在放映《致命的吸引力》这部美国电影时，向影院厅里投放了活蛇。”

韩国艺术可能是下一个。韩国各地艺术博物馆正在大规模增长，近几年，从收藏家数量到市场交易都出现激增。最主要的一些老牌国际画廊与艺术博览会也在此开拓业务，建立亚洲的前哨站。去年 5 月，著名的弗里兹艺博会宣布将于 2022 年 9 月，在首尔举办一场新的国际艺博会，加深与韩国画廊协会的伙伴关系。

《金融时报》报道，这种对文化建设的支持来自高层：2022 年，韩国文化部获得了 7 万亿韩元的年度预算，创下新高。到 2030 年，釜山将把艺术和文化支出占比提高到总预算的 3%。“官员们现在已经意识到，文化发展是让韩国成为一个更发达国家重要的下一步。”釜山艺术博物馆馆长 Ki 表示。

这被认为是对经济增长放缓和城市吸引力下降的一种回应。在重工业推动经济奇迹的时期过去之后，韩国一直在积极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过程中，艺术行业也受到流行音乐产业的启发，变得视野向外，融合，富有创造力。

动荡的时局中，传统艺术品是更好的投资么？4 月的 Newsletter 中曾提到，安迪·沃霍尔著名肖像作品《射击玛丽莲·梦露》的拍卖备受瞩目。5 月 9 日，它不负众望地以 1.95 亿美元的价格成交，创下艺术品拍卖历史第二，也成为 20 世纪艺术品的价格之最。

实际上，这不仅是沃霍尔本身的效果，整个传统藏品市场都生机勃勃。5 月 16 日，纽约地产开发商 Harry Macklowe 的 30 件藏品在苏富比举行第二次拍卖，总成交价达 2.087 亿美元，创下记录。

除却作品的艺术文化价值，也存在许多客观因素。经济学教授 Tyler Cowen 在给彭博的一期专栏中写道：富人一直在购买更多的住房，并希望用艺术品装饰这些房子；其次，近期全球通胀率上升，但几乎没有真正的通胀对冲工具。

现在的加密工具已经失去了这一作用——新一轮的加密牛市让许多人损失惨重。Terra 发行的算法稳定币 Luna 崩盘，比特币也跌至 2020 年 12 月以来最低水平。投资者信心大跌，截至 5 月 20 日的一周，北美的投资者从数字资产基金中撤出了约 1.43 亿美元资产。将 NFT 作为投资方案的艺术藏家们，也深刻感受到了它与传统艺术的不同：Twitter 创始人 Jack Dorsey 的第一条推文去年拍卖价还是 290 万美元，今年再拍卖时，最高标为 280 美元，缩水了 4 个零。

“但艺术品可以在几乎任何环境中作为通货膨胀的对冲工具。它既是一种投资，也是一种消费形式。后者在任何宏观经济条件下都受到很好的保护。当所有其他方法都失败时，花钱肯定是一种有效的通胀对冲措施。”Cowen 写道。

六年前，日本千万富翁前泽友作以 5730 万美元买下巴斯奎特 1982 年的画作《无题》（《恶魔》）。五月的拍卖中，这件作品以 7500 万美元的高价卖出，回报率接近 50%。女性艺术家也表现优异，草间弥生与 Robin F. Williams 的作品均创下拍卖记录。

微博诗人与短视频画家的兴起。网络研究学者 Kate Eichhorn 在最近一篇文章中讨论了这个文化现象——很多年轻的艺术从业者，率先在社交媒体上找到了自己的观众，才进而得到机构的认可。“渐渐地，（社交媒体）内容不仅再是推广艺术所需要的东西，而成为艺术本身，或者艺术的实质载体。”

一直以来，在艺术上获得某种地位都需要得到守门人的认可。“哪些艺术家受到尊敬，谁的作品受到赞扬，谁能够以艺术家或作家的身份谋生，这些总是由超越作品的因素决定的。你在哪里展览或出版，你的作品在哪里被评论，这些总是比作品本身更重要。”

过去，因素是机构、学位、出版商、评论家、学者、媒体，现如今，这些传统守门人被网络名气所替代。“现在不管有没有这些守门人的支持，艺术家和作家都可以实现成功。可以理解，很多人会认为这种转变是积极的。”

但“问题在于，新的范式下，除非艺术家和作家能够雇佣一些人来为他们工作（监督日常运营），他们还必须致力于每天制作关于自己的社交媒体内容。他们必须既是艺术家、作家又是内容制作人。”——艺术家无法纯粹专注于作品，而要花费力气去构筑自己的网络形象；而粉丝，往往也不是作品本身的消费者，而更热衷于消

费与这个名人相关的海报、签名照、T恤、马克杯。

企鹅兰登制造了一本无法被烧毁的《使女的故事》，阿特伍德亲自测试了一下。这本书用黑色的电影胶片封皮，白色的热屏蔽箔纸，酚醛硬封面，高温粘合剂和镍丝装订而成。一则视频中，阿特伍德将一支巨大的喷火枪对准了它，烈焰中这本书毫发无损。

自出版以来，《使女的故事》就经常被列入禁书名目，最近围绕堕胎权的争论又让人们再燃起对其的兴趣。书中身披红斗篷，头戴白帽的形象，也时常在抗议中被作为受压迫女性的象征。而焚书则是反乌托邦题材中极其经典的意象。

5月23日至6月7日，这本书将在苏富比纽约拍卖行展出。截止6月5日，[其官网的拍卖价](#)已经达到10万美元。所有收益将捐向美国笔会支持言论自由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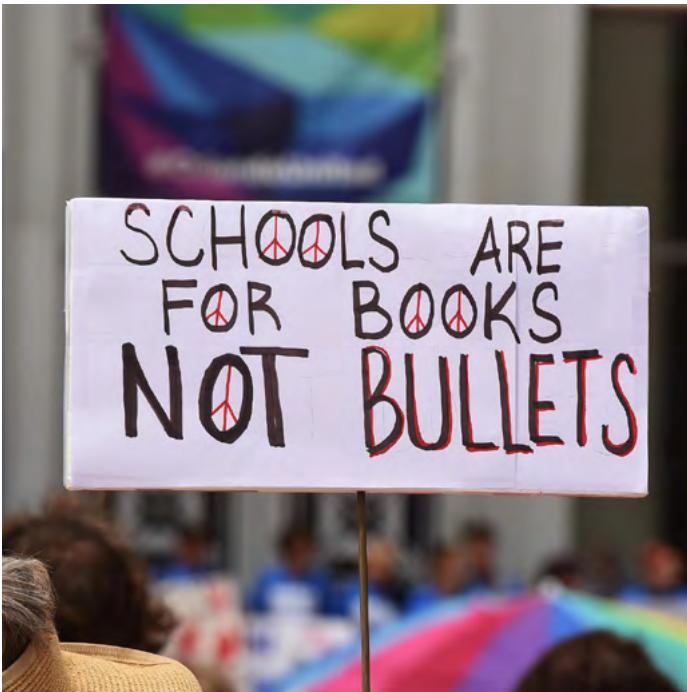


张依依

新闻从业者，关心人类、科技与生活，“所有的鱼”主理人之一。平行世界里是个畅想在艺术幻想里的好青年。爱具体的人和别人的猫。

Newsletter

四种新闻信轮周发布，各自以认可的维度覆盖撰写者认为重要的新闻。因而会有重复。不过不用担心，它们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重复说明了某个问题在世界的权重。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档案

尤瓦尔迪枪击案能否推进美国枪支管制?

Snufkin | Newsletter

这里是更小众群体近期发生的 13 条新闻。

发生于 5 月 24 日的美国得克萨斯州校园枪击案至今已经造成最少 21 人死亡，包括 19 名学生和两名老师。

案发地罗布小学 (Robb Elementary School) 位于圣安东尼奥以西的小城尤瓦尔迪。当天上午，一名持有手枪、AR-15 半自动步枪和高容量弹匣的 18 岁男子 Salvador Ramos 先是在另一处地方枪伤自己的祖母，随后在罗布小学附近撞毁了汽车，之后进入学校向师生开枪。一个多小时后，警方冲进来击毙了袭击者。这起惨案在过去的半个多月里在美国引发了关于枪支管制以及公共安全的各方辩论。

首先是对案发现场的警察的质疑。[CNN 报道称](#)，凶手和学生一起被锁在教室里一个多小时，而警员却没有更快地冲进教室与凶手对峙。在广泛的批评中，学区警察局长 Pete Arredondo [为警方进行了辩护](#)。他说，他们在进入学校后不久就遭到了攻击，有几名警察因此受伤。然而，《芝加哥论坛报》联系的七名执法人员中有六人表示，警方的应对措施存在严重失误。

在周四的新闻发布会上，当地公共安全部地区主管 Victor Escalon Jr. 说，他无法解释为什么没有人阻止凶手进入学校。针对这些事件的时间线和细节，得克萨斯州众议院调查委员会 (Texas House Investigative Committee) 预计会在本月底之前就其事实调查任务出具一份初步报告。

案件发生当天晚上，总统拜登在白宫发表了简短讲话，在反思这场屠杀时情绪十分激动，他呼吁采取行动改革枪支法，但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政策或表决倡议。

得克萨斯州参议员 Sen. Roland Gutierrez [向媒体提到](#)，凶手在 18 岁生日后不久就买了至少两支突击步枪，“他获得这些武器没有任何问题”。而就在罗布小学枪击案 10 天前，一男子在[纽约州布法罗](#)的一家超市开枪打死 10 人，另有 3 人受伤，其中有 11 名受害者是非裔美国人。5 月 15 日，美国加州拉古纳伍兹的[日内瓦长老会教堂](#)发生致命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

两天前，数千人在华盛顿集会，呼吁枪支改革，呼吁出台更严格的枪支法律。演讲者表达了他们对美国持续的枪支暴力的不满。枪支安全组织 March For Our Lives 呼吁禁止攻击性武器，对试图购买枪支的人进行普遍的背景调查，以及建立一个全国许可制度，对枪支拥有者进行登记。

管制压力下，最近几周，一个由参议院两党谈判代表组成的小组誓言要敲定一项控枪协议。不过他们的努力集中在相对较小的变化上，比如允许当局禁止被认为对他构成危险的个人持有枪支以及实施改善心理健康项目等。

[《名利场》杂志的一篇评论写道](#)：“如果过去的十年或二十年你生活在美国，你就知道在大规模枪击事件后，包括一些儿童被杀害的事件，共和党人的反应是绝对不采取任何行动。哦，当然，保守派喜欢谈论‘心理健康’，喜欢把更多的武装警卫带进已经武装起来的学校。”[《经济学人》分析](#)，自 1994 年以来，议员们还没有真正加强过联邦枪支法。如果他们现在通过立法，这也将是温和的，因为枪支管制支持者的力量远远小于美国全国步枪协会 (NRA)。

据[《纽约时报》报道](#)，乌瓦尔德惨案是美国有记录以来严重程度排名第二的中小学枪击案，仅次于 2012 年康涅狄格州纽敦的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那起案件造成六名教职工和 20 名儿童死亡，其中一些年仅六岁。

乌瓦尔德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城市，位于圣安东尼奥以西约 85 英里。人口约为 1.52 万，主要是西班牙裔。罗布小学位于市中心附近，在 2020-2021 学年，该校有 535 名学生，其中大多数是西班牙裔，被认为是经济弱势群体。学区负责人 Hal Harrell 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学生们之后不会再回到罗布小学，而是会被转移到当地不同的学校。

Also in the news

塔利班强迫女性新闻主播戴口罩

阿富汗妇女现在受到来自伊斯兰强硬派的进一步压力，根据最新规定，女性电视主持人现在工作时必须要遮住脸、戴上口罩，因为塔利班在其严格的宗教准则下加强了对“适度”着装的规定。

这项法令引发了一系列的担忧，不仅是关于女性的言论自由，也关于她们是否能够继续做她们的工作。一些女性开始质疑，戴面纱的命令是否是女性主播被勒令停播的前奏，因为许多保守的穆斯林认为女性的声音会引起性欲，因此不应该在公共场合听到。

塔利班在喀布尔的主要政府发言人 Zabihullah Mujahid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新规定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不会造成任何伤害，就像我们去年看到的那样，因为新冠病毒，每个人都必须戴口罩，那么遵守宗教秩序有什么问题呢？”

为了反对塔利班的法令，一些男性新闻主播也在电视上戴上了口罩以示团结。1TV 的主编兼新闻主管 Idrees Farooqi [告诉半岛电视台](#)：“我们和女性同事站在一起，共同抗议这一命令，因为我们知道遮住脸在电视上播报是多么困难的事。”

“我的身体，我的选择”

上周日，支持堕胎合法化的活动人士在得克萨斯州休斯顿的教堂里打断了知名传教士 Joel Osteen 的礼拜，三位女性脱掉了外衣，高喊“我的身体，我的选择！”以及“推翻罗伊案，绝对不！”随后她们被保安请出了教堂。抗议活动之后继续在教堂外继续进行，陆续有其他支持者加入进来。

教堂内的抗议视频在 Twitter 上迅速传播开来。这些活动人士是当地争取堕胎权利的组织 TX4ABORTION 的成员。她们认为，几十年来强硬的基督教会一直在组织和教导人们反对堕胎，甚至出现在堕胎诊所称堕胎女性为“杀人犯”，让她们感到不舒服。

而这些女性之所以选择在 Joel Osteen 的礼拜上抗议，因为他在世界各地都有追随者。活动人士 Julianne D'Eredita [对休斯敦当地电视台 KPRC 2 说](#)，“我们只有非常短的时间来获得我们需要的关注，让数百万走上街头，让数百万像我们今天这样做。”

星巴克员工指控公司破坏工会

星巴克于本月 10 日宣布关闭纽约伊萨卡康奈尔大学附近的一家门店，一些员工认为，这是品牌的报复，因为这家店于 4 月 8 日投票成立了工会。投票结束 8 天后，商店的工人曾进行过一天的罢工，原因是隔油池废水外溢，而经理却不顾员工们的安全担忧拒绝闭店。

去年 12 月，水牛城的一家星巴克商店宣布成立星巴克工人联盟 (Starbucks Workers United)，从那时起，超过 20 个州的 100 多家星巴克门店纷纷效仿。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工会已经向美国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 (NLRB) 提出了数十项指控，包括拖欠工资、解雇工会组织者等。

星巴克方面表示，关闭门店与工会活动无关，而是由门店的设施、员工和考勤问题导致的。发言人 Reggie Borges [告诉彭博社](#)，这只是日常运营的一部分。但星巴克工会的律师 Ian Hayes 在[一份声明中写道](#)：“毫无疑问，NLRB 将起诉这家公司非法破坏工会，正义将得到伸张。”

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暂时将一些毒品去罪化

6 月初，加拿大政府根据《管制药物和物质法案》(Controlled Drugs and Substances Act) 给予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三年的豁免，允许个人拥有、使用少量非法药物（包括阿片类药物、可卡因、冰毒和 MDMA 等）。

加拿大卫生部的一份声明说：“这种豁免不是合法化。这些毒品仍然是非法的。但是拥有 2.5 克或更少量的某些非法物质的成年人将不再被逮捕、起诉。相反，警方将提供健康帮助和支持，并将在有需求时帮助转诊。”

多年来，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一直在与一场“公共卫生紧急状况”作斗争，这场危机已经导致数千人死于服药过量。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 Benjamin Perrin 告诉法新社，通过为期三年的部分合法化试点，该省将逐步把药物滥用调整为健康问题，而不是刑事司法问题。“将吸毒者定罪并没有起到作用。事实上，研究表明，这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犯罪化会带来耻辱，人们会单独使用药物，会更快地使用药物以避免被发现——所有这些都增加了过量死亡的风险。”他解释道。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物质使用中心 (BC Centre on Substance Use) 研究主任

Thomas Kerr 同样认为，这项政策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他也指出了一些不足之处，包括该计划没有解决药物供应的污染问题。此外，也有人担心，如果人们为了避免购买超过 2.5 克的毒品而更频繁地购买少量毒品，这一政策实际上可能会增加风险。

在泰国种大麻合法了，但抽大麻还是不行

就在上周四，泰国成为亚洲第一个将大麻种植和持有合法化的国家。该国的热带气候非常适合种植大麻，政府希望在医用大麻市场上引起轰动。

在大麻合法化的框架下，种植和交易大麻及大麻制品，或者使用其来治疗疾病都不再是犯罪行为。咖啡馆和餐馆也可以提供含有大麻的食物和饮料，但前提是这些产品的四氢大麻酚 (THC) 含量低于 0.2%——四氢大麻酚是大麻中的主要精神活性物质。另一个结果是，至少有 4000 名因与大麻有关的犯罪行为而被监禁的人将获释。

但出于娱乐目的吸食大麻仍是不被允许的。泰国卫生部长 Anutin Charnvirakul 在此举之前接受 CNN 采访时说，他预计合法生产大麻将促进经济，但他警告道，娱乐性地使用大麻仍然是非法的，那些使用大麻来获得快感的人仍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包括最高三个月的监禁以及罚款。

预期的经济效益是泰国大麻改革的核心，但人们担心，这些好处是否会得到公平分配。另一方面，清迈大学植物与土壤科学系教授 Sarana Sommano 提到，政府部门还没有出台管理大麻使用的法规，“这可能是一个错误，因为政府试图匆忙推出政策来取悦选民，而没有真正规划细节，也没有向公众解释发生了什么。”

英国记者和原住民保护专家在亚马逊地区失踪

巴西原住民研究员 Bruno Araújo Pereira 和为《卫报》、《华盛顿邮报》和《金融时报》等多家媒体供稿的英国记者 Dom Phillips 于上周日在亚马逊西部山谷中首次被报告失踪。[CNN 报道](#)，两人在出发前曾收到非法矿工和伐木者的死亡威胁。

Phillips 因报道森林砍伐、非法开采金矿对亚马逊环境和土著部落造成的日益严重的威胁而闻名。而 Pereira 多年来则一直致力于帮助原住民保护自己的土地。失踪之前，两人正在为一个关于该地区保护工作的书籍项目进行研究。

巴西总统 Jair Bolsonaro 于上周二发表评论说，“这可能是一场意外，也可能是他们被杀了”。两人失踪的地方是一个危险区域，猎人、渔民和官方人员在这里曾多次发生枪战。[该地区著名的土著领袖 Beto Marubo 提到](#)，随着非法猎人和矿工团伙涌入森林，该地区近年来变得越来越危险。“他们是真正的帮派，非常暴力。”近年来，曾有为亚马逊地区媒体工作的记者遭到杀害，但外国记者还没有过这样的情况。截至 6 月 9 日，搜索仍在进行中。巴西警方已逮捕了一名犯罪嫌疑人，并从嫌疑人的船上发现血迹。

印度发言人在电视上侮辱先知穆罕默德，穆斯林国家要求道歉

5 月底，印度人民党 (Bharatiya Janata Party) 发言人 Nupur Sharma 在电视上发表了一番关于穆罕默德的言论，她说这位伊斯兰教先知娶了一个六岁的女孩，并在她九岁时与她发生了性关系。这番话在穆斯林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他们认为这是侮辱性的、不实的以及不可接受的贬损言论。

在过去的两个礼拜里，一些中东国家发起了对印度的外交抗议活动，包括科威特、卡塔尔、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等。卡塔尔外交部要求印度政府“向全世界所有穆斯林公开道歉”。印度境内则发生了一系列暴力事件，穆斯林公民试图向警方报案起诉 Nupur Sharma。

事件发生后，印度人民党随即让 Sharma 停职，并声明这些言论并不反映政府的立场，而是“边缘分子的观点”。新德里警方上周四表示，他们已对 Sharma 以及其他一些人展开调查。Sharma 及家人则收到了众多死亡威胁。她对此的回应是，她“无条件”撤回自己的言论，但她也表示这些言论是对“对印度教湿婆神持续的侮辱和不尊重”的回应。社交网络上也有许多人称赞 Sharma，并表示不相信人民党政府会屈服于来自穆斯林国家的压力。

英国第一个全国性的黑人民权组织成立

黑人平等组织 (BEO) 由英国商界、法律界、艺术界等各行各业最具影响力的一些黑人创立，包括外交大臣 David Lammy、学者 David Olusoga、商界领袖 Dame Vivian Hunt 和演员 Kwame Kwei-Armah 等，旨在理清英国黑人生存状况，并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

人们希望这个组织能拥有与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 (NAACP) 相同的规模，NAACP 是由黑人进步人士于 1909 年创立的。一年前，由英国政府支持的种族和民族差异委员会 (CRED) 发表了一份报告，指出制度性的种族主义在英国并不存在。但 BEO 认为，系统性的种族主义不仅存在，而且困扰着英国数百万人。在英国，50% 的黑人儿童生活在贫困中，黑人母亲死于分娩的可能性是白人的四倍。[《卫报》此前的一份报告](#)也发现，95% 的黑人和混合族裔学生在学校里遭遇过种族歧视。

BEO 已经获得了一些知名律师事务所以及慈善基金会的支持，并计划与基层社区组织合作，以解决住房问题、改善健康和教育以及反对种族歧视。David Lammy 曾是一名律师，他告诉 [《独立报》](#)：“我们需要一个全国性的民权组织，无论时局好坏，都致力于这场斗争。”

庆祝同志骄傲月的广告牌在非洲国家加纳被拆除

6 月的第一个周末，一块挂在高速公路上的、有彩虹标志的广告牌在加纳首都阿克拉引发了许多争论。一些议员给警察局长下了 24 小时的最后通牒，要求他们拆除广告牌。最终，它被很快撤下。

每年的 6 月是全球性少数群体的“骄傲月”(pride month)，通常全球各地都会

举行一系列游行庆典。但如同许多非洲国家，加纳有着反 LGBT 群体的历史和文化。去年，[一项将同性恋和变性人定为犯罪的法案](#)引发了激烈的辩论。

骄傲庆典回归，特拉维夫举办同志游行活动

长期以来，以色列第二大城市特拉维夫一直被认为是中东地区最欢迎 LGBTQIA+ 人群的城市之一，它曾以举办亚洲最好的、最大的骄傲庆典而闻名。

因为新冠限制令已经取消，今年的骄傲庆典于 6 月 8 日重返特拉维夫。[据《以色列时报》](#)，超过 17 万人参与了上周五的游行活动。游行开始前，警方敦促公众除非绝对必要，否则不要乘车进入城市。参加者被要求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以缓解该地区的交通堵塞。

特拉维夫市长 Ron Huldai 和社会平等部长 Meirav Cohen 在庆祝活动开始时指出，以色列其他地区的骄傲游行受到了威胁。部长表示，“我们不会向威胁使用暴力和恐怖袭击的人屈服，每一次这样的威胁都将使我们得到更多的预算和投资。”警方说，去年他们全天逮捕了大约 50 名犯罪嫌疑人，其中包括几名涉嫌试图伤害数万名群众的人。

爱尔兰尝试振兴夜间经济，包括俱乐部等文化场所将从中受益

爱尔兰正在开展一项夜间经济试点项目，目前正在筛选六个将从该计划中受益的城镇或城市。该计划预计持续两年，每个被选中的地方都将有一个夜间经济顾问。市郡经理协会 (CCMA) 已经发出呼吁，要求地方政府提出申请，地方议会必须在 6 月 24 日之前提交提案。

除此之外，部长 Catherine Martin 还批准了资金支持国家文化机构在今年夏秋两季的深夜开放。这个想法不仅允许游客在正常开放时间后进入，还将促进展演类型多样化，比如位于都柏林的爱尔兰现代艺术博物馆就在夜晚开展了一系列艺术、舞蹈和戏剧表演活动。

部长 Catherine Martin 在一份官方声明中提到，“（该计划）是为确保所有公民都能拥有更充满活力、更可持续的夜间文化的重要一步。”这些措施也反映出，受新冠疫情影响，文化和夜生活领域持续需要援助。长期以来，爱尔兰的执照管理一直被视为不利于俱乐部和其它较晚开业的场所的成功。

北非国家利比亚有了第一个滑板公园

五月底，利比亚首个滑板公园在首都的黎波里市中心开放，当地年轻人乐在其中。这个免费的露天设施由澳大利亚人 Wade Trevean 设计，他说，志愿者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帮忙建造，整个过程花了大约六周时间。项目由非营利组织 Make Life Skate Life 资助，该组织一直致力于在世界各地推广滑板文化，已经在伊拉克、玻利维亚和印度建造了同样免费的滑板公园。

自从前独裁者 Muammar Qaddafi 在 2011 年的叛乱中被推翻并杀害以来，的黎波里经历了一连串的暴力浪潮，这意味着几乎没有资源被投入到休闲设施中。[在《阿拉伯新闻》的采访中](#)，18 岁的利比亚青年 Mohamed Abderraouf 说：“我无法形容自己的喜悦。”他在 2020 年买了自己的第一块滑板，此前一直只能在街角练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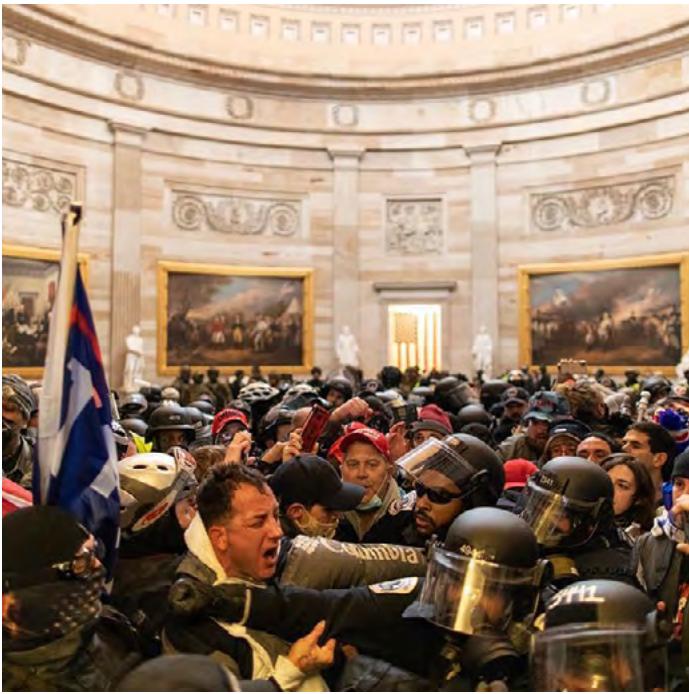


Snufkin

撰稿人，做杂志也做新媒体，关心年轻人和他们的新实践，喜欢阅读、观察，然后分享。

Newsletter

四种新闻信轮周发布，各自以认可的维度覆盖撰写者认为重要的新闻。因而会有重复。不过不用担心，它们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重复说明了某个问题在世界的权重。



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档案

美国未来会爆发内战吗?

曾梦龙 | Newsletter

这是知识和思想界新近发生的 11 条动态。

最近两个月，美国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再次凸显了这个国家内部的争议与分裂。它们包括美国最高法院废止堕胎权的草案遭到泄露：纽约州布法罗市 10 名黑人被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杀害，另有 3 人受伤；得克萨斯州尤瓦尔迪市 19 名儿童和 2 名教师被杀、17 人重伤；美国国会就 2021 年 1 月 6 日的国会山骚乱事件举行听证会，特朗普被指“未遂政变”，一些共和党人则称听证会是“政治迫害”。

其中，布法罗和尤瓦尔迪的枪击案，使得人们对更严控枪的呼声再次兴起。但是，最后估计会和以前一样陷入僵局，无法促成行动和立法。这里面的原因非常复杂，无论是归咎于美国全国步枪协会 (NRA)、历史悠久的枪支文化、共和党人的阻挠、选举政治制度的问题，等等，都有几分道理。

因为是老问题，《纽约书评》最近直接将旧文集结，做成“枪支流行病”的专题。比如，历史学者埃德蒙·摩根 (Edmund Morgan) 在关于《武装美国：美国枪支文化的起源》(Arming America: The Origins of a National Gun Culture) 的书评中称，美国人对枪支的热爱始于 1820 年代，他们效仿英国绅士，买昂贵的步枪，形成一种亚文化：

2012 年康涅狄格州小学枪击案后，作家加里·威尔斯 (Garry Wills) 认为，对 NRA 的会员来说，枪就是他们的摩洛 (Moloch) 神，需要不停献祭儿童；2017 年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后，法学学者亚当·温克勒 (Adam Winkler) 撰文称，NRA 曲解了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更好的枪支法律并不与之违背，人们可以通过民主进程解除步枪协会的武装，推动改变发生：

2018 年佛罗里达校园枪击案后，作家亚当·霍赫希尔德 (Adam Hochschild) 评论了三本相关书籍——《武装在美国：从殖民地民兵到隐蔽携带的枪支权利史》(Armed in America: A History of Gun Rights from Colonial Militias to Concealed Carry)、《加载：第二修正案的解除武装史》(Loaded: A Disarming History of the Second Amendment)、《选定国家：一场西部叛乱》(Chosen Country: A Rebellion in the West)，称由于巨额竞选资金支持，美国国会恐惧 NRA，不仅忽略由于控枪不力造成的伤亡等数据，还使制造商和经销商免于承担因枪死亡的任何责任，阻止疾病控制中心对枪支暴力开展任何研究。

有意思的是，霍赫希尔德在某种意义上还预测成功了三年后的国会山骚乱事件，称特朗普在 2020 年竞选失败后，将尽一切可能激怒和团结支持者。“对任何极右翼人士来说，他的失败或下台将是阴谋论恢复世界新秩序的拟真证据。这些穿着靴子和迷彩防弹夹克的持枪男子会安静地接受他离开白宫吗？而且，如果他们不能阻止，会以某种方式报复吗？”他在文中写道。

除了控枪的争议，在更大维度上，《金融时报》编辑爱德华·卢斯 (Edward Luce) 在 6 月撰文《美国正走向内战？》(Is America heading for civil war?)，称虽然美

国又将爆发一次内战的提法听起来太过耸人听闻，但是最近有几本新书发出了有说服力的警告，现在美国分裂的风险比 1861 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令人警惕。

比如他提到，学者芭芭拉·沃尔特 (Barbara Walter) 在《内战如何开始：如何阻止内战》(How Civil Wars Start: And How to Stop Them) 一书中认为，今天的美国民主在所有题目上都选错了答案：

记者乔纳森·马丁 (Jonathan Martin) 和亚历山大·伯恩斯 (Alexander Burns) 在合著书籍《这不会通过：特朗普、拜登和为美国的未来而战》(This Will Not Pass: Trump, Biden, and the Battle for America's Future) 引用拜登的担心——“我当然希望(我的总统任期)能圆满完成。如果不，我不确定我们的国家是否还会完整。”作家斯蒂芬·马尔什 (Stephen Marche) 在《下一场内战：来自美国未来的通讯》(The Next Civil War: Dispatches from the American Future) 悲观预言，美国距离分裂危机只差一场大规模暴力行动。

他们观察到的现实论据包括，民调显示，大多数共和党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相信，民主党人窃取了选举成果，但在正常民主体制下，败选政党会成为忠诚反对派；两党按照种族和身份划分的界限越来越分明，共和党选民几乎全是乡镇白人，民主党则几乎全是城市和多种族选民；目前两党都有 1/3 以上的人认为，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诉诸暴力合理，而 2017 年这一比例均不到 10%；美国右翼民兵的数量近年来呈爆炸式增长，白人至上主义情绪也渗透到了美国执法机构。潜在武装叛乱分子的数量是左翼叛乱组织（如黑豹党和共生解放军）的数倍，后者曾在 1970 年代早期造成过类似恐慌，等等。

“对于美国民主的持续下滑，几位作者都没有给出简单解药。他们的补救措施——找到使多种族民主正常运行的方法，让金钱退出政治，向美国儿童教授公民学——有一种一厢情愿的事后诸葛亮的即视感，而不是严肃的行动计划。虽然是加拿大人，但马尔什深刻地意识到了全球自由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情况。尽管美国建国之初有些虚伪，但没有哪个国家是建立在这样的信条之上的，即它可以容忍陌生人之间的根本差异，并在此基础上茁壮成长。”卢斯写道。

也如马尔什所言，如果说美国的实验没有给世界带来光辉卓越的人类愿景，那将是谎言，邪恶的谎言：人类的差异值得肯定，人类的矛盾至关重要。这仍然是值得为之奋斗的关于人类存在的愿景。”

还有什么值得想想……

01

6 月，中国民众最为关心的公共事件要数河北唐山打人案，讨论层出不穷，争议非常激烈。其中，最为激烈的争议（唐山打人事件是否反映出性别问题），按道理不该成为争议，但很遗憾，它在网上吵得最凶。

毫无疑问，该事件缘起性骚扰，至少就能反映出是性别问题。而且，事件发生后女性普遍对安全感的恐惧和焦虑，更揭示出性别不公的现状。所以，论者完全可以从性别视角批判现有结构上的不平等，推动性骚扰、性暴力等具体问题的解决和人们观念上的改变。

举个也许不恰当的例子，《小鸟文学》曾访谈过学者贺欣，他研究了女性在离婚诉讼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如何形成，揭示了中国司法实践中的男女不平等。可见，这种系统和结构上的不平等没法装作不存在。

除了性别视角，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认为，人们还需要反思为什么现有制度没给人见义勇为提供足够的激励和保护？如果没有制度保护作为后盾，绝大多数人首先考虑的都会是自保。与之相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濂从哲学角度补充了劳东燕的讨论。他问道，除了制度、勇气和荷尔蒙，见义勇为还需要哪些元素加持？做一个好人为什么比想象中的要难很多？

社会治理或扫黑除恶的分析视角被许多人提起，但或许更让人玩味的是，唐山开展“雷霆风暴”的运动式治理后，当地对媒体报道的限制，还有公安局门口众多排队的访民和网上举报涉黑的民众，足以可见地方政府暴露出的治理问题。

还有很多角度，不再提及。最后说一点，和许多公共事件类似，网络暴力在唐山打人案中再次成为问题，简单或极端思维在网友“讨论”中也非常普遍，比如扣上性别对立的帽子和必须从性别角度讨论，似乎都不可取。毕竟，很多问题都可从多元视角来理解和分析，但在一些人眼中，只有标签或所谓核心，看不到除“我”外的其他景观。

02

中国的常态化核酸检测引发不少争议。一是检测的规模与成本。因为按照国家卫健委的说法，为了方便群众，省会和千万级以上城市要建立步行 15 分钟核酸采样圈”。据《经济观察报》，河南是第一个以省级政府名义采购核酸采样屋的地区，计划投入近 6 亿元采购核酸亭，每个核酸亭价格在 4 万元左右。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另据东吴证券估算，如果中国所有二线以上城市实施常态化核酸检测，其一年的成本上约为 1.7 万亿元，占 2021 年中国名义 GDP 的 1.5%、公共财政收入的 8.7%。可以比对参考的是，2019 年中国卫生总费用为 6.6 万亿元，占当年 GDP 的 6.6%。二是检测的频率和时间。像在许多城市，进入公共场所或者乘坐公共交通，都需要出示核酸阴性证明，但时间不一（如 24 小时、48 小时、72 小时、7 日），其间标准对公众来说并不明晰，误事或不便时有发生。三是费用谁来承担。与新冠疫苗由医保和财政共同分担费用不同，国家医保局 5 月底称，常态化核酸检测费用由各地政府承担，但参保患者看病就医时发生的核酸检测费用，可以按规定由医保基金支付。此前，各地的费用承担方不尽相同，在一些地方，检测费用由医保和财政共同买单，还有市民自费的情况出现。另据华创证券测算，常态化核酸检测将为财政和医保带来巨大负担，今年前四月已花近 1500 亿元。四是检测这门生意。北京多家核酸检测企业出现造假，新浪科技采访多位专家后称，短时间频繁出现造假，一方面是混采方式、阳性率低等特点，导致造假不易被发现；另一方面，在扩大混采比例后，企业的利润将成倍增加。而且，在毛利率大幅下降的情况下，铤而走险的企业绝不止被查处的这几家，只是在阳性率很低的情况下，它们被发现了而已。

03

河南四家村镇银行出现取款难，涉及 40 万储户、400 多亿存款。后来，不少储户发现自己的健康码转成红码，舆论哗然。

《财新周刊》的社论《警惕健康码滥用》说出了许多人的心声：“河南有关部门将取款难的受害人赋红码，显然并非出于疫情防控，而是防止其到河南表达诉求。这种以赋红码来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为，性质恶劣，危害极大，严重侵犯了公民的权利，也侵蚀了防疫大局的根基。民怨沸腾数日后，真相仍然扑朔迷离。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郑州楼盘维权业主健康码也变红，承诺非村镇银行储户后才转绿。这表明，借助健康码的管控行为在当地已非止一例。”

健康码被滥用固然让人气愤，但这起金融事件本身暴露的问题也不应忽视。正如学者唐涯写道：“我有点担心，尤其在这个‘远程赋红码’之后，批评和反思会容易发生视角偏移，集中到大河南不靠谱这个议题上。谈到金融也会容易认为是‘金融监管缺位’——比如说村镇银行利用互联网平台去跨地区揽储，板子又打到平台身上，然后进一步加强‘监管’。过去几年，这种事几乎是周而复始地在发生。‘管’的范围是越来越宽，但是‘监’的效率却不见提高。我希望把逻辑稍微往前推一层，引出更深层的反思——监管政策的制定是否应该有前瞻性？是否有容错和修正空间？”

她称，村镇银行是 2007、2008 年左右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金融配套创新提出来的，几年间发展得如火如荼（截至 2021 年全国有 1651 家村镇银行）。但是，2012—2013 年之后，城市化大潮以及制造到服务的经济转型，使得大批村镇银行陷入生存困境，最后变成揽储通道。之后 P2P 等互联网金融爆发，但 2017 年后又被严控。村镇银行因为有银行两字护体，开始在整个表外资金链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对影子银行的监管越严格，村镇银行反而因为在整个银行体系内无足轻重的角色获得了生长空间。一直到 2018 年后经济持续下行，资管新规让金融市场加快出清，再接着 2020 年疫情冲击，一步一步引发了资金链的风险，这才让监管层意识到，当年种下的因，已经成了有点苦涩的果。……监管政策出台的机制本身，是否值得思考？……类似的例子实在不少，双创、互联网金融创新、结构化货币政策，还有 A 股市场的熔断，都曾抱着美好初心，都曾落了一地鸡毛。”

04

5 月，戛纳电影节在线下举办，一扫疫情阴霾，但在持续三个月仍未结束的俄乌战争的笼罩之下，又使得这场电影节有关政治和艺术关系的争论成为焦点。需要说明的是，两者并非泾渭分明，讨论的只是相互渗入程度或表达方式优劣的问题。

比如在开幕式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突然连线，谈电影与政治的贴近，发表和平倡议；在一种关注单元中，乌克兰导演马克西姆·纳科内奇尼 (*Maksym Nakonechnyi*) 的电影《蝴蝶视觉》(*Butterfly Vision*) 入选，该片取自真实事件，讲述 2014 年俄军入侵顿巴斯地区后实施的暴力行为；

戛纳拒绝了俄罗斯官方电影人参与，但俄罗斯导演基维尔·谢列布尼科夫的电影《柴可夫斯基的妻子》(*Жена Чайковского*) 入围了主竞赛单元。该导演因受俄罗斯官方基金会的资助遭遇争议，但他称自己的作品没有政府宣传性质。事实上，他本人近年常以俄罗斯政府反对者的形象出现。

在性别政治方面，虽然艺术总监蒂耶里·福茂坚称，影片入围不该是配额制，更重要的是艺术价值。这是“法国传统”，和美国不同。但是，从最初的三位女性导演入围主竞赛单元，到后面又增加两位。外界猜测，这或许是迫于美国媒体方面的舆论压力所致。在发布会上，福茂还说，戛纳考虑在“青年电影”的学生短片单元中推出性别配给制度。

05

6 月是 LGBTQ 群体的“骄傲月”(pride month)，《纽约客》精选了一系列文章，探讨了美国过去几十年 LGBTQ 权利的进展，以及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在《“公害”拉里·克莱默》(*Larry Kramer, Public Nuisance*) 中，迈克尔·斯佩克特 (Michael Specter) 描述了一位革命性的剧作家和倡导者，他帮助改变了公众对艾滋病的理解以及治疗和研究的政治；

玛莎·格森 (Masha Gessen) 在《纪念跨性别拉丁裔社区的母亲罗蕾娜·博尔哈斯》(*Remembering Lorena Borjas, the Mother of a Trans Latinx Community*) 中，书写了这位墨西哥裔美国活动家的遗产；在《完美妻子》(*The Perfect Wife*) 中，艾瑞尔·李维 (Ariel Levy) 讲述了伊迪丝·温莎 (Edith Windsor) 的故事，她带着如此坚定的决心走上法庭，帮助重塑了同性婚姻的未来；

在《一名士兵的遗产》(*A Soldier's Legacy*) 中，本·麦格拉思写了一个在“别问，别

说”时代的战斗士兵；最后，在《保利·默里的许多生活》(*The Many Lives of Pauli Murray*) 中，凯瑟琳·舒尔茨 (Kathryn Schulz) 介绍了一位有时被忽视的活动家，她“既走在时代前面，又在幕后”。

06

2022 年的布克国际奖颁给了吉丹贾丽·斯里 (Geetanjali Shree) 的《沙墓》(*Tomb of Sand*)，这是首部获得该奖的英译印地语小说。作者斯里和译者黛西洛克威尔 (Daisy Rockwell) 共同赢得 5 万英镑奖金。



《沙墓》讲述了一个年届八旬的老妇在丈夫去世后一度陷入深重抑郁，尔后又振作起来重获新生的故事。她去了巴基斯坦，直面当年印巴分治加之于她、迄今也未能化解的少年时期创伤，继而反思身为一名母亲、女儿、女性以及女性主义者的意义。

值得一提，《沙墓》的出版商是小型独立出版商“倾斜轴”(Tilted Axis Press)，其创办者黛博拉·史密斯 (Deborah Smith) 曾在 2016 年凭借翻译韩国作家韩江的小说《素食者》与之一同获奖。随后，她用奖金创立倾斜轴出版社。倾斜轴之外，今年布克国际奖的入围作品中，还有两部小说出自一家小型独立出版商“陆上行舟”(Fitzcarraldo Editions)，展现了另一种文学出版的可能性。

除了布克国际奖，今年的女性小说奖获奖作品为日裔美国作家露丝·尾关 (Ruth Ozeki) 的《色与空之书》(*The Book of Form and Emptiness*)。另一边，有着 50 年历史的科斯塔图书奖突然宣布停办，引发图书行业的失望之声，但赞助商科斯塔 (Costa) 咖啡并未给出具体停办理由。

07

几条文化新闻可以留意。一是美国畅销小说家詹姆斯·帕特森 (James Patterson) 在接受采访时称，白人男性作家和编剧在电影、电视、剧场以及出版行业都遭到歧视，“正面临着另一种形式的种族主义”。此番言论一出，即受到批评，帕特森立马道歉：“我向称白人男性作家难以找到工作是种族歧视的言论道歉。我绝对不认为白人作家面临着种族歧视。无论是在文学界、好莱坞还是任何地方，我强烈支持多元的声音被聆听。”二是澳大利亚迈尔斯·富兰克林 (Miles Franklin) 文学奖的入围作品《狗群》(*The Dogs*) 被《卫报》指出抄袭，包括与 S·A·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著作《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有近 60 处相似甚至完全一样的语句，以及多处雷同情节。

随后，作者 约翰·休斯 (John Hughes) 发表道歉声明，称在 2017 年教创意写作课时曾读过《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但后来把它们和自己采访外祖父母的材料混在一起。“我想向阿列克谢耶维奇及她的译者道歉，因为我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使用了她们的文字。”休斯说。

道歉声明发表五天后，作家香农·伯恩斯 (Shannon Burns) 和学者埃米特·斯廷森 (Emmett Stinson) 又发现了《狗群》和《了不起的盖茨比》《安娜·卡列尼娜》《西线无战事》等书籍的相似之处，出版商也改变自己先前的态度，对争议感到苦恼，认为信任被破坏，选择与作家保持距离。

三是 2020 年，英国诗人凯特·克兰奇 (Kate Clanchy) 凭借回忆其教师生涯的作品《我教过的孩子们，以及他们教会我的东西》(*Some Kids I Taught and What They Taught Me*) 获得奥威尔奖，风光无限。之后，批评者挑出其中一些语句涉嫌种族主义，掀起了一场席卷作者、批判者、支持者和数十名图书行业人士的风暴。最近，该书耐人寻味的修改版又被新出版商推出。

《卫报》的一篇长篇报道讲述了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和各方观点，更细微地让我们了解到欧美文化战争风潮下的个人际遇和普遍困境，争论的焦点是：这些是早该做的纠正，还是代表扼杀想象力；艺术是否有权利冒犯，以及如果出版业本身不是一个以白人为主的中产阶级行业，那它是否会不那么笨拙地驾驭这一切。”文章写道。

08

几部英文新作值得关注。德国电影新浪潮代表人物 维尔纳·赫尔佐格 的第一本小说《暮光世界》(*The Twilight World*) 的英文版出版，讲述二战结束后，日本士兵小野田宽郎 (Onoda Hiroo) 在菲律宾一个小岛上守卫 29 年，并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的故事；继《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后，比尔·盖茨又写了一本有关人类未来的新书《如何预防下一次大流行》(*How to Prevent the Next Pandemic*)，希望让新冠肺炎成为最后一次大流行病；“哥特小说女王”雪莉·杰克逊 (1916—1965) 生前未发表的两部短篇小说 Charlie Roberts 和 Only Stand and Wait 在美国 Strange 杂志刊发。

5月27日，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诞辰115周年，《小鸟文学》刊发书摘以纪念这位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先驱；今年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位70年，6月2日是她的官方生日，英国和英联邦国家连续四天举行白金禧庆祝活动。伊丽莎白二世是迄今为止在位时间最长的英国君主，而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长达72年；6月17日，俄裔美籍作曲家[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诞辰140周年，他革新过三个不同的音乐流派，被誉为音乐界的毕加索。

6月3日，加拿大社会学者[多萝西·E.史密斯](#)(Dorothy E. Smith, 1926—2022)逝世，她开创了女性主义的立场理论和调查方法的机构民族志；6月8日，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祥龙](#)(1949—2022)逝世，他对中国的现象学和儒家哲学研究作出重要贡献，也是位率真、执着和开放的哲人；6月14日，以色列作家[亚伯拉罕·耶霍舒亚](#)(A.B.Yehoshua, 1936—2022)逝世，他与阿摩司·奥兹、大卫·格罗斯曼并称“以色列文学铁三角”。



曾梦龙

1993年生，宜宾人，高中学理，大学学文，毕业于四川大学新闻系。2016年毕业后一直做媒体，没赶上最好的时候，但也不是最坏的时候，关心出版、知识和人。

Newsletter

四种新闻信轮周发布，各自以认可的维度覆盖撰写者认为重要的新闻。因而会有重复。不过不用担心，它们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重复说明了某个问题在世界的权重。



电影《万湖会议》(2022)剧照

档案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汉娜·阿伦特 | 发现经典

“那一刻我有了一丝彼拉多的感觉，
因为我不再觉得自己有罪了。”

我这份关于艾希曼良知的报告，目前为止使用的都是被他本人遗忘的材料。按照他自己对此事的陈述，转折点不是发生在四个星期，而是四个月之后。那是1942年1月召开的一次秘密会议，纳粹惯于称之为副部长级会议，也就是如今众所周知的万湖会议，因为海德里希邀请与会者到柏林这块郊区的一座别墅里。会议的官方名称就已显示出其重大性。因为假如将最终解决的范围推广到全欧洲，那么光有国家机关的默许显然不够，还需要所有部长以及全体行政部门的通力合作。希特勒上台九年后，德意志帝国所有部长都已经是资深纳粹党员；政权初期只是“配合”的人，已经被纳粹轻松取代。然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不是百分之百可靠，因为很少有人像海德里希或希姆莱那样完全依赖纳粹党才平步青云。还有一些人不全靠纳粹党发迹，像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贝特洛甫，从前是香槟酒商，现在却也没什么影响力。然而，涉及国家行政机关里部长直属的高层官员，问题就棘手得多了，因为这些人是每个政府部门的骨干，不容轻易替换；希特勒像后来的阿登纳一样，只要这些高层还没有彻底失去底线，就容忍他们的存在。所以，各个副部长和法律以及其他领域专家往往甚至连纳粹党员都不是，因此也就不难理解海德里希的顾虑，他担心能否让这些人积极参与到集体屠杀中来。艾希曼说，海德里希“准备好迎接万难之难”。然而，他却大错特错了。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协调各方力量执行最终解决方案。讨论首先集中在“复杂的法律问题”上。比如，对于拥有一半或四分之一犹太血统者，应该杀死还是绝育？随后所有到会者就“解决这个问题的各种可能性”，也就是各种杀人方式，展开了开诚布公的讨论，并非常“愉快地取得了一致意见”。所有人都对最终解决方案“兴奋异常”。这里面尤其要提到内政部副部长威廉·施图卡特博士。他向来以对“极端”的党政措施持沉默和保守态度而闻名；按汉斯·格洛布克博士在纽伦堡的证词，施图卡特还是一位忠实的法律捍卫者。不管怎样，困难当然是有的。波兰总督府的二号人物约瑟夫·比勒，对于将犹太人从西部撤离到东部的前景感到惴惴不安，因为这意味着波兰要有更多的犹太人；他提议推迟撤离行动，并“在总督府执行最终解决，省去转移的问题”。来自外交部的官员带着精心准备的备忘录现身，表达“外交部对全面解决欧洲犹太人问题的迫切愿望以及思考方案”，可是没人对此感兴趣。正如艾希曼正确指出的，关键在于来自不同行政部门的成员不仅仅表达意见观点，还给出了具体的提案。会议持续一个多小时，不到一个半小时，然后上了饮料，人们共进午餐。这一“舒适的小型社交聚会”，旨在增进与会者彼此间必要的私人交往。这对艾希曼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机会，他此前还从来没有参加过有这么多“高层人物”出席的社交活动。无论从官职还是社会地位上讲，他都是与会者中最低的一个。是他发的邀请函，并且为海德里希的开场演说准备了数据材料（满篇错误，不可思议）——毕竟，要杀死一千一百万犹太人是一项声势浩大的工程；之后，他还准备了会议记录。简单说，

他相当于会议秘书。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那些国家政要离开后，他才被准许跟他的上司米勒和海德里希围坐在壁炉旁，“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海德里希抽烟喝酒”，他们并没有“聊工作，而是享受连续工作几小时后的休息时间”。两个人都心满意足，尤其是海德里希，兴致特别高。

那个会议日之所以让艾希曼难忘，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尽管他一直在尽力协助“最终解决”，但总是对“这样一种暴力解决方案”心存疑虑：而今，这些疑虑终于烟消云散。“在万湖会议上，连最重要的人士，第三帝国的教皇们都发言了。”现在，他可以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不单是希特勒，不仅是海德里希和神秘的“米勒”，不只是党卫军和纳粹党，就连具有优秀传统的官场精英也竞相争夺指挥这场“血腥”任务的殊荣。“那一刻我有了一丝彼拉多的感觉，因为我不再觉得自己有罪了。”他是谁，胆敢作出审判？他是谁，“对这件事能有自己的想法”？这下好了。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由于谦逊而被毁的人。

根据艾希曼的回忆，接下来的事进行得比较顺利，按部就班。当年的“强制移民”专家很快便成了一个“强制撤离”专家：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登记犹太人口，强制他们佩戴黄星以便于辨认，按照当时东部地区各个灭绝中心的相对容量集中调遣车辆。当满载犹太人的列车抵达一个中心，首先要把他们当中身强力壮的挑选出来干活，通常是在去操作各种灭绝设备，剩下的人则立即被处决。偶尔会有不顺，但都是小状况。外交部同纳粹占领国或协作政府的高官接触，在遣送当地犹太人的问题上向他们施压，或者防止他们打乱既定顺序——在尚未对死亡中心的吸纳能力进行恰当评估的情况下，就一时冲动地把犹太人撤到东部添乱。（艾希曼记得是这样的，可事实远没有这么简单。）法律专家拟定了剥夺受害人国籍的必要条款，这样做是出于两点考虑：如此一来，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再去追查他们的下落；与此同时，受害人原先的所在国就可以侵占他们的财产。财政部和帝国银行已经准备好了方便设施接收来自欧洲各国的巨额赃款赃物，甚至手表、金牙，全部都被帝国银行清理，然后发往普鲁士国家铸币厂。交通部提供必需的运力，即便铁路车辆短缺的时候，他们通常也能安排货运车厢。他们还负责确保这些火车的运行时刻不与其他列车相冲突。艾希曼及其下属将每节车厢的拟装载人数报给犹太委员会元老，后者再提交乘客名单给前者。犹太人登记姓名，填写大量表格，回答关于个人财产的海量问卷，从而使财产没收流程变得更加顺畅。然后，他们到达集合地点，踏上列车。少数试图躲藏或者逃跑的人，被犹太特别警察控制起来。就艾希曼所见，没有人提出抗议，也没有人拒绝合作。一个住在柏林的犹太人在1943年写道：“这里的人在一天天走向自己的坟墓。”

这场行动将迅速覆盖纳粹在欧洲的全部占领区和盟国，施害者的良知问题必然成为横亘其中的巨大障碍。要全面扫除障碍，单凭受害者的逆来顺受肯定不够。因为那些施害者毕竟受过“汝不可杀人”的教育，知晓《圣经》里那句“你杀了人，又要夺了他的产业吗？”耶路撒冷地方法院恰到好处地引用了这句话。艾希曼称斯大林格勒惨败后的德国处在“死亡旋涡”，盟军对德国城市的地毯式轰炸，常被他当作杀害平民的正当理由，同样也常被今天的德国人用作大屠杀的挡箭牌。这种俯拾皆是的轰炸场面，虽不同于耶路撒冷报告中提到的暴行，但在恐怖程度上却毫不逊色；而这可能对于削减，或毋宁说泯灭施害者的良知作出了巨大贡献——假如当时他们还尚存一丝良知的话。不过，从证据来看，这种“假设”的可能性不大。早在德国本土遭遇战争恐怖之前很久，杀人灭绝机器就已被提上日程并经过了精心打磨。无论是在捷报频传的岁月，还是节节溃败的战争末期，其错综复杂的官僚机制都始终如一地精确运转。起初，当人们可能还有良知的时候，担任指挥角色的精英层，尤其是高级党卫军军官几乎没有倒戈或变节；只有当德国战争败局已定时，他们才开始冒头。另外，这些背叛的规模从来就没有大到推翻纳粹杀人组织的程度；并且，这些个人行为并非出于怜悯，而是贪腐；背叛纳粹不是出于良心发现，而是希望在苦日子到来之前积攒一些钱财和人脉。希姆莱之所以于1944年秋天下令停止灭绝行动、拆除死亡工厂，是因为他荒唐并虔诚地以为，盟军会对这种殷切姿态表示感激。他对将信将疑的艾希曼说：此举既成，他便可以去磋商“胡伯图斯堡和约”了。这里影射的是1763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结束七年战争的《胡伯图斯堡和约》，该和约准许普鲁士在战败情况下仍然保留西里西亚。

如艾希曼所述，最有力的良心安慰剂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他看不到哪怕一个人，任何一个人，真正反对“最终解决”。然而他反复提起一个例外，这肯定也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事情发生在匈牙利，当时希姆莱下令释放一百万犹太人，用以交换一万辆卡车，艾希曼就此事跟卡斯特纳博士进行磋商。事态的转变显然让卡斯特纳受到了鼓舞。他请求艾希曼关闭“奥斯维辛的杀人磨坊”。艾希曼回答，他将“欣然从命”，无奈此乃他及其上司力所不能及之事。事实的确如此。当然，他并不期待犹太人以同样的热情投入到自我毁灭之中。不过他期待的也不只是顺从。他期待他们的合作，而且如愿以偿得简直超乎想象。争取到犹太人的合作，自然是他的全部事业的“定海神针”，正如他在维也纳时代所经历的那样。假如没有犹太人协助管理和维护治安，局面就会完全陷于混乱，或严重损耗德国人力。正如前文所提，柏林地区的犹太人，最终全部由犹太警察集中、控制。（毋庸置疑的是，如果没有受害者一方的合作，很难单靠几千个人，而且大部分还是坐办公室的，就把十几万人消灭掉……在通向死亡的道路上，波兰犹太人全程只看见过几个德国人。）R.彭道夫在其著作中如是说。这些话用在那些被运到波兰受死的犹太人身上更为贴切。）因此，在占领领土上建立伪政府的同时，总是伴生着一个犹太中央组织；我们随后还会发现，纳粹未能建立傀儡政权的地方，便无法获得犹太人的合作。尽管伪政府的成员通常来自反对党派，但犹太委员会成员原则上都是当地声名显赫的犹太领袖，纳粹赋予他们很大权力，直到他们自己也被火车带走。如果他们碰巧来自中欧或西欧，那么会被运到特莱西恩施塔特或者伯根—贝尔森；如果他们来自东欧的犹太社群，那么终点就是奥斯维辛。对于一个犹太人而言，在毁灭本民族的过程中担任犹太领袖，无疑是整个黑暗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这种行为人们早有耳闻。不过，还是在劳尔·希尔伯格的教科书式著作《欧洲犹太人的毁灭》(我之前提到过)里，其中可悲又可鄙的细节才首次被

曝光。论及合作，高度同化的中西欧犹太中央社团与大量以意第绪语为母语的东欧犹太人并不存在什么区别。无论在阿姆斯特丹还是在华沙，在柏林还是在布达佩斯，犹太官员被委托拟定人员及其财产名单，从被遣送者手中收取钱财用作其乘车费和灭绝费，监督清空公寓，提供警力协助抓捕犹太人，再把他们带到火车上，直到最后，把犹太社团的财产有序上交充公。他们分发黄色星标，有时候，比如在华沙，“出售臂章成为一项常见业务。当时有普通的布质臂章和可清洗的高级塑料臂章”。在他们受纳粹启发（而非胁迫）所作的宣言中，我们仍能感觉到他们多么享受于这份新近获得的权力。如布达佩斯委员会第一次声明所示，“犹太中央委员会被赋予全权处理一切犹太精神和物质财富以及全部犹太人力资源”。我们知道犹太官员成为杀人工具时的感受：他们就像在船将倾覆之际，为安全抵达港口放弃大部分珍贵货物的船长们，就像“牺牲一百人换取一千人的性命，牺牲一千人换取一万人的性命”的营救者。真相更加残忍。比如在匈牙利，卡斯特纳博士以牺牲大约 476000 人的代价解救了整整 1684 个人。为了不让生死变成“盲目的偶然事件”，则需要“真正的神圣原则”，作为“孱弱的人性之手的操纵者，写下那些默默无闻者的名字，决定他们的生死”。那么“神圣原则”又是如何挑选幸运之人的呢？是那些“毕生都在为孜孜不倦”的人，比如犹太长老以及“最杰出的犹太人”——卡斯特纳的报告如是回答。没有人特意要求犹太官员们守口如瓶。他们是自觉自愿的“保密者”，不管是出于维持稳定、防止动乱（比如卡斯特纳博士的情况），还是出于“人道”考虑（如柏林当时的首席拉比莱奥·贝克博士所言，“坐等被毒死只会更残酷”）。艾希曼审判期间，一位证人指出这种“人道”的不幸后果：人们自愿被从特莱西恩施塔特运到奥斯维辛，并斥责那些试图告诉他们真相的人“简直是疯子”。我们熟知纳粹时期的各个犹太领袖。位居榜首的是哈伊姆·罗姆科夫斯基，罗兹首席犹太元老，被叫作哈伊姆一世。他发行过印有他签名的纸币，以及印有他头像的邮票。他还乘坐一辆破马车到处周游。紧随其后的是莱奥·贝克。他学识渊博、温文儒雅，接受过高等教育，相信犹太警察会“更加温和、更加得力”，会“令磨难得得到缓解”（然而实际上，他们当然更加凶残、更难收买，因为对他们而言风险太大）。最后是几名自杀的犹太人。华沙犹太委员会主席亚当·车尼利亚科夫就是其中之一。他不是拉比，而是一个自由信仰者，一个操波兰语的犹太工程师；但是他一定还记得犹太拉比的名言：“让他们杀死你们，但不要越界。”

耶路撒冷的控方小心翼翼地绕开阿登纳政府。出于更加重大也更显而易见的理由，他们本该避免把犹太委员会这页故事公之于众，这一点不言自明。（然而，这些情况却被人们公开拿出来讨论，并且毫不避讳地写进以色列的教科书——见马克·M. 克鲁格的一篇名为《以色列青年和海外犹太人——精编历史课本》[“Young Israelis and Jews Abroad—A Study of Selected History Textbooks”] 的文章，载于《比较教育评论》[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1963 年 10 月。）无论如何，在此必须提及这个章节。因为，一个案子纵然证据堆积如山，却仍存在无法解释的空白。法官们举了一个例子，审讯材料中没有 H.G. 阿德勒的《特莱西恩施塔特 1941—1945》(Theresienstadt 1941—1945, 1955) 一书，控方不无尴尬地承认该书“真实可信，基于无可争辩的事实材料”。之所以会有这个疏忽，理由很清楚。该书详细记载了特莱西恩施塔特犹太委员会在接到党卫军总体指示后，如何制定出令人生畏的“遣送名单”，如何规定多少人将被运走以及这些人的年龄、性别、职业、来源国。被迫承认制定死亡名单（除了少数例外）是犹太委员会的任务，肯定会削弱控诉的力度。对于这半路杀出的程咬金，出席检察官雅各布·巴洛先生拍案而起，用暗示的方式说：“我们尽量在不损害被告完整形象的前提下，呈现那些跟被告有关联的事件。”假如将阿德勒的书呈堂，一定会损害被告的形象，因为书中内容与特莱西恩施塔特的主要证人所作证词相矛盾，证人宣称是艾希曼亲自制定的死亡名单。更为重要的是，这会令控方刻画的施害者与受害者形象不再那样泾渭分明。提交不支持控方的可靠证据，通常是辩方的使命，可是塞尔瓦蒂乌斯博士虽察觉到证词中存在一些细微的矛盾，却并未抓住如此手到擒来且众所周知的证据，个中缘由很难回答。他本可以指出，艾希曼从移民专家转变成“撤离”专家之后，就把他移民时代的两位犹太故交任命为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犹太元老”。两人分别为曾负责柏林移民事务的保罗·爱泼斯坦和曾在维也纳从事同类业务的拉比本雅明·默梅施坦。要想勾勒出艾希曼当年的工作氛围，这一点肯定比所有围绕盟誓、忠诚、绝对服从等美德所展开的唇枪舌剑更有效力。

夏洛特·扎尔茨贝格尔女士为特莱西恩施塔特所作的证词（我前面引用过她的话）至少让我们瞥见，控方再三提到的“完整形象”中有个无人问津的角落。主审法官并不喜欢“完整形象”这个表达，也不喜欢这副形象。他提醒过首席检察官许多次，“我们不是来这画的”，而是“在诉讼，诉讼是我们审判的框架”，法庭“基于诉讼来形成审判意见”，控方必须“遵守法庭规定的程序原则”。控方完全没有遵从以上列举的任何一条刑事诉讼准则，更过分的是，控方拒绝引导证人发言，或者只有在耐不住法官一再催促时，才随意向证人抛出几个问题。结果，证人好像是在参加一场由首席检察官主持的会议。在证人起立发言之前，检察官负责向观众介绍他们的身份；他们想发言多久都可以，但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他们才会被专门问及某个问题。控方宣证人一个接一个出场为华沙犹太人隔离区以及维尔纽斯和考纳斯的起义作证时，你尤其会感觉到，此刻的气氛不是一场公审大会，而是一场群众集会。发言者各尽所能地刺激观众的神经。但这些起义同被告的罪名没有任何关联。如果他们说出犹太委员会的努力及其重要而毁灭性的角色，那么这些证词对审判也许会有一些效用。当然有人注意到：证人谈到“党卫军和他们的帮手”时指出，后者当中包括“隔都警察（也是纳粹杀人犯手中的一枚工具）”以及“犹太委员会”。可是他们不愿从这一角度“细述”这一故事，而是把讨论的焦点切换到真正的叛徒身上，那些少数“无名无姓的人，不为犹太公众所识的人”，比如那些破坏所有反抗纳粹的地下活动的人。（这些证人作证期间，观众又换了一批人；现在，坐在观众席里的是“基布兹人”，即证人所属的以色列集体农场成员。）最纯粹也最有启发性的证词来自齐薇娅·鲁贝特金·楚克曼，她大约四十岁，美丽依旧，完全没有多愁善感或自暴自弃；她的证据很有条理，而且她非常清楚自己的话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从法律角度看，这些证人的证

词无关紧要。豪斯纳先生在结案陈词中甚至没有提及其中任何一个。然而，这些证词却证实了犹太起义与波兰、苏联游击战士之间存在紧密关系；此外，尽管同其他人的证词（“所有人都反对我们”）之间存在矛盾，但这些证词可能对辩护方更有利，因为在大规模屠杀平民这个问题上，它们提供了比艾希曼反复说的“魏茨曼 1939 年对德宣战”更好的理由。（艾希曼的话是一派胡言。最后一次战前犹太复国者大会结束之际，哈伊姆·魏茨曼只是说，西方民主国家之战“是我们的战争，他们的战斗就是我们的战斗”。如豪斯纳所言，真正的不幸在于，纳粹从未把犹太人看作交战国的国民：因为，假如他们是交战国国民，他们或许还可以在战俘营或难民营里劫后余生。）如果塞尔瓦蒂乌斯博士指出这一点，那么控方将不得不承认这些抵抗组织的力量是多么薄弱，他们的虚弱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在本质上是多么没有杀伤力——尤其是，他们在犹太人民当中是多么缺乏代表性。犹太人民甚至曾与他们兵戎相见。这些耗费大量时间的证词对于法律量刑显然并无太大作用。而以色列政府在这件事背后的政治意图也不难破解。豪斯纳先生（或者本·古里安先生）大概想要传递这样一个讯息，即所有形式的抵抗都来自犹太复国主义者，似乎在所有犹太人中只有复国主义者懂得，就算不能拯救自己的生命，也要不惜一切挽救自己的荣誉（如楚克曼先生所言）；同时，在这种情况下，人所能经历的最糟糕的情况，就是处于，或长期处于“无辜”的状态，这正是楚克曼夫人在证词中想要表明的意思。无论如何，这些“政治”意图毫不奏效，因为证人们都很诚实。他们对法庭说，所有犹太组织和党派都在抵抗中发挥了作用。所以，真正的区别不在复国主义者与非复国主义者，而在有组织的和无组织的人之间，而更为重要的区别则在年轻人与中年人之间。的确，那些抵抗者只是少数，或者说极少数。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如一名证人所述，“这些少数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个奇迹”。

不考虑法律问题，前犹太抵抗战士一出现在证人席上，就受到热烈欢迎。他们的出场，击碎了关于全面合作的那些阴魂不散的鬼话和围绕“最终解决”的那种令人窒息中毒的氛围。众所周知，灭绝中心的屠杀工作实际上是由犹太指挥者亲手完成的；这个事实已经得到了控方证人明白无误的确认——他们在毒气室和锅炉房如何工作，怎样拔下金牙、剪掉头发，如何挖墓坑，然后再把尸体挖走，抹去集体屠杀的痕迹；犹太技术人员如何在特莱西恩施塔特建造毒气室，让犹太人的“自主权”在那里得到充分发挥，就连刽子手都是犹太人。不过这仅仅是恐怖而已，还谈不上道德问题。集中营里的劳动力由党卫军来选择并分类，后者尤其偏爱犯罪分子，而且，只会作出最差劲的选择。（在波兰尤其如此，纳粹在那里杀害了相当一部分犹太知识分子，同时还杀害了波兰知识分子和从事专业职务的人——这一点同纳粹在西欧的政策构成鲜明对比。在西欧，他们更愿意留下那些声名显赫的犹太人，用来换取德国平民囚犯和战俘。伯根一贝尔森原本是“犹太人质”的集中营。）而道德问题，存在于艾希曼描述同犹太人合作（甚至在最终解决之际）的所谓真相之中：“[特莱西恩施塔特的] 犹太委员会如何组织……分配业务，都由委员会自己决定。不过领导层、领袖人选，那是不言自明的 [由我们决定]。不过，我说过……这种任命方式，我们这么说吧，并非独断专行的结果。跟那些长期合作的元老打交道时，多少就像，就像在玩生鸡蛋，不得不慎……不能对他们颐指气使，理由很简单，法官大人，假如要对那些犹太元老，以类似‘你必须，你不得不’的方式说话，那么，那么将无济于事。因为，如果，如果你对面的人不，不喜欢他所做的事情，那么整个工作都会遭到损失……我们会尽最大努力让各方面满意。”毫无疑问他们做到了。问题是，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于是，这副“完整形象”中最重大的遗漏便是，没有证人证实纳粹统治者同犹太元老们之间有过合作；于是，也就没有机会去提出那个问题：“为什么跟毁灭本民族，最终也毁灭你自己的人合作？”出庭作证的人里，唯一一名犹太委员会著名成员是布达佩斯的品查斯·弗罗伊迪格，也就是曾经的菲利普·冯·弗罗伊迪格男爵。在他作证时，观众席里发生了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严重骚乱；人们用匈牙利语和意第绪语对证人大喊，法庭不得不中断审判程序。弗罗伊迪格这位德高望重的正统犹太人瑟瑟发抖：“有人说，并没人建议他们逃跑。但是在那些逃亡者当中，有一半的人又被逮捕、杀害！”——而没有逃跑的人，有百分之九十九遇难。“他们能逃到哪儿？他们能逃到哪儿呢？”——可是弗罗伊迪格自己却逃到了罗马尼亚，因为他有钱，而且维斯利策尼帮助了他。“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们到底该做什么？”唯一的答案来自主审法官兰道：“我不认为这样就算回答了问题。”——那是一个由观众席而非法庭提出的问题。

法官们两次提到合作的问题。伊扎克·拉维诱使作证的抵抗者说出，“隔都警察”是“凶犯手中的工具”，并且承认“犹太委员会同纳粹的合作政策”。哈拉维法官从警方对艾希曼的审讯材料中发现，纳粹把这种合作作为其犹太政策的基石。然而，控方频繁向除抵抗者之外的每个证人提问“你为什么不反抗”。在那些对审判的事实背景一无所知的人看来，这个问题再自然不过，其实这是在为没有直说出来的问题释放烟雾弹。于是，证人们对豪斯纳先生抛出的这个无解之题所作的一切回答，都离“真相、全部真相、唯一真相”相距甚远。犹太人整体确实没有得到有序组织，没有领土，没有政府，没有军队，在紧要关头也没有一个流亡政府作为同盟国的代表（魏茨曼博士领导的巴勒斯坦犹太人代办处顶多是个可怜的替补），没有武器库，没有经过军事训练的青年。不过，真相是，无论在地方还是国际上，都存在犹太社团组织、犹太党派和社会福利组织。犹太人无论在哪里生活，都有公认的犹太领袖；而这些领袖，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出于何种原因，几乎都毫无例外地同纳粹合作。真相是，假如犹太人民的确没有组织、没有领袖，那么就会乱象丛生，灾祸遍地；但是那样一来，受害者的总数则很难达到四百五十万到六百万之间。（按照弗罗伊迪格的估计，假如他们不听从犹太委员会的安排，那么会有将近一半的人得以自救。这当然只是一个推测，却跟我们从荷兰方面——为此我还要感谢荷兰国家战争档案馆馆长 L. 德容博士——得到的准确数据对上了。这真是讽刺啊。在荷兰，犹太委员会 [荷兰语：Joodsche Raad] 像所有荷兰高官显贵一样，迅速成为一个“纳粹工具”。十万三千名犹太人被运往死亡营，大约五千人以正常的方式——也就是说，在犹太委员会的协作下——被运抵特莱西恩施塔特。只有五百一十九名犹太人从死亡营里活着出来。

对比这一数据，在两万到两万五千名逃离纳粹——这意味着也要逃离犹太委员会——的犹太人当中，有一万人靠东躲西藏活了下来。这部分人占到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的比例。大部分被送到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犹太人后来都回到了荷兰。)

我在故事的这一章不吝笔墨，详述耶路撒冷审判未能充分曝光的内容。因为透过这个故事，人们可以最清晰地洞见纳粹在欧洲上层社会——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几乎所有国家，不仅在施害者同时也在受害者身上——引发的全面道德崩溃。与纳粹运动中的其他元素相对比，艾希曼总是对“上层社会”心怀敬畏。他之所以在那些说德语的犹太高层人士面前彬彬有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意识到他是在跟一些社会地位高于自己的人打交道。他根本就不像某个证人所说的“天生奴性”，与冒险家、玩世不恭者、虚无主义者也都沾不上边。他至死不渝的追求，是“成功”；据他所知，这是衡量“上层社会”的主要标准。尤其有代表性的，是他对阿道夫·希特勒这个人的最后总结。他和他的采访者萨森都同意把这个“剔除出”他们的访谈。他说：“希特勒可能千错万错，但是有一点不容置疑：这个人有本事从一名德军准下士一跃成为八千万人的人民领袖……仅凭他的成功，就足以让我心服口服地受他领导。”当他看到，各处“上层社会”跟他有着相同的热切和渴望，他便心安理得了。审判书中说他“闭耳不听良心的声音”。他根本没必要那样做，不是因为他没有良知，而是因为他的良知在以一种“高尚的声音”，以他身边高尚的人群发出的声音发声。

艾希曼的一个论点是，他身边没有能唤起他良知的声音；而控方的任务则是，证明事实并非如此，他本该听取一些声音，而且，他的工作热情远远超出了职责所需。结果，尽管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但那些曾经劝他收手的声音变得模棱两可，也一定程度上触发了他对杀戮的热衷。我们这里只需顺便提一下德国国内所谓的“内心流亡”。那些人大都供职于第三帝国，甚至有的身居高位；而在战争结束之后，他们告诉自己和整个世界，他们一直“从内心反抗纳粹专政”。此处的问题不是他们是否在说谎，而是在这个被重重秘密包裹的希特勒政权下，“内心反抗”竟是保守得最好的秘密。在纳粹的恐怖形势下，这几乎成了心照不宣之事。有一位著名的“内心流亡者”，认为自己刚正不阿。有一次他对我讲，为了保守他们的秘密，他露面时不得不“在外表上”比普通纳粹更像纳粹。（这碰巧解释了，为什么组织那几次著名反抗灭绝杀人计划的不是军队将领，而是老党员。）于是，在第三帝国，不像纳粹一样行事却仍能苟活的唯一方式，就是根本不露面，正如奥托·基希海默尔在《政治公正》（Political Justice, 1961）中所言：“不参与重要公众生活事件”事实上成了衡量一个人是否有罪的唯一标准。假如“内心流亡者”这个词还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它只能指一个生活在盲信大众之中而又背弃自己民族的流浪者”，如赫尔曼·雅赖斯教授在纽伦堡审判庭上“代表所有辩护律师陈词”中所说的那样。因为在没有任何组织的情况下，抵抗确实“彻底无意义”。这十二年里，的确存在着“外表冷酷”的德国人，但是他们的数量微不足道，甚至在抵抗运动成员当中也是微乎其微。近年来，“内心流亡”（这个词本身就包含歧义，既可以表示退到一个人的灵魂深处去流亡，也可表示以流亡者的方式为人处世）这一口号已经成了一块笑料。前特别行动队成员之一、凶狠的奥托·布拉德费什博士曾组织杀害至少一万五千人，他在一个德国法庭上说，他一直从内心反抗他的所作所为。也许一万五千人之死为他提供了在“真纳粹”看来必要的托词。（在波兰的一个法庭上，前瓦尔特高主席阿图尔·格赖泽尔提出了同样的论调，但相比之下却不够成功。他提出只是他的“秉公之心”实施了犯罪行为，他的“个人灵魂”则一直在抵抗。然而，他最终还是因“秉公之心”于1946年被处绞刑。）

艾希曼可能从没有遇到过“内心流亡者”，但他一定熟悉无数这样的政府官员，这些人今天声称他们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没有其他原因，只是为了“缓和”事态，防止“真纳粹”占据他们的职位。我们提到过汉斯·格洛布克博士的著名案例，此人曾担任国务秘书、1953—1963年西德总理府人事主管。由于他是审判中提到的唯一一位高级政府官员，或许我们应该看看他有过哪些“缓和”行动。在希特勒上台之前，格洛布克博士曾供职于普鲁士内政部，并且很早就显露出对犹太问题的兴趣。1932年12月，他制定了首批法令，要求申请改名者提供“雅利安血统证明”。希特勒上台一事虽未板上钉钉，却已露出强烈迹象，正值此时，这封信从天而降，而且竟然还是“最高密令”，也就是说，以法律形式确定的、旨在不引起公众瞩目的典型极权主义法则，后来过了很久，这种密令才成为希特勒政权的极权统治特征。格洛布克博士，如前所述，一直很喜欢研究姓名。由于他对1935年纽伦堡法案所做的解释比内政部犹太问题专家、老党员伯恩哈特·勒斯纳博士之前对“血统耻辱”的阐释更为苛刻，人们甚至可以控诉他令事态比“真纳粹”当权时更为恶劣。但是，即便我们承认他所有的善心，也很难看出，若是再给他一次机会，他怎样做才能令事态好转。然而最近，一家德国报纸在做了大量研究之后，对这个令人迷惑的问题给出了一个答案。他们找到一份档案，由格洛布克博士署名，裁定德国士兵的捷克籍新娘必须提供泳装照片，才能获取结婚证明。而格洛布克博士解释道：“这条法令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一场历时三年的丑闻”；因为在这项预案颁布之前，捷克籍新娘必须上交裸体照片。

据格洛布克博士在纽伦堡所说，他有幸成为另一位“缓和者”、副部长威廉·施图卡特的下属。之前我们已经知道，施图卡特是万湖会议的积极参与者之一。施图卡特缓和措施的对象是混血犹太人，他建议对他们进行绝育。（纽伦堡法庭根据其掌握的万湖会议笔录，不大会相信他对灭绝计划毫无所知，不过考虑到他的健康状况，最终裁决其以待审拘留时间抵押刑期。尽管知道施图卡特是纳粹党的“老派先锋人物”而且很久以前就加入了党卫军，是举足轻重的元老级人物，德国去纳粹化法庭还是只对他罚款五百马克，宣布他为“跟风者”。）显然，关于希特勒政府里“缓和者”的故事，只是浩瀚的战后传奇故事之一，我们也不可把它们当作可能触及艾希曼良心深处的声音。

随着基督教教长、新教牧师海因里希·格吕伯在耶路撒冷现身，关于这些声音的问题显得越发事关重大。格吕伯是唯一一个作为控方证人出庭的德国人。（巧的是，只有他和一位来自美国的迈克尔·穆斯曼诺法官不是犹太人；辩方提供的德国人证此前已被排除在出庭名单之外，因为依据审判艾希曼的法律，他们一旦在以色列露面便可能被捕、被起诉。）希特勒时代曾有数量上很少的一些政治影响力不大的反对者，

格吕伯教长就属其中之一；他们反对希特勒不是出于民族主义原因，而是从根本上反对他；而且，他们在犹太人问题上一贯态度明确。由于艾希曼曾与他进行过数次磋商，他保证要做一个令人满意的证人。他在审判庭上一露面，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只可惜他的证词语焉不详。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记不得当时谈话的主题了。他曾因逾越节而要求把未经发酵的面包运送到匈牙利；还有，战争爆发后他曾亲自前往瑞士，向他在那里的基督教朋友申明形势如何危急，敦促他们给更多外国人提供移民瑞士的机会。（希姆莱下令禁止一切移民之后，才开始“最终解决”；而格吕伯同艾希曼的磋商一定先于最终解决令，很可能发生在进攻苏联之前。）他拿到了他想要的面包，平安抵达瑞士又平安返回。后来，遣送犹太人的行动开始了，他的麻烦来了。格吕伯教长和他的新教牧师团首先只是“代表那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伤员以及获得军事嘉奖的人；同时，他们还要为那些战争造成的鳏寡老弱代言”。纳粹原本对这些人网开一面。现在，格吕伯被告知他所做的事情“与政府的政策相抵”，可是他没有遭遇什么严重后果。不过，这件事没过多久，格吕伯教长的做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事：他试图到法国南部的居尔集中营，维希政府在那里关押了大约七千五百名来自巴登和萨尔普法尔茨的德国犹太难民，艾希曼于1940年秋天将他们偷运出德国。根据格吕伯教长所述，那些人的下场比运到波兰的犹太人还要悲惨。这次尝试导致他被捕，并被投进集中营——先是在萨克森豪森，后来到了达豪。（相似的命运也降临在天主教神父、柏林圣黑德维希主教座堂大主教贝尔纳德·利希滕贝格头上。无论犹太人是否接受了洗礼，他都敢于公开为他们祈祷。这显然要比干预“特殊情况”更加危险。他还申请与犹太人共同前往东欧，最终死在了前往集中营的路上。）

除了证实“另一个德国”的存在，对这场审判，无论在法律意义上还是历史意义上，格吕伯教长的贡献均乏善可陈。他对艾希曼的评价全是人们常说的那一套：他就像“一块冰”，像块“大理石”，“奴仆性格”，“自行车手”（德国人最近常用这个词来形容那些对上级俯首帖耳、对下属专横跋扈的人）。没有一个评价能显出他是个特别优秀的心理学家，尤其是“自行车手”这个判断，跟法庭已有的证据（证明艾希曼对下属相当平易近人）相矛盾。无论如何，庭审记录通常会删掉这类阐释和结论：可是在耶路撒冷，人们甚至又在宣判词里听到了类似的话。假如没有这些话，格吕伯教长的证词可能反而对辩方十分有利。因为，只要是艾希曼能批准的，比如未发酵的面包、到瑞士出差，他都会批准。此外，艾希曼从来没有给过一个直接回答，而是一直要求他再来一趟，因为他要先请示上级。更重要的是，塞尔瓦蒂乌斯博士有一次主动发问，向证人提出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您是否试图影响过他？作为牧师，您是否试图诉诸他的情感、向他布道？是否告诉他，他的行为是违反道义的？”当然，这位勇敢的教长没做过此类事情，他后来的回答相当令人尴尬。他说“行动比言语重要”，并且认为“言语可能毫无用处”。他满口陈词滥调，和实际情况毫不相干。然而在当时，“只是说说”就已经是一种行动；神职人员的责任，就是去验证“这些无用的语言”。比塞尔瓦蒂乌斯博士的提问更加切中要害的，是艾希曼对这一阶段的最后陈词。“没有人，”他重复道，“走到我面前，因我在工作中的任何表现而责备我。甚至格吕伯牧师也承认没那样做过。”他接着说：“他找到我，寻求缓解痛苦，但是并没有对我的工作表现提出过任何抗议。”从格吕伯教长本人的证词来看，似乎他不是在寻求“缓解痛苦”，而是希望从前得到纳粹认可的优秀人群能够被网开一面。从一开始，德国犹太人就平静地接受了这种分类，这种区别对待：德国犹太人优于波兰犹太人，战场老兵和有功勋的犹太人优于普通犹太人，祖上就出生在德国的家庭优于晚近移入者，等等。这成了犹太高尚社会道德滑坡的第一步。（今天，面对此类事件，人们的反应通常是，似乎人之天性中存在这样一种法则，驱动每个人在灾难面前摒弃尊严。我们还记得那些法国犹太老兵，当法国政府为他们提供同样的优待时，他们给出怎样的态度和回答：“我们郑重宣布，我们拒绝接受一切作为退伍老兵应受的特殊待遇。”见《美国犹太人年鉴》[American Jewish Yearbook]，1945。）毋庸讳言，纳粹本身从不把这些差别当回事。在他们眼里，犹太人就是犹太人；但是，对犹太人进行分门别类一直发挥着某种作用，因为它有助于在德国人中维持稳定：只有波兰犹太人被运走了，只有那些逃避兵役的人被运走了，等等。那些不愿意闭上眼睛的人，肯定从一开始就明白，“为了更顺畅地贯彻普遍原则，通常都会允许存在一些例外情况”（参见路易斯·德容名为《纳粹占领下的荷兰犹太人与非犹太人》[“Jews and Non-Jews in Nazi Occupied Holland”]的文章，此文颇富启发性）。

接受对本民族进行分门别类，是一场严重的道德灾难。这是因为，每个要求获得“例外”的人，也就等于间接承认了这个等级原则；不过显而易见的是，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在忙于争取“特殊情况”以求特殊对待之时，没有人明白这一点。关于犹太受害者对“最终解决”的标准接受到什么程度，再没有比所谓“卡斯特纳报告”揭示得更加露骨了（*Der Kastner Bericht über Eichmanns Menschenhandel in Ungarn, 1941*）。甚至在战后，卡斯特纳仍然自豪于他成功营救了“卓越的犹太人”。纳粹于1942年正式提出这一范畴。似乎他也认为，一个著名的犹太人无疑比一个普通的犹太人更有资格活下来。履行这种“责任”，去帮助纳粹在茫茫人海中挑选出“著名”人物，因为这是事情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比直面死亡需要更大的勇气”。但是，就算申请“特殊情况”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并不知道他们变成了无意识的共犯，他们模模糊糊接受的这种对所有非特殊情况宣判死刑的原则，对那些专事屠杀的人而言肯定是最明白不过的。有人到他们这里来申请豁免，偶尔大笔一挥批准一下，并且赚取受害者的感激，这些一定会让他们觉得，就连他们的反对者也不会怀疑这种做法的公正性。

与此同时，格吕伯教长和耶路撒冷法庭犯了个大错：他们以为申请特殊情况的人只是政府的反对者。相反，正如海德里希在万湖会议上明确表示的，在特莱西恩施塔特为犹太人建立隔离区的想法是由来自四面八方的无数介入力量提出的。特莱西恩施塔特后来成了对外参观的展示基地，用来欺骗外面的世界。不过，这并非建造者的初衷。艾希曼曾正确地指出，“其他集中营和特莱西恩施塔特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然而，在这个“天堂”里经常发生紧急而恐怖的减员行为。因为从来就没有足够的地方容纳那些优等人，帝国保安总局局长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下达的一项命

令告诉我们，“在挑选外迁犹太人员时……要注意，被挑选出来的犹太人同外界没有特殊人脉和关系”。换句话说，有些重要的犹太人若在东部消失，可能引发不愉快的质疑；于是，那些不太“卓越”的犹太人持续不断地充当了炮灰。这些“特殊人脉和关系”并不一定非在德国之外。按照希姆莱的说法，有“八千万德国人，每个都有些正派的犹太朋友。显然，特殊犹太人是头等犹太人，其他人都是猪猡”（希尔伯格）。希特勒本人据说认识三百四十个“头等犹太人”，他把他们同化为德国人，或者给他们混血犹太人的优待。数千名混血犹太人得到豁免，这或许解释了海德里希在党卫军、陆军元帅埃哈德·米尔希在戈林空军中分别扮演的角色；因为众所周知，海德里希和米尔希就是半个犹太人。（在主要战犯中，只有两个人临死前悔过：海德里希和汉斯·弗兰克。前者被捷克爱国者袭击九天后因伤口感染而死，后者则死在纽伦堡的死囚牢里。这个事实令人难以接受，你很难不去怀疑，海德里希悔恨的不是他杀过人，而是背叛了人民。）如果是由“卓越”的人代表“卓越”的犹太人出面干涉，通常都很成功。斯文·赫定，希特勒最狂热的崇拜者之一，为著名的地理学家、波恩教授菲利普森出面，因为后者“在特莱西恩施塔特过得很不像样”。在一封写给希特勒的信中，赫定威胁说，他对待德国的态度取决于菲利普森的命运走向。后来（根据 H.G. 阿德勒写特莱西恩施塔特的那本书），菲利普森先生很快就被安置到了一个更好的地方。

在今天的德国，“卓越”的犹太人这一概念仍然没有消失。人们不再拿那些老兵和其他优等群体说事，但仍然哀叹“著名”犹太人的命运，对其他受害者却视而不见。有不少人，尤其在文化精英当中，仍然对德国曾驱逐爱因斯坦而公开表示惋惜。可是他们并未意识到，与之相比，杀害身边某个普通的小汉斯·科恩却是一宗更大的罪。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

EICHMANN
IN JERUSALEM



本文摘自《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
〔美〕汉娜·阿伦特

安尼译
译林出版社
2017年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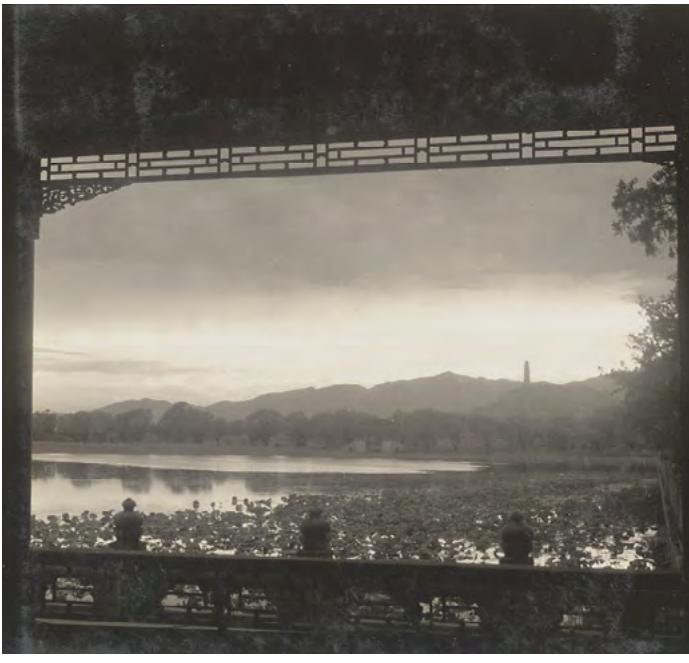


汉娜·阿伦特

美籍德国犹太哲学家，曾师从于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在海德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自1954年开始，阿伦特先后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开办讲座；她还担任过芝加哥大学教授、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阿伦特以《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过去与未来之间》（1961）和《论革命》（1963）等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及其天才的洞见和隽永的智慧，为当代政治哲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上令人瞩目的人物。

发现经典

这里是已经出版、我们认为不应该被湮没、遗忘和打成纸浆的旧书。



题图为从昆明湖鱼藻轩西望（德国摄影师赫达·莫里逊摄于 1933—1946 年间，照片由哈佛燕京图书馆提供）

档案

阴晴不定的日子

葛兆光 | 发现经典

生活常常被无情的筛子拒绝在历史书之外

我想写的是 1927 年 6 月 2 号所发生的事情。

我开始动笔的这天，已经是 1997 年 6 月 2 号，恰恰七十年，选择这一天来写这篇既算不上论文也算不上散文的东西，并没有特别的意思。其实，七十年前的事情了，那时的人与事，早已经成了“历史”，透过发黄的旧报纸、重新出版的日记和种种回忆录，纷纭的、没有头绪的事件，不时呈现在眼前，看上去杂乱无章，又朦朦胧胧。在这朦朦胧胧中，我回忆着那一天发生的事情，也体验着这一天存在着的各种人的心情。

—
1927 年 6 月 2 日，农历五月初三，星期四。

早晨，在北京西郊的清华园里，王国维依然像往日一样，按时起床，在八点到了学校，只不过他的心情却很复杂，平静的面容稍稍显得有些疲惫，显然晚上并没有睡好。在上海，刚刚从日本回国不久的胡适，租到极司斐尔路 49 号甲的楼房，看看这座楼房，他心里并不很满意，不过，才收购来的甲戌本《石头记》倒让他心里很高兴，摩挲着这部旧书，他又想起在泛太平洋俱乐部所讲演的《中国文化之再生》，他觉得，可能真的中国有再生的希望，对于前不久发生的“清共”事件， he 觉得蒋介石是对的，也许这样一来，中国真的就有了秩序，自由主义的信奉者胡适对没有秩序的中国也有些担心。和胡适一样，在浙江的方豪早晨起来就给远方的陈垣写信，他对这个自己很佩服的学者说，自己在编《浙江公教史》和《圣教词典》，并希望陈垣能写成中国人自己的《中国基督教史》，想到外面的情景，在信中又添了一句，“杭州自厉行清党后，景象尚不恶劣”。而在广州，这个曾经是革命基地的城市里，气氛已经很紧张了，在中山大学辞职后的鲁迅蛰居在白云楼，一夜不眠后，推开窗户，让稍稍凉爽的晨风透进小屋，听见报童已经在沿街叫卖当天的《民国日报》，这一天的报纸上，头版用了半版刊登一幅口号，“肃清一切改头换面的中国共产党”，当年的联盟已经反目成仇。很多年以后，有一位当年的老报人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自己的心情真是彷徨，不知道是怎么了，为什么打起来了？明明北伐要胜利了，为什么又变成这样了？

那些天的情势真的是复杂。就在前一两个月，国民党的蒋介石在上海宣布“清共”，与共产党分道扬镳，而这时在武汉，国民党的态度却还很暧昧，也许是在窥测方向，也许是在犹豫徘徊。

北京的人心浮动，有的对南方传来的消息鼓掌叫好，而有的对北京的未来忧心忡忡。有消息传来，奉军已经退出了郑州，而原来不表态的阎锡山决定悬挂国民党的旗帜，只是现在还与张作霖打着哈哈，阎老西真是脚踩两只船。街上传说，孙传芳等人准备拥护张作霖在北京当总统，和南方分庭抗礼，地坛边上，聚着一帮清晨喊嗓子唱京戏的老北京，一面听人唱着西皮流水二黄倒板，一面扎堆儿，忙里偷闲地谈论国事，有人猜测，说不定哪一天北京会成了战场，可一个据说在京城里住了几辈子的

旗人不屑地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咱北京城是风水宝地，自打大清以来就从不兴刀兵。过了七十年后来看，好像他说的还真是个准。当然，也有人心里盼着发生些什么事，这一天，一个沙滩红楼的北大学生，买了一本 4 月底才出版的《革命哲学》，兴奋得一口气看完，作者朱谦之在里面用后来红卫兵才用的口吻写道：“最彻底的革命，是把宇宙间的一切组织都推翻”，毁灭宇宙，才能重建本体。看得不明不白的年轻人热血沸腾，从字里行间只体会出来两个字“革命”、“革命”、“革命”。

当时，“革命”几乎是一个具有无上权威性的词眼，在人们心中它和“民主”、“科学”差不多，仿佛拿了它就拿了杏黄旗，说着它就等于说着真理。不过，究竟革谁的命，似乎已经有些弄不明白了，原来都说要革命的人打起来了，连革命者有时自己也遭到了革命，不止是共产党，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已经决定，对那些不合作的名人采取惩戒性的策略。他们商量好，打蛇先打头，把威望最高的章太炎作为惩戒的首要对象，他们宣称章太炎破坏国民革命，与军阀勾勾搭搭，一个上海市党部的年轻人正在起草明天见报的文件，这份文件斥责章太炎“妄冀破坏国民革命”，宣布没收他的油车及碾米厂两处股本三千七百大洋和二十七亩地。不过，“革命”还是很有吸引力，《民国日报》的副刊《现代青年》上发表了陈安仁的文章《革命的理论》，第九节里讽刺那些意志薄弱的人害怕革命的大潮，“见得眼前受些痛苦，对革命就怀疑起来，甚或反对起来，这是极大的错误”，理由是不容置疑的，因为革命是为大多数人的，革命的幸福，“非一部分的幸福，是全部的幸福”。不管是革谁的命吧，反正，很多年轻人都以为这一下，革命就要成功，中国就会统一，天下就会变得生气勃勃。可是，那个总是爱与众不同的梁漱溟在广州，却对兴奋不已的李任潮当头泼了一瓢冷水，说国家是不能统一的，党是没有前途的，凡你的希望都是做不到的。

二

当早晨的太阳升到清华学校工字厅的屋檐上的时候，喜鹊已经叫了很久。学校里的树，颜色渐渐由浅转深，6 月的树荫下，多少还有些凉。而城里好像比郊外热，各个公园里的牡丹已经“姹紫嫣红”，据说，土女如云，一个画报的记者发现，北京的公园里奇装异服，有二女郎“遍身绿衣，剪发，墨绿长巾束其头”，仿佛荀慧生《元宵谜醉卧书房》里的装束，而太太们则戴大花，似乎出自程砚秋的京戏打扮。他把这个现象写在给《北洋画报》的“小消息”稿件中，心里却暗暗忧虑，想到时下的情势，他想，这是不是乱世的“服妖”，古代以来的那种对奇装异服的象征性意味的警惕传统，总是在心里使他不安。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那么多心事，也不是那么多人在革命大潮中的。当旧事成为历史的时候，历史学家总是要替读者省略许多似乎“无关紧要”的细节，这种省略有时是越俎代庖，使后人看历史时不免错以为没有细节，所以看看那些被历史学家和历史著作省略过去的小事，却也能知道旧时生活的真实图景和历史人物的真实心情。几十年以后，我在大学学近现代史，在那些被装订得整整齐齐的教科书里看到的，就是一个清理得干干净净的革命史或政治史，可是稍后自己去读当时的日记、当时的报纸，却发现历史其实已经被用筛子筛过，剩下的仿佛都是历史学家认可了的“大事”，而生活常常被无情的筛子拒绝在历史书之外。

其实在那一天，在中国普通人的生活里，在中国的东西南北，何尝有那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那时候，尽管外面大江东去，风起云涌间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生活在潮起潮落中的人们心中不免惴惴不安，但是 1927 年 6 月 2 日，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中，大多数还在生活中挣扎，为谋生而劳作着。虽然一部分人在革命的热潮中激情洋溢，为中国的前途而奋斗着，但大多数人仍然按照旧日的生活轨道前行。一篇署名“慎予”的文章《自述三大问题的经过》在《民国日报》上连载，说的是当时青年关心的三大问题，没有革命，而是“求学”、“恋爱”和“职业”。同样，悠闲的北京尽管已经听到了南方传来的消息，但中和戏院那天还是准备上演尚小云的《林四娘》，中天电影院那天还是准备上演西洋片《风流皇子》，一个江湖骗子叫什么金文弼，在《晨报》上大做广告，说他留学印度三十年，正准备作环球演出，要“证明人类能以精神克制物质”，在北京的演出中，他要让人们看一看，他可以“打破医学原理”、“打破力学原理”、“打破热学原理”，而证明科学失效的方法一是停止呼吸，二是以石击身，三是吞吐红铁，和现在的气功或魔术差不多。而天津出版的《北洋画报》则在连篇累牍地讨论，是否应当取消伤风化的饭店舞会，不过讨论归讨论，画报还是在下面刊出巴黎蓝磨坊演出裸体舞的照片。据称，荷兰某伯爵夫人为考察东方美术来北京游历，这天到梅兰芳宅中参观各种京剧的行头，一面看一面从鼻子里发出洋人惯有的“嗯哼”表示惊异。梅兰芳真是大忙人，他忙里偷闲又在饭店宴请英国公使蓝浦生 (Milles Lampson)，席间有记者问及他的日程，他回答说赴美演出的事情正在安排中，不日可以成行。他在当时也是红透了半边天，连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都借了他的名，要生产“梅兰芳香烟”，《良友画报》刊登的广告中称，这种香烟的烟罐上有梅氏戏装像，买烟者可以一面吸烟一面晤对佳人，“梅郎倩影，置诸案头，不啻与梅郎晤言一室也”。不止是演艺界，文学界也有平静的日子和平静的人们。在北京，有消息说，著名作家谢冰心已经与清华某君订婚，前些年他们曾坐了一条轮船到美国留学，成就了这一段因缘。而刚刚从清华毕业的柳无忌则正准备步前辈的后尘，也在那里忙着订票放洋，清华毕业生出洋寻的是天经地义的前途。在杭州，那个写过《沉沦》的郁达夫则处在温柔乡里，这一天，他到聚丰园订餐，是为了几天以后大宴宾客，宣布他与王映霞的情事，订餐后他去买了一件夏装，准备在宴会上穿，回到住所翻开日记本，前一天的日记上写着：“梦里的光阴过去得真快，日日和映霞坐在洞房，晚上出去走走，每日服药一帖，天气也好，饮食也好，世事全丢在脑后，这几天的生活，总算是安乐极了”，至于外面的天翻地覆，好像没有发生似的。

其实，怎么会什么事也没发生？不必说国共两党的分裂，也不必说中原的战火，那个时代的中国，积贫积弱之外，实在是多灾多难。教会了中国人如何现代化的外国人，有时很是使中国人感到自惭形秽，像徐永昌就在这一天的日记里不无感慨地写道，西洋人的差役很勤劳，而中国人的佣人很懒惰，因为“人家有科学知识，会用，亦因新气提起，旧习不敢逞”。可是，有“新气”的老是欺负有“旧习”的，不免让中国人生

出抵抗的心情，报纸上的烟草广告就利用了这种心情，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广告就呼吁“请吸国货三醋香烟”，中国烟草公司的广告则自称“金牌”是“真正国货香烟”，可是，就在前一天，日本陆军二千余人在少将菱田兼安的率领下，以保护济南的侨民为由，强行从青岛登陆，当局劝阻无效，这天，外长伍朝枢无可奈何之余，只能向日本外长田中发一份外交照会表示抗议了事，可是中国的知识界对这件事却很激动，觉得这真是“丧权辱国”。前几天的另一件事则更让人生气，一个英国军人强奸民女，本应由中国法院审理，但在英国领事馆的干预下，竟然被宣判无罪，理由实在是荒唐得可笑：“这不算强奸，只是睡觉。”

三

清华园的荷塘，还没有荷花，零零星星地，矗立在水面的荷叶在风中摇晃着，朱自清《荷塘月色》里写的景象还要一两个月才能出现，不过古月堂和藤影荷声之馆的杂花还是不少，心情复杂的王国维和研究院的人谈了谈事情后，借了两元大洋，回到了办公室，这时他已经没有心思看任何东西了，在办公室里，他吸了不少烟，烟雾缭绕中，他深深地吸一口气，慢慢地从桌旁起身来，向外走去，招呼吓差叫一辆洋车。

学术界和教育界好像跟社会政治有关，又无关，在那个时候的革命浪潮中，似乎学术与教育也还没有像后来“文化大革命”时那样，闹得都得停下来给革命让步，北京大学照样在这一天刊出“招考广告”，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登出考试规则，要广招天下英才。两个月前，中央研究院在南京成立，就在这个月，《燕京学报》在未名湖畔问世。但是实际上学术界和教育界的人们，心情实在是被政治风云搅得无法平静。三四个月前，康有为死了，这个月出版的《新生》十三期上，黄延毓写了一篇《康有为的生平与学术》，好像这个过时的学者倒不太被人注意，又能在学术界中混到冷猪头祭供了，相反，倒是像章太炎这样的当红学人，虽然曾经是革命中坚，却弄不好就要被权力严厉制裁，连家财都得被没收。这一天，胡适在上海，可是武汉的《中央日报》却在副刊上发表了一篇《何物胡适之》的文章，讽刺他依违于政治之中，自称不求“popular”，其实只是想当贵族，作超然状，其实说到底就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而王国维在北京，却想到不久前湖南发生的事情，那个有名的乡绅尽管有学问，却因为鱼肉乡里免不了被以革命的名义处死。也是在这个时候，当年《新青年》的盟友已经四分五裂，连表面上的友情都所剩无几，就连一道发表过关于建立“好政府”主张“同心协力的拿这共同目标来向国中的恶势力作战”的朋友，其实也已经分化。虽然胡适还坚持着他的自由主义立场在文化界当领袖，但聪明的王宠惠当了官，而共产党人李大钊却已经在一个多月前为理想被杀害，五四时期短暂的精神一致似乎昙花一现地过去，相对较自由的思想出现在相对较混乱的时代，各种思想学说在混乱的时代中上演，各种政治权力则在上演各种思想时也不甘寂寞地要动刀兵趟浑水，这使得人心情更加混乱，于是一个词在当时很流行，叫做“彷徨”。

在武汉的《中央日报》不谈武汉，却连篇累牍地大谈北京，南方的力量显然对这个古都表现了太多的兴趣，这使得住在北京的人很有一些议论，身在北京的学人们也不免有些彷徨，王国维也彷徨，但是他太内向，心里的很多话不能向别人说，于是彷徨就成了苦闷，而苦闷郁积得太深，就只好自己找一个了断的方法。在离传说中屈原自沉的端午只有两天的时候，他坐着洋车，出了西门，直往不远的颐和园。这时不过十点左右，纤波不起的昆明湖水很柔和，闪着漾漾的光，他在鱼藻轩中又吸了一支香烟，这时，他的心情大概已经平静下来了。在那一刻，不知道王国维想了些什么，不过我想，他的心情一定很平静，因为很久以后，我的一个朋友吴方，曾经写过关于王国维的文章的学者，在他决心离开人世的时候，曾经也很平静地做着一件一件他觉得要做的事，然后才飘然而去。我想，王国维那个时候的心里可能也是很平静的，佛教说大彻大悟的时候，一切妄念顿消，心底里是一片澄澈。很巧，就在这一天，当年曾经大红大紫地当了一回“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英雄的吴虞替别人拟挽联，他琢磨了许久，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柏林夜月，巴里春花，回首清游成昨梦。建业多才，全身无术，始识人生最可哀。”过了一会儿，他又觉得对这种丧气悲哀的话不满意，于是再写一首，想了半天，心里能想出来的竟然就是佛教的箴言：“百年本是浮生，地下埋忧，喂虎饲鹰同一视。三日不汗亦死，人间何世，老彭殇子总成空。”这一天，北京晴转多云，杭州阴有小雨，成都的人觉得闷热，盼着下场大雨。

四

两天以后也就是6月4日，《晨报》第六版登了一条消息：“我国之世界的学者，王国维教授投昆明湖自杀。”记者说：“吾人接受惨报之余，不禁感觉我国学术界前途之寂寞矣。”可是，中和戏院的京剧依然上演，那个江湖骗子即将表演他打破各种科学定理的绝技，女士们还是遍身绿衣婷婷袅袅地穿梭于花间，中山公园的几百口大缸里，各色金鱼仍然悠闲地摇头摆尾，这一天恰逢端午，陶然亭的茶座酒馆，都是宾客爆满，地坛那没有经过修缮的红墙里，那帮天天在那里听戏练嗓的老北京还是在那里聊大天，那个几辈子住在京城的旗人还是自信满满地在宣称咱北京风水宝地不动刀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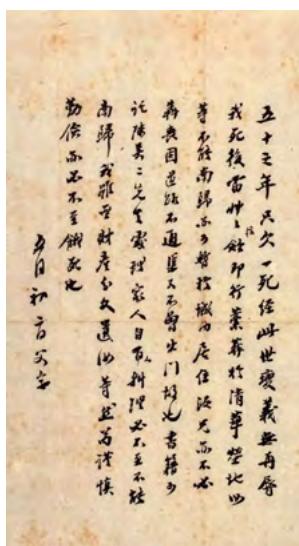
一个穿了夏布长衫的中年人独自登上景山。天色有些阴沉，站在山顶的亭中望去，近处的紫禁城上，炊烟笼罩而王气黯然，护城河边，杂草丛生。眺望南方，似乎浓密的云端隐隐地透出隆隆的炮声，随风飘来的云彩中，嗅一嗅，总觉得夹有一些硝烟。

1997年6月2日—6月10日断断续续写于清华园北

*本文最初发表于《天涯》1997年第5期。参考文献来自：《民国日报》《晨报》《中央日报》《新生》《良友画报》《北洋画报》《东方杂志》《北京大学日刊》《王国维年谱长编》《胡适年谱》《梁漱溟年谱》《章太炎年谱长编》《鲁迅日记》《吴虞日记》《陈垣往来书信》、《徐永昌日记》《郁达夫日记》等。



本文摘自《余音》
葛兆光著
2017年1月
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王国维遗书



葛兆光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历史系特聘教授。2009年获选第一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普林斯顿全球学人”。著有《中国思想史》两卷本、《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等。

发现经典

这里是已经出版、我们认为不应该被湮没、遗忘和打成纸浆的旧书。



图片来自 Darwin Vegher on Unsplash

档案 阅读、图书馆和纸， 那些关于书的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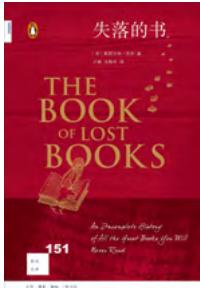
刘苏里 | 发现经典

万圣创始人刘苏里的私人清单。

下面是近期买的书的书，它们还可分出类别，大致介绍一二：

阅读（及其方法）

1. 重读经典的伟大冒险，[美]大卫·丹比，冯莉译，理想国·北京日报版，108.00
作者为骨灰级书虫，作品、故事、哲理一锅烩，好读，但近、现、当代作品部分，左味太浓，左死拉倒，慎入。



2. 失落的书，[英]斯图尔特·凯利，卢葳、汪梅子译，三联书店（京）版，59.00
一本悼亡书。作者列出史上，因焚毁、遗失、腹稿...总之我们（永远）读不到的作品。作者也是骨灰级书虫，从15岁开始搜集书目，将近三十年心血。心脏不好，重度焦虑症者慎入。书中铺满了书籍尸体，观之瞠目结舌。

3. 非必要阅读，[波兰]维斯瓦娃·辛波斯卡，黄灿然译，译林版，55.00
一本书评集。列出来因两条原因，一，她是个诗人，阅读面积之阔大，为之惊叹！始知诗人也不是总拿只笔拄着头胡思乱想，也有诗人的灵感来自书籍。

4. 阅读的方法，罗振宇，得到·新星版，69.00
罗胖的确是用功之人，他的知识贩售其来有自，——热爱书籍、阅读，炒股炒成股东。本书框架编排很用心，为读者着想。它不是一本跟风随性、顺手拈来之作。

5. 一个人的世界在书架上，[英]亚历克斯·约翰逊，胡韵娇译，联合低音·北京联合版，49.80

一本很杂很杂的小书。很喜欢这个书名，但内容有点名实不符，不过没关系，完全不影响阅读乐趣，顺道收获若干犄角旮旯的知识。末章谈“弃书”予本人警示最多。

书籍（及其出版）



1. 书籍秘史，[西班牙]伊莲内·巴列霍，李静译，博集天卷·湖南文艺版，98.00
一部不错的“书诞生于人类对抗遗忘的努力”的注释。历史感充沛，文笔上佳。

2. 什么是书籍史，[英]詹姆斯·雷文，孙微言译，北京大学版，48.00
周正但极其简略的书籍（文化）史研究著作，更准确说，是一部书籍研究史研究作品。作者引入社会史、知识史工具，别开生面。

3. 启蒙与书籍：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出版业，[美]理查德·B. 谢尔，启蒙编译所译，商务版，198.00
大书，篇幅、内容皆是。提醒，840多页，正文520页，附录、注释、参考文献高达320页！不用问，便知是本纯学术研究作品。昨天买来的，未及翻阅，无法说出一二。

4. 书虫杂记，[英]克莱尔·科克－斯塔基，许梦鸽译，商务版，55.00
作者编辑出身，书中涉及到的编辑、印刷、出版等环节，点滴晶莹，可供发烧友品赏。书中还涉及纸张、封皮等冷知识。作者自认“书虫”，也的确堪当超级书虫之名。总之吧，作者讲了“出版背后的故事”。

5. 书后的故事，俞晓群，草鹭文化·华文版，168.00
晓群先生此书，与前书神似，大家对他熟悉了，包括他书中提到的人和事，都熟悉。跟前书的不同之处，首先在装帧豪奢；其次，你还可意外得知他家族轶事，印证了凡事其来有自的道理；第三，有人统计，作者书中记录哭了十多次，科克－斯塔基没哭过，克莱尔大概率是女性...

6. 德国出版零时年：作家、读者、畅销书，巨变后的图书世界，[德]克里斯蒂安·亚当，王琳琳等译，陕西人民版，86.00
书名可猜出几分内容。各位还记得布鲁玛的《零年》吧，它有个副标题：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虽学过几天德语，但还只能连蒙带猜：所谓“零时年”，跟布鲁玛Year Zero有形似，但意思还真不太一样。零时年，来自德国史家汉斯·迈尔。从这两概念中，看得出盎格鲁－撒克逊人（布鲁玛是荷兰人，荷兰是大英表亲，布鲁玛也长期在纽约任教）与德国人看世界的差异，——布鲁玛把1945看做现代世界诞生年，而德国人却用钱包表达态度，试图将战前、战中、战后的图书世界，链接起来！书中对战后400种畅销书有详细统计，相当比例的书，要么出版于战前，战中流布不断，要么出版于战中，战后依然畅销不衰。当然，书中少不了记录战后通过书籍出版，对纳粹统治的反思，对国民进行“洗脑”——精神改造的规划。我相信，德国的做法，影响至今，我们可以对德国的反思进行再反思。
这是一本学术性很强的书。

书店



1. 世界在书店中，[英]亨利·希金斯，彭伦译，人民文学版，50.00
中文世界出版过希金斯4本书，这本书评价最高，不知何故，翻译出版却最晚。此前三本，最喜欢《英语的秘密家谱：英语帝国的起源与兴盛》，光书名就能引起我生理反应，“家谱”“帝国”“起源”“兴盛”之类。
这本书为书店说了话，却不是一本书店地图；作者的确写到几家书店，但主要内容是呈现13位愤世嫉俗的作家，在作为公共空间的书店的谈话，甚至呐喊声。完全赞同作者对独立书店的定义：公共空间。我们自己就是这么看的。当年有位学者领了欧盟一个项目，研究中国的公共空间，选的第一家访谈对象，就是万圣。对这本书，我有一种特别好感。

2. 伦敦最后一家书店，[美]玛德琳·马丁，陈晓颖译，对外翻译版，68.00
书名有点耸人听闻。翻开才知，是讲二战前后樱草山书店，以及两个女孩子战中战后经历故事的，当然，跟开书店、读书有关。神奇的是，两位女子，一位参了军，一位业余时间当上了空袭防御督查员（可见战争之残酷）。在希特勒德国对伦敦毁灭性轰炸中，樱草山书店却活到了战争结束，读者送给它“伦敦最后一家书店”的美名。战火、黑暗、暴虐，抵不住书籍的力量，何其鼓舞人心，何其快哉。

图书馆

图书馆杂记，[英]克莱尔·科克－斯塔基，陆紫莹译，商务版，55.00
《书虫杂记》作者。翻开书第一眼，便看到世界十大图书馆排名，盎格鲁－撒克逊人占了前4，匪夷所思？不。排在前两位的是国会图书馆和大英图书馆，藏品太他妈惊人了，零头比第5名后任何一家都多。大国国家图书馆排10，约为前2藏品的1/5。还好进了10，要不如何称大国呢。俄罗斯入榜两家，虽然加起来藏品只比第一零头多一点点，毕竟是两家。图书馆数量以及藏品多少，肯定表示了点什么。可你占了两家排名，怎么出兵侵略邻居而不知羞耻？看来“表示了点什么”要看在哪儿，谁向着大鼎。有时，一个人的野心（权力欲）会让国家结结实实地蒙羞。

纸

纸的文化史，[德]罗塔尔·穆勒，何潇伊、宋琼译，广东人民版，68.00
只说一句：没纸，就没人类今天，怎么感谢它的发明、传播都不为过。
还得说一句：一本研究作品，但不妨碍你从中摘到很多能让你心灵亮亮的句子，书籍是黑暗中的灯，灯光。

版权



版权战争：跨越大西洋三个世纪的争斗，[美]彼得·鲍德温，王志刚译，传媒大学版，148.00

一本完完全全的学术著作，作者讲的故事却不负“战争”争斗之名，读来颇有跌宕起伏，屏息握拳之感，为啥？故事、讲的，都精彩绝伦。
很多人，是通过互联网时代“知识共享”（说白了，免费）引发的争议，才知道版权这回事。
书中说，版权之战，打仗打了几百年，三百年来从没消停过。书不小，实实在在60多万字，但你拿起来，多半不会后悔。
原来，英美各大地点的藏品如此惊人，是打仗打出来的。

小结

- 以上，翻译书多，英美作者作品尤其多，与我们的经验世界相当匹配。
- 译者多为女性，两位国产作者却都是男性，向她/他们致敬。
- 各年各时期，出版家们不仅出版很多好书，还出版不少书的书。可见读者不只需要好书，也需要书的书，以为励心励志（意志的志）。万圣有个专区，摆放这些书的书。

刘苏里

2022.05.11 草于北京



刘苏里

万圣书园创办人和总经理。经营书园之余，亦为多家报刊撰写专栏、书评。

发现经典

这里是已经出版、我们认为不应该被湮没、遗忘和打成纸浆的旧书。



图为 Czapliński / Jakubczak. (2019) Czesław Miłosz

档案

米沃什的另一个欧洲

西川 | 发现经典

纪念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

请理解，一个人必须独自在人间创造一个新的天堂与地狱，是多么难哪。

——米沃什《阿德里安·齐林斯基之歌》

据波兰诗人彼得·佐默（Piotr Sommer）说，许多居住在波兰的波兰诗人认为，198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籍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算不得波兰诗人，他更是一位西方诗人，或美国诗人。这种评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些德国人对君特·格拉斯的看法，认为格拉斯的德语不能代表德语的最高水平，也让人回忆起高行健获奖时一些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反应，认为中国国内不乏更出色的作家。但是，对米沃什的赞誉，至少在中国和北美，如今似乎越来越一致（正像在对其他一些问题的看法上一样）。1978年米沃什在美国获得由《今日世界文学》杂志颁发的纽斯达特国际文学奖（Neustadt International Prize for Literature，一般认为该奖是小诺贝尔奖）时，约瑟夫·布罗茨基称赞米沃什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或许是最伟大的”（米沃什反过来也是布罗茨基的崇拜者）。伟大不伟大，有时是一句空话，但布罗茨基对此赞美，乃是基于他对米沃什的认识、他对20世纪诗歌的认识、他对“伟大”一词的理解和他的历史意识。当然这其中也有他对米沃什的友谊。美国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与米沃什的关系赶不上布罗茨基与米沃什密切，2001年12月他在为《纽约客》写的一篇文章中称，米沃什是“一位就在我们身边但令我们琢磨不透的巨人”，这或许能够代表一部分美国作家和诗人对米沃什的看法。米沃什在美国的成功确定无疑，但无论是波兰人还是其他地方的人若据此认为他就变成了美国诗人，恐怕不妥。他本人当然不会同意，至少他一生都在使用波兰语写作。

在《米沃什词典》这部回忆录中，他承认他是西方文化的追慕者。在谈到20世纪初东欧一些国家的诗歌写作时，他说：“我不好意思承认，我们这些国家主要是模仿西方。”这听起来完全是文化势利眼的意思。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民族文化习惯，还有个人从小受到的教育。但有没有更深一层的文化原因？批评家伊瓦尔·伊瓦斯克（Ivar Ivask）曾经谈到过东部欧洲与西部欧洲的不同，他说：“我们知道在我们的时代‘一切都瓦解了，中心再不能保持’，但是在东欧，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中心，即使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维也纳也称不上，所以事物无需瓦解，而是一直围绕着一个空空的或纯粹是想象出来的中心，以一种奇怪的、离心的方式旋转。”这种情况没有到东欧的人大概不太容易理解。但可以理解的是共产党波兰的意识形态气候。在米沃什的亲西方主义中，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1951年他从波兰驻巴黎大使馆文化事务一等秘书任上出走，从而与波兰政府决裂，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应该是他亲西方的逻辑结果。而这正是为某些一直生活在波兰的波兰作家所反感的，认为他没能与波兰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因而他不能理解波兰人民的政治选择。不过，波兰作家们应该了解，米沃什心里始终装着波兰，装着他的家乡——立陶宛说波兰

语的维尔诺社会。“为什么那个毫无防御的、纯洁得像一个被遗忘的／结婚项圈一样的城市不断呈现在我面前？”（《没有名字的城市》）——这使他对西方生活经常做出波兰式的反应。在他的《一次演讲》这首诗中，米沃什回忆起法国诗人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的一次演讲和他自己听演讲时的心态：瓦莱里讨论着“审美经验的持久特征，它确保了艺术的永恒的吸引力”。但是，坐在听众席上的米沃什却想到了自己的另一种可能的处境：

他头发倒竖，
耳朵听见搜捕的尖叫，
他逃过冰冻的原野，
而他朋友和敌人的
灵魂留在了
结霜的铁丝网后面。

好像正是为了回应波兰国内对他的批评，他在回忆录中针锋相对地对波兰青年一代诗人提出了指责：“对于那些1989年之后开始为西方出版市场写作的波兰作家，我无法抱以好感。对于那些模仿美国诗歌的青年诗人我也是一样的态度。我和整个‘波兰派’（Polish school）做我们自己的事情，心里装着我们的历史经验。”

二

米沃什的历史经验很大一部分得自他的家乡维尔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构成了米沃什诗歌中的地理和意识形态因素。维尔诺是波兰语的叫法，立陶宛语称维尔纽斯，意第绪语称维尔内，俄国人过去称之为维尔纳。维尔诺曾经属于沙皇俄国，曾经属于波兰，属于立陶宛大公国，属于苏联，现为立陶宛首都。该城始建于10世纪，一直是波兰人、立陶宛人、犹太人、白俄罗斯人混居的地方。米沃什虽然生于基日达尼（Kiejdany），但他在维尔诺长大和受的教育。他在小说《故土》中说，他了解城中的每一块石头。城里有四十座天主教教堂和许多犹太教堂。城市的周围绵延着山岭。老城的中心是一座小山丘，城市上空凝聚的云朵犹如城中的巴洛克建筑。米沃什曾先后在巴黎、纽约这样的大都市居住过，但是说到城市，他首先想到的就是维尔诺。是维尔诺建构了他有关城市的观念。在他的诺贝尔奖受奖辞中，他谈到过这座城市的精神面貌：城市里“有一种宽容的无政府主义，一种使凶猛口角罢休的幽默，一种有机的群体感，一种对任何集权的不信任”。他就是在这样一种精神氛围中长大成人，这为他后来的写作和政治态度埋下了伏笔。米沃什不仅熟悉他那个时代的维尔诺，他甚至可以想象出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维尔诺：在密茨凯维奇时期，维尔诺是波兰浪漫主义的发源地；在1939年德国军队和苏联军队先后入侵波兰之前，它也是波兰的文化首都。此外，它还被犹太人称为“北方的耶路撒冷”。米沃什认为，说波兰语的维尔诺社会其实是波兰庄园文化的延伸部分，因此，作为一个出身于乡绅家庭的庄园少爷（他个人的经济情况在维尔诺时期和巴黎时期都不好），在他对维尔诺的忠诚里，看来也包含着他后来在共产党波兰消失了的旧时代的上流社会和知识精英的怀想。

但是维尔诺带给米沃什的不仅是美好，更重要的是，它赋予米沃什以强大的现实感和历史感。他的许多同学和朋友不是死于纳粹的集中营，就是死于苏联的“古拉格群岛”。这在他的回忆录里有集中的反映。可以说死亡对于米沃什如同家常便饭一般，他因此才会在诗里说：“让死者向死者解释发生了什么。”（《逃离》）死亡和发生在波兰、苏联及东欧的事，把米沃什塑造成一个充满“意识形态激情”的诗人。这样的诗人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一般不会被看好。读者和批评家一般会追究一个诗人的情感表达是否动人，其诗歌的音乐性、意象、结构是否精彩，但米沃什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使他成为诗人中的例外，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后文中讨论。自1951年开始，米沃什在法国流亡了十年（然后去了美国）。法国知识分子如萨特、波伏瓦对苏联的赞颂和对苏联社会真实情况的掩盖，令米沃什愤愤不已。由于他在波兰和在法国的经历，这个早年政治上的左派、社会主义者变成了右派，并且称左派为“乌合之众”。有意思的是，他认为自己恰恰是在踏上流亡之途之后，才开始了共产党所提倡的现实主义写作。

可能有两个因素强化了米沃什与维尔诺的关系。一个是他的流亡：距离使得他自觉或不自觉地强化了自己的身份感；距离滤除了他与维尔诺的日常纠缠，使得维尔诺更容易进入书写。远景中的城市或许比近在眼前的事物更适于被观看。想想但丁与佛罗伦萨的关系，这个问题便很好理解。但有一点必须指出：米沃什心里装着维尔诺，并不等于国人所说的“怀乡病”，即使米沃什在流亡中思念家乡，他也在很大程度上克制住了自己的乡愁，从而避免了对于家乡的美化。这样，他便赋予了维尔诺以更大的历史想象、道德想象和形而上想象的空间。维尔诺一方面担当起米沃什想象和思考的对象的角色，另一方面成为他面对西方社会生活时所不可或缺的他者。俄国批评家托马斯·温克罗瓦（Tomas Venclova）曾经指出：“维尔纽斯和立陶宛省份以一种唤起的力量出现在（米沃什的）诗歌中，就像马丹维尔和贡布雷出现在普鲁斯特的作品中。”强化了米沃什与维尔诺的关系的第二个因素，大概是波兰人对历史的屈辱感。二战时期德国曾有人将波兰称作“世界的阴沟”，德国人杀起波兰人或斯拉夫人来就像处理次等人类。布罗茨基谈起这个问题仿佛感同身受：“人们或许会称米沃什所受到的教育为标准的东欧教育，其中包括人们所知道的大屠杀。”这种历史的屈辱感不时涌入米沃什的诗歌和散文。他写道：

在帝国的阴影里，穿着古老斯拉夫人的长内裤，
你最好学会喜欢你的羞耻因为它会跟你在一起。

它不会走掉即使你改换了国家和姓名。

可悲地耻于失败。耻于供宰割的心。

耻于献媚的热忱。耻于机巧的伪装。

耻于平原上的土路和被砍倒当柴烧的树木。

.....

你时刻受到屈辱，憎恨外国人。

米沃什说：“无疑存在着两个欧洲，并且发生了这样的事，我们，第二个欧洲的居民们，命定坠入了 20 世纪的‘黑暗中心’。我不知道怎样一般地谈诗。我谈诗，必然会谈到它与特定时空环境的关系。”或许基于这一点，在讨论米沃什或与之相似的诗人时，我们可以置新批评要求删除诗人历史经验的理论于不顾。细读式批评对于某些经典作家是有效的，但米沃什在当前，不完全是一位经典作家，或者说他是一位大于经典作家的作家，有待历史的遗忘将他缩小为一位经典作家。

三

从欧洲启蒙时代以来，梦想成为“世界主义者”便是许多文人的精神乐趣所在，世界主义似乎成了某种文明的标签，它与民族主义相对立。但是，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一个人既不是世界主义者，也不是民族主义者？在《米沃什词典》中，米沃什说：“我到过许多城市、许多国家，但没有养成世界主义的习惯。相反，我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谨慎。”但就在同一本回忆录中，他也批评了波兰小说家和小品文作家斯蒂凡·基谢列夫斯基（Stefan Kisielewski）的民族主义：“基谢尔总是以一身逗人的丑打扮出现，但说到底，他内心隐藏着一个充满波兰中心论偏见的知识分子。”米沃什了解基谢尔的爱国主义，但是他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区分开来。民族主义并不是一个坏词，它通常指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将民族利益、民族价值观置于诸多利益、诸多价值观的首位，但有时它也与强烈的自我中心和排外情感搅混在一起，从而不能与多元民族文化相兼容。有时它也可以用以掩饰民族自卑感。民族主义发展到极端，或者说民族主义降落到文明基线以下时，便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纳粹德国是一个我们很容易想到的例子。德国诗人海涅说过：“没有比狭隘的民族主义更有害的东西了。”米沃什虽然始终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谨慎，看不惯西蒙娜·德·波伏瓦所代表的巴黎左派知识分子的习气，不能接受“资产阶级审慎的魅力”，但他也不认同盛行于美国诗歌界的地方主义。美国的地方主义诗歌以罗伯特·弗罗斯特为代表。米沃什一方面承认弗罗斯特具有强大的才智、非凡的理解力，另一方面又认为后者的地方主义是装出来的，是基于“要做一位伟大诗人”的强烈愿望，是基于对美国诗歌听众和读者对诗歌的预期所做出的判断。说穿了，这样的诗歌具有欺骗性。美国是一个大国，可历史不长，社会生活兼具开放性和封闭性，是流行文化的天堂，其公众的道德感往往遮蔽了他们智力上的浅薄，而其精英文学的自信心只是到 20 世纪初才在爱默生、惠特曼打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这样一个国家成了米沃什后半生的流亡之地。而米沃什则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国家不算大，国力不算强，有时自以为是，有时被人宰割，但其文化资源丰富。因此，米沃什的历史经验、道德准则、审美倾向都要求他既反对世界主义，也反对民族主义，也反对地方主义。那么，这就牵扯到一个问题，米沃什自己的文学主题是什么？这一问题看似一目了然，因为作为一名流亡者，他的作品肯定是向回看的，肯定少不了对专制制度的谴责。但如果以此为米沃什的写作主题，我们是否便简化了一位复杂而深刻的诗人？在《米沃什词典》中，他提到一位名叫利奥波德·泰曼德（Leopold Tyrmand）的波兰人。此人流亡在美国，以谴责专制为己任，但最终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极端保守派。而米沃什在用几本书（如《被禁锢的头脑》、《权力的攫取》等）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之后，便再未继续往前走。他深知自己必须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写作，把一切噩梦化为自己的写作资源，并与噩梦本身保持距离。但是这是否意味着米沃什就变成了一位传统意义上的讲究“拯救”的天主教徒？或一位马拉美的象征主义者？或一个把“历史”理解为“时间”的人？一个形而上的人？不错，米沃什的确在维尔诺的上空发现或建造了一座斯威登堡式的天堂，他也的确称赞过波兰诗人博莱斯瓦夫·莱什米安（Bolesław Leśmian）的诗歌想象被其自身的美所救赎，但是，正如厄普代克所说，米沃什是一位“扎根于自己的存在状态的诗人”。他的存在状态也就是他所理解的人类的生存状态。他说：“人类是用文明废墟中的残留物来建构诗歌的。”他特别称赞 T. S. 艾略特的作诗法：“他用不可能性、匮乏和废墟来建构诗歌。”他也写到过“时间”，但那不是马拉美或博尔赫斯的“时间”；他要“探查那使时间屈服的法律”，他说：“时间在我们的头顶狂风似的怒号。”不过，无论是时间，还是废墟，还是拯救，还是谴责，恐怕都担当不起米沃什诗歌、散文统摄全局的主题，米沃什的历史经验和他对神学、哲学的兴趣都要求他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来观照历史和人生。人们对米沃什的文学主题有过种种概括，其中，美国学者、米沃什的学生路易斯·伊里瓦内（Louis Iribarne）指出：“米沃什的伟大主题是，用‘人性的东西’填满宇宙。”这可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并且，任何一种观点都有可能导致米沃什缩水。仅米沃什用英文出版的著作（包括诗集、小说、思想论文、文论、日记、翻译等）就有二十来部，其主题是多重的。那么，在米沃什的多重主题中是否存在一个核心？或许米沃什的老朋友布罗茨基对他会有更深入的了解，对我们会有所帮助。布罗茨基说米沃什多重主题的核心是：“一个人无法抓住他的经验，他和他的经验之间越是被时间所隔绝，他越是不能理解他的经验，认识到这一点令人无法忍受。”或许唯其无法抓住，他才要努力抓住，在此过程中，他向我们呈现了我们的生存处境。这一处境我们越是不能理解，它的悲剧性越强。而在这一点上，米沃什超越了作为回忆者、谴责者的米沃什。

四

要满足这样的主题的表达，需要怎样的语言，怎样的风格？米沃什一生都是用波兰语来写作他的诗歌。对于他这样一个选择，我们会习惯性地将之理解为诗人的爱国主义。的确，这里面包含着米沃什对波兰的爱、对故乡维尔诺的忠诚，但事情当然不是这么简单，因为一个身在美国的外国诗人，做出这样的选择，就意味着选择了边缘，选择了默默无闻。但是他说：“我被另外的东西所召唤。”波兰语是一个小语种，中国以出版语言辞书著称的商务印书馆甚至从未出版过波兰语词典。可以想见，波兰语在美国的处境即使好一些也好不到哪里去。米沃什曾经感叹不懂波兰语的外国人很难理解为什么密茨凯维支在波兰被尊为伟大的诗人。尽管如此，米沃什还是选

择了波兰语作为其诗歌的第一语言，这其中可能蕴含着一种观点，即一个诗人只能选择一种语言，他和该语言之间存在一种命定的关系。比较而言，小说家要自由得多，无论是康拉德（波兰人）还是纳博科夫（俄国人），都变成了伟大的英语作家。诗人当中能讲多种语言的也不乏其人：近的有布罗茨基，他用英语写出的散文相当精彩，但写诗，他还是用俄语：远的有但丁·彼特拉克，使他们永垂不朽的是意大利语而不是拉丁语。当然，一位诗人选择使用一种语言，并不妨碍他向这种语言引入异质因素，博尔赫斯便向西班牙语引入了英语。

中国诗人使用中文写作，不存在太多的道德和技术问题，因为一来，中国诗人几乎清一色为单语写作；二来，中文是一种如此丰富的语言，古汉语为现代汉语保存了诸多可能性（尽管在当代它不可避免地需要被调试，被刷新）。但是波兰语的情况与中文的情况非常不同。为了达到其写作的理想状态，米沃什无法停留在对波兰语的一味赞美上，甚至连道德上的赞美也是困难的。在《没有名字的城市》这组诗的终篇《我忠实的母语》中，米沃什感慨道：

现在，我承认我的疑虑。

有时我觉得我浪费了自己的一生。

因为你是低贱者的、无理智者的语言，

他们憎恨自己甚至超过憎恨其他民族：

是一种告密者的语言，

是一种因自己天真

而患病的糊涂人的语言。

但这还是该语言的表面现象，如果我们稍微探究一下蕴含在这表面现象背后的意味，我们就能掂量出米沃什所面临的困难：狭隘的民族主义、只能表达日常生活却不能表达历史生活的可能性、对思想的无能、对悲剧的漠然，等等。此外波兰语就像其他斯拉夫语，特别是俄语一样，与邻近的西方相隔绝。米沃什在其哈佛大学系列讲座《诗的见证》中曾引用俄国历史学家格奥尔基·费多托夫（Georgy Fedotov）的观点，谈到俄罗斯的不幸。费多托夫“将所有俄罗斯不幸的根源归结为选择了斯拉夫语作为教会语言，而没有采用本来在东方可以成为与西方通用的拉丁文并驾齐驱的希腊文，于是俄罗斯长期处于孤立自守的状态，直到它突然发现了西方思想，但已为时太晚”。这就引出一个致命的问题：波兰诗人使用同样属于斯拉夫语族的波兰语，能否成就伟大的诗篇？路易斯·伊里瓦内形容米沃什既是诗人也是哲学家，既是东方人也是西方人，既是过去的人也是现在的人，既是孩子也是先知，既是雅各也是赞美诗的作者。那么，什么样的语言才适合这样一个人来使用？

波兰语言的问题，据米沃什看来，最要命的，是它惊人地缺乏哲学表达方式，这种缺乏使得用波兰语进行智力谈话成为一种挑战，需要高超的杂技功夫。此外，波兰语不是一种形式化的语言，它缺少准确性和规则。米沃什的朋友、为米兰·昆德拉所特别称赏的波兰小说家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Witold Gombrowicz）曾经感叹：“我们用法语说话就准确，一旦我们改用波兰语，我们就变得模糊起来。”缺少准确性和规则可能是斯拉夫语言的通病。不过米沃什倒也从这种不足中发现了新的可能性：其不确定性或许可被用来增加语言的柔韧度。本文作者并不懂波兰语，这里只能罗列出米沃什和其他人对波兰语的看法。但如上麻烦不仅是米沃什的麻烦，这大概也是密茨凯维支的麻烦。而密茨凯维支对波兰诗歌史的重新书写和对波兰语言的改造，看来鼓舞了米沃什。他力图使波兰语适合自己对另一个欧洲的描述和思索，尽管他也意识到了自己所能做的工作的有限性。他说：“既然我用语言工作，我明白发展的各阶段是不能被跨越的。我期望参与到世界文学中来，不过我却受制于我的前辈介绍给波兰语言的东西，尽管我自己对它也做出了微薄的贡献。”

米沃什深知波兰语言和其他西方语言的不对等性，这一点在翻译中尤能见出。他曾以波德莱尔波兰语译文为例，指出波兰语和法语这两种语言发展的不均衡。他也曾感叹亨利·米勒的作品无法有效地翻译成波兰文，因为波兰文缺乏翻译米勒的相应词汇。米沃什一生注重文学翻译，他曾花很长时间翻译了波德莱尔的《阳台》和他的美术评论，二战中他翻译过法国理论家雅克·马里坦（Jacques Maritain）的著作，翻译过莎士比亚的戏剧，他还把大量的美国当代诗歌翻译成波兰语，以期改变战后波兰文学界的灰暗气氛。这大概就是他自言对波兰语做出的“微薄贡献”的一部分。任何一种语言的发展都离不开翻译的贡献。回到埃兹拉·庞德那句老话：“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就是一个伟大的翻译时代。”即使那些追求“纯正”语言的人，也无法否认翻译对“纯正”语言的间接影响。在这方面，近在眼前的中文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米沃什不仅从事法语译波兰语、英语译波兰语，自他移居美国并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他也将许多波兰诗歌翻译成了英语。在他用英语出版的著作中也包括《战后波兰诗选》、《兹比格涅夫·赫伯特诗选》（与人合译）、《亚历山大·瓦特地中海诗选》等。从这里我们是否也能看出米沃什对波兰和波兰语言的忠诚？

五

维尔诺、大屠杀、波兰、波兰语，米沃什与这一切的关系之深决定了他诗歌中一种可以称之为“封闭性”的东西。我们可以说这种封闭性并不完全属于米沃什，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与其他东欧诗人分享了这种封闭性。这种封闭性同样见于波兰的维斯瓦娃·申博尔斯卡（Wisława Szymborska）、兹比格涅夫·赫伯特（Zbigniew Herbert），捷克的米罗斯拉夫赫鲁伯（Miroslav Holub）、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Jaroslav Seifert），塞尔维亚的瓦斯科·波帕（Vasko Popa），原东德的萨拉·基尔施（Sarah Kirsch），以及一些俄国诗人，以及自塞尔维亚移民美国的查尔斯·西米奇（Charles Simic）等人的诗歌。东欧诗歌的封闭性不同于受制于岛屿意识的英国当代诗歌的封闭性（尽管英国当代诗歌对东欧诗歌有所借鉴），作用于前者主要是历史记忆、天主教和患上了幽闭症的东欧共产主义。这使得东欧诗歌在 20 世纪的世界诗歌版图上呈现出与开放的法国、西班牙、美国及拉丁美洲等地诗歌截然不同的色彩。所谓东欧诗歌的封闭性，是指它的向回看、向内看、寓言化和沉思特征；它不可避免的沉重有时发展到沉闷。这样的诗歌注重道德问题、历史问题胜过注重形式问题。形

式问题对于东欧诗人来说大概过于奢侈，尽管它并非不重要。在《被禁锢的头脑》一书中，米沃什谈到：“对每一位当代诗人来说，波罗的海人的问题比风格、格律和隐喻重要得多。”可能基于如此认识，他又在《诗的艺术？》中强调：“诗歌的本质有些粗鄙。”米沃什虽是一位封闭的诗人，但他对“粗鄙”的理解使他得以欣赏惠特曼的“开放”。但是，非常有趣，在欣赏惠特曼的“开放”的同时，他又坚决地反对“开放”的现代主义诗歌。查尔斯·西米克指出：“米沃什警觉于 20 世纪的各种社会风潮，这些风潮指示了诗人的否定倾向。他反对现代主义的许多化身，反对现代主义者在语言上的实验、对过去文学的反抗、对中产阶级和普通大众的嫌恶，还反对他们的信条，即人生来就要受苦受难，因为人生没有基本的意义。”这是米沃什的“后现代主义”吗？我们知道，米沃什热爱美国诗人、T. S. 艾略特的竞争对手之一罗宾逊·杰弗斯（Robinson Jeffers），认为后者在表达哲学思想上的直截了当和散漫的长句子有后现代主义色彩。这是他理解的“后现代主义”。从这里，我们又看出了米沃什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或许在外人看来不可思，因而令人望而生畏。于是便有胆大的人站出来指出他的毛病。台湾诗人杜国清在其《米洛舒诗选》短短的《译者后记》中说：“他的诗也有不少英美现代诗中为人诟病的晦涩，尤其是掉书袋以及表现过于个人的特殊经验，因此，典故、地名、人名等等，往往成为读者理解上的一大障碍。”我们得感谢杜国清教授说出了诗歌小读者们的心声。巧的是米沃什好像了解这样的心声，在回忆录中，他曾提及人们不理解他何以获得诺贝尔奖。

瑞典皇家学院的拉尔斯·于伦斯滕（Lars Gyllensten）教授在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上说：“强烈的情感，还加上严格的训练和确切无误的洞察力，使他的作品与众不同。”他还提到米沃什的宽容精神、人道主义、自我克制、禁欲主义、英雄气概，但这一切溢美之词虽然无不正确，却好像都没能抓住米沃什及其诗歌的要领之处。也就是说，这一切溢美之词都没能解释清楚米沃什的诗歌何以与众不同。关于他的诗歌，厄普代克的看法是：“（它们）以一种被监视着的、沉默寡言的声音，触及了那些战争年月。他的回忆是粗略的，他的暗示是隐约的。”一般说来，米沃什语言平实，但如果只有平实，他便流于一般。而米沃什平衡平实语言的方法是求助于雄辩。雄辩需要观念、思想这类很难入诗甚至难以卒读的东西。查尔斯·西米克注意到，米沃什为使自己的诗歌对称于自己的历史记忆，而使自己的诗歌一反常态地具有观念性。大多数诗人在写作中竭力寻求意象、象征和隐喻的魔法，但“米沃什却是个例外。他的诗中观念越多，读起来越趣味盎然”。而且，他好像在“写诗发言之前，就已经知道了他想要说什么”。这全是诗歌写作的大忌，是平庸的诗人们所不敢一试的违反写作金科玉律的冒险。如果米沃什是一位单纯的抒情诗人，那么大量运用观念的结果肯定是彻底失败。幸亏他称自己是一座“满是妖魔的城市”。这样一座“城市”需要哲学和宗教的读解，需要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和列夫·舍斯托夫（Lev Shestov）的启迪。对米沃什来讲，无论是传统的还是实验的抒情诗，都无法满足他的智力需求和他对历史经验的表达的需要。他需要一种混合的风格，能够同时容纳思想、说教、叙事与抒情。美国批评家唐纳德·戴维（Donald Davie）据此专门著有一部名为《米沃什与抒情诗的不足》的著作，由田纳西大学出版社在 1986 年出版。

米沃什的爱好者们大多知道他写有一首名为《礼物》的诗。这首诗写于 1971 年，这一年他六十岁，距他在巴黎离职出走已经二十年，他在美国也已生活了十年。写这首诗时他可能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还要再活上几十个年头。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首诗写得早了点。诗是这样写的：

如此幸福的一天。
雾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园里干活。
蜂鸟停在忍冬花上。
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
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
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人并不使我难为情。
在我身上没有痛苦。
直起腰来，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

一首平静、安详、单纯、从容、自足，甚至快乐的诗，大师味十足。作者好像历尽沧桑，终于抵达了内心一方净土。这时他已可以暂时抛却记忆，专注于当下和眼前的事物；他已可以否认自己身上的痛苦。这意味着他已经将记忆和痛苦安排妥当，获得了一用平实、冲虚、清淡之风格的资格，而他惯用的雄辩的武器似已收仓入库。到这首诗的最后一行，诗人“直起腰来”，仿佛巨大的历史跨度业已被跨越。但他望见海与帆，把视野从眼前推向远方，仿佛有所暗示，意蕴多多——那是不是尤利西斯的漫长的旅程？因此，这不是一首孤立的诗，对它的阅读必须在米沃什的整个经验背景、精神背景下展开，否则无法达成有效的阅读。而在包围着这首诗的诸多声音中，有一个声音始终在说：“没有影子的东西没有力量活下去。”

西川

2003 年 9 月 16 日

本文为《米沃什词典：一部 20 世纪的回忆录》（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 2 月版）
译者导言，注释从略



西川

1985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美国艾奥瓦大学 2002 年访问学者。现执教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西川自 80 年代起即投身于全国性的青年诗歌运动。曾与友人创办民间诗歌刊物《倾向》（1988—1991），参与过民间诗歌刊物《现代汉诗》的编辑工作。其创作和诗歌理念在当代中国诗歌界影响广泛。

发现经典

这里是已经出版、我们认为不应该被湮没、遗忘和打成纸浆的旧书。



电影 100 Years of Ulysses 剧照

专栏

《尤利西斯》问世百年： 现代主义文学的发端

科尔姆·托宾 | 作家之爱

乔伊斯是如何改写叙述准则，
为爱尔兰人可能的生活形态勾画蓝图的？

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于 1922 年首度出版，就在出版两周多前，英国将其总督府都柏林城堡的钥匙交予迈克尔·柯林斯和他领导的爱尔兰新政府。那年，文坛的另一件大事是 T.S. 艾略特的《荒原》问世。

乔伊斯的这部小说与艾略特的长诗有许多共同之处——都以原生态的城市生活为题材，使用交相辉映的叙事形式，包含谐仿、神话和各种不同的声部。《荒原》近似宣告了叙事诗的终结，正如《尤利西斯》所做的是力求破除单一视角、作者全知的叙述手法——像一声发令枪，开启了从弗吉尼亚·伍尔夫到塞缪尔·贝克特的一轮“现代主义”文学创作浪潮，全面改写了如何处理和表现文学的准则。

今年迎来出版一百周年纪念的《尤利西斯》，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地位日渐升高，屡被誉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小说之一，甚至名列榜首。

随着后殖民研究和性别研究在学术界盛行，《尤利西斯》完全可以用来检验任何一种理论。对历史学家而言，它令人着迷地描绘了都柏林在一段相对和平时期的面貌，只有微小的迹象显示变化即将来临。对文学批评家而言，它是天赐的良机，盈满原型、文字游戏、模仿和晦涩的指涉。对普通读者而言，它的声威好比普通运动员跑马拉松。它一方面是挑战，另一方面，对那些读完全书的人来说，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

乔伊斯于 1914 年在的里雅斯特开始创作《尤利西斯》，1921 年在巴黎完成这本书。整个写作期间，他所熟悉的世界一步步分崩离析。幸运的乔伊斯在战争爆发时未遭奥地利人扣留。1915 年，他和他的妻子及家人逃往苏黎世。翌年，他试图通过他的小说使之千古留名的那座城市，其市中心被炮火摧毁。他的位至交在复活节起义中命丧都柏林：他自学生时代认识的帕特里克·皮尔斯，作为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被处决。当然，乔伊斯并没有在他的小说里提到那场战争或那次起义，他把故事设定在都柏林的一天之内——1904 年 6 月 16 日。但在创作《尤利西斯》的那个时期，在爱尔兰，不管写什么，无论小说、诗歌或剧本，都具有特殊、强烈的色彩。连以私下或个人生活为背景的文学作品也会被解读为介入一场有关爱尔兰的辩论。就诗人 W.B. 叶芝来说，这种介入不但如实地体现在像《1913 年 9 月》或《1916 年复活节》这类他面向公众的诗里，也存在于他写逝去之爱的诗里，含蓄地让所爱的人代表一个逝去的国家。

可这场辩论不是只围绕失去，因为它实际讨论的是未来。在 1904 年，可以明显预见到爱尔兰将成为第一个脱离大英帝国的国家。问题是：怎么脱离？还有：崛起的将是什么样的国家？

《尤利西斯》本身以其丰富的文体、包罗万象的内容、小说人物公然的耽于声色、对权威的不恭不敬、将一个思想自由、胸怀世界的犹太人置于故事的中心，都可以被解读成给这场爱尔兰之争添砖加瓦，全书的基调是在为独立后爱尔兰人可能的生活形态勾画蓝图。

在 1907 年所写的短篇小说《死者》的一场戏里，詹姆斯·乔伊斯生动描述了两个人物之间的冲突，一方是拥护爱尔兰文化民族主义的爱佛丝小姐，另一方是故事的主人公加布里埃尔·康洛伊，他坚持放眼世界，更感兴趣的是欧洲的语言，而非爱佛丝小姐口中的“你自己的语言——爱尔兰语”。

虽然其他作家，像 J.M. 辛格、W.B. 叶芝和格雷戈里夫人这几位都柏林艾比剧院的创始人歌颂农民的生活和爱尔兰西部的风光，乔伊斯却着重把《尤利西斯》的背景设在首府都柏林。他不像其他人一样诉诸爱尔兰神话。这部小说借用荷马史诗《奥德赛》的结构，尝试对英语写作者而言一切可能的文体。小说中有几次使用了我们或可称之为散文体的凯尔特腔调，但这么做的用意仅是嘲弄。

这部小说的中心人物是利奥波德·布鲁姆，他学识渊博，具有非凡的观察力和评论口才。布鲁姆是个新派人士，从事兜揽广告的工作。他的妻子莫莉是位歌手，与为她筹办音乐会的男人有私情。小说分十八章——其中大部分章节照应荷马史诗《奥德赛》的章节——跟随布鲁姆和一位名叫斯蒂芬·迪达勒斯的年轻诗人的脚步，在都柏林这座城市四处走动。

乔伊斯对情节、甚至人物心理均不感兴趣，他的兴趣在语言。他试图找到一条途径，描绘布鲁姆的意识、刻画他飞奔的思绪和游离的回忆及沉思。《尤利西斯》的开拓创新不仅在于它将壮丽的史诗与平凡普通相结合，而且使都柏林那日最不起眼的瞬间都似乎璀璨闪耀起来，并探索了一切可能的叙述手法，包括结尾为莫莉设计的一段独白，精彩绝伦的第一人称叙事。

有别于许多乔伊斯以前的爱尔兰小说家所追求的，《尤利西斯》无意向英语读者呈现一个充满异国情调或令人忧心的爱尔兰。书里虽有大量唱歌的场景，但没有人演奏爱尔兰的传统音乐或用盖尔语演唱。他们唱的是歌剧咏叹调、在音乐厅唱的歌和民族主义歌谣。乔伊斯不给他们添加多余的爱尔兰特色。

他想使都柏林恢复常态，确保他小说里的人物不狭隘保守或囿于他们是爱尔兰人，反之让他们因他们的风趣幽默、他们敏感的内心生活、他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而为人铭记。

此外，把都柏林设为一部小说巨著的活动中心，乔伊斯没兴趣向外界讲解爱尔兰。凡是爱尔兰小说家都明白乔伊斯面临的难题：遇到那些爱尔兰读者了然于心、但让外人一头雾水的鲜为人知的历史人物及事件的名字时怎么办？若是英国作家，他们无须解释什么是足球或格莱斯顿是谁。若是爱尔兰作家，当他们说起板棍球或提到奥康奈尔的名字时，谁知道他们是在讲什么？

乔伊斯没把外界读者考虑在内，没有对写的东西做任何解释说明，以便国外读者了解和接受。尽管他的书是在法国出版，但在他的想象中，这本书首先是写给爱尔兰人看的。

利奥波德·布鲁姆既非新教徒也非天主教徒，既不属于民族派也不属于联合派。他回避关于爱尔兰的简单争论。但在有一章里，他的人本主义和温和的思想经受了同胞的考验。

在第十二章“库克罗普斯”里，布鲁姆在一家名叫巴尼·基尔南的酒吧加入一场有关爱尔兰和民族独立的讨论。他把民族 / 国家定义为“生活在同一个地方的同一群人”，但接着改口，把“此外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也包含在内。有人问他是哪国人时，他直率地回答：“爱尔兰……我生在这儿，爱尔兰。”后来，他抱怨他的犹太同胞在别处受到迫害，但对用“武力”抵抗这种迫害的建议不以为然：“可那样没用。武力、仇恨、历史，一切等等。无论男人女人，不应活在侮辱和仇恨中。”

上述对话实际是乔伊斯在 1916 年起义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屠戮发生后所写的。他明知在 1904 年，谁也想不到“武力、仇恨、历史”和民族国家的概念会在十年内造成这么大的破坏。通过让布鲁姆坚定地反对狂热与暴力，乔伊斯将历史倒推回去，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使布鲁姆可以做出一番刺耳的雄辩，这番雄辩被酒吧里他周围那些人的陈词滥调和空话大话衬托得益发铿锵有力。

“库克罗普斯”这一章本身包含了暴行。整章中，人们在酒吧里谈天说地，乔伊斯以戏仿的形式，精心巧妙地介入当时爱尔兰流行的各类话语。其中一处是戏仿报纸记叙一次牵动全社会的盛事——但绝非社交盛会：讲的是 1803 年在都柏林公开处决爱国英雄罗伯特·埃米特，无论在 1904 年、小说故事发生之际，还是在 1922 年、《尤利西斯》出版之时，大多数爱尔兰人都把这件事看得严肃极了。

在写到出席处决仪式的宾客名单时，乔伊斯加入了许多荒唐滑稽的名字，像是“阿里巴巴·施舍·尊贵·辉煌主人、高贵骑士马拉利亚邪恶时刻·唐·伊·词儿·伊·主祷词·德·拉·皮卡迪洛先生、蒙蒙尼·切腹君”。

上述戏仿写于爱尔兰推崇烈士的时期。用闹剧般的一连串出席者的名字打趣处决一位爱国英雄，这么做是抵制在一个一味舍生忘死的国家里对死亡的膜拜。万一有人没注意到乔伊斯是在 1916 年起义后写的，他给处决埃米特的刽子手起名“汤姆金·马克斯韦尔·弗兰契马兰·汤姆林森”，在唐·吉福德和罗伯特·J. 塞德曼合编的《<尤利西斯>注释》里，对此的评注是：“一个虚构的名字，极尽浮夸地标榜‘良好的家庭’出身。”不过对爱尔兰读者而言，马克斯韦尔这个名字跃然眼前。约翰·马克斯韦尔爵士是 1916 年爱尔兰的军事总督，他下令处决了那些起义领导人。

通过打趣一件被视为萦绕在人们心头的悲剧，乔伊斯表达了与公认的舆论相反的立场。通过把处决写得如此令人捧腹，他暗示，让过去满载着烈士和爱国主义的纪念，这种做法婆婆妈妈、沉重累赘。

把《尤利西斯》放在创作它的时代背景中读，它之所以勾起人莫大的兴趣，因为它誓不出做明确的表态。例如，在颂扬都柏林日常生活的《游动山崖》那章里，有一刻耐人寻味，隐含反英意味。许多都柏林次要的角色在一幕幕拼接的场景中亮相或有机会开口讲话。但坐马车穿过市区的总督及他的随从没得出声。我们知道他们的

存在，但我们看不见或听不见他们。《尤利西斯》不唾骂他们，反而无视他们。在后面的一章《太阳神牛》里，乔伊斯将一个场景设在一家妇产医院，那儿奇怪地聚集了一众男人。构成这章内容的是英语散文创作史上的各个重要时刻。1920年3月，正致力于这一章的乔伊斯写信给一位朋友，谈到技巧，这些技巧将包括“最早的头韵体、单音节和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古英文……接着以曼德维尔的风格……接着是马洛礼的《亚瑟王之死》……接着是伊丽莎白时代的编年体……接着是一节庄重严肃的，如出自米尔顿、泰勒、胡克，继之是一小段支离破碎、拉丁漫谈式的、伯顿—布朗体，接着是一节班扬式的……在一小段皮普斯—伊夫林的日记体后……一直再到笛福—斯威夫特、斯蒂尔—艾迪生—斯特恩、兰多尔—佩特—纽曼，最后以惊人的混杂收尾。”

安东尼·伯吉斯说，这章是他梦寐以求想写出的作品：“它是属于作者的篇章，令人眼花缭乱又权威性地展示了英语能有的功用。”这样的乔伊斯好比课堂上的最佳学生，显露出他在英语散文史方面的博识。不同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卡利班，他不但学会了咒骂。他先学会了驾驭。

《尤利西斯》充溢着讽刺、插科打诨和义正词严的叙述。它在作者四十岁生日之际出版，宣告了一个爱尔兰作家对英语小说进行再创造时所获得的成果。《尤利西斯》表面的戏谑、它的兼容并蓄和对外部世界的开放态度、它坚持独立自主的想象，给1922年的爱尔兰——一个正要变得保守、缺乏自信的国家——上了一课。在《尤利西斯》里，乔伊斯提出了爱尔兰摆脱帝国后可以走的另一条路，拥有像利奥波德·布鲁姆和莫莉·布鲁姆这样的公民。当然，爱尔兰无视他，连把他的书正式列为禁书这点面子也不给他。

虽然他的书大获好评，但爱尔兰政府始终对乔伊斯有戒心。据诗人伊凡·博兰德所述，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她的父亲担任爱尔兰外交官，与爱尔兰总理埃蒙·德·瓦莱拉一起在瑞士时，与德·瓦莱拉在同一家眼科诊所看病的乔伊斯请求和他们共进晚餐。德·瓦莱拉拒绝。1941年乔伊斯在苏黎世去世，英国公使前往伯尔尼，在葬礼上讲话，但没有爱尔兰的官方代表出席。

美国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去世前夕，我和他谈起约翰·F.肯尼迪1963年6月访问爱尔兰的事。他告诉我，肯尼迪故意在他向爱尔兰国会两院发表的演讲中插入提到詹姆斯·乔伊斯，借此推进爱尔兰政府和爱尔兰人民认可乔伊斯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一位杰出的爱尔兰人。

1954年，在现被称为布鲁姆日的6月16日，数位作家依循布鲁姆和迪达勒斯所走的部分路线，做了一次都柏林朝圣之旅。在过去几十年里，每逢布鲁姆日，市内到处是穿着爱德华七世时代的装束、表演《尤利西斯》里的场景的人。以前的弃儿如今是全国性文化庆祝活动的焦点，并吸引着大批外国人，想无视也不行——或几乎不行。

有一年，我因忙碌而忘了那天是布鲁姆日。当一大群乔伊斯迷上前与我搭讪时，我发现自己提着两袋食物，在市中心的一家超市外。他们个个盛装打扮，问我扮的是书里的哪个角色。我告诉他们，我不是任何角色，只是城市中普通一天里的一个普通人。最后我们一致赞同，这样充分符合乔伊斯那部杰出小说的精神。



科尔姆·托宾

爱尔兰著名作家。已出版十部长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集，多部戏剧、游记、散文集。《黑水灯塔船》《大师》《玛利亚的自白》都入围布克奖决选名单，《大师》获2006年度都柏林国际文学奖文学奖。《布鲁克林》获2009年度英国科斯塔最佳小说奖。他最新作品是2021年出版的《魔术师》。目前，托宾担任哥伦比亚大学英文与比较文学系讲席教授，自2017年起也担任利物浦大学校监。

译者：张芸

毕业于北京大学德语系，现旅居美国。自由译者、撰稿人。译有《遥望》《猫桌》《舞者》《管家》《飞越大西洋》《马利亚的自白》《美国佬》《圣徒与罪人》《奥丽芙·基特里奇》《旅行之道》等。

《<尤利西斯>问世百年：现代主义文学的发端》("Ulysses at 100: the birth of the modern")，原载于2022年1月19日英国《金融时报》。本文经《金融时报》授权发表。但译者根据作者托宾提供的原稿译出，与《金融时报》发表的版本略有出入。
Copyright © 2022 The Financial Time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作家之爱

这不是一个书评栏目，作者只是谈谈他们是如何“爱”上另一位作家，以及他们和他们的作品是如何成为自己的一部分。这个栏目和作家的私人阅读体验有关。



电影《泰坦尼克号》(1997)剧照

专栏

这届人民审美疲劳了

王永智 | 王伯伯脑保健操

缺少美感的社会，所有的目的都不是人，
都是利益，而人只是手段

王小波说，不知道我有没有说过这样一句话，“一辈子很长，要跟有趣的人在一起”，他没说一辈子很长，就找个胸大的人在一起，也没说一辈子很长，就找个欧式双眼皮和嘟嘟唇的人在一起，更没说一辈子很长，就找个持有 48 小时核酸检测报告的人在一起。可见，有趣比胸大重要，比欧式双眼皮和嘟嘟唇重要，比核酸检测报告重要，但这世上就是没有一个部门是对有趣这件事负责的，相反他们还通过“春晚”这种形式杀死有趣。这或许就是，世上好看的阴性肉体很多，有趣的阳性灵魂太少。

有趣，是一种审美意识，能满足审美渴望，是审美疲劳时爱人递上的汇仁肾宝和汇源果汁，而在眼下，它却成了李可均送给明光宗的红丸，戚继光送给张居正的海狗鞭，有趣成了别有用心，成了图谋不轨，而此时有趣的尽头也不是无趣，是无耻。“以有趣对抗无趣”，这是《南方体育》当年的口号，这个报纸要是活到现在，恐怕口号得改成“以有趣对抗无耻”，因为他们面对的不再是冰冷的制度，而是活生生的人，制度无趣，人使它变得无耻，我想，此时，上海人民深有体会。

上面来的指令看上去都是面善的，到了底层一开始执行，你就会发现来者不善。比如说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 6 月 6 日发的这条无趣没有美感的规定，“任何企业、组织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图书、报刊、电影、广播电视台节目、舞台艺术作品、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或者网络信息，不得含有诱导未成年人文身的内容。”如此来看，岳母刺字的故事也要走下历史舞台了，这个故事以后恐怕要改写成“1126 年，金兵大举入侵中原，岳飞投军，临行前，姚太夫人把岳飞叫到眼前说，现在国难当头，你要到前线杀敌，临行前，妈帮你做个核酸检测吧！”，这么一改，反倒有趣了。

水泊梁山景区忠义堂门口悬挂的大旗，也进行了有趣的修改，原先那面“替天行道”的大旗，内容被换成了“义薄云天”，要是李逵知道这事，估计又要嚷嚷“吃俺两板斧”了。虽然官方回复“替天行道”“义薄云天”都是水浒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意思相差甚远，不过“水泊梁山”这四个字后面加了“景区”二字，门前的大旗我们就当个景儿看看就得。当然，我们还是能够理解官方的用心良苦，虽然宋江最终归顺了朝廷，但毕竟走了那么多弯路，所以，“替天行道”这四个字，太不安分太血腥太暴力了。其实换成“义薄云天”也不好，这也是江湖文化，绿林遗风，避免不了打打杀杀毁坏公共财物的意气用事，还是换成“遵纪守法”四个字，更符合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精神，此外，如果能在上梁山的入口，挂上“应检尽检”和“动态清零”两面大旗，再安排几个健康码、行程码核验人员把守，我相信一百单八将里有一百人上不了山，那就天下太平了。有些人很擅长做伤害未成年人的事，而且是打着保护未成年人的旗号去伤害的，就像有些人很擅长做破坏防疫大局的事，而且是打着维护防疫大局的旗号。他们反对

的恐怕是文身所代表的特立独行的文化，他们担忧的恐怕是未成年人的独立思考和个人意志表达，倘若未成年人要文个“精忠报国”“遵纪守法”之类的，我想他们是不会有反对的。在目前的环境下，我只能说他们做事的方式看起来不够美，不够有趣，但很可笑，而不美和可笑，一直是体制机器产物的特征，比如各类开幕式，比如建筑，比如人造景观，比如看上去恪尽职守的人执行着漏洞百出的防疫逻辑，比如看上去永无止境的核酸检测，以及那些真假难辨的检测结果。缺少美感的社会，所有的目的都不是人，都是利益，而人只是手段，康德要是生活在现在，他肯定会竖着中指在上海街头咆哮，“人在任何时候都要被看成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成是手段。”他也会因困扰公共秩序、危害抗疫大局被行政拘留七天。

康德不仅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同时他也是古典美学的奠基人。审美自由问题是德国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为了捍卫“审美自由”，一方面不断批评教会对人性的压抑，一方面又极力主张人性的张扬。只有守住这一点，才能把人性里的自由释放出来。自由，是美的本质和审美的最基本特征，可以说，审美的过程是一个争取自由的过程，而审美疲劳，往往是自由被禁锢住了。人的自由一旦被禁锢住，那么他就成了工具，而不是目的了，不仅人成了工具，就连他身上的病毒也成了敛财的工具，比如前阵子国家医保局的飞行检查就加入了核酸和抗原检测，据专家说，“核酸检测乱象也在被查的范围内，有些地方核酸检测已经形成利益集团了。”新冠病毒听了估计都懵了，病毒们尚且各自为战没有形成团团伙伙，检测病毒的却已经率先形成利益集团了，这是审美出现了问题，这是人成了敛财的工具。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自由出入需求和官方日益增长的核酸检测频次之间的矛盾，天上还有不测的风云呢，地下连个可以不做核酸检测的人都没有，动不动几十天的核酸检测，已经让大家很疲劳了，身体疲劳，审美也疲劳了。在我百度搜索“审美疲劳”准备深入研究一番时，词条解释下面紧跟着一条链接为什么阴茎不勃起了，千年宫廷配方”这就是百度的审美，康德要是看到了，肯定又要疾呼，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可这社会，就是把人当成工具，达到敛财的目的，当他们的财富积聚到一定程度，他们将跻身于上层社会，在社会源头制造污染。就像这几天宣称要用五十辆宾利挡住劳斯莱斯汽车的“国企领导女朋友”，当她和另外一个当事人熟练的躺在地上共同耍起无赖时，你就知道这个社会有多丑了，当她说只是和国企领导男朋友举办了结婚仪式而没有领证时，你就知道这个社会源头丑得多深刻了。当然，你也能知道自己为什么生活在社会底层了，当劳斯莱斯车主和宾利车主为了一个车位而躺在地上撒泼时，你却常常为了一点可怜的自尊和所谓的原则而把唯一一辆共享单车让给晚来的女士。

社会的审美教育往往是自上而下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悌，上恤孤而民不悖”，这就是上行下效。“上”是一个时代审美水准的源头，也就是说审美这个事，如果被“上”独裁了，这是很危险的事情，会导致整个时代审美的堕落和崩塌。“上”有时候是一个人，更多的时候是一个阶层，“上”的审美水准关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建筑，比如影视作品，比如美食，比如服装，比如美女……现在很多漂亮姑娘的长相都不随父母，都随韩国的主刀医生了，但主刀医生也只是负责技术层面的东西，背后操控审美标准的还是“上”，比如说各地经常光顾夜总会的有钱有权群体，他们是审美消费的主体，姑娘们走进包房一字排开，喊声“晚上好”，剩下的就是等待他们“审美”、“选美”，选择权在有权有钱人手里，他们也就定义了这个层面的审美标准，而他们的文化层次，往往也决定了他们的审美层次。

于是，夜场的姑娘们为了提高收入，就要揣摩这些人的审美标准，去整一下自己身体的各个部位迎合市场需要。国产暴发户们的发家之路大多不清不楚不明不白，跟各级权力都有千丝万缕的关联，这也注定了他们的审美标准在初级阶段是简单粗暴的，主要集中在身体部位上。后来他们升级了，他们开始重视文化愿意花个几十万去读个 EMBA 了，不是他们喜欢文化，而是权力喜欢文化了，他们可以在那里相遇。于是，夜总会的姑娘们开始注重精神审美了，比如说包里放一本知名学者谭伯牛的《近代史的明媚与深沉》，或者玉面文人宋石男的《人人都有自己的历史学家》，比如说花上个两百多块钱买个本地高校的学生证等等。

范濂在《云间据目抄》之卷二《纪风俗》中说，“风俗自淳而趋于薄，犹江河之走下而不可返也”，风俗即审美标准。当一个社会的权贵阶层荒淫无度，整个社会伦理纲常荡然无存时，社会的审美水准就急转直下了，它反映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人们喜欢的服饰的颜色、款式等等，出现了“奴隶争尚华丽，则难为贵矣；女装皆钟娼妓，则难为良矣”，这种现象跟现如今整容界的风潮极为类似，古今对照，如出一辙。

我们之所以需要审美，是因为有很多人和事需要我们去取舍和辨别，“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这就是审美。审美的能力是一个人在经年累月的生活中积累和沉淀而成的，一个人的审美标准是有时代烙印的，听着小虎队的《爱》长大的，“想带你一起看大海说声我爱你，给你最亮的星星说声我想你，听听大海的誓言，看看执着的蓝天，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和听着 TFBOYS 的《宠爱》长大的，“给你买最大的房子，最酷的汽车，走遍世界每个角落……”，二者之间的审美水准往往会有本质区别。以前流行长裙单车花房姑娘，至少这是一类审美情趣，现在流行短裤跑车海景大床房，更多的还是陷在物欲里无法自拔。以前的文艺作品里夸个人至少也是“娴静犹如花照水，行动好比风扶柳”、“眉梢眼角藏秀气，声音笑貌露温柔”，现在就直接给概括成嫩模、小鲜肉了。审美无力，生活无趣。

人们的审美标准是随着时代而变化的，前提是操控这个时代的人允许你变化，允许你自由审美。比如说安史之乱之前，唐朝以壮硕、高大为美，安史之乱之后，又以纤细、瘦弱为美，白居易老师喜欢的女子是“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杜牧老师喜欢的类型是“楚腰纤细掌中轻”。再比如说 20 世纪 90 年代，人民可以欣赏气质硬朗的女性，比如晓庆、青霞；人民可以欣赏五官精致甜蜜柔美的女性，比如说丽君、雅芝，人民还可以欣赏大眼睛瓜子脸的玉女，比如说慧敏、祖贤，人民还可以欣赏高冷酷瘦的音乐天后，比如说王菲、慧琳……，这些审美是自由的，是流动的，是

不断生长的。审美的标准可以不同，不同不可怕，可怕的是只允许你有一种审美标准，或者说这个审美标准是不可抗拒的，“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这样的审美标准很可怕，审美应该是在自由的状态下进行的。

高压时代的审美往往是跟政治相关的，而且必须相关，这种审美是低劣和扭曲的，比如说“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比如说林立密集毫无美感和设计感的钢筋水泥之城，比如说四处可见的领袖雕像和狂热标语。审美成了政治任务，审美标准必须为政治服务，在这样的审美环境中，艺术家创作的作品风格只有“红、光、亮”：人物红光满面，双眼发亮精神焕发，内心充满着坚定的信仰……就像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时期的作品，主角都是壮硕的工人小伙子以及强壮的女拖拉机手，人们的审美标准也是以此为参照，不论是找工作还是找对象，就像朱新建以前说过的那样，“来世我愿意做一台手扶拖拉机，插队的时候村里有一个健壮、快乐的女孩儿，让她来开我，我一定不亦快哉！”

在十几年前，很多人都从审美的角度用审丑的话语评论过芙蓉姐姐和凤姐，并称之为全民审丑时代的到来，甚至有人担心这种“审丑”会由变态转化为常态，现在看来这种担心是多余的，那时不仅没有转化为常态，反而比现在这些丑陋的行为美丽得多，因为这两位姐姐的背后没有权力意志主导，那时候的网民有点自视甚高，现在回头来看，竟有点可笑，当年担心两位姐姐那样的审丑行为会成为常态的人，现在应该都像个小丑一样常态化的做着核酸检测吧？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网络环境都是相对宽松的，那时候即便是丑的，也丑不到哪里去，更何况所谓的丑也是有成长空间的，那时的社会文化土壤给了她们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机会，苏东坡在《孙莘老求墨妙亭诗》中写道：“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虽然谈的是书法，但也适用于一切审美判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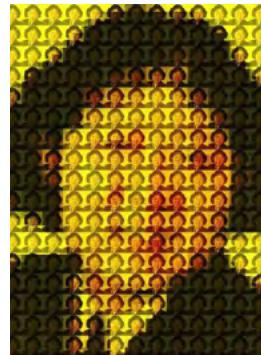
这段时间老一辈歌手崔健、罗大佑、王心凌又重新活跃在舞台上了，而且受欢迎的程度大有超越当下流量明星的势头，很多人认为这是青春回忆在起作用，当然有这层原因，但如果只把它定义为怀旧，则是矮化了这些人这些歌在社会层面的积极作用，人们不仅仅是在怀念过去的青春，过去的生活，更是在怀念过去的时代，过去的风过去的雨以及过去的文化土壤和审美滋养。这就跟疫情之下被封闭已久的人们，突然流行起露营一样了，这是长久以来饱受丑陋行为摧残的人群，内心渴望大自然、渴望自由自在、渴望无拘无束生活的美好向往和具体体现。或者说，这是一种对抗，就像是“以有趣对抗无趣”，是对层层加码的防疫措施的反抗，是对无休无止的核酸检测的无声抗议，是对没有盼望的生活竖起中指。

这些年互联网的发展是以流量为导向的，并不是以内容为导向，这就导致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了大量粗制滥造但流量极大的内容以及众多流量明星，审美发育成熟的我们尚且避之不及，甚至有些招架无力，更何况那些还处在美育成长中的孩子。从审美的角度来看，这些流量明星把粉丝当做敛财的工具，但他们本身也逃脱不了成为他人敛财工具的命运，所以，他们是很丑的，什么偶像经济，饭圈文化，既不是经济也没有文化，他们只是加剧了本已被掏空的社会崩塌的速度。这些流量明星本应成为撑起社会责任的其中一条支柱，但他们却只是成了社会支柱中的一条蛀虫。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写道，“娱乐至死的可怕之处不在于娱乐本身，而在于人们日渐失去对社会事物进行严肃思考和理智判断的能力，在于人们被轻佻的文化环境培养成无知无畏又不自知的社会群体。”娱乐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不论是粗浅的还是高雅的，人们有自己的审美自由和标准去选择去防御，可当娱乐成为社会统治的工具而不是服务大众的目的时，娱乐至死就开始了，有人沉迷于娱乐中致死，有人被现实恐吓后躲进娱乐中至死。

人心百态，遍地都是丑的种子，这不可怕，因为还有很多充满人性光辉的美好种子，可怕的是土壤病了，只能为丑的种子提供养分，无法为美的种子提供养分。2008年有一部动画电影《机器人总动员》，这部电影的主线故事是，随着人类社会的高度发展，地球上的垃圾也越来越多，生态恶化到已不适合人类生存，于是人们离开地球，只留下一些机器人在清理和打包地球上的垃圾。最后只剩下一个名叫瓦力的机器人，有一天它在荒废的大地上发现了一株绿色植物，这预示着地球开始具备适合人类生存的条件了，最后人类回到故土。这有点像当下，在无休止的疫情里，在渐渐沉入深渊的人群里，总有那么几个人闪烁着光芒一跃而起，虽然最后还是不免要坠入黑暗的深渊，但那一丝跃起的光亮，还是点燃了更多的人心，就像上海做着免费“摆渡人”的骑手们，就像那个对无来由封闭不满竖起中指的年轻人，他们就是这个时代的绿色植物，他们在告诉我们地球还值得抢救一下。

《机器人总动员》是一部既有警醒作用最终又给你希望的电影，但中间缺少了一样东西，那就是人类的忏悔，没有忏悔地重返地球，很有可能又是一次对地球灾难性的毁灭。而我们为什么要回忆，回忆里有适合植物生长的土壤，回忆里有我们现在需要汲取的养分，回忆里还应该有对过往的忏悔、对未来的盼望以及对当下的审美，就像我们总是回忆1998年那一刀未剪就上映的《泰坦尼克号》，最初我们回忆凯特·温斯莱特的胸脯，最后我们回忆“一刀未剪”，这是一种审美性回忆。

我们应该进行审美活动，特别是遍地都是丑陋的时候，指出丑陋，是审美自由，是我们最后的体面，为了这体面，我们和我们的孩子，都需要学习，就像约翰·亚当斯说的，“我必须学习政治和战争，这样我的孩子就可以自由地学习数学和哲学。我的孩子应该学习数学、哲学、地理、自然史、船舶制造、航海术、商业和农业，这样他们的孩子就有权学习绘画、诗歌、音乐、建筑、雕塑、装饰和陶艺。”



王永智

曾用艺名王五四，自媒体行业从业者，资深互联网创业失败者，百余微信公众号被剥夺者，坚信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部分结果未显示。

王伯伯脑保健操

秦楼楚馆声犹在，黑夜总会过去，一个别有用心良苦的专栏，希望读者不明真相大白。



图片来自 [WEB AGENCY](#) on Unsplash

专栏

当珍宝海鲜舫沉入海底时， 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

王永智 | 王伯伯脑保健操

我们一会是两吃的鱼，一会是待宰的羔羊，
一会是镰刀下的韭菜

火箭队的前教练范甘迪曾经买过一件阿玛尼西装，刚开始穿着还挺玉树临风，后来这件名牌西装就被他霍霍得皱巴巴，再加上他又经常出现在电视上，所以品牌方阿玛尼有点受不了了，于是跟范甘迪说，你说个数，只要你不再穿俺们家的衣服。要不是中国的社会大哥太多，我相信 BOY LONDON 品牌也会说，大哥们说个数，只要你们不再穿俺们家的衣服，更准确地说是只要你们打人时不穿。唐山打人事件的行凶者因为穿着一件 BOY LONDON 的衣服，使得该品牌遭到了无妄之灾，它们的广告语是“你离潮人就差一件 BOY LONDON”，而在群众眼里，早已变成了“你离打人就差一件 BOY LONDON”。当然，穿着时尚品牌、奢侈品牌打人的社会大哥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打人者穿着公家品牌的服装。借着唐山打人事件的热点，越来越多的人公开举报唐山的黑恶势力，这不叫蹭热点，这叫合理利用社会关注度，这说明平时的举报很有可能失效了，这也说明“敌在本能寺”，如果举报黑恶势力都需要找时机，需要等热点，那么“见义勇为”这件事，的确需要再三思考了，不是人们变得懦弱了，而是社会变得险恶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可我们手里连刀都没有，不仅没有，行凶者手里可能还有“枪杆子”。执法者成为行凶者很可怕，就像存钱的地方变成吞钱的地方一样。今年四月，河南多家村镇银行出现无法取款的情况，以河南许昌农商银行为大股东的 6 家村镇银行，集体暴雷，不承认储户线上存款。他们一方面禁止 40 余万储户取款，一方面说可以给生活困难的储户发放贷款。这种“一户两吃”的玩法很像是一鱼两吃，而且鱼还是自带柴火和锅来的。他们的这种做法很符合当下某些部门的气质，一方面群众没有困难就给他们制造困难，一方面帮助群众解决部分困难，大爱无疆，多难兴邦。担心部分储户不领情，他们还利用储户身份证件信息精准赋予全国所有储户“红码”，就算此时身在东北、广东等地的储户也难逃一劫，当我们以为健康码的红黄绿就像哨兵一样神圣不可侵犯时，没想到在某些人的操控下它比交通信号灯的红黄绿还容易变换，当举国上下把健康码及其背后的防疫工作当成头等大事严肃对待，甚至很多人因为这个码进不去医院只能等死时，没想到在他们眼里这就是个儿戏，健康码是儿戏，我们也是儿戏，健康码就像一个双刃剑，铸造时声称是用来保护大众健康的，铸造完毕大家却发现某些人手里菜刀变成凶器，以此类推，身体健康码变成思想健康码，肉体脚镣变成精神枷锁，不远矣。不过，相信那天到来时，我们一定是处乱不惊的，因为震过太多次，惊过太多回了，这不是一种麻木，而是绝望。

从唐山打人和河南村镇银行这两件事里，我们可以感悟到人在社会中三种无拘无束的境界，一是个人身份信息得不到保护，二是个人私有财产得不到保护，三是个人得不到

保护。于是身处三界之中的我们就不再是个人，我们一会是两吃的鱼，一会是待宰的羔羊，一会是镰刀下的韭菜，我们看上去变幻万千，但始终成不了那个人。我们的社会属性、社会身份、社会符号很多，但在这些的下面，始终空空如也。当我们要求被像个人一样对待时，就仿佛打破了某种禁忌，触犯了天条，就连同类也震惊了，有吃有喝的，你怎么能提出如此无理的要求。那种景象，就像猪圈里，一头猪先是吃惊地看着想要跳出猪圈的同类，然后轻蔑一笑，低下头继续愉悦地吃着猪食槽里的东西。

当我们不被以人相待时，对待他人自然也不会爱人如己，这时的社会“含人量”很低很低，于是“做个人吧”“有点人味吧”，就成了社会生活中紧急需求的物资。于是讲人话有人味的新东方的董老师，就在这样的危急关头挺身而出，为社会的“含人量”补充了营养。他在直播间卖货时说“当你背单词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算数学的时候，南太平洋的海鸥正掠过海岸；当你晚自习的时候，地球的极圈正五彩斑斓；但少年，梦要你自己实现，世界要你自己去看。”最近这句话广为流传，所以阿拉斯加的鳕鱼很累，在中国人的生活里一次次跃出水面，下次大家可以换成阿拉斯加的帝王蟹，“当上海多部门启动抗疫捐款时，阿拉斯加的帝王蟹正跃出水面；当唐山市民排队举报黑恶势力时，南太平洋的海鸥正掠过海岸；当河南村镇银行取不出款随意赋红码时，极圈上的夜空散漫着五彩斑斓……”还是鸡汤最温暖人心，特别是人们经历了多年的疫情，看多了疫情之下个体的悲惨遭遇，就更渴望来一碗暖暖的心灵鸡汤了。

因着新东方老师的身份和张嘴就来的金句，董老师和他的同事们被直播间的人定义为知识分子，这是直播间里的消费者缺少文化素养的一种表现，但这并不令人吃惊，毕竟相比其他火过的带货而言，新东方的老师们就像一股清流。但他们真不是知识分子，就像宋石男老师说的那样，“所做的事也没什么知识和观念意义上的价值”。这只是一种平和的表述，并非高高在上的批评，要批评的人很多，但并非董老师和他的同事们。我觉得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如果董老师他们没有更深度的商业运营和内容创作能力，很快就会被这些所谓的拥趸抛弃，鸡汤一碗就够，蜜月期也很短，商业还是需要回归它的本质，否则鸡汤喝完，碗打翻，就剩下一地鸡毛了。抛开政策风险不谈，在商业方面，我觉得李佳琦他们的模式会更长久，他们的用户更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以及李佳琦们能给他们什么，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清清爽爽，商业恒久远。不过，政策的锤子已经落下，李佳琦们都往事随风了，就像当年做教育的新东方一样。

根据以往的经验，目前追捧新东方直播的那些用户里，肯定有很多翻脸比翻书还快的人，不是说这些人品质有问题，而是说病态的社会下，畸形的商业环境里，人的消费心理是很奇怪的，但又不难理解，罗永浩的离开，新东方直播间的火爆，更像是直播带货行业的回光返照，看了几篇董老师的采访，感觉他是个充满善意同时又真诚还有点可爱的人，这样的人，本身就是这个含人量低和营养不良的社会的稀缺产品和营养品。董老师在直播间其实是熬了一锅心灵鸡汤给众人喝，只不过他很真诚地告诉大家，鸡被官府抢走了，只能用鸡精代替一下，对不起大家，大家感动得热泪盈眶，因为许久没有被人如此真诚而又温暖地对待过了，毕竟当下，人们更需要的是抱团取暖的感觉，而不是一只真鸡。

新东方教育这样一个形象健康的企业销声匿迹，其实是令人不安的，并非社会离不开它那样的教育，而是它的存在，某种程度上与这个社会是否还能健康前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直播间的努力以及转型成功有望，在社会心理层面，是一种生产自救、坚韧不拔精神的暗示，它们以重获新生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会给他们极大的安抚感和希望，人们愿意为这种安抚感和希望买单。这就像灾难后的曙光，会给人额外的温暖，可这是戏剧化片段性的表达，事实上，谁也改变不了灾难已经造成的伤害，甚至是这种伤害随时还会再来一次，所以我们不应该沉迷于这种虚幻中，所以当人们还在新东方的直播间里买买买时，腾讯“清仓式”减持新东方在线套现七亿，这就是现实。

所以，当董老师以“谷贱伤农”，来解释东方甄选的玉米棒为啥那么贵时，我感觉那锅鸡汤快要熬干了，谷贱是伤农，但熟悉电商的人都知道，谷贵跟农也没啥关系，多卖的钱并不会分给农民，“帮帮老农”只是电商行业低级的营销手段，董老师当然不屑于用这种方式，但这样的表述会把公共问题简化美化，甚至归结于错误的对象。在这样的社会里，“农”注定是被剥削的，被剥削的又何止是农，新东方教育这个“商”呢？大家特别是董老师，不会风轻云淡地认为是新东方经营不善吧？董老师在直播里说，“在我直播的时候，在祖国大地上，风吹麦浪收割机轰鸣……我明白他是想烘托一种销售氛围，搁以前没问题，但现在讲这个过于新闻联播了。董老师在卖苹果时说“总有人得做那些事情，你觉得一箱苹果 20 来块钱有什么用，但你知道，你一天晚上卖出去 1000 箱的时候，这一个果农家里，一年他家孩子上大学的钱，生活费的钱，老人吃药的钱都够了……”，这比美化苦难要真诚一些，但这种真诚又有溢情的嫌疑，甚至是不负责任的，如果我们只是借助这些苦难来表达自己的悲天悯人，最终引向销售转化，那么这种苦难永远不会有办法得到改变。我们得指出，教育的钱，生活的钱，医疗的钱，不是卖点苹果就能解决的，不是我们内心最柔弱的部分被打动，然后下了几单就能解决的，而且在全面脱贫的情况下，你直播也要小心，提这些苦难，会违规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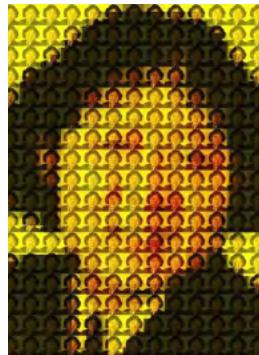
我之所以说董老师是社会“含人量”过低的补充，并不是因为他有多渊博的知识，多睿智的观点，而是他身上的悲悯之心，你也可以理解成人情味，现在能讲道理的人太多，讲规矩的人太多，讲政治的人也很多，但都缺少人味，就像上海那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过生日，想去粮店买两块钱的切面，因为没有手机没办法扫场所码而无法购买，很多人说，为什么要过生日为什么非要买面为什么不学会用手机，也有人说规矩就是规矩，不要用煽情来破坏规矩，听上去都很有道理，却一点人味都没有，其实一细想，又何止没人味，就连道理也说不通，没有手机的人就不配在社会上走动了吗？没有手机就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检验了吗？过生日想吃面去买面是正常的消费行为，假如是想吃水果你会说为什么非要吃水果，按照你这套逻辑，最好在家里绝食，饿死在家里就是过了一个难忘的生日了，就是过了一个守规矩的生日了，就是不给社会添麻烦了。

这个社会之所以看上去正常，适合正常人活着，不是因为人人都守所谓的规矩，特别是守那些临时性不管合理不合理合情不合情的规矩，正是因为很多人敢于对那些不符合人性和常理的规矩提出了抗议和反对这个社会才能像个正常社会一样适合正常人生活，而现在之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不开心，就是因为那些看上去合规却根本不合情合理的东

西堂而皇之大行其道。单一看待一个问题，当然有解决方案，但当我们觉得这个解决方案很别扭很冰冷很生硬时，我们应该再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矛盾冲突。就像河北那个因肠梗阻得不到正常治疗而死亡的婴儿，她先是根据规矩被送入方舱医院，医生根据规矩要核酸报告，等核酸结果出来婴儿抢救无效死亡，看上去大家都在遵守规矩，只有这个婴儿不合时宜地生病，又不合时宜地死亡。2022年5月18日，石家庄市医学会召开医疗事故鉴定会，鉴定结果为一级甲等医疗事故，省二院承担次要责任，婴儿家长负主要责任。我完全同意这个鉴定结果，是家长太守规矩了，没有为孩子据理力争，没有为孩子冲破这些不合人性的规矩，他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责任，那就是把婴儿带到人世间。

每逢天灾人祸，政府总爱树立一些灾后生产自救的典型，什么叫生产自救，就是守规矩不麻烦政府不指责政府，即便这次这难是政府失职或者政策失当的原因造成的，他们也不哭不闹，努力自救着，政府喜欢这样的人，群众喜欢这样的人，政府喜欢的是无人问责追责，群众喜欢的是西线无战事岁月仍静好。当然，有些事是无法追问和追责的，受害者可以选择默不作声，但真没有必要因为多卖了三五斗，就欢天喜地的。

有一阵子我突然觉得时评没法写了，时评是写人的，时评是写给人看的，可这个社会里的人越来越少了，我闻不到人味了，怎么写，又写给谁看。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想从时评中获取答案，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进步的答案，这是可笑的，也是廉价改变和虚假希望的代表，与其在时评里寻找，不如去新闻联播里畅游。这些年发生了很多事，一件比一件不可思议，后来看到新东方董老师的直播我才恍然大悟，让我们重温那段话语，“当你背单词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算数学题的时候，南太平洋的海鸥正掠过海岸”，我觉得很多发生在我们这边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东西方在用蝴蝶效应试探和伤害彼此，就像当我们正摸着石头过河时，美国人正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摸着石头过河，美国人也搞不懂自己为什么总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或许崔健知道，他老说，“现实像个石头，精神像个蛋，石头虽然坚硬，可蛋才是生命。”



王永智

曾用艺名王五四，自媒体行业从良者，资深互联网创业失败者，百余微信公众号被剥夺者，坚信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部分结果未显示。

王伯伯脑保健操

秦楼楚馆声犹在，黑夜总会过去，一个别有用心良苦的专栏，希望读者不明真相大白。



图片来自 [Florian Weichelt on Unsplash](#)

专栏

我们今天开车去卡辰

王竟 | 在汉堡

虽然“老东”“老西”是两德统一后双方的笑称，可谁又能保证，玩笑仅仅是玩笑。

01

德国今年要改革房产税，有房产的人都必须提交一份表格，如实填写房子建成的年份、宅基地面积等信息。我们在汉堡的一位街坊，他家的房子是1898年盖的，但他搞不清宅基地的面积，就去区政府建筑部交了32欧元，查阅历史文献。回来后，他给我先生乌韦看了他拍的一堆照片，盖房申请、图纸到后来历次改建、包括修车库、抹外墙，都一一在案。他说，住在一百多年的老房子里不觉得有什么，可是，手里摸着1898年留下来的旧黄纸张，感觉好怪。

就像我们的街坊，乌韦也有搞不清楚的问题，他不知道他的卡辰小屋是哪年盖的。1990年代中期，乌韦收到一封信，通知他是前东德地区一处房产的法定继承人。这栋房子坐落在一个叫卡辰的村子里，是乌韦祖上的两个兄弟一砖一石自己盖成的。冷战期间，住在房子里的亲戚陆续搬出，据说，老人可以在达到某个年龄线后正式离开东德，省去政府的养老负担，只是离开的条件很严格，除了身上穿的，不许带走其他东西。年纪轻些的亲戚是用各种隐秘的方法逃走的，去了西德或欧洲其他地方。此后，这栋房子充了公。两德统一后，不知经过了多少复杂的追踪排查程序，老屋最后落到了乌韦名下。

乌韦犹豫了很久，是不是要把这栋又破又旧的房子卖掉。那时我们刚认识不久，我拿出中国人的道理对他说，这是你家好几代人住过的祖宅，怎么能在你的手里卖掉呢？乌韦被说服，就花钱把老屋做了一番必要的修整，这个房子成了我们的度假屋。在天气好和不忙的时候，我们会去那里住几天。但乌韦对房子的历史沿革几乎一无所知，只是懵懂地认为，应该是在世纪之交建的。

那么现在，该怎样“如实填写”政府要求的信息？我们决定效仿汉堡街坊的做法，去卡辰村所在的县政府查询历史文献。

从汉堡开车去卡辰，往西南方向走，行程80公里，约一个半小时。我们一大早出发，开完前三十公里后，就进入了东西德时期的东德地界，从那里开始，一直到卡辰，道路都基本上沿易北河修筑。易北河发源于捷克，东北流向，入德国境内后，先是经过前东德的三个州，然后流经原属西德的下萨克森州和汉堡，汇入北海。二战结束后，原先的德意志帝国分东西德而治，易北河成了一道双方认可的天然分界线。1990年中期，乌韦第一次带我去卡辰，我被那个地区的自然风光迷住了，森林、田野、草滩、河堤，散落的红砖房村落，悠闲吃草的牛群和羊群，农居屋顶上有野鹤坐窝，易北河分支的小河里，野鸭和天鹅旁若无人地浮游，道路两旁是粗矮的苹果树，谁都可以停车采摘……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这个地方好像遗世独立，没有跟着世界改天换地，而是静止在某幅19世纪的风景油画或一首巴赫的田园曲里了。乌韦说，

两德时期，这里是边境重镇，所以没有任何工业发展，统一后成了国家自然保护区，也不允许发展工业。

突然，他就跟我讲起跟此情此景毫不协调的东西。那是在1970年代末，他的一位也住在汉堡的远房舅舅申请到去卡辰看亲戚的许可，带他同行。西德这边波澜不惊，可车一开到东西德交界的路口，气氛马上悚然起来，一通过关卡，到了东德地界，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他们的车随时被拦停，士兵们持枪荷弹，用严厉的态度检查他们的文件，除了开箱搜查，还拿镜子反照汽车底座，好像面对恐怖分子。东德一边的高度紧张和敌意，对衬着西德一边的松弛和平常，一个怕坏人进来和自己人逃跑，另一个什么都不怕。乌韦一提起这情景就觉得匪夷所思。

现在，我们每次从汉堡往卡辰开的时候，路过当年的边界，只会看到路边一块褐色字迹的牌子，跟其他说明旅游景点的路标无异。乌韦还会指点几个当年格外吓人的检查站地点，我们嗖地一声开过去，若不是他指指戳戳，窗外的景色跟其他路段并没有什么不同，痕迹已经消失干净了。

02

县镇府的公务员很实在，告诉我们，关于卡辰村闵采尔路15号的信息，他们的档案记载为零。我们有些不敢相信。德国的官僚管理系统可是非常严格和完善的。是被二战毁掉了吗？乌韦问。她摇摇头，戴着口罩无法读表情，她的摇头是不知道呢，还是与二战无关？

那么，是东德时期被销毁了，还是两德统一后遗失了？乌韦继续问。公务员又摇了摇头，说，抱歉，我真的不知道。一直到两德统一前，卡辰村和我们整个县都是属于梅前州的（原东德的一个州），统一后，这里民意投票，重新归属了下萨克森州（西德的州），从魏玛帝国到东西德分裂前，我们都是下萨克森的一部分嘛。可能是出于这个行政区域改变的原因，以前的档案就没有了。

那，我们该怎么填写房产税改革需要的信息呢？我问。

公务员想了想，给了我们两个建议，一，请一位本地的建筑师来做鉴定，他对这个地区的房屋建筑十分在行，一看红砖烧制的情况，房屋搭建的格局，就能把建筑年代判断得八九不离十。二，也可以问卡辰村的汝格勒先生，他对卡辰村的历史了如指掌，而且热心收集本地区的各种历史文献，准儿他那里也有线索。

乌韦和我回到车里，快速地商量了一下。约建筑师是件耗时的事，汝格勒先生我们在村里见过，只是不熟。他家住在村边上，门前就是国道。而我们的房子在卡辰村里面，挨着森林。村里总共住了四百来居民，除了房子可以互相望到的邻里，我们跟其他人不太熟。

乌韦想起了堂叔纳比和堂婶丝特，他们就住在县政府所在的小镇上，一家三代持续经营这个地区唯一的一座加油站，也许我们可以去问问他们的意见。

一脚油，五分钟后我们就坐在了堂叔纳比的花园里，堂嫂丝特给我们倒了两杯冰水。纳比瘦高，一米九的个头，丝特矮胖，跟我这个一米六出身的身高差不多。五十多年前，他们在卡辰村的舞会上认识了，从此结婚成家。纳比很自豪地给我们演示他家露台新安的钢筋玻璃天棚，上面铺着特制的收放自动化的遮阳布，无论太阳多大，只要一摁按钮，露台上立即一片荫凉。乌韦关心，这个斜面的大玻璃天棚怎么擦洗，纳比说，当然每年要雇专业的清洁公司来擦几次。我们都吐吐舌头，笑了。加油站给他们带来了殷实的家产。纳比七十多岁，儿子在汉堡的一家国际物流巨头做软件工程师，眼看加油站传不到第四代了，夫妻二人就在十年前把加油站租赁出去，让外人经营。

丝特曾跟我讲过，若不是两德统一，他们的生意决不会有今天的发展。前东德跟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有一个相似之处，就是非劳动人民子弟不能上大学。纳比的加油站是他祖父创建的，又从父亲手上传给他，他本来想说不。他的梦想是去莱比锡读大学，但在东德体制下，作为个体经营者出身，他没有资格，只好接着开加油站。夫妻二人辛辛苦苦，但赚不了多少钱，还要夹着尾巴做人，当心人打小报告，至于开个加油站会犯哪些错误，无人知晓。丝特说，那年代，每个村每个县以至全国，至少有一半的人是体制的坚定者。人人都可能被打小报告。东德一解体，史塔西档案就开放了，谁都可以申请看自己的那份。纳比马上做了申请。“监视你们的人是你们猜的那位吗？”我忍不住好奇。“当然不是，”纳比说，“永远是那个你最想不到的人。”丝特说，仅这个县就有90%的人申请去看自己的档案了。所以，东德解体后的人际关系变得不如从前。好在他们夫妻往前看，鼓起勇气贷了款，更新了加油站的设备，财富就显著地积累起来。

这会儿聊到卡辰村的老宅，纳比说，他只知道这个房子跟他祖父有一定的关系，更多的他就不清楚了。他也没听说过，县里居然有一位这么牛的建筑师。丝特等丈夫把话说完后，安静地告诉我们，她跟汝格勒从小就认识，她小时候还去过汝格勒家开的饭庄吃饭呢，那里特别美，要划船过去。

乌韦跟我交换了一下眼神，觉得他堂婶是不是把人搞错了，我也一头雾水。我们认识的汝格勒，住在卡辰全村位置最差的地方，几年前，他上了岁数，就把开在自家院子里的汽车维修站关了。方圆数十公里内的汽车修理工，有不少都跟他学过徒。哪来什么要登船而至的浪漫饭庄？

03

丝特是在一种极特殊的环境下长大的，我们对此有所耳闻，但从来不敢细问。向前看是他们夫妻二人的座右铭。有一次，乌韦和我开车去离卡辰不到两公里的更西边的一个村子。那个村子地理位置极佳，直接坐落在易北河边上，几乎每栋房子都是河景房。村里有个“边境博物馆”，用很老式的方法陈列了一些黑白照片和密集的文字说明。我们从一派田园牧歌的世界毫无准备地走进这个展览，才知道在六七十年前，易北河东岸的沿途村庄发生过那么多惨案。

展板上白纸黑字地写着，全东德有321140登记在案的边境居民，其中3175名被强制搬迁，该计划名叫“消灭害虫行动”。谁是“害虫”？这是机密，直到某户人家突然

接到通知，责令其在 48 小时内搬走。搬走意味着彻底拔根儿，永远离开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家乡。正是这种不知轮到谁的不确定性，让人人自危，每个人都会被怀疑成潜在的叛逃份子。在卡辰附近的河段，易北河宽度不到百米，对岸就是西德。等某家某户出事后，从不会给出解释，为什么是此家而不是彼家被列上“害虫名单”，其他人继续担惊受怕。展览上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可能这就是当年制造恐慌的刻意手段。

丝特的娘家就曾住在这个封锁区的某个村庄里。

“你小时候认识他？”既然丝特婶这回自己开了头，我就小心翼翼地问下去，“咱们说的是同一个汝格尓吗？”

丝特点点头。她和纳比都有当地人一个特点：话少，而且有问才答，基本上不主动开口。不过这次，她跟我们多说了几句。她和汝格尓都是在易北河东岸的安保巡逻区长大的，但不同村。1952 年，东德对易北河东岸做了三个划分区，以易北河为基准，离河 500 米之内为“安保巡逻区”，由人民警察巡视管理，5 公里之外才是“正常生活区”。我们的卡辰位于 5 公里边境严防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乌韦跟他舅舅当年来一趟有多不容易。

封锁最严的，是丝特家生活的 500 米安保巡逻区。尽管她在这里出生长大，她的村子跟易北河只隔一个绿草茵茵的河滩，可她从来没有见过易北河。从 1952 年开始，易北河河堤上修筑了铁板隔离墙，墙头拉了铁丝网，还有一段一个的卫兵哨塔。除非有特别许可，外人不得入内。村民倒是可以自由外出，但要按照规定时间返回。夜夜执行宵禁，免得村民被当作偷渡者遭误伤。

丝特在这个环境里长到 17 岁，之后才到一个属于正常生活区的小城读职业学校。17 岁前，她不知道世上还有另一种生活，所以没觉得自己的世界是奇怪的。但有三件事不能忘，一是她怕极了边境警卫队的狗，它们故意被喂得很少，总是饿，虽然拴在极长的链子上，可以追捕任何想偷渡边境的人，但它们有时会挣脱链条，跑到村子里来偷鸡和兔子，也咬人。二是村里的大地主，在一个浓雾的黑夜，全家老小划船逃到河西去了。直到他们的牛因为没有按时挤奶疼得嗷嗷叫，警卫队和全村人才发现人去楼空。三是丝特班上的一个男生，成功翻过上了铁丝网的高墙，跳到易北河里朝对岸偷渡，结果被淹死了。易北河不是很宽，河水的湍急容易被低估。

我把我在“边境展”上拍的一张照片给丝特婶看，那是 1989 年 11 月 25 日，响应柏林墙倒塌，易北河河堤上的隔离铁板和铁丝网被拆除，河边上，大家人山人海等渡船，只需三分钟，烧柴油的小船就从此岸开到彼岸，那天不知来来回回跑了多少趟，一共运了 1000 多名东岸的村民去西岸。很多人都说，他们在易北河边住了一辈子，这才第一次看到这条河。

丝特婶说，她小时候虽然没有见过易北河，但易北河每年有几次涨水，水会漫上河滩，若正好赶上节日，大人带孩子们去汝格尓父母开的饭庄吃饭，就要划船过去，那是非常欢乐的情景。汝格尓家在河边已经住了上百年，他们有远近闻名的饭庄、果园，汝格尓的姥爷和父亲都捕鱼，他家的饭菜永远是新鲜的。后来饭庄被关，鱼也不让捕了，但还允许他们家住那儿，直到 1974 年的一天，挖土机来了，把他家的房子全部拆掉，全家被勒令搬到卡辰重新安家。理由是，边境安全需加强，易北河河堤也要抬高，那儿不能再住人了。

04

告别了纳比堂叔和丝特堂婶后，我们继续往卡辰开，只剩 15 公里的路程了。途中穿过几段梦境般的林荫路，那是站在路两边的百年橡树朝对方伸出枝条，搭出了一条条深密的绿拱廊。乌韦还没开口，我就知道他要说什么。他每回的台词都是，只有前东德还保留着这么美的林荫道，西德那边在战后经济奇迹中不断扩宽公路，把长了几百年的林荫道都砍光了。

我们俩都同意忘掉建筑师，去找汝格尓先生问问老屋的情况。在谁去找汝格尓这个问题上，乌韦和我争了起来。两人一起上门显得过于兴师动众，我觉得应该乌韦去找，毕竟是关于他祖上的老宅。可乌韦想让我去。他总觉得，村子里的人可能不太接受他，或多或少，他在村民眼里还是一个从汉堡来的“老西”。有时他找水暖工或电工到家里来修东西，人家拖好几天也不给他个准信儿，他就会嘟囔一句，“老东”就是“老东”，怎么还没养成商业意识呢。虽然“老东”“老西”是两德统一后双方的笑称，可谁又能保证，玩笑仅仅是玩笑。

我就不一样了。我是村里的两个外国人之一，另一个是英国人。他没有德国亲戚，也不跟村里人说话，买了栋快倒的老房子，每年来住两个月。我是村里迄今来过的唯一一个中国人。也许因为民主德国和中国曾经是阶级兄弟和姐妹，也许因为我见人就打招呼，总之，我的人缘还可以，邻居雷娜特过六十大寿的时候烤了十个蛋糕，我被邀请参加了这个盛宴；另一位邻居，龚特的母亲去世时，是我代表我们全家去村教堂出席了追悼会；复活节火堆晚会上，跟乌韦聊天的熟人多，跟我主动碰杯的不熟的人多。

其实，我也有些犯怵去找汝格尓先生，因为真的不熟。他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身材不高，面色泛红，自带一种威仪。村操场上每年举办一次的老爷车市集，就是他发起的。如果乌韦和我那个周末正好在卡辰，从家里的窗户就能把村操场尽收眼底，看到东德著名的小轿车特拉比鱼贯而行地开来，还有极具社会主义新农村气派的大拖拉机也突突上场。两德统一后，这些车在公路上早就绝尘而去，却在卡辰这个鸟不拉屎的小村子里还魂而归，且生龙活虎。听给汝格尓先生打下手的龚特说，汝格尓先生的威望很高，全德国有六个州的老爷车连续二十年来参加这个市集，东德怀旧车是诱人的特色之一。

快到卡辰的时候，乌韦和我聊起，为什么这些年来，我们在村子里跟人的交往越来越少。我们很快得出了一致的结论：村子里能碰到人的场合一接一个地消失了。

我第一次去卡辰，两德刚统一五六年，卡辰颇有地区中心村的气派，村里有邮局，花店，面包店，一家小连锁超市，三个医生诊所，全科医生、牙医和兽医，还有一所小学和一家教会资助的幼儿园。邻居指着一个大房子告诉我，这里以前开了个大餐厅，

是村里最有人气的地方，人们在这里聚会饮酒和跳舞，连边境警卫队的军官士兵都要每天过来喝一杯。两德统一后，这是村里第一个关张的公共场所。

渐渐地，邮局不见了，花店也搬走了，小学也集中到镇上去了，早晚由校车接送各村的孩子。诊所只剩下全科医生，全村都数着他将退休的日子。

以前，我们每次到村里小住，都喜欢在早上吸着从田野上飘来的带着牛粪味儿和草味儿的空气，步行七八分钟去面包店买小面包当早点。村面包店已经开了好几代了，还保持着这个古老职业的传统，面包师——那时已经换成女掌柜的儿子——每天凌晨两点起床揉面，不到五点就把面包送进被炭火烧热的石头炉子，六点钟，跑长途运输的卡车司机和早起的村民就陆续过来买新鲜面包了。等我们八点多钟进门的时候，已经没什么可挑的，只剩下最后三四个小面包，乌韦再买一份世界日报，找零钱的时候跟女掌柜打听一下村里的新闻，因为从早六点到早八点，她那里的信息已经攒得比一份报纸还厚了。十年前，这个村面包店也关门了。

超市也没能幸存下来。面包店消失后，小超市成了全村的信息集散地。现在，住在超市那栋房子里的，是一位从汉堡移民过来的古董家具修理匠。超市原先的长条空间，正好变成他的家具修理车间，可谁会去跟一堆老木头和一个汉堡人噜舌头呢。大型连锁超市在卡辰村或北或南平均 15 公里之外。如今，我们每一次来卡辰，都要先在大超市里买东西。像我家邻居龚特这样的没车的老单身汉，基本上靠每周两次进村的流动售货车，从那里买些肉肠、黄油、咖啡等食品。土豆、蔬菜反正都是他自己种。

05

汝格尓先生五分钟之内就把我的问题解决了。

我一个人走进他家院子的时候，他正往一个用空了的白色颜料桶的桶底钻眼儿，他说，何苦花钱买花盆呢，这个桶的大小正好种西红柿。我用手比划了一下，说我今年种得早，我们家的西红柿苗已经有三十公分高了。然后我说明来意，是县政府推荐我们来问他，是否知道乌韦家的房子是哪年建的。

老人看了我几秒钟。听说他几年前轻微地中过一次风，从动作到语言几乎看不出什么后遗症，就是有一点点缓慢，也可能是天性使然。他点了一下头，让我跟他去地下室他的资料库看看。我们一下楼梯，我就明白了，汝格尓先生作为卡辰村的“史官”的确名不虚传。地下室的走廊墙壁上，挂满了各种历史照片。走进正厅，那里就像一个正规的档案馆，摆满了文件、照片和老物件。他先在一个本子上查目录编号，然后打开灰色的铁皮档案柜，用手指划过一列列排序整齐的文件夹，停住，抽出其中深褐色的一本。我从心里佩服这位汽车修理师傅的档案管理水平。

深褐色的硬皮本是 1950 年 3 月 25 日梅前州的一个镇做的《卡辰村住房登记册》，监制单位为该镇的测量局。今天上午到县政府没找到的档案，怎么会落到汝格尓先生手里？我没敢问。但行政划分证明了上午公务员介绍的情况，在东德时期，卡辰归梅前州管。汝格尓先生很快查到乌韦祖上姓名的那一页，建房信息立即赫然在目。那是用钢笔手写的清秀笔迹，黑色墨汁印在发黄的纸上，散发出一种格外的踏实感。房子是在 1910 年落成的，在“一战”打响的四年之前。

我谢过汝格尓，转身告辞时说，对了，丝特问你好，她给我们讲了你家河边的大饭庄。老人一怔，示意我再跟他回到放档案的正厅，指着墙上正中央镶在镜框里的一张手绘平面图，说，就是这个房子，房子是 19 世纪末盖的，1930 年绘制的图纸，1974 年被拆。我突然看到墙上还挂着另一张照片，很小，但跟我在“边境展”上拍到的是同一张。镜头里是一个口叼香烟的老爷爷，挺着肚子站在自家房前，右手牵一个男孩，左手抱一个女孩，无比骄傲自得。我把手机里的照片指给汝格尓看，我拍的时候，也拍下了出现在同一块展板上的其它几张照片，虽然都是黑白的，却充满了田园野趣，有一组孩子立在一棵木舟上，划过被水漫漫的果林，还有一组身着周日盛装的人们，站在一栋很大的农舍前，他们左边是一棵几百年老的栗子树。我不记得自己当时为什么拍下这块展板，更不明白我拍的照片怎么会出现在汝格尓的墙上。

“那个小男孩是我，”他说，“那是我外祖父和我妹妹。”

他请我坐下来，拿出更多的照片和文件给我看。乌韦在家里的院子里割草，左等右等都不见我的影子，等我终于回到家来，他一看表，发现我在汝格尓先生家待了整整三个小时。

汝格尓给我讲了他们家的故事，也分析了卡辰村的衰落。他说，两德统一后，西德过来的官员不了解这里的情况，并没有任何人问过当地居民的意见，就把这个地区的行政归属划给了下萨克森州。人们本来以为，归属一个原西德的州一定错不了，可是，分割了半个世纪的两个体制，彼此差异太大了，当地居民的诉求不被自以为是的西德人理解，卡辰村在新的行政格局下，变得边缘空心。年轻人几乎都走光了，去工资高的地方找工作，他的修理厂到后来，越来越难留住有能力的学徒。卡辰要是留在梅前州的管辖内就会好得多，前东德的遗留问题毕竟只有前东德地区的人心知肚明。那么，卡辰也许还能维持它的中心村地位和繁盛，要知道，在两德统一前，卡辰村可是开了 22 家企业的。

丝特婶说得没错，汝格尓全家是在 1974 年被强迫搬迁到卡辰来的，但汝格尓向我耐心做了解释，他们并不是“清除害虫行动”的一部分。“害虫行动”主要发生在 1952 年和 1961 年。到了 1974 年，他们家的大饭庄早就被勒令停业了，他外祖父和父亲热爱的捕鱼业也因为边境安全问题不许经营了。他们全家都别无选择地加入了集体合作社，还把家里的大院子无偿地贡献出来，供合作社每周放映露天电影。汝格尓本人成了合作社里的机械修理工，甚至还积极入党。全家老小费尽心思，一切的努力只为一件事，就是想让组织放心，他们家是不会起异心，逃到河对岸去的。

说到这里，汝格尓看了我一眼，用手轻拍着桌子说，“我们真的没有打算逃跑，从来就没打算过！这里是我们的家，好几代人已经住了上百年，扎根了。可是，说什么都没有用，他们什么时候想把我们轰走，只需一道命令，你就得连根拔。推土机来把房子推倒那天，正是四月，院子里，几百棵果树都开满了花。他们把果树全砍了，连长了几百年的栗子树也未能幸免。”

汝格尔先生家的客厅跟他的地下档案室有一个明显的反差，档案室的墙上挂满了镜框，客厅墙上只挂了一张照片。但那是一张放得很大的黑白老照片，从上面的人物服装和发型看，应该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拍的。易北河在静静流淌，河边不远处是一棵巨大无比的栗子树，开满白色花朵，一大家子人十几口，散坐在树下，满眼放光地朝我们看过来。

2022 年 6 月 27 日写于汉堡



王竟

中西文化项目策划人 / 写作者 / 德国当代文学翻译者。1989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91 年赴德国工作学习，获工商管理硕士和教育学博士。2013 年至今生活在汉堡。

在汉堡

作家王竟说的是德国日常生活，却是你不会陌生的话题。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相隔很远的人想着同样的问题，近在眼前的人连共同的话题也无法说起。这是全球观察栏目之一种。



小鸟文学出品
卷十八，2022.06
可以留档
请勿商用
有事联系
info@aves.art